

倾听当代中国底层最真实的声音

关山 著

一路

奔走

平山题



华艺出版社

纪实报告

一路奔走

—— 倾听当代中国底层最真实的声音

关 山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00K00.com.cn 和/或 www.B00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00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00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00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 Inc. 的商标。

前言

有一天，我读到了命运多舛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一句诗：“我的时代，我的野兽！”那首诗的名字叫〈世纪〉。

我在哪儿听到过这句话？当时我想。

我的时代，我的野兽！

我决定了，得去走走，我相信在路上人们会告诉我一些真实的事情，那些事情在他们的眼前发生过，并且继续发生着。对于我身在这个时代，我知道些什么呢？

他们一定有话要说，我相信居住在这片大地上的人民！

旅行访问从 1999 年 1 月 1 日开始，至 12 月 31 日正式结束。历时整整一年。在 46000 公里的行程之中，在城市、港口、农场、县城、乡村、油田、牧区、林场、煤矿、工厂和边境，在长途车上、茶馆和路边，我找到了那些敞开胸怀向我倾诉的人。

我访问的这些人，只有他们的亲人和邻居知道他们的名字，为了害怕有些人受到更大的伤害，甚至还要隐去他们真实的姓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底层，他们不曾对谁说起过自己的故事，如果没有人询问，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提到这些故事。然而，他们坚强，他们有智慧，他们口齿清晰。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谋生，歌舞厅的乐手、律师、打工仔、农垦工人、推销员、老红卫兵、乘警、村干部、

占卜师、导游、促销小姐、牧师、铁匠、民间艺人、青藏公路司机、坐台小姐、民歌手、劳动模范、僧人、猎户、烟贩子、老八路、修自行车的人性学专家、边防武警、孤寡老人、渔民——他们是一个真实的民间，他们是昭然若揭的秘密。

在倾听人们的诉说时，我有时被他们的故事打动，有时看到他们不能自持的流下泪水而无言劝慰，我的内心有时会对他们所叙述的细节表示怀疑，有时被他们感染，和他们一起忧虑。

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访问原则，我对他们讲述的内容和叙述方式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他愿意，他讲什么都可以，只要他愿意，他怎么讲都可以。我们需要一种非常自由的交流，虽然这并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完全习惯，但它也许能够更大限度的接近真实。

我对人们说，你可以谈论你自己的事，或者是谈论别人的事；你可以讲述经历，也可以讲述你听到、看到的一切；你讲述的内容可以涉及童年、成长、情感、婚姻、家庭、人际关系、政治理想；可以讲述故事、经历、感受、观念、态度或者是奇思异想；可以表达你的欣慰、满足、快乐或者忧伤、鄙夷、愤怒；你甚至可以谈论你的幻想，因为它同样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你。

因此，除了需要适当的解释之外，我在“访问”中对我的“采访对象”不提出任何问题。我不希望我对他们的谈话有更多的暗示或者导向，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是谈话的主体，而我不是，我只是一个诚恳的倾听者和忠实的记录者而已，对他们谈到的所有内容，包

括他们对一事物截然相反的观点和感受，我尽可能的在书中不加任何评论和分析，尽管我在这样一番经历之后必然有自己的倾向和态度，但我学到的更重要的事情是，下个结论并不轻易。

完成这次旅行访问之后，我总在想，我的遗憾远远大于收获，但这是一种不能抗拒的遗憾。人们还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鲜活的人生和语言，他们的庞大会不断的反衬我的浅薄。面对他们，我曾经做过一些什么吗？

我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像一个叩门人，走街串巷，收集了一些故事，并把它们讲给你。

我要到处去发现真正的人，看他们是什么样的素质，去体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怎么生活，又是怎么谋生的。

我要了解这些值得了解的人们，不甚为世人所知的勤劳的人们。

开始时我感到压抑和绝望，而此刻我心中却充满热情，期待着新的发现。

——彼得 詹金斯〈走遍美国〉

出发

看来一切都准备好了，一个大背包放下了所有旅途中需要的东西。98 年 12 月 31 日的晚间，我正在西安的家里清点行李：换洗的衣物；最新版的列车时刻表和中国实用地图册，在地图册的一些

篇章已经标明了我将 前往的路径；在真正的摄影家的眼里像玩具一样的傻瓜照相机；还有一只 WAIKMAN，对于我的这次长达一年的旅行来说，这两样东西尤为重要，他们将替我记录下我所接触的人物和事物的景象，记录下他们的声音，这些被记录的音节连缀起来，就是一个个小小的故事，这些故事代表了他们自己。

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品，不过这时候我感觉身体状况良好，其实在路上如果你经常告诉自己不要生病，就不大会生什么病。当然你同时要提醒自己，多穿或少穿衣服，注意不要吃腐烂的食物，不要喝冰凉的水。

在衣物的下边，是一些小零碎，其中有把特种兵用的刀子，这把刀子我在路上从来没有用到过，而且后来我才意识到，刀子放在背包中那么隐秘的地方，如果遇到了歹徒劫匪之类的是来不及取出它的。

一名摇滚少年送我一只墨镜，能够夹在我的镜片上面，八个月之后在拉萨裸露的阳光下我第一次用到它，虽然我一直不喜欢墨镜，它会把人的眼睛隐藏起来。

还有一些胶卷和一些磁带，笔和本子。最上层放着我的通讯录，到了旅行结束的时候，那上边记满了名字。

然后就是那个大背包，朋友把它送给我时说这是荷兰专业的旅行包，它装满东西以后鼓鼓囊囊的，总显得和我稍显瘦弱的身体有点不大相称。

这些东西后来都忠实地陪我走完了一年的路程。

当我把他们清点清楚，我意识到，我真的要走了。

我们在平常的生活流程中过着日子，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路上的一年会是个什么概念，在这一年里，我将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我真是一点也不知道。

有谁说过：“旅行一定会带来一些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那总还有一种始料不及的形式。”

第一章 海风过处

[路线：西安——广州——深圳——海口——三亚——屯昌——海口——北海——南宁——广州——长沙——湘潭——长沙——武昌——西安]

我最大的愿望，是写出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民的传记。我相信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断代史，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倾诉都包含着最深刻的现实，每一句话里的期望都预示着我们共同的未来。

——摘自出发前的一封公开信

在这个世界上，在你的生命中，

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想说些什么

把你的故事留在世界上，记录下曾被忽视的声音。

——摘自旅行访问中使用的名片

是不是必须说好话呢？-----不是，什么都可以说。

真的什么都可以说吗？-----真的。

我不信。

——南去列车上一位旅客和我的对话

轮船航行在南中国海上，一月的海，阴沉寂静，空中飞散着的不知是雾气还是细雨，白昼犹如黄昏。我站在船头，有一瞬间，我在想，谁能够在这海面上留下脚印呢？

海是不说话的，他不屑一顾这种孩童式的想象，没有谁能够在他的身上做出标记，所有的航线都画在地图上，所有的灯塔都站在礁石上，再庞大的船只都只是过客。

几年前，几十年前，这片海洋如同现在一般的不可捉摸，有一些来自遥远地域的“闯海人”，他们背负着简单的行李，怀揣着一点希望，向南，再向南，抵达了海边上这些潮湿的城市。

十年前，四川人诸葛宏来到三亚，只是为了打一个赌，十年过去了，他虽然是一着不慎，但并没有满盘皆输，他说：“三亚不相信眼泪”，他仍然在竭尽全力地苦苦挣扎，这让我想到了那句话：“只要没有把生命输掉，你可以一赌再赌。”

华鑫漂洋过海的时候，是怀着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那时他似乎处在生命的边缘，他的行李是一箱注射液和一千支针头——

—而现在，他看起来似乎比我们还要健康。

陆起明八年前到达广州，在这里他看透了人情世态。

周立太为了一起官司来深圳，他的仗义执言从此欲罢不能。

还有那许许多多被忽略了的，那许许多多被遗忘了的，那许许多多被漠视了的，那许许多多像轮船身躯下的白沫子一样瞬间就无影无踪了的。海风过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管是临行前被自己夸张成灿烂星空一样的梦想，还是在这梦想破灭后炼狱一般煎熬出的苦痛，你可以和大海抗衡吗？无论你是怎样珍重自己的尊严，怎样在乎自己的屈辱。

还有，还有，龙岗工厂里那些上下班被搜身的工人，除了瘦弱的身体他们一无所有；海南岛中部农场里那些似乎与世隔绝的农垦战士，他们孤独地守护着几十年前起早贪黑栽种的橡胶林；在高级餐馆里服侍傲慢的暴发户的硕士生，他们用“跪地喂猪”这样的自嘲来保卫可怜的自尊心；那些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赚钱的女人们永远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受歧视受指责受议论受鄙夷的总是她们，而很少有人去责问那些至少同样不大光彩的达官贵人。

在这些明珠一般的城市，在这些繁花似锦的城市，在码头、车间、夜总会、狭窄闷热的街区，你或者是为了存折上的天文数字，香车美人，或者是为了一顿尚能果腹的晚餐，没有谁不是在付出代价。

十九岁的打工仔付绪林付出的代价是一支手臂，这件事发生的

时候，他踏上自己的梦想之路才短短几天；在天河东路的立交桥下，一位胡先生说：“这个城市完蛋了”，他付出的是对这个城市的信任；背着吉他去过街头的歌手敖博唱着：“没有人真正关心过他们，却有人真正驱赶他们，他们不该睡在街上，可是他们能睡在哪里？”

当我看到墙上花花绿绿的招工启事时，我知道这不是他们青春的通行证，就是墓志铭。

在去深圳龙岗工业区的班车上，陪我去访问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想看到那些实实在在的带着血肉的东西，而不是什么花边新闻，你不要写‘人咬狗’，你要写的，是‘狗咬人’！”

“我听见，我看见，我诉说”-----我在接近他们的时候一步一步接近着真实，他们的言说能够指引我去寻找藏在深渊里的依据和根源。带着腥味的海风来自海面，来自阳光不可及的水草遮蔽的海底。

我即使不能完全相信他们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情绪，我也坚定地相信他们的存在。我的主人公们在经历了无数波澜之后，仍然在说：“我知道你是大海，但我仍在这里！”

还有多少人会说自己付出的这一切是为了高尚的理想呢？或许这种理想根本就不存在。更多的人只是为了寻找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甚至只是为了找回自己与生俱来的那一点尊严，当然，要找回它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有一天，我在石碑村的过街天桥上为这个著名的村落拍照的时

候，看到一个乞丐的孩子和一个保姆领着的孩子在一起玩耍，他们差不多一般大，彼此非常友好。等他们长大的时候，那个海并不会更加苍老，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到海上去，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曾去过那里。海风起时，他们的耳边会响起父辈的话：“风吹来的地方，海就在那里。”

拥抱丑陋

陆启明：访问地点是广州天河石牌村陆启明租住的民房；录音的开始时间是 1999 年 1 月 5 日 19 时；他是一名保险公司资深业务员；30 余岁。

见到他时他正在忙着做饭，我们约好了边吃饭边聊天。石牌村的晚上很热闹，带我去找他的朋友忘记了他住在哪一个房间，所有的这些房间都很相象，我们在楼下喊他。

打开一个一人宽的铁门，接下来是一节非常狭窄的楼梯，我能够想象他一米八的身躯走在这样的楼梯上一定是很委屈的事情。

房间是个套间，有一些简单的家具，这个房间每月的租金要一千元。窗户开着，街道的喧闹不时涌进房间里来，能够听到房东在和什么人吵着架，他说，这里的房东很厉害。

陆启明从事保险业的工作已经有很多年，他喜欢读书，思维敏捷。我们在饭桌上开始了这番谈话。

现在，你面对的是这样的景象，不管你处在什么地位，是男女老少，都没把握，没钱的没把握，有钱的也没把握，结婚的人没把握，不结婚的人也没把握，现在只有时髦，没有一点固定的东西。当官的图短期效益，有权不用，过期做废，老百姓更是七上八下。唯一不变的是天天在变，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啦，部门冲突啦，既得利益者的问题啦，国家社会的稳定啦，都是利益冲突。“饭”这个字，没有吃的那一半儿，不就是反喽？贪官污吏不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下岗工人的权利在哪儿呢？

婚姻法也是利益的平衡，离婚以后妇女的权益如何保护？你看看包二奶的现象，外国人离婚，买了房子，离就离了，经济地位有了，才谈得上生存发展。温暖工程、扶贫、希望工程等等，这叫国家利益。九八年出台的财税金融改革，是为了平衡国家和地方利益，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讨价还价；阿拉法特，那是宗教支配下的民族利益；俄罗斯闹的不就是政党利益？个人的声音小，就成立团队，因为政党的声音大。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富的地方要政策，穷的地方要钱。应聘也为了利益，大家要生存嘛，公司为什么要做广告？还不是利益！？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牺牲品，都是过渡人物，整个社会都是过渡性的。你看我，三十五了，工作十一年了，现在居住的更差了，这个房子一个月房租一千元，原来做文员一月工资一两千，现在七八百，别的地方还不如这里，厦门、上海那边都冷冷清清的，坦率的

说，这个行业，初做者做个一两年，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赚不到钱的。做这行的直接跟人打交道，见一个人就和一个人谈判，这关系到怎样保护个人和家庭的利益。

一切都在变，做保险最有意思的是，你可以了解每个人对未来、对自己的家庭有没有信心。比如说，对自己的婚姻有没有信心，我们这些人，说少了是心理学家，多了是社会学家。

我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没有底薪，公司什么都不管，税是一分钱都逃不掉。一个月一个帐单，你还得满怀期望，客户的脸就象小孩子的脸，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他会想出一千个理由不买你的保险，可我们得有一千个理由来劝他心动。你要花时间、精力，这都是成本。说白了，做这个，百分之九十八是掌握人性，百分之二才是销售产品，这一行你做的久了，就是人际关系的大师。什么方面你都能接触得到，人的犹豫徘徊，愤怒激动，什么都有。

我们公司周年庆的时候，轮椅上坐了位杨女士，公司是把她包装了又包装，在大会上把她推出来。她说：“我非常感动！”因为公司赔了她三十万，她说她身体好转了以后，“我也要做保险！”，响亮的口号，我们在底下激动的不得了，公司的承诺兑现了，听上去很好啊。可实情呢？很悲惨！我到病房去看过她，她老公是广东电白的千万富翁，很有钱，但素质很低。她是二奶，没有名分，养了个小孩，五六岁，她老公在上海做生意时认识了她父亲，过了几年她就跟了他，她是二十三岁跟的这个男人。大款你也知道，反正

是喜新不厌旧就好了，就这么平衡下来了。出车祸的时候，惨到什么程度！？我们公司的业务员两个小时内就赶到了，晚上两三点钟，打的过去的。可她老公很晚才来，他也在广州，来了以后呢，先哭他大老婆生的大儿子，死了嘛，哭的一塌糊涂。在车祸发生的时候，她很勇敢，保护着两个孩子，他老公来时，把她先抛在一边，在公路边上，只顾看小孩。其实如果抢救及时，她根本就不需要瘫痪的，他还怪她，根本就不管她。车翻的时候，她非常冷静的保护两个小孩，最后脊柱受损。那么现在呢，住在病房里边，全陪就一个护士，她老公隔两三天来一趟，来了就是五分钟，这五分钟的内容就是吵架。他老公又在外边包了两个女人，她已经感觉到了，幸亏她还留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传宗接代的小孩，否则他看都不会来看她。医药费还是公司的赔偿金，一个月下来都要四五万。她在台上讲话时很勇敢，看着精神非常好，可在病房里却哭的一塌糊涂。她曾经不想活了，要自杀，她是为了这个小儿子而活，强打精神，自己一个人从床上爬下来，坐到轮椅上，然后出去洗头，锻炼上肢。这是我做了这么久保险遇到的最悲惨的事。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保险真的有用，不是看在钱的份上才去做，我在这儿讲的是老实话，如果没有一点点精神寄托，或者是兴趣，真的是没办法做下去的，做下去，是有了一种信念。

做保险哪，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拒绝，一出门就是拒绝。百分之九十五，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夸张，不管你是老人还是新人。电话约

访多辛苦呐，约一个人都要想破脑袋，什么时候约他，他什么时候方便？是喝茶好，还是跳舞好，还是卡拉 ok 好？谈什么呢？既要让他信任我，又不能谈保险，但是我是做这行的，我一定要谈保险，怎么切入，如何切入，气氛如何掌握，难的不得了，真的很费脑筋。全世界的人都拒绝推销，这是人性。你怎么样引起他的好奇心，怎么样欲擒故纵，咳，一大堆的问题，比三国演义还要精彩，这就是它的乐趣，不见火，不见刀枪。

我接着那件事讲，这个很悲惨的事情，跟外边宣传的都不一样，业务员们也都不知道实情。保险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撇开保险来谈，生活真是太残酷不过了。当时我看到那个杨女士拉着业务员的手，我真是感动，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亲切的场面，她希望那个业务员每天来看她就好了，她拉着她一双手，感到精神上有个寄托。实际上呢？那个业务员能给她什么寄托，而且精神寄托能实际问题吗？她能从床上爬得起来吗？小孩谁来替她照顾呢？根本不可能，说人生的无常啊，什么都可以。可当初买保险时，那个男的是坚决反对，连三千块钱都不愿意出。后来，她从赔偿金中拿出两万元给她老公买了保险，受益人写的是她的名字。万一她老公在外边出了车祸呢？意外呢？又可以赔上一两百万呐，她下半辈子就有办法生活下去啦！

有钱的人不买保险，为什么？“买了以后，我老婆不是盼着我早点死？完了可以拿一笔保险金去再嫁人。”实际上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保险的问题，是极端的对婚姻的不信任。“我买它干什么？我死了以后管他干什么？给小孩留那么多遗产干什么？”很多问题都不是保险的问题，但这一行就全部反映出来了。当你辛辛苦苦找了一个准客户，所谓有购买欲望有能力的客户，你敢得罪他吗？你不是法官，也不是评论家。你敢评论他吗？后果就是让你滚。

什么样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有，当官的也不会买保险，跟他的经济收入不符，钱从哪里来的？贪污来的，这问题就大了，要隐蔽，不能买。有钱的个体户呢？私营企业家也不买，阴暗面太多了，想办法投资移民出国岂不是更好，外国的社会保障各方面不是更好？做生意，做贸易，经受的苦已经太多了，还会相信你的政策？何况你这个钱是几十年后给我的，既是投资，还不如短平快，或者我把哪个当官的搞定，赚的钱比你保险不是更多？这就是潜在的回答。当着我们的面，他们绝对不会告诉我们。人们对法律不信任，不是保险法不好，是其他行业多变，所以对保险也不信任。这种情绪是客观存在的，谁相信你几十年的承诺？钱钟书把话说透了，进去的，出来的，你的职业、婚姻、家庭，都在折腾。“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愿望，大抵如此。”“朋友有钱，我们需要他的钱，我们也许需要真正的朋友，不过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朋友。”“眼光放远，万事皆悲。”抓住身边的幸福，就这么简单，谁敢想以后，这么跳，那么跳，我们不都在那儿跳，你还没有办法回避，你只有硬着头皮上去，逃都逃不掉。你移民到国外去，依然逃不掉，

只要你是人，就要面对，很多东西都带来快乐，但同样的东西也带来痛苦，就看你钟摆摆向那一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阶段，又带来不同的悲喜，想开也罢，豁达也罢，都是空话，难得糊涂也是一句空话。戏剧化的人生，到底是戏剧模仿人生，还是人生模仿戏剧？谁能分得清？人一生最根本的东西是荒诞的，四大皆空的，悲观的，只是有份责任感罢了。我对那些出来做的只说一句话，四个字，“拥抱丑陋。”这是勇气，没有这个勇气，就不要做。不拥抱丑陋，你就痛苦，痛苦是标不出价钱的，隐私和快乐都可以卖，谁不想看笑脸？谁愿意看祥林嫂呢？

我劝你不要写这个东西啦，书让别人写去，趁着 99 年赚个二三十万，不如一边赚钱，一边了解生活吧！

讨回公道

周立太：访问地点是深圳龙岗周立太租住的民房；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1999 年 1 月 9 日 13 时；他的职业是律师，现在专门为深圳伤残的打工者打官司；40 余岁。

几年前，一对在深圳打工的四川籍夫妇下班途中遭遇车祸，为了替他们讨回公道，周立太南下深圳并打赢了官司，后来他就留在了这个和他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

在深圳大大小小的工厂里，每年都有两万名左右的打工者因工

致残，他们中的许多人听说了周立太这个名字，他们找到他，他成了打工者的代言人。

他是一个典型的吃辣椒的重庆人，嗓门很高，脾气火爆。

在他租来的民房中，生活着十几位失去了一只手或一条腿的打工崽和打工妹。

说四川话吧。

我的今天始于我曾在湖南挑砖挑瓦的那三年，那个时候我就理解了打工者这个阶层。在当律师之前，我也是一名打工者，维护打工者是必然的。打工群体的这些人是很穷的，他们一打官司就给工厂赶出来了，现在我这里住了十几个。他们的吃住都没有保障，你叫他们交律师费，他们到哪里去找？他们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维持，还说什么人权？有一个女孩子打官司，在街上捡人家剩下的菜吃，天天晚上，她的父亲推着车，她用仅存的一只手去拣菜，维持了两年多，就是为了抗争到底。

我这里的很多打工者是没有手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面子和尊严。我刚才喊他来倒开水的那个人，来自安徽，六安的一个中专生，出来实习二十多天，一只手被轧断了。他通过人家找到我，让我帮他告状。在仲裁的时候，老板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出门，是深圳电视台和我们一起把他解救出来的。

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确实需要你们把它写出来。现在有文化的人都不想去看那些吹牛皮的东西，要看一些现实的东西，

我说的是老实话，你像我，活了几十年了，哪种牛皮没吹过，没听过？

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就是学法律。我从小就喜欢仗义执言，1980年去湖南安乡县的砖瓦厂打工的时候，我看到工人经常为了要工资打架，出了一些流血事件，甚至是砍伤人，我就想到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过一本书，写的是施洋大律师。虽然我文化不多，但我也读了很多书。我想，施洋大律师伸张正义，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伸张正义呢？

我是怎么来到深圳的呢？1996年的10月，开县南门镇有一个叫徐昌文的人，夫妇两人在深圳打工，有一天下午下班以后，徐昌文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回到自己的宿舍去，被一辆汽车当场撞死。这两公婆死了以后留下了三个孩子，最大的9岁，最小的只有3岁，而且死者还各有一对父母。我受他们父母的委托到深圳去打官司。来到深圳，打官司历时四个月，最后总共索赔了33万块钱。这个案子在深圳造成很大的影响，过去从来没有赔过这么多钱。特别是过去的深圳政府部门认为，下班以后被车撞死只能按照交通事故索赔，工厂这方面不能双赔，这是他们的一种传统观念。我国的法律认为，上下班的途中，如果因为发生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应该双赔。出劳动法以来，人大1993年所颁布的地方法规也是这么决定，它还算工伤。

深圳的打工群落是一个比较底层的群落，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真

正理解他们的痛苦。这时候有一个叫彭钢中的找到了我，他是四川资中县的人，在宝安区的一个塑料玩具厂打工。在那里，他把右手全部砸断了。当时他请了两位律师帮他打了两个月的官司，只赔了三万八千块钱。他找到我的时候只差没有跪到那儿，我当时想急于回到开县，但是他找到了我，他说：“律师，请您帮我打官司。”他所在的那个工厂的老板，是深圳一个大官的亲弟弟，他断了一只手，按照法律规定，在工厂发生这种工伤属于劳动争议，先要仲裁才能起诉法院，他已经接受了仲裁，再来打官司就太艰难了。当时我们谈了条件，他给我 300 块钱让我帮他打这个官司，我不收律师费，赢了按三七分成，打不赢我一分钱都不收，哪怕我打很多次。后来我们向宝安法院起诉，我的理由是，第一个三万八千块钱的这个赔偿是错误，按深圳市的法规，今年发生的事故应当按照去年全年职工的平均工资作为赔偿，但你是按照 93 年的标准，明显使用法律法规错误；第二假肢更换费应该予以支付，因为从法律上讲，假肢有一定的使用期限，到期就应当更换，你不能安装一次假肢你就不管了。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个险种，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现。我当时接这个案子是非常有风险的，我是从外地来到深圳的，压力是多么的大，况且被告又是市级高官的兄弟。我们向宝安法院起诉，法院支持我们的起诉，赔偿了十七万八，这个判决引起了整个深圳市的强烈反响，有些部门可以说就差没搞游行了，全部闹起来，这还得了！一只手要赔十几万，那我们深圳一年要断两万只手，要赔

多少钱呢？当时的政府官员就是这样想的。这一次在全国假肢案上开了先例。

我给你谈谈深圳的打工者。

你知道那些外国的企业老板是怎么做的吗？他们去女工宿舍查访，每一个蚊帐都要拉开看。那些女孩子给我讲这个事，我就问她们为什么不告？这种行为很明显是违法的。她们说：“周律师，我可以给你讲老实话，作为我们一个假发厂，生产假发，招工是很容易的，随便找一个老婆婆都可以梳头发吧！”那么就是说，我们出去找工作会很难，只有忍气吞声。这就是为什么保护意识、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原因。我们现在很多厂家，电池厂、皮鞋厂、手表厂出门都要搜身，不管男女都要搜身，我随时可以带你去看。我们国家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人身权利，严禁非法搜查，这种行为明显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然而这些工厂还是我们政府的明星企业。

深圳有今天的发展，一是有当地的政策，第二是外来劳工的辛勤劳动和付出，这是他们的血肉肢体换来的。当那些外来工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我觉得当地政府部门应该把保护他们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特别是我们国家现在下岗职工很多，很大部分都属于打工的人，如果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将会引起一些社会动荡。也许我的这种看法不一定成熟，从宏观来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护劳动者，保护创造财富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短视的国家。这个打工的群体，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他们的很多权利仍然需要得到保

护。如果没有他们，一个社会能够创造什么财富？深圳不是在标语上写着，深圳的今天离不开纳税户，纳税户是谁？是劳动者！

我这个人文化不高，接触的东西也不太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几十年，由于我的家庭环境和历史背景，就让我有了这么一种不服气的性格。当然每个人都想挣钱，我在深圳没有赚到钱，但是我觉得我满足了。有那么多舆论能够支持我，他们开玩笑说，这里的官员很恨你，这说明我还为深圳的两百多万打工者做了一件好事。为什么？就是因为深圳为打工者断了手还要换假肢，从换一次到70岁一次付清，从3万多块钱到将近20万块钱。

我为人的宗旨是以诚相待，争取在我有生之年能办几件好事情，打工者群体一年比一年增加，工伤事故也是在不断发生，为那些打工者提供的法律帮助，我永远都会坚持下去。我不怕它有多大的压力。一定要搞定这件事情。我当时在深圳电视台的镜头前面说，如果不搞定这个事情我决不离开深圳。如果法律法规不执行，那么还要什么法律？

这个地方白天是交通警察站岗，晚上是鸡婆站岗，还有老公带着自己老婆卖淫。所有的大酒店如果没有卖淫，就不会有生意，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我们的政府难道不知道？那是假的。说句老实话，她们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卖淫，现在工作很难找到。环境就是那么样一个状况，你如果要改变自己的生存就要主动走出去，出来工作又找不到，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吃住没有地方，如果吃住

都得不到保障那就麻烦了，查三无人员时，被抓起来就会关到监牢里。你可以去走访一下，在那些劳教所里，那些卖淫和吸毒的人，他们为什么卖淫？为什么吸毒？我相信他们不是生下来就是坏人，是这个社会和生存环境促成了他们那样。为什么抢钱？为什么杀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可以给你看一篇报道，中国第一个刑警人员杀县长的案例。说他是去抢县长的钱，公安局把县长的保险柜打开以后，金银财宝一大堆。他为什么杀他，是因为两种心态，他很爱他的女朋友，这女孩就是县长的情妇，大家都笑话他。还有，他从小就有一种愿望是杀死贪官，他觉得县长就是贪官，必杀不可。我们的报纸却说他为了抢县长的钱，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不相信眼泪

诸葛宏：访问地点是三亚大东海岸边；开始录音时间是 1999 年 1 月 14 日 13 时 30 分；他是一名中学教师，晚上在歌舞厅兼职当乐手；34 岁。

他是四川人，十年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海南，在这里当了中学教师，再也没有回去，由于生活所迫，这几年，他每天晚上要去歌舞厅演奏。

我们为这次谈话找了个好地方，这是在大东海湾边的一片礁石上，海浪不断的涌到礁石的缝隙里来，她们的动作充满热情而又非常轻柔，像是在爱抚这些神色沉郁的石头。

我在为他的故事录音时，把海浪的声音也录了下来。

咱们坐在大海边上，就从大海开始说吧！

大海对于内地人是很有诱惑力的，当年到海南来，也就是因为这一种诱惑。我来到三亚，一转眼十个年头啦！我当时到海南来真正的、最根本的一个动机，是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到这边来了以后，我基本上都是在歌舞厅，从事贝斯的演奏。我从 95 年开始弹键盘，那是从零开始，那个时候已经三十岁了，有的朋友问，你三十岁了学键盘干吗呢？我的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赚钱。我出去打工，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讲，有点“逼良为娼”。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 86 年大学本科毕业，到现在的工资是五百四十多块钱，房改已经基本上铺开来搞啦，房子再便宜，再怎么弄，你也得要个三五万吧！即便不吃不喝，凑够房改的钱也是很困难的。我到海南的时候是不到二十四岁，现在三十三岁都过了，可以说我的青春都献给了歌舞厅，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我说的这个回报，不是我要赚很多的钱，我连起码的那个房改的三五万块钱都没有凑得上来，现在觉得压力非常大，但是压力大，你总还得活下去呀！你还得一步一步往前走啊！

有不少朋友在外边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压力都很大。从歌舞厅夜总会这个圈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小伙子，比如说琴师，歌手，活的确是不容易，最大的问题是生活的压迫，他们有一个说法很

好玩，叫做“海南海南，害男害男”，害是伤害的害，伤害男人的地方。

小伙子出来特别不容易，女孩子的话，哪怕是一个暗娼，孤单的时候还有朋友来找你兜兜风什么的。小伙子，谁来找你兜什么风呀？谁管你呀？所以只能自己跟自己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三亚也是不会相信眼泪的，你在这边，要能够生存下去，要自强不息，因为天上不可能掉馅饼下来，什么事情全靠自己的奋斗。

歌舞厅像一个舞台，能看到很多戏。我在歌舞厅干了八九年，原来我们的乐队成员的女朋友都是坐台的，大家处的都非常好，说的都是知心话。有个小姐是我们原来鼓手的老婆，说是老婆，实际上没有结婚，他们现在结婚了，到北海去了，还生了个小孩。那个女孩子是贵州都匀过来的，她对歌舞厅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说的很深刻，很形象，很有道理。她怎么讲的呢？她说一般人好像认为歌舞厅这个地方灯红酒绿的，我们坐台小姐似乎低人一等，对我们有这样那样一些看法，这实质上是不公正的。在我们看来，我们不是坐台小姐，我们是猎人，我们是狩猎的，歌舞厅也不是歌舞厅，它只是一片丛林。她说，到晚上，歌舞厅夜总会开门了，客人陆陆续续的来了，一般坐台小姐应该要来的早一些，猎人狩猎都要预先到达指定地点，我们晚上来上班，就是来狩猎。客人来了，在我们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只是丛林里边形形色色的动物而已，比如说，这个一进门摇头晃脑，肥头大耳的，粗粗胖胖的，我们看

上去可能是狗熊，或者是一个野猪，那个人精精瘦瘦的，一进来眼睛贼溜溜的乱转，我们看他啊可能就是一只狐狸，总而言之，客人在我们的眼睛里，不是人，是动物。她们坐台的时间比较长，也就是狩猎经验比较丰富，客人一进门，她们马上凭直觉就能知道，他大概属于哪一类型的动物，那么怎么样跟他周旋，才能有效的捕获他。

海南这些歌舞厅，很正常的来消费的开开心心的也有，但是绝大多数是抱着不正常的心态来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歌舞厅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地方。我开始弹琴的时候，不是很熟练，老有一点怯场，紧张。有一位朋友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打消我紧张的念头，他这么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值得紧张的。第一，下边那些客人本身素质差，听不懂，你弹错了他们也不知道，第二，就算弹错了，弹的很糟糕，让他们听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人，他们出来是寻欢作乐的，根本就不在乎你弹了些什么，不在乎歌手唱的是什么东西。经常有这样一些情况，歌手唱歌的时候，比如说，第一段过门完了，第二段词忘了，怎么办呢？把第一段翻来覆去的唱，或者乱编一些来唱，甚至咦咿呀呀的也不知唱些啥，别人也听不清楚，完了以后报以热烈的掌声。我那个朋友讲的话对我很有效，别人可不在乎你，随便弹吧，有声音就行了，他们到歌舞厅来是来抱小姐来了。原来开的工资非常低，月月跟老板提到要加工资的问题，那个家伙对三亚的情况也是比较清楚，他就讲，

我们请乐队请歌手只是夜总会的一个摆设而已。至于你们讲你们的素质高，要拿高工资，我不这样认为，你们不愿意干，我请素质低的来也可以。我的目的只要舞台上声音就可以了，我就开这个工资。

在歌舞厅工作人员里边，男歌手，男乐手，很多人都找了女朋友，找的是坐台小姐。男歌手既然在歌舞厅唱歌，他不可能不知道，坐台小姐的工作性质是怎样的，但是他们又能找她们做女朋友，并且处的还很好。我有个朋友在三亚唱歌是很有名的，唱通俗歌曲，小伙子长的也很漂亮，是湖北沙市人，就叫他阿远吧。他长的很标致，找了一个女朋友，他跟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导我，因为我老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来一个人往的。他说，你傻的很，你找个女朋友不就得了？我说，坐台要出钟呀，陪客人去睡觉，找这样的人做女朋友好像不行吧？他说你这个人就是思想不开化，男孩子出来混，生存能力是非常脆弱的，你唱歌或者弹琴，弄不好歌舞厅生意不好关门了，或者老板因为什么情况跑了，或者你被炒了，你马上就失业了，失业以后你再找一份工，不是想找马上就能找得到的。你没有收入了，但是每天还有支出，要租房子，要生活上的开销，你没有工作干了，肯定要请别的歌舞厅的琴师啊甚至经理啊出来吃饭，交个朋友，希望别人那里差人的时候好叫你，这是属于应酬上必须要花的钱。男孩子生存力量脆弱，而女孩子就好混，说的不好听一点，这个歌舞厅关门了，夜总会停业了，不可能所有的门都

关了。第二天晚上我换个地方去坐台，一样的。她们的收入也比较高，你找个坐台的女朋友，吃饭住宿，不用你花钱啦。别人也知道你男孩子没有多少钱的，你要租房子，一块住就得了。说不好听一点，小伙子正当年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想女人了，到外面找个小姐，还要花钱，我至少不用花这个钱吧。他那个女朋友和他相处的那段时间，从头到尾他都是在欺骗那个女孩。但这种情况不是他一个，很普遍。坐台小姐交朋友最后交成正果的，结婚的，几乎少到接近于零。

坐台的女孩出来有三部曲，第一步纯粹是经济上的原因，坐台出钟为了赚钱，那么赚了一部分钱以后，她们就有了一种变态的心理状态。她们怎么想呢？男人有了钱可以去嫖女人，那么女人有了钱也可以去嫖小伙子嘛！很保守的来讲，十个里边至少有一半多的女孩都养有小靓仔，小伙子什么事也不干，也没有本事，既不能唱歌，也不能弹琴，要文化也没有文化，就是人年轻，长的漂亮。那些小伙子，到晚上女朋友出去坐台啦，就约几个人来打麻将、看录像，就搞这些事情。这第二部，可以说是一种逆反心理，或者是一种报复，她们对这些小伙子也没感情。到了第三部，就是属于醉生梦死，吸毒的就比较多，到什么地方去问问，打听一下，有一半多吸毒。

到歌舞厅来玩的人，据我了解和观察到的，其中有持续消费能力的人，一般都是中年人。在这里面占的比例相当大的都是不用自

己花钱的或者是公款的，特别是在有档次的酒店里边，象贾平凹讲的什么“几类人，吃喝嫖赌全报销的”，就是那一类人。还有另外一类占的比例也比较大，就是做生意的人，他们要请一些职能部门的人来玩，他要办什么事，比如营业执照啊，或者派出所有个什么东西要摆平啊。再就是公款旅游的。真正自己掏腰包到歌舞厅来玩的，只限于一些中低档歌舞厅，大酒店里的客人走的时候，十个有八九个都是要开发票的。

三亚人讲，听到街上警车叫，大概就有那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当官的来了，第二种是犯人来了，还有一种就是目无法纪的司法人员带着小姐兜风呢！情况糟啊！三亚这个地方是一个旅游城市，特别是开会，到了冬天他们都愿意到这里来。《羊城晚报》都登了，国家有明确规定，不能到国家几个城市开什么会议，国家规定归规定，开会照样开会。现在三亚各个酒店住房过年期间基本上都定满了，绝大部分仍然是公款。

在三亚，卖淫嫖娼太多啦！我原来就想公安机关要侦破一些刑事犯罪的案件，错综复杂、蛛丝蚂迹都可以清理出来，卖淫嫖娼是摆在面子上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管不了呢？他们是知道的，也不是他们不管，过一段时间管一下，管的目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目的是赚钱，我抓了发廊老板，罚款多少，这是创收的手段。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共产党是伟大的，是了不起的，这不是说假话，是真心话。解放时，卖淫嫖娼吸大烟的问题那么猖獗，几年时

间解决的清清爽爽。应该这么想，我们的党更加成熟，经验更加丰富，更加能高瞻远瞩，处理这些当然应该更加容易吧！

铁汉柔情

华 鑫：海口某美容院的一间办公室；开始录音时间是 1999 年 1 月 15 日 20 时；他目前正在美容院任经理；30 余岁。

他每天都要在自己身上扎三针，一年下来身上要留下一千多个针眼，这个早已被医生判处死刑的人，顽强的与疾病抗争了十几年。

他愿意说，包括那些苦难、病痛、失去爱情的孤独和遭受的歧视，在他的诉说中，我看到一个人不断站立起来的姿态。

他的本职是主持人，在海口，许多人都知道他，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一家美容院当经理。

要说我这个故事，得从一开始讲起。

我十三岁就参加了工作。在我那个年龄里不应该承受的一切，不应该经历的生离死别，却突然全部经过了。那时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胆小的小心谨慎的人，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他连收音机都不敢买，害怕人家说他偷听敌台。母亲在化验室工作，有天出去让二氧化硫呛了鼻子，一打喷嚏，被脚底下有个水管子一绊，从楼上掉下来。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了。母亲的左腿粉碎性骨折，这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次不幸。母亲在病

床上一躺，就是八年。这八年是辗转到各地去转院、看病、治疗。母亲的腿略有好转了，我父亲借架子车把母亲推着，争取让她上班。上班干什么呢？工厂里头的磅秤房，拉的金属要出去的时候，要给铸好的镍版、铜版过秤，这一过秤看一下纪录，记下来就行了。我呢，就陪着去，从小我们家的孩子都是给母亲当拐棍，她一个手柱着拐棍，一个手搭在我肩上。家里头我父亲是八十多块钱的工资，这一家人，家庭负担还是比较重，怎么办呢？拣劈材、煤壶，我们从小都干过的。捡煤核儿，人家推车出来以后，包括我的妹妹、我、我哥就扑到那个煤车上面，穿着帆布的工作服，先把它垒成堆儿，抢过来，然后等它凉了，一点一点刨着去捡，捡的时候手套都不知道烂了多少，手指头上全是裂的，斑斑点点，那就没办法说。尽管母亲有了工作，但是家境仍是这样，唯一的希望就是学习要学好。我们靠自己的劳动，捡煤核儿补贴家里面用。我们一包一包的捡好了煤核儿，用小布袋扎好，扛回来的时候，是很自豪的，认为自己能为家里头做事了。

但是，第二次不幸接着就来了，我那时候上初中一年级，那是1977年7月5日，中午大家一块吃饭，一点半我们去上课了。到了四点多放学下课的时候，我哥哥就跑来叫我，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在前头，我问：“怎么回事？”他说：“爸死了！”当时我就没法相信这个事情，中午还在一起吃饭呢，才两个小时。等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像电影里头一样，白布盖着父亲。我进去时看到他已经

死了。我们三个孩子就一下子没有依靠了。在烧我父亲的时候，从他衬衣里面找到了一张一个月的病假条，他一个人顶三、四个人在干那么些事，别人全抓革命去了，他就想着一心要把事情做好，结果积劳成疾。最后就是这张假条救了全家人，被上报到省邮电局，临时就被树为“雷锋式的好职工”，于是这种荣誉就带来了一个处理方法，那就是我们可以去拿一个接班指标。这给我们家造成了最大的困惑就是上学和上班的问题。父亲去世我才十二岁这样子，哥哥才十三岁，那怎么办？我那时初中毕业考完了要上高中，这高中班分好了，我在尖子班，在文科班，这使母亲非常头疼，我到底应该上学还是上班？顶替指标是个好事，去不去？不让孩子上学，对不起孩子，但这个指标可惜了怎么办？最后没办法，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决断，做四个阄，两个上班，两个上学。她把我们三个孩子叫到床前，围坐在一块，把阄放在红军帽里头，她说：“这样吧，儿子，我写了两个上班，两个上学，咱们抓阄来定，抓着上学你就上学，抓着上班你就上班，看天怎样安排。”我抓的是上班，这样我就上班了，人的命运就是一个阄，就这样决定了。

我在邮电局的第一份工作是卖汇款单，卖五百张汇款单还要赔两、三毛钱，怎么赔的？没有工作的意识。十三岁能干什么活儿，只好干这个啦，背着书包到库房里领这么一堆出来开始卖钱，很多人都认识，在这个地方长大，不是叔叔就是伯伯，不好意思要钱。后来为了能够让自己挣钱多一点，转正快一点，就开始干电报投递

员，半年转正，基本工资 38 元，那时候没有奖金，半年转正就可以拿到 45 元，因为高这么几块钱，就选择这个工种。去当投递员的时候太辛苦了，领一台新的黑颜色的永久牌自行车，骑了一年，那自行车就烂的差不多了，风雨无阻，夏天坐在硬座上穿着绿颜色的工作服，那屁股上面全是疖子，就半边屁股坐着，半个屁股露在外头。长了疖子不行，就趴在床上，母亲就用清洁棉球给我擦。冬天北方下着大雪，把矿山的路都填平了，看不着的，大下坡下去，连人带车就翻在雪里头，爬起来流着眼泪。我被狗追过，和自行车撞过，除了跟火车没撞过，剩下什么都撞过了，那个时候还有马车，还有骆驼车呢。干了两年投递员，就换到内勤，最后搞分检，就是所有的信件、邮寄件、包裹到了内部，把它分到往全国各地去的地方，用格子把它分完，拿袋扎上，用邮车送到火车站。那时候给我的刺激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刚好工作两年之后，我的那些同学都高中毕业了，都考大学了，都是从清华、北大、科大来的通知书。因为能够从我这里走后门，不等着邮递员给他送到家里面去，他们直接到邮电局来找我，我这儿直接签名字就可以拿过去给我的同学。拿通知书的时候，办公室全部都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我的同学。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我的命运不该是这样的。

我那时候第一个概念是要学技术，要考虑想办法上大学。后来有个机会，全国搞 35 岁以下青工政治轮训，我就仗着自己从小喜

欢朗诵，口才较好，跑到团里去考试，这么一考就考上了，这样，生活开始逐渐好起来。

母亲在家里头开了一块地，人家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我们出来上学她一个人在家，我妹妹她带着，她怎么办？她自己种菜，不出门，曾经也是非常漂亮的梳着大辫子的一个年轻女人，因为不幸，变成了一个连家门都不出，只穿黑颜色的衣服的女人。她把钱一点一点省下来，压在枕头底下，供我们上学。那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托人多买点白糖、鸡蛋送到学校，但是我就偏偏在要留校的时候，得了病，一得就得了不治之症，糖尿病，完全依赖胰岛素。

我到现在还是靠每天打三针维持生命，今年这个年头是十五年。这个包里装了三件东西，注射器、酒精面球和胰岛素，就是靠它来使自己的生命存在。当然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大约有一亿多人有糖尿病，我这种情况占很少一部分，体内有些功能突然就没有了，没有了只能靠体外补充，我用的是猪和牛、羊身上的胰岛细胞提炼的一种东西，每天供给自己。我吃饭的时候必须用胰岛素，打了之后，吃进去的主食部分也就是葡萄糖转化为能量的那一部分，才能过通过它来转换。得了病，那时候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在学校，第一次恋爱就在这个问题上完蛋了。命运靠自己，挣到终于上了学，终于在二十岁这个年龄可以看到自己的前途了，可是——那个女孩子非常好，她是家里头最小的孩子，她父亲那个时候是兰州市委书记，后来是我们甘肃省的副省长，这样一个家庭

的女孩子，没有那种高干子弟的做派。她对入非常用真情、非常好。

我住在我们学校的实习医院，当时我们病房里住了四个绝症患者，我们照了一张照片，叫“生死之交”。我们全部给女朋友写了绝交信，那时候我心情非常复杂，觉得前途真是一片黑暗。那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病治好，再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也不要影响别人。毕业之后，我就回到原来生活的那个城市，跟这个女孩子没有来往了。一直到她结了婚，孩子已经两岁、三的时候，我才通过她的和我的一个朋友，给她的孩子送去了礼物。那时候我觉得我当时的选择还是对的。后来我们还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没有想到的事情，其实谁也不想这样。年轻的时候，老年人跟年轻人说，哎呀！你应该多一点坎坷，年轻人多一点坎坷是好事，吃过苦才知道甜。我不赞同这个观点，也许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尽管我现在知道苦了才知道甜，但是，如果一个人能顺利的去得到和获得他所应该获得的一切，为什么要吃这些苦？人生就这么短，就这么不容易，如果他的家庭、背景、环境能够给他创造他顺理成章的体验人生幸福的那一部分，甚至是完整的幸福，为什么还要去吃苦？我觉得人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就希望人们少一点挫折、少一点磨难、少一点坎坷。

这样，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治病，转院到兰州的第一附属医院，那里有个内分泌研究室，有外国的糖尿病专家。我尝试了第一例移植手术，这是一次比较奇特的经历，没有人做，我来做，而且

我跟他们达成口头协议，如果我要死了，就把我的遗体献给他们解剖，查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会的这种病，这种病不能治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我们成功了，我就是第一个受益者。因为医院没有公开做这种手术的，就在地下室的一个组织培养室的写字台上去做。移植手术最大的难点就是排异反应，人体有自己的免疫系统，它消灭外来的病毒和细菌保护机体，但是它有个识别功能，不认外来的任何东西，它不知道这个移植进来的是好的。做这种手术不能打麻药，在腹部切大约一、二公分的这样的刀口，然后用一个特制的针头，三棱形的，把培养好的东西的通过这个刀口进去，进到里面再推，然后一点一点拔出来。这样的手术我做了四次，我这个人很怕疼的，但是人为了生命，真是什么都可以做。就这样度过了七个月的时间，手术效果并不好。最终必须靠胰岛素去维持生命。

在这个动荡当中，对我触动最大的也就是恋爱上的事情。我要谈恋爱一定要先给人家讲清楚我有这个病，认可了我这个病才能谈恋爱，认可不了我不谈。有很多人劝我，你应该找一个能伺候你的，或者是能对你好就行了，不要要求太高了，还有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去讲你的病啊！讲你的病多麻烦呀！讲了以后把人吓跑了。但在我的概念当中，如果我喜欢的女孩子，我希望她嫁给我，她因为这个病有想法，我宁可不要，但是不在乎我的病的女孩子，我不喜欢，我也不会要的。宁可不找，绝不凑活。后来我找了一个女孩子，开始谈这场恋爱的时候，发生了对我伤害最大的一件事。知道了我的

病以后，她的母亲骂我：“你臭不要脸的，你为什么找我们家姑娘，你要再找我们家姑娘，我打断你的腿。”人因为自私保护自己家人的时候，会不惜伤害一切。她的两个姐姐可以到电视台去骂我，要让我离开这个女孩子。为了达到这个目地，她母亲要拿刀来杀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恋爱突然变得团结了，两个人为了见一面，象做贼的一样，要化妆的；要换衣服的；要找地方，害怕跟踪的。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路灯下的阴影》，别人的女朋友晚上下了班，你去接她，晚上也是站在路灯下，得让她看得着。而我晚上连路灯下都不敢站，站在路灯的阴影里。给她去送饭，我得偷偷摸摸的送去，有一次送饭的时候，刚好碰到她母亲，我赶紧藏到另外一个地方，她母亲就转着楼去找。我把饭菜送到这个女孩子那儿，她是流着眼泪吃的，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故事持续了八年。作为一个男人我还是比较坚强的，但是有一次我真是痛苦的不能再痛苦了，就抱着这个女孩子放声大哭，我们俩个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哭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惭愧，好像自己很无能。这个女孩子比我小六岁，她用手在后面轻轻拍打我的手。我想尽一个男人的力量使自己生活变得好一点，但是给自己造成这么多的麻烦，老天给的麻烦。我大哭过两次，第一次是父亲去世，那时候是对生活的不知所措。这次的哭是对生命的一种不能肯定，老天不给我这种追求幸福的权利。后来，他们家里头就想办法把这个女孩子弄到北京去上学，我们就分开了。

后来我们打电话，打一夜，互相安慰。什么叫咫尺天涯，就是很近但是又离得很远。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跟我谈恋爱，一直到她二十六岁、二十七岁。在那种景况下我们已经无法去摆脱这种家庭造成的这种折磨，我们就觉得只要能够在一起，就会觉得非常幸福，就会非常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于是就摆脱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事物。就是在这种生活当中，大家就忽略了自己的生活，而我有带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宁可自己牺牲所有的东西，但是这同时，我也在牺牲她的生活，由于用一种极端的方法，去表示这种爱，必然造成一些摩擦。这场恋爱走到了最后。

我在大西北，将近三十年，通过自己一步一步努力换了那么多的单位，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最后终于成为这个城市里人人提起来认为很不错的一个人，我认为我在这里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尽管感情上受到了一些挫折，但我始终不去怨别人，我只怨我自己，为什么我要有病呢？我要走出来，原本就有一种观念在我的脑子里头，我觉得人不应该生活在一个地方，生在一个地方，死在一个地方，不对，人应该走出去，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你应该改变，改变首先要敢于走。我就想到南方来，找一个中小城市，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然后自己能够找到一席之地，过一种比较平静的生活，一种新的生活。在这时候，在海南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愿不愿到这儿来看看？我说行啊！我坐飞机到广州，又从广州坐船到海南岛，就这么带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来了。这次我脱离

了所有的东西，来寻求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挺悲壮的。一切都一去不返了。

坐船到琼州海峡的时候，晚上，我一个人站在船头上，看到黑乎乎的一片，前面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带了一只短风衣，两套衣服，大包里放了一千支注射器，四十支胰岛素，一大瓶酒精棉球。我就是去考一把试，我看我能不能考上，就是这种想法。如果说当年博士们都可以到饭馆干活，我自己还当过小老板，我想我去洗碗也不会洗得太差，我就落到洗碗的地步，也要比别人洗得好。我要忘掉以前，忘掉以前所拥有的东西，就这么，我到海南来了。

第二章 寻找回家的路

分段地图路线：

西安——延安——安塞——西安——宝鸡——勉县——汉中——广元——成都——重庆——万洲——开县——奉节——宜昌——荆洲

人家说，这是我的家，究竟这家是不是我的家，我心里还是要有个数的。是不是，小伙子？我自己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一生中都在漂泊。

一次又一次地盼，一年又一年的盼，盼望什么呢？盼望娃娃长大，盼下班，盼好久攒一点钱回来看我的妈妈，我妈也盼我回来，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被遗忘的知青”唐玉群

这不是我的父母对我描述的秦岭，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秦岭，这陌生的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秦岭既没有想象中的险恶，也没有想象中的壮观，更没有想象中的充满诗意。长途班车在蜿蜒的山道上安全地颠簸，像是在干涸的河道中因为漫天灰尘的拥挤而摇晃着行进的小船。我的遥不可及的秦岭，我的父母亲告诉过我，那时候他们不止一次地带着我打这条山路上走过，在裹挟着花香的温和气息涌动的夏日清晨，或者在瘦骨嶙峋的山石像鬼魅一样掠过的寒冬的暗夜，那时候，我年轻的父亲母亲曾开玩笑地指着车窗外那一闪而过的影子，对我说：“记住，这是回家的路。”

人的生命历程中必将缺失一部分记忆，那些记忆永远躲藏在早已不知去向的襁褓之中，尤其在我们志得意满地被成人社会认可之后，为了自己的体面和尊严，我们会毫不吝惜地背叛那使我们感觉到自由的童年。

但是我看到了樱桃树的碎白小花，它们像一朵朵棉絮和冰凌，簇拥成群，浓郁的香气在空中飘扬。

我在这个初春的下午回到了勉县的方家坝。三十年前，当我的父母在这里搭起他们第一间遮风挡雨的茅草屋的时候，是像我今天一般的年纪。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学会了说话和行走，如今我在这里苦思冥想，寻找着任何细微的一草一木间的记忆，却一无所获。

然而当我找到那些陌生的乡亲，当他们听完陌生的我的自我介

绍，一声惊呼之后，他们便奔走相告，他们说：“这个孩子回来了，他回来了！”

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三十年前父亲的话：“记住，这是回家的路。”

乡亲们告诉我父亲和母亲在哪一块田地上劳动，在哪一口水井中舀水，哪里有一株高大的银杏树。我分明看见年轻的父亲母亲在那条山道上走过，手电筒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回家的路。

在离开方家坝之后的旅途之中，在小旅馆潮湿的房间，在广元火车站喧闹的人群中，在府南河边，船过三峡停泊在某个小县城的间歇，当人们买好了车票和船票，收拾好了行囊，或者他们坐卧不宁，或者他们泪流满面，或者他们已经决定出门远行，我知道，所有的人终将踏上回家的路。

广元火车站贴着一幅标语：“祝民工一路平安”，他们背着劣质的牛仔包和编织袋，要在拥挤的车厢中呆上两天两夜，赶赴南方的某个城市，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一个女孩说：“等到挣够了盖房子的钱，我就回家。”

从重庆到万县，客船的四等舱里，一个到处跑江湖的生意人，望着江边星星点点的灯火，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向我们倾诉：“我有三年没回家了！”

四川南部叙永县一个偏僻的茶场，所有知青的墓碑都朝着成都的方向，那里是他们的家。这个被遗忘的知青部落，幸存者之一的唐大姐回到了她从小就熟知的府南河和春熙路，在她经过了三十年

的企盼并真的回到家乡的时候，她却神情恍惚地说：“这是我的家吗？”她想起了自己被岁月折磨的苍老的容颜，她说：“我不属于这里！”

背井离乡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民间书法家钟永书，每当他写完一幅字，回家的路边缩短了一程。

探险摄影家吕玲珑春天的时候独自驾车踏上征程，他是去他的另一个故乡，真正的故乡，在那些河流的源头，在那些山脉的谷底，在那些狼群出没的高原，他说：“那里，到处都是我的家，到处都有我的朋友！”

理想主义者李风云的故乡存在于他充满激情的记忆之中，凭着一句“要为真理而斗争”，他会在复杂的人生经历中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同志。

奉节移民张正宇的家就要搬到山上去了，但他更怀念他在天津的家，在一次无法预知的动荡之中，爱人的一封电报让他来到了三峡中的这个小镇，一呆就是十几年。

是什么在不断唤醒他们的灵魂呢？是什么样的骨骼能够支撑早已疲惫不堪的肉体？在那些让人绝望的几乎要窒息的漫漫长夜，在唐大姐被噩梦惊醒的瞬间，在钟永书被蚊虫吸吮着鲜血的瞬间，在吕玲珑打开车灯照亮前程的瞬间，在李风云目睹了一次又一次背叛的瞬间，在张正宇等待一位老乡和他聊上几句话的瞬间，是什么让他们懂得坚持？

所有的人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寻找回家的路，这是他们唯一的故事。

16 岁的三线

吴驷宏：访问地点是宝鸡火车站附近吴经营的某饭店；开始录音时间是 1999 年 3 月 1 日 16 时；他是饭店经理；44 岁。

在访问他之前不久，我看到了一部叫做《三线学兵连》的电视片，也读到了一些有关这部电视片的赞誉式的评论，“电视片讴歌了十五六岁的学兵战士们支援三线建设的献身精神。”评论是这么说的。

吴驷宏曾是三线学兵连的一名战士，我想听听他的说法，他是当事人，他应该说话。

可他说：“有些事情是说不下去的。”

我记得当时国家号召，为了让毛主席能睡着觉，国家建设急需一批人，我们这帮人就提前领了毕业证。当时走的人，我这个年龄是比较多的，16 岁不到，直接就给拉走了。你想那么大个小孩知道啥？当时离开家还挺高兴的，总算解脱出来了，出去闯荡闯荡。当时家里给我准备铺盖我都不要，不知道去干啥，搞不清楚，只当好像是玩去的。家里给我准备这些必需用的东西，老人们都清楚，这一去——上车以后，当时情绪还可以，但是和亲人分手的时候，马

上觉得就不一样了。火车一开，满站台都是家长，全都哭，一片哭声。幼稚的孩子们在车上，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就感觉到这一次出门不一般了，后来车上马上有一首歌唱起来：“火车上的夜晚，梦见妈妈坐在我身边，妈妈抚摸着儿的头额，眼泪挂在胸前。”

坐了不知道是两天，还是三天，总算坐到一个铁路新线，没有了铁路，走到尽头了，再往前就靠我们去修了。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六里坪车站下的车，天都黑了，当时肚子也饿了，突然间来到一个大山窝里面，黑乎乎的，这个时候确实想家了。当时铁路兵给我们接待了一下，就在河滩上开了大锅灶，一个人挖了一碗米饭。吃完以后，说是大家要徒步行军。原来在学校搞过军训，搞过拉练，可那个时候就背一个小挎包，现在这家伙！一个人那么一大堆东西，咋弄呢？当时领导我们的有一个铁道兵，我们叫他班长，他也顾不过来，那么一群孩子，那么多行李，他帮了这个，帮不了那个。于是东西就往路上扔，该扔的都扔了，都不敢说是自己的行李，这不是我的，那不是我的，最后就拾个挎包，背起一床被子。什么脸盆、网兜里的东西，根本没法背动，背不动，说是要走三十里，实际我们那天走了整整一夜。走走喘着气，走走喘着气，家里给我带了两个甜萝卜，还真解了渴。那个地方刚砸开一条公路，石头炸的坑洼不平的。那个晚上，我们就沿着江边走，十六岁的小孩们，走着歇着，走着歇着，一直走到天亮，走到一个山底下。然后上山，山上有一个大帐篷，地下铺的是陕南的翠竹。进到帐篷里去以后，没有

一个人再有劲儿解开自己的行李，全都躺倒了，精力已经全部到了极限，也已经吃不进去东西了。到第二天早上，军号响了，我们才发现那是个军营，我出帐篷的第一感觉是吓了一跳，山那么高！我没见过那么大的山。我们当时已经在山顶了，晚上也不知道咋上来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指挥员说，大家已经到目的地了，可以练习着给家里写一封信，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一下父母们，报个平安。当然这是我有生一来的第一封信，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当时家里给我的几个信封，我都不知道该咋用。那信封中间有个红框框，倒底收信地址在哪边儿，搞不清楚。最后我们就问指导员这个信咋写，指导员帮助我们写了信封，然后自己简单的写了几个字，这就是第一封信。信写完了以后，组织人去送，又要坐船又是走路才能把信送到邮电局，这个都得要一天时间，当时环境就恶劣到那个程度。

可能是头一天的九、十点钟吧，我们驻地对面的山坡出现了险情，有一个同学叫马师凤，她拿着一封信往山下走。咱城里人都走平路，往下走那么陡的山路，一点经验都没有，稀哩哗啦人一下就栽下去了。那个沟最起码有七、八十米深，对面山上有人就喊，这个时候我们全吃了一惊，下去又不敢下，只好从顶上向下看，当时有一个大胆的女同学，拿着自己的一床被子就去了，连滚带爬的往下跑，去救她的同学。这是第一幕，去的当天，就牺牲了一个人。这时候连队就开始高度重视了，教育我们不能轻易下山，怎样走山路这方面的知识才开始慢慢灌输。

我们经过简单的整理，编了连、排、班，领导跟我们说，我们要先施工后生活，主席为了这条线已经睡不着觉了。这就开始组织我们进洞子，打洞子，我们是学兵二连，干啥活呢？先修了一个洞门，那隧道的洞门就是我们修的。当时没有电，啥都没有，施工条件特别艰苦，然后就给我们发了大锤、钢钎，那么点儿的孩子就抡大锤，用钢钎一点一点的凿，然后就打炮眼、放炮、炸石头，这个时候这条线就不停的出现受伤的、死亡的人。尤其是在施工刚开始，经验缺乏，这时候公路也没有修好，劈山炸石开公路，那是最危险的。但是那会儿的教育特别正统，充满了政治色彩，现在违心说话的习惯，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号召我们写革命家信，因为当时出现死伤了以后，家长陆陆续续要来，一看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本来提着的心就更放不下了，所以就号召大家写红色家信，把这个地方说得多好多好，还制定了基本模式，写完连里指导员要看，连长也要过目，意思就是政治宣传，让家长少来，尽量不要来，就宣传这个。

洞子慢慢就往里延伸发展，在我们那个洞子里面，有一个和我在一块儿的同班同学，在一次大塌方的时候牺牲了。同样一块石头砸死的，有铁道兵，有我们，我们就是“同志”，铁道兵就是“烈士”，就那么不公平。当时的危险性特别强，我们的座右铭是啥？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每天在洞口，这帮人进去之前要背诵几遍座右铭，和下一帮人握手告别，

然后就进去了，确实不知道能不能出来。那段时间不停的出现死伤，劳保的条件也特别的差，本来可以搭一些排架遮挡一下，但这些材料都运不进来，就那么空着。我们每次交接班的时候，都说：“再见了，但愿你能出来。”排长就让背几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随时都有危险。要不，我最后总结了一下，这个三线学兵连，知识青年不能比。它有几个关，对一个 16 岁的孩子来说，都摆在那儿了，不允许你有一点儿周旋的余地，或者是打个退堂鼓，不可能的，给你已经送到那儿，想回来都没门儿，只有前进。生活关、生死关、劳动关实实在在的，每天都面临着。那么繁重的体力活儿，发的劳保用品，就是雨衣、胶鞋，洞子里往下滴水，再戴一个钢盔帽，都看不见脸了，光剩下一对牙齿和两个小眼睛。

当时我们吃的小馒头呢，比我们的拳头还小，然后就是高粱米稀饭，一小勺咸菜，生活是相当的艰苦。为啥那么艰苦呢，就是东西运不进来，因为要先施工，水泥、木材可以提前进来，生活必需品就始终没有正常过。

我们的劳动方式非常原始，当时在小猫洞里，根本就站不起来，它最多有一米五高，两米来宽，你想休息时，也就是展展腰躺平。洞打大了容易塌方，也就是得一点一点的，一跪就是十几个小时。当时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十二个小时，刚开始去的时候是八个小时，后来一个劲儿催长度米，每个月的长度米要多少，别的连队能打下来，我们也得一样，那个时候的人啊，往前的劲儿大的很。所以就

抓进度，把一切都抛弃了抓进度。作为我来说，虽然都是三线来的，有后勤的，有洞外的，我那时领着兵在最头里打，这打洞子我体会是最深的，就是这么个劳动，这么个强度。我们班里面有个调皮的同学生，找了一个地方偷懒，那个地方砸死人最多，没有人去，他就在那儿藏着休息。

生活上一弄就断顿了，连队没面了，剩下苞谷面熬稠一点。就是这样维持着，大家互相接济。我们那时也有生日，在一块过生日的时候，你攒两个馍，他攒两个馍，在一块一摆，一人半个，一点儿野菜，意思意思。我记得后来有一年，宝鸡市给我们送去了几车西瓜，我们班分了个小西瓜，也怪我没算好，十一个人切了十芽，大家高高兴兴的抱着西瓜呀，就吃开了，品那个味道，一点点的咽下去，我就悄悄地走了，我不想大家知道少分了一块。虽然是那个样子，只要我们的同学被砸伤了，我们就去先验血型，部队没有血库，却经常要输血。塌方总是在晚上发生，有时候深更半夜了，“各连队注意，凡是O型血的同志请赶快到卫生队来！”不用再多说，哗……献血的人像潮水一样，经常随时要给自己的战友输血，去换取他的生命。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较深的，我的一个同学，被砸死了，我们在公路边简单给他搭了个灵台，当时他的头都没有了。砸死他的石头还卡着底下的钢轨，石头有多大呢？算起来有八、九个立方，很重的石头。当时我们为了救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洞子里面很小，

怎么别、怎么翘就是不动弹，但我们总感觉他还活着。最后采取啥办法，干脆这样吧，没办法的办法，还得用炮炸。一点一点在那个石头上打眼，打眼以后用棚子把他盖住、支好，然后一点一点的放炮，让石头崩小一点再拉他出来。结果最后一炮没崩好，把人脑袋崩烂了，只好把尸体拾起来对到一块，太惨了。那次塌方砸了七、八个人，隧道外面摊了七、八个尸体，当时我这个同学面目全非，我们弄个钢盔给他做了个头盖上，等着他家里人来，他家里人来了以后，非要看一看她的儿子，我们就一直都没让看。我们给战友找墓地，现在想起来，那个地方真是死无葬身之地。陕南那个山上没有土，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凿啊，一个班的人在那儿整整干了一天，我们讲究战友的墓坑不能放炮，就靠这个钎子和锤一点点给他挖，棺材露出一半，就拿片石一堆一堆遮起来，可是一场大雨，棺材就又露出来了。清明扫墓，同学们都寄松柏枝儿，表示大家对他的怀念。到我们走的时候，专门把他好好安排了一下，用水泥给他立了块碑。我们毕竟还能回来，他们永远回不来了。

在我们中间，现在好多人的愿望就是带着自己的孩子、老婆到我们那个地方走一下，这是我们将来退休以后的第一件事，咱也不说去这儿去那儿，咱就回去看看。

世道人心

鲁远洲、杨文路：访问地点是勉县勉阳某村；录音开始的时间是1999年3月5日15时；两位老人都曾当过教师，如今在家务农；他们一位80岁，一位72岁。

村里有一处古迹，那是刘备封汉中王设坛处的遗址，两位老先生的家都在这古迹附近。

两位老先生都当过几十年的中学教师，都曾经被打成右派，如今都在家务农，他们的身体都很硬朗结实，都爱看报纸电视，关心时事。

他们两位，有些事情都有点想的不大明白。

现在哪一个人家的生活水平达不到过去地主的水平？地主还不会骑自行车呢！现在这个生活，恐怕比大地主过的还要好，那么我们还要做啥呢么？简单的说，想吃啥，就买啥；想到哪儿去，走就是了。我现在就不明白了，有些年轻人好象对现行政策还有些不满意？这究竟是个什么原因？只有一句话：没有受到旧社会的苦，比不来。

要说国家的政策，上面很对，一到下面就搞瞎了。特别是当前的腐败问题，我们有个想法，那确实很严重。比如私自出卖土地，一贪污就是多少多少，你往哪里告？你告到镇上？镇上有些人收了这些人的回落，被这些人买通了。你告到县土地局？县土地局也被人家买通了。五几年的时候三反五反，毛泽东有这个胆量，把中央

一级的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枪毙，这一枪毙把全国吓住了。现在情况这么严重，国家为什么不手法泼辣一点呢？有些地方干部，我们从报纸、电视上看到的处罚都不太严厉，为什么整不下去？我有两个看法，一个是“打老虎”，那个时候老虎少，武松多，一打就打死了，现在是不是老虎太多了？第二个，我想大胆的说，有些高层次的领导本身不够硬。

再不下个狠心，会失掉民心的，任何朝代都是这样。中央规定的好事情，下边就给你整瞎。是谁的决定来着？农村财务要公开。很好嘛！不搞社教了，搞财务清理，这是对的。但是你放到下边来，我们这儿的混帐东西就给你胡整啦！叫你选代表来清查，一个村选七个代表，上边要委派四个，只准你下边提三个，这是哪个规定的啊？七个人你把四个人都占了，还有三个人起作用？少数服从多数，委派的这些人和那些人都是穿连裆裤，查不出来什么问题。说难听的话，要是搞垮共产党的江山，问题还在基层。

过去是民不告，官不究。现在民告了，官为啥还不究？从清朝到民国，济民款，哪里受了灾政府给发的救济粮食，谁要贪污了，非杀不可，包公陈州放粮，讲的就是这个事情。一九二七年大灾，勉县有一记侵吞公款的事情，那是乱棒打死！我们现在也有啊，仅仅是判刑而已。这济民款是救命的，你们都敢贪污啊？

现在没法告皇状，你往市上告，往省上告，不得往中央去。告状难，究竟是法律上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我问他们为啥要诉讼

费，他们说：“不收诉讼费，这告状的人多的很，我们忙不过来，收点诉讼费嘛，他拿不起这笔钱，他就不告了。”这是什么话？那么冤死的人也不告啦？

我们可能想的也太天真了，这怕是上边的政策吧？可是共产党搞这个不行，谁又能行呢？这个问题得自己问，再自己答复吧！

农民的负担很重，小小的一个村，光干部召了多少，他们都干了啥？我们什么都要叫老百姓拿钱，我们的钱都叫他们吃了，发了工资了，村干部的工资高低是根据你村上人均收入来衡量的。我才知道，他们现在报的人均收入，实际上连一半都没有，你看我们村挂的是小康村，你看，你去了那么多地方，有几个村就这个烂街道？这个都办不到，这就够个小康村？光往上报喜不报忧，死吹瞎骗，话可能有些过火，但实际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工资却发不出来，又是啥原因呢？

回家

唐大姐：访问地点是成都某幼儿园唐的居所；开始录音的时间是3月11日18时；她曾经是一名知青，目前在幼儿园里当清洁工；53岁。

在我到成都的前两天，成都电视台做的一期《今晚800》的节目在这个城市引起了轰动，它讲述了在四川南部叙永县的一个茶场里的成都知青的故事，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了三十年，被

称为“被遗忘的知青部落”。

唐大姐是这个部落的一位成员，如今她和丈夫已经被一家幼儿园接回成都，在那里做了清洁工。

这就是她的小屋，所有的东西都是同情她的人们送的，三十年的岁月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包括她的热情和青春。她的头发是新梳的，衣服是新换的，否则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人们凭着她暗淡的眼神和苦涩的表情也只会把她当成是沿街乞讨的盲流。

她在三个小时的倾诉中不停的哭泣，她一无所有，除了记忆中的苦难——她仅存的三个小时的故事。

我们这些人里，发了疯的，死了的多的很，前年就死了两个，想家乡的、个人问题没有眉目的、还有因为玩朋友被关起来的。那个发疯的就是因为写了一封求爱信，被抓起来关了一年多。那些坟墓都是冲着成都的方向，一大片一大片的。

第一个死了的人死的时候 19 岁，当时她死得非常惨。当时我们在表演什么节目，有一首歌，叫《东山升起红太阳》。她跳的是藏族舞蹈，跳得很好。第二天她的病就发作了，她说她肚子疼，就跑去看病。那是一个很简陋的医务室，和农民喂鸡的地方是一个样子，不像是什么医院，也就有一个会包扎伤口的卫生员。她去了，就说：“我肚子疼得很！”卫生员拿了一些药给它吃。可能因为生病还想吃一点糖，她用一角钱买了十颗糖，这个糖都没有吃完，晚上她的肚子又疼起来了。她喊：“搞一些最好的药给我吃吃！”意思是

说把这个疼止住。她说：“可能我要死了！”我们劝她说，死什么？不会死的！结果，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早饭，看到队长忧心忡忡的，我们就问他，刘玉娟的病好了没有？他说，死了！我们一下子就哭起来，连工都不想上了，每个人都软了。这是第一个死掉的，她的死给我们的打击是相当大的。她在成都的时候早就想要件毛衣，我给你说过，我们没有人有毛衣，没有人有春秋裤。她是个孝顺的孩子，她的妈妈是个疯子，我们出来的人家境都不好，要么是成份不好的，要么是工人阶级穷光蛋。她一直想要件毛衣一直没得要到，最后她死的时候，她爸爸给她带了一件毛衣来，把这件毛衣放到棺材里，那棺材也不是什么棺材，是随便钉的一个木板。就这样子安葬了。

有些人后来回城了，他们有的是假离婚，有的是顶替，有的是有后台，我们是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就永远在那个地方，如果不是电视台他们把我们解救出来，可能也过不了很久就死了。他们太好了，他们没有在我们身上吃一口水，我们真的很感动。我的娃娃前两天还过来说，他说我不相信现在这个世道还有这么好的人。在成都我只要一上公共汽车，他们个个都说自己的心都哭疼了，我没法儿感谢别个（别人）。我坐长途车的时候，人家车站的人给我拿饭来，给我拿面来，我心里都不是滋味。我想，凭啥子人家可怜我！我也是有手有脚的人，那时候我话都说不出来一句，我要感谢别人，我怎么感谢呢？人家给我写了这么多封信，人家给我资助，比如说

衣服，有一位中学老师把她的毛衣脱给我，你说我这个心理是不是滋味？艰苦了三十五年，身不由己，我凭啥子要拿别个的东西？我凭啥子别人能玩着，我不能玩儿？我无法买东西。我觉得欠人家一笔债。这个情咋个来还？我们 17 岁出去，一个山都让我们挖平了，我们都是自己种菜吃。我是很勤劳的人啊！

那个地方最先是劳改农场，劳改农场建不起来，然后又是耕牛场，耕牛场也建不起来，才把这批下放知青放到这里，准备把这个茶场搞起来。当时我们很天真，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还在想，单位上能分饭吃，大人们对我们说，那个地方艰苦，但是有艰苦就有甜。

头天晚上我们都哭了。因为我的家庭比较困难一些，我还比较成熟，哭是哭，但我还是想，好好干！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财富。那个地方以前只有一百多亩茶园，我们就开始了开荒，早上 5 点多起来上工，晚上才回来。一个宿舍睡了十二个人，一个铺上是两个人，房子中间有个铁圈圈，冬天来了，给弄点儿煤炭，那就是我们的火。你知道，现在 17 岁的娃娃还在妈妈身边撒娇呢。那个时候我们没得春秋裤，没得一个人有皮鞋，有布鞋都是不得了的。

那个时候，我的个子是一米四几，生活压力很大，粮食也不够吃，家里也不可能给我寄粮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都过得是这样的日子。后来人家造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造反，那个时候就很想回成都，后来又想着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就要安心。哪怕要回成都，我们都找不到方向。我们走的时候是雾蒙蒙的天气，

在火车站走的，小的时候没有看见过火车是什么样子，转了好几节才到了农场。

随着自己的年龄长大，随着自己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那个苦是说不出的苦。以前我在家里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对自己的个人问题，还是渴望家里边给我找一个，找过一个在部队上的人，可当地的公社把我的信拆开看了，我就把信烧掉了，打消了这个念头，和现在的这个爱人好了。他的妈妈要抚养，我的妈妈也要抚养，那个时候我们一边要抚养妈妈，一边要抚养孩子，真是苦得不得了。

在那里我们一直吃的是包谷，菜也只有萝卜和莲花白，吃了这么多年。刚开始下去的时候，那些饭都吞不下去，几天没有吃饭。我们那个时候就哭妈，又找不到妈，那时候我们在海拔 1000 多公尺的山上摘茶，深山老林一伸手不见五指，雾蒙蒙的。我们要洗澡，到泉水的沟里跳下去就洗，从来就没有用热水的时候。生产队用的水，早上只有一瓢，晚上也只有一个瓢。我那个时候身体只有 70 来斤，他们让我担 80 斤的化肥，而且你还得鼓足劲去担，不能让哪个男娃娃来帮助。表现不好就入不了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能入团。我们那时得病，风湿性心脏病多得很，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丢下两个娃娃死了。

我们当时想，开荒出来，日子就好过一些，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后来有些文化高一点的，有点思想的，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头，有些俏皮话，这样就把他们逮捕了；精明一点儿能跟领导搞好关系的，

就调到硫磺厂去了；吃得做不得的，就把你退转了；剩下的人就开荒。这样一直开荒，现在的茶园已经将近三千亩，那里只剩下 90 多名成都人了。现在茶园终于有点起色，可以看到甜味了，县上领导就把他们的子女都叫到这里来。我们仍然在第一线，采茶的辛苦，吃茶的人是不会感觉的。

他们什么都有了，房子也有了，钱也有了，福也享了，我们仍然是空空的，建设了一辈子的山区。我们的娃娃出来在成都打工。我的儿子只说要挣钱买房子，谈何容易！他挣来的钱，他还要吃、要用，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房子买得起。今天他们这里的人还在说，她用一生的积蓄才买了一所房子。

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在山上住，下雨，要把胶鞋拿回来烤干，脚上打着绷带，背上背着斗笠，斗笠就在你的背上晃来晃去，就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的，一下子就老了。我都不知道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一次又一次地盼，一年又一年的盼，盼望什么呢？盼望娃娃长大，盼下班，盼好久攒一点钱回来看我的妈妈，我妈也盼我回来，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样子是刚刚才变好了的，你没有看到我以前的样子，自从电视台他们来过，我收到了社会上的很多群众来信，他们都当过知青，他们觉得我们比他们还要苦。他们当知青，8 年以后可以回到家乡，可是我们从 17 岁，一个天真的小孩，一呆就是这么多年。我都认命了，我觉得我命中注定是这样子。我根本不埋怨哪个。电

视台采访，他们问我需要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需要在毛主席像面前照张相，我们是忠实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青春埋葬在那个农村。

别人回到城市都有一个自己的家，可是我仍然住在这个幼儿园里边，我没有家，我现在已经 54 岁，如果我早些年回来，在一个单位里，我早该退休享福了，可是我没得，（四川方言，没有的意思）我还得重新创造。你现在看到的环境都是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要用自己工作感谢电视台，感谢收留我的赵园长。

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这一生的经历如果要写一部小说，简直是写不完。电视台他们到茶场来的时候，我已经麻木了。我一直非常的自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亲人。其实我曾经回过成都一次，有过很多遭遇，我们在这里挨过打，派出所查过我们的暂住证，要收我们的罚款，说我们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哭）我给派出所的人跪下去，我求他们，我挨打受伤，他们把我弄到医院里边去，给我拍这个片子、那个片子问我要几百块钱，我没得，我简直都绝望了。那次回成都的时候，被派出所警察罚款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想不开，我们就跳河死了，那是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应，哪一个晓得你的身世？我们一辈子务农，也没有什么技术，没有什么能耐，一辈子就这样耽误了，不会受到人们尊重，17 岁我们在宣传队里跳舞唱歌的时候还不觉得，现在细细想一下子，怎么就过去了？

这次他们把我们救回来，我觉得还是好人多，他们喊我“唐大

姐”，不管我走到哪里，我觉得很多人都像我的亲人，我就流泪。

电视台到我们那里去的时候，我白天还要应酬他们，想着那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到了黑夜里我就睡不着觉，想着他们说的话。他们把我带到府南河，我的家，我看到那里修成了这个样子，心里是很不舒服的。所有的人都替我打抱不平，他们说，唐大姐，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找人民政府给你一个自己的家，但是我不敢有这样的要求。我觉得那样我要求太高了，是给人家国家出难题了。但是我又想，我现在住在这里，一旦我年纪大了不能做了，或者有病了不能做了，我怎么办呢？我的孩子还在打工，如果回到农村去，有个病我只好自生自灭死在哪里啦！我到这个地方来，人家说，这是我的家。究竟这家是不是我的家，我心里还要有数的。是不是，小伙子？我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一生中都在漂泊。他们把我带到街上去耍，看到春熙路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他们让我吃这个吃那个，我吃不下去，我觉得我的内心是空虚的，成都那么大，但是它不要我。不摆了。（泣不成声）

在成都的街上走的时候，一些高档的商店我们都不愿意进去，什么太平洋百货我们也没有进去。我们穿的那么寒酸，不了解情况的人把你当作什么人呢？可想而知，但是电视台太好了，我们必须配合他们拍电视。后来确实受不了了，我也确实就哭了，他们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看，没有回成都的时候想回成都，回到成都又觉得不是自己的家，我怕在这个街上走。你们问我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我是空虚的，昨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觉。你们说一切都会变的，难道说变就变？拿啥子来变呢？我们也不愿到商店去看，我们买不起。我说，你看这么大一个成都市，为啥人家都能够忙忙碌碌，人家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就像鸟儿能回到自己窝里，可是我没有家。我当时就哭了，大街上的人就说，怎么比我们下岗的还苦啊！

他们问我：“唐大姐，府南河变了的时候，你来过没有？你知不知道府南河？”我说，我晓得，我在电视里边看见过，那是母亲河。我就是在那条河边长大的。当时我想，现在这条河被叫做母亲，我如果死了，就让我的儿子把我丢到府南河里，我们从母亲的肚子里边出来，一直都没有价值，一直到现在几十岁，死的还有什么价值？还要装什么棺材？烧什么纸钱？就把我丢在府南河里边吧！

下乡好是好，但是我有时候也想，毛主席说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要说教育，归顺都把我们归顺了。又不赌，又不嫖，又不骗钱吃喝。想跳舞没有人替我捧场，想唱歌也唱不起来，在电视里看见人家老人吵吵闹闹的度过百年，我自己想想都辛酸。

我没有给娃娃带来什么东西。其实我很能干，我理发也都学会了，可是人家现在理发厅要按摩，要年轻人，老年人是挣不到这个钱的。

这里哪样是属于我的？一个人一步走错了，终身遗憾，但是那个时候是个运动，你非去不可。我妈妈那时候是居委会主任，她说她不当这个主任了，但是不行，还是要去。我们家里就走了三个，

你说我妈妈是怎么能够承担得起的？

现在成都很多地方的人都知道我的命运，他们和我很亲近，叫一声“唐大姐”，我觉得舒服，以前没有人知道你的苦，现在同病相怜的人都理解我的心情。成都的人都在说，我们要看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他们究竟能不能回来？但这次，确实是回来了！

大地书法

钟永书：访问地点是成都望江亭公园薛涛井附近的一个茶摊；开始录音的时间是3月15日12时；他是一位来自农村的“民间书法家”；32岁。

他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缩了水的颜色泛白的中式外套，坐在繁华的红星路上，面前摆了几幅写好的对联，一张纸牌上写着他家境困难、卖字为生的经历。

我问他有没有兴趣聊聊。

他问我：“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我想了一下，回答他：“恐怕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天十二点，我们在望江亭公园门口见面吧！你会去吗？”

我去早了，在公园里转了转，公园里栽满了各种各样的竹子，等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他已经坐在台阶上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失约。

我请他在薛涛井附近的一个茶馆喝茶，他送我一幅字，写着：“酒千盅难成知己，茶一盏也可醉人。”

我写字的时候要抽烟，喝茶的时候也偶尔抽抽烟，但白天在街上摆摊子卖字的时候，就一只烟也不抽。平常每天摆摊要摆八个小时，因为抽烟，就要喝茶水，如果你不喝茶就会很干燥。

我已经走了半个中国。摆摊子很困难，现在搞市容卫生不准摆地摊，等到哪天是星期天，管理人员松懈一点，我就找机会去摆摊，一般的时间没得机会。正规练字要花许多经济，出来摆摊的可以挣点钱。

我写完了这幅字以后再给你讲故事，因为要讲很长时间才能讲得完。

（这时候，他很细心的写完了送我的那幅字。然后大口喝了一口茶。）

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你和我两个人遇见了，你和我只有两个人，地方只有那么一点点，这也算是一种缘份。

写字，第一需要时间，要谋生就没有时间，再一个，需要精力，打工回来就没有精力了。一直到了 93 年，我那个时候 25 岁，我什么工都做过了，小生意也做过了，总觉得这样下去没有什么出路。人生也许这样一辈子就完了。就开始想起写字来了。

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必须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做小生意和打工无非是想走条路子出来，结果是越走越糟。但是写字有时候也是

写不下去的，因为要生活，我家里当时是七个人的家，许多事情我都要亲自料理，大哥二哥的智力比常人有差异，那么个摊子，我的父母收拾不了，生活过得越来越难。我想反正是难过，我还是来写字，我觉得写字很适合我，从读书的时候起我就喜欢写字。那时候没有毛笔字，我喜欢拿着钢笔做那种抄写课文的作业。

在都市里边摆摊子的难度很大，94 年的时候比现在还要松懈一点，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每周只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月摆四次摊子，能挣 30 多块钱。这些钱一半用于日常开支，一半用于买些毛笔和纸张。后来我就想外出，我想，可能比成都有更好的摊口，还有机会到别的地方学习。特别是能够看到比自己的字写得好的人亲自写字，那是一种最大最高的享受。

95 年我第一个外出的地方是广州，因为广州在中国还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那边离香港、澳门、深圳都很近，我想到那边去，也许会卖更多钱，或许能有什么转机出现。实在写下去了，也能找到其它的工作。写字需要经济作后盾，纵观中国这些写字的人，从来都是病魔缠身而死。像凡高，他生前的画并不被世人所重视，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名气，他死了以后，人们才知道他画的画不是一般的画家能画得出来的。徐悲鸿也是吃了很多苦的，很多艺术家都过得很清苦，。

我在成都卖了十多天才把路费卖齐，那个时候我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因为广州毕竟路途遥远，自己又是一个人，到了那个地

方人生地不熟。就这样子去了广州，那是 1995 年的 5 月 3 号，我坐了 53 小时的火车，到了广州只剩下 37 块钱。本来火车可以是上午 11 点就到的，可是因为晚点，到了下午 5 点多才到。到了广州，先要寻找那些便宜的住宿的地方，因为路不熟悉，这样来来回回地走到晚上。我当时身处市中心，没有便宜的旅馆住，就睡在人家的街道边上，那时候天已经黑下去了。我刚刚睡下，房主的洗澡水就泼过来，差点泼了我一身。他看见外面有人，就跟我说：“这里住不得，一会儿有巡夜的警察来了要把你抓走。”我真的怕被抓走，就找了一个很深的胡同，那个胡同大约有一百多米长，我想那个地方肯定很安全，警察不会到这个地方来，就在那个胡同里蹲下来。当时是五月份，广州的天气比这里的气温要高得多，晚上不是很冷，但是有很多的虫子，咬了我很多。那一夜我没有睡，我想，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苦难就伴随着他到老到死，才能够了结。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我想先去把摊子摆起，因为这关系到吃饭的问题。我就找了一个没有警察驱赶的地方，人也比较少，两小时赚了三十多块钱，加上我还有二十多块钱，就有五十多块钱了。当时我的精神已经很疲倦，因为一夜都没有睡过，我就想先去找一个住宿的地方。我把一张地图翻出来，坐了一个车子到终点站，那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地方，我终于找到一个便宜的旅馆。这样我倒头就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到了晚上睡觉睡的舒服了就醒来，接着去摆摊子。那边的人出手要比我们这边的人出手大方，有的人给三十、

五十，我这个毕竟属于商品，人家讲所谓的黄金口岸，口岸不好肯定没有人来买东西，口岸好了他不会允许你摆摊子。广州五月晚上温度已经到了三十多度，比起我们成都七月份的天气都还要热，我似乎有点儿水土不服，身子感到不舒服。就想到要去杭州，到了第五天我就把去杭州的火车票买到，又在火车站捱了一晚上，也没有睡觉。

又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了杭州。第二天又出来摆摊子，杭州有个西湖，刚下过雨，我看见有个卖东西的，就想这里可以摆摊子。我就一边写字一边摆，刚刚写完一幅对子就有人把它买走了，我一共卖出去了七、八幅对子，反正他们给多给少都一样。卖完几幅之后，过来了两个警察，他们让我不要摆了，把摊子收起来跟他们一路走。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保安给这两个警察说，这个人我一会儿带走吧！警察和保安之间要互相给些面子，警察就没再说什么。其实那个保安是个书法爱好者，我就去了他打工的那个珠宝店，他就让我给他写几副对子，他没有什么钱，但执意要把他的表送给我，我为了感谢他，又把几幅字送给他，晚上他又把我留在他休息的地方住了一宿。那个保安也是年轻人，比我小。

来来回回，二十多天时间，这是我的第一次出行。

夏天到了，我就再没有出去，因为夏天到处都很热。我也没有固定收入，流浪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收入，能够把肚子填饱，运气就算不错。到了秋天，我就在青羊宫里写了两个多月的字，12 月

初，就去了西安。这是我第一次到西安，到西安是打算去卖字的，但是我没有估计到，12月份的时候，西安比成都冷得多，冷得手都拿不出来。好像都有零下二、三度。在西安，我去碑林观摩书法家的字，唐代有个书法家名字叫颜真卿，我去看他写的那个“之乎者也”的之，在那里看的入神了，足足看了有七八分钟，他写得真是好。碑林汇集了古代以来各朝各代书法家的真迹，我在西安没有摆成摊子，但是看了碑林。那些名胜古迹我没有去看，我已经没有心思，也没有钱了，只剩下返回来的路费，

在去西安之前我去过北京，我是先去的北京，才返回到的西安。我想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游客比较多，因为买字画往往是有素质的游客，从经济上来说也比较有钱。那天我在大前门附近摆摊子，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卖东西，刚刚摆起有十几分钟，我就看见旁边的人迅速把他们的东西收拾起来，但是我要收拾已经来不及啦！想跑也已经跑不掉了，我就干脆不动，等着警察来处置我。我心里很害怕，我想这次真的要被抓起来、关起来啦！警察过来让我把摊子收起来，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把摊子收起，他说：“这里不准摆，你到别的地方去，到偏僻的地方去。”那时候我悬着的一颗心落地了。警察把围观的人驱散，我就走啦。后来我分析这件事情，觉得北京的警察都是有一定的修养和素质，不像杭州的那些警察。摊子没有摆成，我就去参观了毛泽东的水晶棺材，有很多人去看，那个纪念馆是不要门票的，因为毛泽东不可能让人们去看还要掏钱。很多名胜古迹

都要门票，就是那个不要门票。后来我又走到了故宫博物馆的前面，我一看，票价 30 块钱，我就望而生畏了，就没有去。

96 年我吃苦是在南京，南京是中国的火炉之一，气温高达 40℃。那一次我是从昆明到杭州，然后又从杭州到南京。昆明的气候是很好的，夏天阴凉的地方都可以穿两件衣服，那个地方摊子比较好摆，但那里的人们普遍来说文化素质太低，比较落后，毕竟处在边远地方，不像上海这些地方经济发达。我卖了一个星期才把到南京的路费卖得齐，可到了杭州我只剩下十五块钱，这下我就着急起来了，晚上住宿花了十块钱只剩下五块钱了。我想，明天要是下雨的话肯定要挨饿，没办法了。幸好第二天没有下雨，把摊子摆起有半个小时，就遇到了一个退休的老工人，他问我干吗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我把我的经历说给他听，他很同情我，就给了我一百块。那天我总共卖了一百二十块钱，这下子心理比较安定了，因为出门在外，没有钱是最大的事情。

卖了几天我就去了南京，本来在杭州就感到很热了，南京就更不得了。公共汽车上汗水能把衣服打湿，我就把衣服脱了，裸着上身，四川人也许带着一些野蛮的味道，南京人很多人都带着擦汗的帕子，衣服被打湿了也不脱衣服。在南京我水土不服，而且那里离家太远，南京的二十四个小时都很热，晚上也不例外。我实在呆不下去，就又回来了。

到了冬天，就又想去了广州，因为南方四季都像夏天，冬天的气

温也比较高。那一次我买了一张卧铺票，花了三百多块钱。因为我第一次去广州的时候把腿都坐肿了，这次就想舒服一下，苦中求乐嘛。

其实最苦的是心苦，皮不能算是苦，有些人看上去很乐观，其实他的内心比较痛苦，他的追求比较高，抱负比较大，很多现实的事情都不适合他。

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花了七十块钱买了一张边境证，去了一次深圳，在青羊宫写字的时候，有一个深圳人给我留下了一个地址，他说有机会到广州的时候可以到深圳去，要不然我也不敢贸然去深圳，因为那里的住宿和吃饭都很贵。我到那里去就住在他的家里，住宿吃饭都是他招待，然后我就去卖字，97 年的元旦，我在深圳最高的楼房帝王大厦附近摆起摊子来，那天的人很多，结果只有一个人买字，那个人说他也姓钟，和我是家门，他出于这个缘故才买一副字。我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再没有人买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深圳人对书法不感兴趣，也许艺术商品不适合深圳。反正卖不了钱我就再也没有去。听说深圳有一个罗湖桥可以看得见香港，但是我没有去那里。

去年就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因为路费比较贵，地形也不熟悉，冷热也有很大差别，还有的地方不适合写字，太冷了的时候写字手也要发抖。

11 月份，在人民南路的毛主席像下面，他们把我抓去关了九

天，主要理由是无证摆摊。从去年起成都的市容整治就比较严格，毕竟是中国旅游城市，要给游客留下好的印象，很多人被抓起来关起来。在关着的地方，晚上天气很冷，早上一个馒头，晚上一个馒头，没有菜，那些天我都没有解过大手。

所以说现在摆摊子越来越困难，不过路总还是要走下去的，我好不容易走到写字这条路上来，每一条路都不可能是很平坦，都是弯弯曲曲、崎岖不平的，人的一生不会永远都幸福，他肯定有很多苦难。摆摊子还是要继续下去，毕竟没有性命之忧吧。

我原来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宽，现在我知道是一个人，总要磨练成长。所以这几年来的收获，第一个是自己已经基本上成熟了，第二个是我的字进步了很多，这样，有了精神磨难，也有了一技之长。

今年的打算，成都不会再长久的呆下去，我还是打算外出，中国这么大，难道没有我的容身之所么？这种游历可以丰富人的阅历，而且会教给你怎么做人，这个道理很重要，不管你做哪一行，做人是要放在首位的。

我卖字卖了五年，卖了有上千幅对联，赚了七万多块钱，大部分都在路上花掉了。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不管多么困难我要把它走下去，我想有一天我要成功，我只要写字，把它写好。“事到盛时需谨慎，境当逆处要从容。”当你遇到困难时不要惊慌的去看待。人是为了希望而活者，如果没有希望，就没有光彩，就没有人生的

价值。

与狼共舞

吕玲珑：访问地点是成都百花潭附近的富景茶楼；开始录音的时间是3月16日14时，他是探险摄影家；47岁。

在我们约好见面的茶楼门口，他送我一本摄影集，上边是他拍摄的长江源头、唐古拉山峰、金秋的阿勒泰和宁静的稻城。

每年的初春，他总要在他的那辆北京吉普里塞满照相器材和食物给养，开着它离开对于他来说呆不了多久就会厌倦的城市，而在每年冬天来临的时候，当他蓄满了胡子，胡子上沾满了风霜，他就又开车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他的妻子说，他每次回来我都不好意思，像是要熟悉一个新的男人。

他的皮肤粗糙，身体结实，他在很多地方有一些特别的朋友：藏族少女、大漠中的土匪、牧羊老人、狼、熊和成群的羚羊。

他说，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他又该准备远行了。

中国的西部，一过甘孜州和阿坝就进入了西部高原地带，从这里开始一直到青海、新疆、甘肃、西藏，都是我要去的地方。

我可以告诉你我印象最深的东西。在西部走了这么多年，每一次我搭起了帐篷，烧起自己的篝火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奇遇。我可以从散落的小规模的羚羊群看到他们的后面有没有狼群，我也知道和狼遇到的时候怎样能够和他泰然处之地交流，知道遇到一只黑熊

的时候我怎样地对待他，这些都是我在西部得到的。我能够看到动物求生的那种渴望，还能够看到动物比人更高尚的地方。

十多年以前，有一次在藏北无人区，我自己带的给养不够了，就去打猎。遇到一群羚羊，我打了三枪，一只都没有看见他们倒下来。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我的枪法一般是一枪一个的，为什么这次没有？我就开着车跟着这个羚羊群追，追出去了 20 多公里，掉下来了三只羚羊。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最后我才悟到，是怎么回事呢？那受了伤的被枪击中的羚羊，被他的群体把他挤起来继续往前跑，一直到这个群体感觉到他们的伙伴在身旁已经停止呼吸了，没有救了，他们才开始散开，他就落在地上。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故事，非常一般的现象，但是它有着无以伦比的震撼力，一下子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就觉得这动物的伟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有打猎。

这是一群羚羊对我的启示。

再给你说说狼，我经常遇到他。搭上帐篷的时候把篝火一点，狼群就来了。因为你那里烧了篝火，他也不离你很近，他就围着你，你看见狼带着自己的小崽子就在你的面前，模模糊糊的。一直要到第二天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一支头狼就带着狼群走了。他们也不向你进攻，你也不要再去进攻他，在与狼共舞的这个过程中，你得到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夏天的狼是吃饱了的，他看到有人在这里，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奇，他也想跟你做伴。最奇怪的是有一次，

我在雪地上碰到了一支孤狼，冬天的狼会很饥饿，我转过山坳的时候，他就在我的面前。在我的《稻城画册》上，我是用标准的镜头把他拍了下来的，你说他离我有多近？！就在我的面前！他看着我，伸着舌头，我也看着他，我进两步，他退两步，我退两步，他进两步，我往左走，他往左走，我往右走，他往右走，我们两个的那种交流足足有半小时。他不走，我也不走，最后我蹲到地上，他坐到地上，这狼就这么奇怪。从那里边，我就认识到以前人们对狼有误解，狼是要吃人的，是要杀生灵的，但是动物扼杀生灵是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它是食物链上一种弱肉强食的淘汰，他淘汰了弱小的而使它的群体更加强大。跟那个狼的照面和会晤以后，我有点震惊，我觉得在人性里，有许多不如狼的东西，这是我内心最深的一种感悟，我真想随狼而去，也变成一只狼。

有一次，有一头黑熊，像女孩子一样看着我微笑，非常温柔、非常浪漫还带着温馨。我当时也是狭路相逢碰到了他，他坐在树枝上，那是一棵很高大的榛子树，他在吃树上的那种果实。我过山沟的时候，他听到有声音响，就“刷”的一声缩下来了。他在灌木丛的那一边，我在灌木丛的这一边，秋天的灌木丛非常弱小，树叶都掉光了，只剩下一些细枝枝，他在那里站着，我能看得清他嘴里喷着的气，我拿着枪一动不动看着他，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就这样，我冲着他微笑，他冲着我叹气，我想，假如我能够懂得动物语言就好了。如果你有一个大动作，他就进攻了，可是对峙了半天以后，

他走了，并且他走的时候非常浪漫，好像在跟你说拜拜、下次再见或者后会有期，这种浪漫带有他根本不带任何进攻的意味，他非常缓慢地非常友好地走了，很有意思。狼也是，它跟你左跳右跳，左跳右跳，就没想着咬你一口，他也没想着把你当成肉吃啦，当成食物吞了。他们比较诙谐的解释这个问题，那一定是一只母狼，遇到你这个老公狼，我下次去就会有一窝狼崽啦！

我去的那些地方，和城市的喧嚣是两码事，需要你耐得住寂寞，并且对你有非常高的要求，才能够长年累月的这样去做。我在拍照片的时候，创作的时候，非常激动，完了还是很平静地对待一切。我曾经遇到一个藏族姑娘，我到的那个地方是非常偏远的山区，他们那儿遭灾，一场大雪灾下来，就把牦牛羊全部打死了。那姑娘当时只有 18 岁，黑红黑红的脸上透出少女的纯真，她的眼神是城里的女人是永远没有的。她看着我说：“阿哥，我跟你去嘛！”我说：“你跟我干吗呢？”她说：“我当你的老婆嘛！你相信嘛，你就带我去，我肯定要好好的伺候你嘛！”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啦！我已经有啦，假若我可以把自己分成两个人，我拿一半给你！”

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我旁边看到我的一件事情，他看到，他也拍下来了，他被震动了。95 年他和我去阿勒泰，从新疆那边过来的时候，专门从我以前当兵呆过的一个老县走，一方面我可以看看当年埋在那儿的那些战友的生灵，死了的那些人，他们的灵魂都埋在那儿，另一方面，我也去看看当年的一位朋友——

穆萨还在不在。我当年到他那儿去看他的时候，他在给公社当放牧员，有 100 多只羊，他那个羊圈满地都是羊粪，母羊生的小羊，胎盘啦、血啊，到处都是，非常的脏，非常的恶心。进去以后，他拿出那个馕，就是维吾尔族人吃的干饼饼，只要皮肤裸露和拿出食物，一出来，就铺天盖地的沾满了苍蝇。那时候他的羊被狼咬了，我在雪地里头，零下三四十度呆了三天，把那个狼打死了。他非常感谢我，我们就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把我带到博斯腾湖里头，划那个原始的木头掏空的船，就象非洲的独木舟一样。我是 75 年跟他成为好朋友的，那个时候我是排长，维吾尔族语言叫解放军为尔勒兵，他不知道我的名字，他只知道我是尔勒兵的排长，他就这么喊：“（维吾尔族语）排长！排长！”我就叫他穆萨。这次路过那里，我就把车开到戈壁滩里去，找到了那个羊圈，空空的，羊粪也没有了，已经干了，变成土了，就是一片残垣废墟，没有那种还有人的感觉了，很悲凉的样子。我就在当年他放蜡烛的那个土坎上，给他放了两个罐头、方便面和一些糖果，写了一个字条：“穆萨，我来看你，我很想你，但没见到你，很遗憾，留下了东西，但愿你能收到。尔勒兵排长。”然后，我出来拿着机器准备把这个羊栏拍下来，这时候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就有一个黑点在蠕动，慢慢慢慢地朝这边走，拄着个拐杖朝这边走。非常奇怪，这里没有人，怎么会有一个小黑点呢？我说。我当时感觉，肯定是穆萨还活着！要不然，任何一个人不会看到这儿有辆车就跑过来，一定要是知道当年的故事和背景

的人，才能有这种感觉和直觉。结果走到了有一百米远的时候，我看出来了就是穆萨，他也看出了我，老远就叫：“排长！排长！”他叫起来，然后一阵狂奔，我们抱到一起就是一阵痛哭。他已经 90 岁了，满头都是白头发。他说，真没有想到我还能来看他，他汉语说不来的嘛，“你来看我，你来看我。”他只会重复这一句文理都不通的话。他说：“我现在好了，我已经有了 300 多只羊，修了新房。”我们开上车就在戈壁朝他的新房开去，他的羊杠子比他小 30 岁，就是他老婆。他的儿子已经结婚了，有孙子了，他最大的孙子都十几岁了。他一定要给我宰一头羊，让我吃羊，他说：“我自己有 300 多头羊了，生活也好了。”

我也遇到过拿枪抢劫的人，如果没有钱，他会把你打死。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把枪顶在我头上：“把钱拿出来嘛！”我马上就把钱拿出来：“要，全拿去！”他只要钱、要罐头、要吃的，我说：“我车上有的，你家在哪儿我给你送去。开到你的帐篷里，我都给你！”我开到那儿去了以后，就让他尽情的卸，让他拿完，然后我把帐篷搭在土匪的帐篷边，天天跟他要酥油茶喝，天天跟他摆谈，天天跟他做朋友，后来那些土匪成了我的朋友，把抢我的钱还给我，还问我：“你够不够？”他拿去的食物全部还给我，他说：“你比我还需要嘛！我这儿还有糌粑和酥油茶，你都拿去嘛！”

藏族人对人的直觉非常准确，你的豪放超过了他，气质超过了他，他会很服气的。反过来我们汉族的人非常阴柔、盘算、计较，

所以说人不如狼。狼要进攻的时候是直线进攻，就跟狗撵骨头一样，你丢出去，他一个直线定律，嗖的就去了。只有人进攻人是从背后去的。动物淘汰生物链上的东西，他是弱者淘汰，他要保护强大的东西的繁衍，让他的生命力更加的旺盛，他的群体更加的健全。而人淘汰的全是精英，你比他厉害，你比他有思想，他就会淘汰你，并且他淘汰你又不是一种直接进攻的方式，没有贵族格斗的那种人格，这是人的悲剧。

有时候会遇到死亡，有一次开车过阿里，我开车开到沼泽里就陷进去出不来啦。我在 20 米的沼泽地里陷了三天，到最后怎么办呢？人已经精疲力竭。不知道哪儿来的求生欲望，最后苟延残喘把能量全部释放光，把车上所有能够垫轮子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还是出不来，最后就把衣服裤子全部脱光，把它们垫到轮子下。出来的时候我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先是乌鸦呱呱地来到你头上，到你头上叨你的眼睛，你要用自己垂死挣扎的力量把它赶走，哨鹫看到乌鸦在那儿跳，直接就飞下来了，后边的一群就紧跟着来了。这个时候你必须动，否则他就会把你当尸体肢解了。

最开始出去的一两年，因为设备比较简陋，遇到的困难就要比现在多得多，但是到后来最难忘的，肯定还是最开始的时候。人永远要去回忆遥远的年代，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写得非常的明确，“当奥雷良诺少校面对行刑队的时候，他想起了当年父亲带他去看冰的那个下午”，就是这种感觉。那个时候的爱是一种博大，万物的博

大，那种恨是一种渺小，找不到去恨谁？

我在阿坝的时候，那里搞了一个盛大的宗教节庆，我看见一位老太太带了三个小孩，非常漂亮、非常纯真，然后走过来围着我们看。我看见其中的一个小女孩，她叫孜玛，翻译成汉语就是卓玛，仙女的意思。她只有六岁，我就给她拍了一些照片，在拍照片的过程中问她，我才知道，她的父亲走了，她的母亲得病死了，她就跟着奶奶。我就想把她带回来，但是又不可能。那个女孩抱住我，不让我走，我就给她买了干粮，给她留了一些钱，你看那张照片，她拿着格桑花坐在草地上，永远都在冲着我微笑。她笑的那么自然，我久久地不能忘记。这件事非常的感动我。我遇到这种小孩儿也非常多，但是我就是没有能力把这种城市里的方式也让他们得到一些。但是你再过来想，她千万不要得到城市的方式，她在她的那种氛围里，才是一种超然和幸福，如果把她放在城市里，第二天也许就会被污染，她再也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小卓玛，她就再也没有草原上的那种气息。

我在西部的环境中生存，回来的时候感觉像是一个外人。最多一个月我就不习惯了，心里就不平衡，容易发脾气，容易激动，格格不入。这些东西就是一种直觉，一种必然，就好像上帝派我来只能到那里去。我举这个例子吧，在他们电视台的探险考察的报道里边，说这里危险，那里危险，我就觉得非常可笑。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们这个群体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就不是这种氛围的人，他做这种

事情只不过是城里的生活的平淡无味了，想找个刺激，而在刺激当中，他就不知道他的状态要被扭曲，所以他就是病态的探险。他跟我是两码事，跟余纯顺也是两码事，跟尧茂书也是两码事，这些人就是对生命的一种执著，离了他是不可以的。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笑之泰然，并且就算我死去了，也就是我当年说的那些话，我还是一个牧羊人，赶着自己羊群走向遥远地平线，也许我不会回来了，我争取的只是回头向人们微笑的权利。他们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就会吓得惊叫。遇到一点点困难，就会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困境。于是乎他又“认识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其实我觉得他们就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是另外一个氛围里的人，他要做的这个事情是沽名钓誉。

在那里，我真的好象有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那种感觉，我在那个地方非常的踏实。我曾经为一个落日从早晨到晚上等在那里，只为了按一下快门，一直看着那个太阳移动到我设想的阴影的地方，好像是在等一种百年一遇的时刻。那就是那种朦胧诗的感觉，在等待光的变化的时候，你是在等待自己灵性的复苏，等待的是四十个处女给你的奉献，你能够把握到那种感觉知觉碰撞的最微妙的情绪，当那种景象出现的时候，我就感到其乐无穷、超凡脱俗、飘飘欲仙。一旦你悟到他选择了你，你也选择了他。那么你就孤注一掷的走到底，不要遇到一条偏僻的小路就走开了。

我的生命中有两件最幸福的事，一件就是一件事一辈子做到

底，还有一件事就是一辈子都不做，那就是喝酒。当我死去的时候我都没有沾一滴酒，我对酒还有一种迷惘，那也是一种幸福。

你最好到那种戈壁滩上去体验断了水的感受，到雪线冰封的上面去感受那些大自然的关系，去了阿勒泰就会知道俄罗斯为什么会出托尔斯泰，为什么会出现柴科夫斯基，因为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白桦林。

我的妻子对我这个人非常适应，他知道这头老山羊出去，什么困苦都放不倒他的。每年到 12 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失踪的人突然出现，她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她说每回你回来我都不好意思，好像不认识你，像一个陌生的魔鬼。

过上一阵儿，我又会消失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造反有理”

李风云：访问地点是重庆枣子岚垭住处；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3 月 22 日 14 时；他目前退休在家；50 岁。

他是一名右派的后代，一个异己分子；他是一名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名读书人，一名知识分子；他曾是一名造反派，一名武斗战士；他是一名幻想家，一名行动者；他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人，一些事件的目击者，一个知情者；他是一位同志。

现在他坐在女儿的房间，背后的墙上贴着歌星影星和球星的照片，他说，他们是我女儿的偶像，我也是。

他是一位父亲，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他只想做一个人。

我可以说把一个 20 岁的年轻人的所有的热情、精力、生命力都投入了“文革”。

那么大的一次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在我来说，个人的感受非常强烈。文革初期曾经对血统论提出过批判，我不知道他的背景，但那个血统论曾经是很风靡一时，让我感到深深的压抑。我父亲 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在那以前我已经经历过一些事情，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被农场的领导叫去，说，“你不许和李某某接触。”写文章，达到了发表的水平，编辑部给你一张调查表，叫“作者政审表”，给你的单位寄去，单位就批示：“此人父亲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此人资产阶级思想特别严重，建议作品不予发表。”所以在文革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种狂热的幻想，解放全人类，缔造一个红彤彤的美好的新世界，又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同时还能够解放自己。

起初参加造反，给工作组写大字报，然后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两派发生武斗，都以为是自己在保卫毛主席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枪，也把我一个 16 岁的弟弟带去上了主战场。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对一个政权厌倦之后，巴不得马上去找另外一个政权，换政权是没有用处的，换皇帝也没有用。要换的是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不换这些是不行的。想想我自己，我也就是一个中国人，活得很压抑，很难受，文革一

旦兴起，机会来了，咱们革命吧！咱们造反吧！砸烂一个旧世界，最后我就可以在政治上不受歧视啦！

从我自身的遭遇和我见到的，反思我们国家的历史。我觉得苦难使人聪明，你活的太苦他就强迫你思考，咱们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那么苦？

我那时候在农村，中国的农民真是勤劳善良、真实纯朴。我看到在下雪的冬天里打着赤脚上街买一只母鸡，为家里打煤油的农民。有一个很端庄甚至很美丽的中年妇女，穿了一件补丁针脚很细的洗得发白的蓝衣服，在饭店里向我要一碗剩饭。她说：“能不能剩半碗饭给我，我走了20里地，从家里来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后来我就给她另外买了一碗饭，她拿着就吞，噎住了。这样的人，她每天付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根本不能统计，她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到晚上九点钟睡觉，她不停的干活，结果她居然连一碗饭都没能吃上。这时候我不能不思考。

“造反”这个词汇翻译过来，就是对旧的不合理的制度的否定。在科技界的革命就是造错误和谬误的反，造反实际上有很多广泛和深刻的含义，至今我还觉得：造反有理。

我已经跟你谈到，我投身“文革”，就是觉得那种对血统论的否定，对官僚主义的否定和批判，是群众非常拥护的。千百万人这样上街、游行、写大字报批判走资派，没发神经病，他们不是疯子。我那时一点都没发疯，我很理智。如果说后来文革十年动乱给整个

国家造成的损失、经济文化倒退、政治混乱，我们是很清醒地干了一件蠢事，干了一件错事。但是我非常反对的是，对文革进行批判的文艺作品，包括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把造反派全部抹煞成小丑。我觉得那样就太简单，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一些执行政策的人，人品是非常好的。特别是造反派当中的青年，有的是真正的是有政治才能，有组织能力的，他们也有自己的人格魅力，

那时候我在重庆一个郊区的国营茶场当工人，1966年的冬天，重庆已经闹腾起来。四清工作组在我们那里说，重庆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重大“八一五”反革命集团受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指导，冲击市委。这时候他们就把重庆的保守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的传单给我们看。农场有一个女孩子回重庆探亲，回来时带了几张造反派的传单，那种热血沸腾保卫毛主席的气势，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感染了我。我想，7000名大学生上街去冲进市政府，冲进市委，没有带武器，能够叫反革命吗？我就是我们茶厂第一个跑进重庆的人，回到重庆的时候已经是“八一五派”占上风的时候了。进城以后，四清工作组在最后一次大会上，说：“右派子女李某某已经偷偷跑进城里，我们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他如果敢乱说乱动……”结果他说这话以后一个星期，工作组就滚蛋了。

我们那里的工作组有一个组长，此人是个什么玩艺？一口江西话，他是红军长征的中途参加红军的，没有文化，那时候工作队队长不能让他当，他文化太低了，说话乱放炮。他原来在重庆一个矿

山医务所当卫生科长，是穿着中校的呢子大衣转业到地方来的。他上班干什么呢？天天就和女医生、女护士拍拍打打，问问人家，“身体好吗？小姑娘？”他在台上讲话就这么讲：“咱们这些人的水平，那就不是5磅的，那是8磅的。”读《人民日报》社论，五百字的社论，二十几个错别字，他那叫8磅的水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矿区的造反派把他从他躲在矿区乡下一个亲戚那里抓回来批斗的时候，一个小伙子给他挂上一个横牌：“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从桌子上跳下去一脚踩在他的背心。五十多岁的人了，头发花白，那是残酷的行为。但是那种残酷的行为是他对群众霸道的反馈。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合理的一种反馈。而工作组也有一些比较讲政策有人情味儿的人，他们走的时候害怕我们这些年轻人去冲击他们，结果还有人帮他们拎皮箱、扛背包。也是工作组，也是走资派派来的人。在巨大的政治动乱、巨大的社会激流和浊流当中显现出来的还是不同的人格、不同的为人、不同的道德标准带来的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反应。斗走资派，那是上面的命令，社会的潮流。具体的一个走资派，你跟你的群众部下怎么相处，那时候的为人处事，就显示出来了。当然有一些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想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斗走资派就要斗得半死，有本身不是很坏的人，遭到了过分的严重的冲击。而我总觉得，如果没有文革的那次动乱，没有那次对当权派的批判，那么今天的腐败不知道要嚣张到什么程度。简直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

你说红卫兵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阿 Q。革命，就是把赵太爷的雕花床抬到破庙里头。血统论没有了，我就可以用我的知识、我的才智为社会作贡献，我就可以不那么屈辱，可以不那么受歧视，这不是阿 Q？

69 年以前我已经清醒了，我告诉哥哥，造反派这个事情不能再干，回来读读书、练练笔、写写文章吧！他不听我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说，“好，好，你努力，我不努力了”。结果批斗会上，他挨了两拳，我挨了一拳，因为咱们少努力了一点。

中国人都有那种在狂热的躁动之中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愿望，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两千年来的农民起义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农民当地主。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就是带着一盘大杂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贡献，咱们当时想的就是这个。我们来干他一场。阿 Q 不是认为把家具搁到破庙里，再摸一下小尼姑，革命就成功了。我自己想的就是把走资派斗倒，把反动的血统论斗倒，我自己政治上不受歧视了，那么革命就成功了。鲁迅写了阿 Q，毛泽东塑造了红卫兵。

那时候的全国串联，在广场讲上几句话引起欢呼，当然一个是毛主席的威信，还有一个就是十七年来官僚体制在群众当中积压的反抗情绪。

我又喜欢文艺，又喜欢军事，太好了，喜欢文艺我就可以搞宣传队，编节目，我自己作曲写词，自己表演编排舞蹈；一会儿又搞

武斗了，我就把我那些用兵布阵派上用场。但是那时候我很狡猾，我知道这种武斗是不会长久的，中央政权还在，不会允许你把兵工厂弄乱的。谁打赢了谁当革委会主任？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咱们两军对垒，抓住对方没有武器的人不要动他，给我放了。咱们武斗据点的东西随便吃，群众家里的东西我们不要动，说不定将来还以抢劫论罪。当然后来清楚了，搞一打三反的时候，造反派犯错误，如果你是红五类，认识错误，检查。像我们这种没犯什么错误，但是我又喜欢枪，却出身不好的追究起来就比较严重。

每次政治运动以前，都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打掉反革命的嚣张气焰。我与工作组辩论，那时候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最高指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然后就是他下面要讲的话。我说：“不对，不对，必须把中巴人民友谊这一段，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这一段读完，才叫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否则就是王勃指示，这个人已经死了一千多年了，他是唐朝的。”他说：“李风云，你睁大狗眼看看！”他把红宝书翻出来，“这里是不是最高指示？”我说：“好像前后都有一个引号吧，我狗眼都看见了，怎么你人眼没有看见呢？从语法来讲，这是毛主席引用别人的话，如果单独的念就不能叫最高指示，你可以找你们工作队文化多一点的同志打听打听。”我血气方刚，锋芒毕露，咱们还是阿Q。那时候工作组的工农兵干部队伍，普遍的文化水平相当低，闹得笑话就数不清。但是有一点，中国的人民，正直的干部，包括部队的干部，最后大家认识到文革

是个错误，那个时候人们坚韧的忍耐、等待机会和曲折的反抗，也是很感人的。从那个当中我看到我们的民族确实是生生不息。好起来不容易，要灭亡也不可能。

在悲剧当中，毁灭的不一定全是美好的东西。按鲁迅的说法，悲剧是把美好的毁掉给人看。就整个历史来说那是一场悲剧，但是他也毁掉了一些丑恶的东西，他让我们普通的工人群众知道有些人并不可怕，不过如此。如果群众要和他理论，他也会显出狼狈的一面，只要群众敢站出来。而今天的群众如果能有那时候的十分之一的造反精神，腐败、乱收费、乱七八糟的社会现象将会少得多。

我有时会想到我们当时武斗的情景，一个老工人，本身是兵工厂造炮的，他用 37 毫米的高炮从嘉陵江的北边打到嘉陵江的南边，炮弹卡壳以后，按规定应该是等它冷却几分钟后用炭条把它捅出来，他等不起啦，一炮就被炸死了。一米八的大个子，我们用担架把他扛上，血水顺着竹片流下来。还有一个老工人被炸掉了三个手指头，手上缠的纱布，医生给他打了麻药以后，他听到他的炮没有响，他说：“我的炮没有声音了！”就往阵地上扑去。我这时候才想到，战争时期那些舍身炸碉堡、负伤坚持战斗都是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那股劲头了。有一个比喻，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在纯洁的时候，有了第一次狂热的初恋，结果对方是个流氓。把中华民族比作这个少女，从此以后你再要她有什么狂热的爱情，再奉献一次，已经很难了。她被蹂躏了、被欺骗了、被糟蹋了。那时候，十五六岁的中

学生小姑娘，一边唱“北方的大雁，请你快快飞”，一面给机枪装子弹袋。我就问他：“明天打仗了，你怕不怕？”她说：“怕什么呀？你怕，你回去吧！”她在哈哈大笑。是的，真是没有人怕！不怕死啊！现在的人汽车上发现了扒手，男人们全部把脸别过来。

武斗是 1967 年的夏天进行的，重庆的武斗是全国之冠。我们的农场离重庆市区有一百多公里，那时候我们造反已经一年了，生产早就停顿。一部分还有兴趣搞政治的，咱们就去造反，还有一部分是用我开玩笑的话说，就是以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速度结婚生孩子的。那时候我是单身汉，我父亲问题不解决，我也不好结婚。我想我父亲当右派，我是黑狗崽子，再结婚生一个小黑狗崽子，那不外乎就是让阶级斗争一代一代的搞下去。我何苦害那两个人呢？67 年的 8 月份，我和农场的九个兄弟顶着大太阳走路，步行回到市中区。那时候武斗的焦点在重庆的杨家坪，嘉陵江大桥，江北区和市中区之间。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条小街，全部都是用竹子捆绑的很破旧的房子，刚好被对岸“反到底”的打了一发燃烧弹，烧了十几间。那时候幸好消防队没有派性，不管是谁打房子，他都来救火。父亲母亲已经不见了，他们都到“反到底”的据点里躲武斗去了，我弟弟是个中学生，一个人在家里留守。我一看大木盆装了满满一盆水，弟弟在那里吹笛子，他说已经断过两次水，现在在这里搞战备，这是战备水。家里有多少米、多少菜油、多少煤，他给我清点战备物资。我说：“没意思，咱们从军去，保卫毛主席。”

江北第三钢铁厂的组织是“反到底”观点，我们也是“反到底”观点，我有一个同志的母亲是“反到底”的，当炊事员。我就跟我弟弟说：“把乐器收了，房门锁了，把猫交给邻居，咱们走啦！去他妈的菜油，咱们吃大锅饭。”到了延安兵团的总部，一个四层楼的水泥结构的房子，大门口堆着条石沙袋和重机枪。戴钢盔背自动步枪的卫兵问我们找谁，我们说找高宝争，他是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很机智的一个北方人。同志的妈妈就把我们带到了延安兵团司令部说：“这是从茶场来的小伙子，完全合格。”他像收徒弟一样，“行，留下来吧！”咱们就从军保卫毛主席啦！

先去的时候没有枪，也没有事情可干。第一顿饭是一大桶酸菜炖粉条，带一大桶红烧肉，我跟我弟说，当兵怎么样？保卫毛主席错不了！大米饭管饱，那么大的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差大秤分金银了，还真有点山大王、流氓无产者的形象。咱们吃饭的地方有两座坟，一座坟用炉渣堆起来，是半个月前两派对峙的时候打死的。进大门的地方有一个密封的很厚的塑料袋，那个尸体是一个中学生。他的家在农村，家人没有见到他，尸体已经烂得一塌糊涂了，咱们离那两具尸体只有十几公尺。但是年轻人盲目乐观，说：“我来打仗肯定福星高照，子弹不会找我。”从来没想过，真的打起来，子弹找谁，他也不告诉您，他也不开会研究。那个武斗据点里面，有四层楼，有很现代化的手术室，造反派里边什么人都有，大学教授都有。市委领导干部也分为两种观点，工农商学兵、政治、

经济、文化，简直就是两个政权，很有意思。搞外交的也有，当翻译的也有，而那幢大楼就是一个小国家的中枢神经。有几个穿工作服戴钢盔挎手枪的造反派头头，都在朝鲜打过仗，他们会打仗，他们知道一支军队应该怎样组合，重机枪架在什么地方，要封锁那条街，他们都懂。重庆有两所军医大学，三军医大和七军医大，他们那些同观点的“反到底”师生就在这里。我们战场的救护车是一辆装甲车，我对弟弟说，“只要受了伤，马上就不打了，见了救护车就没有问题，只要不伤着心脏脑袋。”那些少校级以上的军医，战场救护的例子上百例，一般的伤，那自是不在话下。还有堆积如山的粮食、食盐、煤油桶装的菜油，我一看咱们这种幸福的生活可以维持很久，粮店有“反倒底”，财贸也有“反倒底”，要什么给什么。造反派有最高指示，“革命队伍要互相关心”。那是一种既有政权又不见政权的感觉，那种战争也是真枪真炮，现代化的装备，打起来炮火连天，而又不像战争。

我们去的时候是8月14号，第二天就是重庆“八一五派”的生日，而“反到底”是“八一五”派的敌人。大楼里的空气很紧张，已经吃过晚饭了，炊事员又在切肉和面。我问这是干什么？他们说：“今天晚上有戏，今天晚上的红烧肉特别的好吃，我们是到乡下找老太太要的咸菜，香得不得了，晚上来吃吧！”我还看到那些中学生在给重机枪按子弹袋。晚上我们被炮声惊醒了，就在我们大楼七十公尺以外的地方，双管的37毫米的高射炮，向南岸打过去，把

重庆市第二工业局的一整幢大楼和两幢教学楼打成一片火海。兵工厂工人设计的精度肯定比炮兵准的多，因为他每天都要矫正。我们看见炮弹一排一排地从窗户里打进去，像电影似得，火一下子就燃烧起来，通天的大火。打着打着，那边就发信号，进攻部队希望打哪个哪个，但是这边不给他们打，因为旁边有民房。进攻部队说，他们从大楼里边跑出来了，打流弹！“不打，学生跑了认输就成了，你打那些小兔崽子干什么？”那些老工人说。那是绝对精良的武器，但是又不像是战争，因为双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争论谁在保卫毛主席，我说我保卫毛主席，你说你保卫毛主席，谁打赢了就是真正保卫毛主席。后来我听到一个朋友说，他听到塔斯社的一个广播，说：“8月14日凌晨，在嘉陵江北岸的毛泽东派，向嘉陵江南岸的毛泽东派发起进攻，炮击持续两小时。”那天晚上打了三万发炮弹，我扛了有六箱。武斗结束以后，在修二轻工业局大楼的时候，那里招零工，我们茶场还没有上班，我就从嘉陵江边走了很长的石台阶，义务担了两担沙。那纯粹是作为赎罪，虽然没有杀人，但我也已经放火了。

8月18号，我们的领导来了，他们说，到外面去拿枪。建设厂也是以“反到底”派为主，我们直接走进了国家兵工厂的枪库，护厂哨兵见了我们，一个立正，“向革命造反派致敬！”我就带头向解放军致敬，“向解放军学习！”那是一个很宽的钢梁结构的库房，两边是枪架，一排一排的自动步枪，全部是黄油抹好的。半自动步

枪就像妇女们码的柴禾。我拿了一只六五式的半自动步枪，那是很新的枪，一个弹荚十发子弹，不拉枪栓，而且是点射，后弹膛自己张开，弹荚从里边跳出来，再压一荚。它的优点是射击的精度高，但是太慢。半自动步枪的优缺点介乎于冲锋枪和步枪之间。后来我想起了有一个郭兴福压弹荚法，他让半自动步枪变成自动步枪的射速，在战场上是相当占便宜的。小男孩儿都喜欢枪，回到大楼里，一人发了六十发子弹。发了以后马上拿着过枪瘾，头头听见了就来问是谁在打枪，我们就说枪走火了，其实他知道，小青年拿着枪怎么着也得玩几把。

那时候“反到底”打到长江嘉陵江南岸，把整个嘉陵江大桥占领以后，就宣布嘉陵江大桥为红色解放区。农民就从郊区到嘉陵江大桥上卖菜，“八一五”派了游击队的短枪手在那里打冷枪，很热闹的。我们戴着钢盔在大桥上巡逻，发生打冷枪以后，我就告诉我弟弟，枪不要背，压上子弹端在怀里，枪口冲天。对面的高音喇叭喊着：“强烈抗议匪帮向我挑衅！”这面喊着：“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我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大桥上城市居民和农民买菜卖菜，“多少钱一斤？”“两毛。”“两毛？要斗私批修。”“什么斗私批修，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城市老太太把菜拿来甩一甩，“你这个有那么重？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全部都是毛主席语录，精彩极了。我就背着枪，在农贸市场巡逻，听老百姓用毛主席语录讨价还价。在大桥

上的几十分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部都显现出来了，浓缩在那个大桥上，想起来很荒诞。那时候惟一有威信的是野战军，公检法砸烂了，两派只要看见野战军，都会承认你是权威，你代表毛主席，因为解放军是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亲自指挥的。而解放军没有出来收枪，没有出来制止。十六条上明明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竟然就从拳头一直到高射炮，重庆还动了坦克。重庆有装配坦克和装甲车的工厂。武斗当中，重庆可能死了上千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中学生。中学生不知道害怕，十五六岁，十六七岁，在自己的身上捆上炸药，就向对方占领的大楼冲过去。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的电影，给了我们很多精神养分，也给了我们很多毒害。我们渴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在流血的战斗中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直到现在，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我还是有那种东西。我的老婆说，在街上看见流氓，你不要去管。我说不行，我忍不住，我忘记自己已经不再是三十岁的小伙子了。随便哪个一拳打我就得躺一个星期。我爱人有时候说我的女儿一点都不知道生活的甘苦，“你爸原来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说：“咱们很艰苦，但是咱们用不着把那种很值得赞颂的东西再向自己的子女倾诉，我们多么苦，你们多享福，好像要他来向我们感恩，有什么感恩的？社会进步到这一步，他应该过这种生活，他应该幸福，他可以不知道那些痛苦。只要他能够珍惜这个幸福，为他的后代创造幸

福就行了。”中国人喜欢把自己受的苦受的磨难作为一种资本，向下一代炫耀，我对这种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反感。我就一个女儿，她在读高中，我跟朋友交谈的时候说，我是只思甜，不忆苦。这些事，我跟我女儿也没有讲过。我特别赞成你们这些年轻人读书就要读好的学校，工作就要干体面的工作，待遇高的工作。下一代的中国人将会很难当，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代只知道奉献不知道索取的人。我们两千年的封建文化对个体的人的要求都是直讲责任不讲权利。我觉得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懂得自己的权利，懂得自己的尊严，懂得“我就是最宝贵的。”你看看现在的社会，方方面面那么多阴暗面，那么多问题，归结起来，还是作为本体的人的个体得不到保护、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爱护、得不到承认。

我希望有一种在下个世纪保持理想的人。太现实，一个民族也就没有将来了。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想。说到革命，这不是一个政权和政党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他不是急功近利能够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它充满了科学的论证的逻辑，又充满了诗意和激情。而且它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正义感。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看到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异化。他才反抗寻找一个新的出路。确实要解放人类。资本主义到最后也会显示出它致命的弊病，人类还要改造它！

患难夫妻

张正宇：访问地点是奉节街道某化妆品店；开始录音的时间是3月29日9时30分；

他是化妆品店的店主，三峡移民的一员；52岁。

雨后的奉节县城道路泥泞，杂乱无章，中午在小吃铺里差点吃了一只苍蝇，这会儿我也像一只苍蝇一样在狭窄的破旧巷道中乱撞，街道两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书店、影碟店、小吃铺、夜总会和录象厅，法院外的墙上贴着几张枪决公告。长江沿岸潮湿的气息像油脂在缓慢滑动。

我想在招待所里洗个澡，信步走到一家化妆店门口，准备买一片袋装的洗发膏，化妆品店的老板出来招呼我，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说我从北京来，他说：“那我们是老乡啊！我也是北方人，我家在天津。”

他请我进屋，拿出一张小板凳让我坐下，我看到他边照顾生意边喝着酒，一碟花生是他的下酒菜。

他说：“你把洗发水拿走，不收你的钱了。”

我问他：“你的家在天津，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他感慨的说：“我的故事，说起来可就多了！”

我们的故事刚开个头，他又开始招呼来来往往的客人，他说，你明天早上再来吧，上午人少，清净。

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爱人是怎么到北方去的呢？要从这里说起，最早的时候，我爱人到北方，是被别人欺骗了。她有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的姐姐跟着我们北方的一个男人结婚了，就跑到北方去。她的姐姐说你们两个人在山区特别苦，你们到河北来吧。我爱人出于当时她的家庭环境，就想找到出路。赶快就去了。她的姐姐给我的爱人介绍了一个对象，是我们邻村的。她从中间把钱用了，等于把我爱人卖给了人家。等我爱人去了以后，他们就把我爱人锁到屋里，不许她出来，他们说，你要答应这个婚事，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答应，就不放你出去。当时我爱人坚决不同意，但是他们把她锁起来，一直不许她见外人，关了一个多星期。我爱人心眼儿相当多，正好是赶集的时候，她说，我同意了，但是总要赶一下集，买点东西吧。她就跑到县城去，写了一张小纸条，电到检察院里，把她的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检察院当时有个检察长，他搭救了我爱人的生命。当时有一个细节，他们家曾经带着我爱人去照相馆照结婚照，在照相机按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爱人一下子把头就扭过去了，后来这张相片依然存在。检察院公安人员到他这个村子里，问了情况以后，就说他们属于买卖婚姻，女方不同意。这时候我爱人把照片拿去给人家看，证明她并不愿意。后来检察院监察部门就把我爱人从他们那个村安排到我们大队。我的四嫂也是四川人，这样一个外地人来到我们这里，个人单独生活，口音也不懂，做饭也不会，他们就安排我四嫂来照顾她。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后来通

过我们的大队支书做介绍，我们结合了。当时大伙也都反对，说不要找四川人，四川人到处跑。但是当时我们看她怪可怜的，别人拿她开玩笑，因为她挑水也挑不来，我们北方是水井嘛。她做饭也做不了，冬天的水缸结冰了，她也搞不了，下雪，她把雪化在锅里煮成水。看她特别艰难，我也出于一种同情的心理，就和她结合。后来我们一直艰苦生活了这么多年。

九年以后，她爸爸给她写了一封信，就说他们这边的知识青年都回来了，要求她回四川。她当时犹豫不决的，两头为难。回来吧，我一个人在那边，我原来老家是在农村。可不回来，一辈子前途就没有了。我说：“我支持你回去，不管牺牲一切代价，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你还是要回去，至于今后我们两个怎么办？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想跟我在一起，到时候我们在共同想办法，不想，我们分手也可以。为了你的前途，不能把这个机会错过了。”这样，我就给她把所有走的东西准备好，凑够了路费，送到北京。带着孩子把她送走，这时候我们村里七言八语的说起来：“她一个四川人，跑到这边来跟你结婚了，现在好嘛，安排工作了，她要回去，肯定这一切都不回来了。”我姐姐说：“她肯定不回来了，你也别指望。”我说：“看吧，等以后看。”她回来安排工作以后，上班只有二十七块钱，工资相当低，她写信问我要钱，那点工资，她和她父亲两个人绝对不够。我就给她寄钱，又寄粮票。大伙又七言八语的，他们说：“她骗你呢，找你要东西，反正不想跟你了，四川人的特点就是到

处跑。”我也不管那个。当时的政策是小孩儿跟妈走，她把工作安排了以后，又写信说她天天想孩子，怎么办呢？回不去，她就说把孩子给她送来吧，送来可以把户口转来。这样我的那些亲戚朋友和家族的人又都说了：“千万不要相信，不能把他送去，送去后你一辈子就完了，连孩子都没有了。你总要抓住一样。”我最后还是个人决定的，把小孩儿送来。小孩子那时候读一年级，送来了以后在这里住了半个月，我就回去了。等到两年以后，我们村子里的议论就更多了：“他把孩子送到四川去了，把爱人也送走了，搞得个家破人亡。”就说我太傻，他们说没有见过这么傻的人。这么好的一个家庭，搞得妻离子散。他们说她肯定是把离婚手续办完了再回来，我也不管它。

过了一段时间，我爱人有了探亲假，就回到北方。大伙心里也明白了，一看确实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事情，因为我们两个人属于那种患难夫妻，并不是像一般人那么结合。当时我的家庭也相当困难，她也处于走投无路的地步，举目无亲。她一回家也看出来了，我一个人在家确实也不行，当时考虑把我叫到四川去有很多的困难，一个是房子住不下，再一个经济是大问题，当时还凭粮票吃饭，要购粮证。她也犹豫不决的住了几天就走了，走到石家庄，她叫一个熟人给我带来一封信，也没有说其他的，只是叫我赶快赶到石家庄，坐火车走。她在石家庄做了一个突然的决定，结果我什么都没有带，独身一人跑到石家庄，并且还是找别人借的路费。就这样，

我跑到四川来了。一来就是这么多年。

当时也没有到南方来过，那个年代有多少人出门？不像现在经商到处走。来到这里一看，他们家房子也没有，一间小茅草房，一张床，睡不下，打地铺，灯——灯不亮，水——水没有，一无所有，连张吃饭的桌子都没有。怎么办呢？当然我的家庭虽然也很困难，但比她的家庭还要好一些，说起来她是一个城市居民，但是还赶不上我一个农村的。这样，想走，不可能，她肯定不回去，因为她的家乡在这里，他的父亲没人管没人照顾。我的父母没有了，兄弟姊妹都在天津，她就劝我留在这里。我们呆下来，一切都是亲戚朋友赞助的，吃饭桌子、小板凳、水缸都是人家给的，连水桶都没有，慢慢维持吧。

在这里打工，做零工，不管是下劳动力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只要能有生活来源就做。那时候艰苦奋斗，真是很不容易，要仔细的说，一天都说不完。小孩子要读书，口音不懂。生活呢？我们从北方来到这儿不习惯，水土不服。还有各方面的原因，那简直不行。而且外来的人在社会上低人一等。几年以后，公安局就帮我把户口解决了，给我安排工作，安排到商业系统，这才好一点。商业系统工资又不高，我们两个工资加起来一百多块钱，生活还是不够。这样在单位上了十多年的班以后，就开始个人经商，慢慢走到现在这一步。

反正我们两个的曲折那是很多很多。他的一个表姑父曾经把我

们两个喊到他家去，他说，他有生以来最赞成的，就是我们两个，“从她到你们北方去插队，背井离乡，到你到我们四川来，背井离乡，你们两个一直结合到现在，你们两个确实是患难夫妻。”这个患难夫妻包括的很多啦，现在到这一步，大伙确实都赞成，从原来的一无所有，到现在不说多的，十来万块钱是有的。生活的温饱问题是基本解决了，家庭的小康水平基本上是达到了。说起来还是政策好，这二十年的变化，我们家收获还是很多。小孩子安排工作安排得不错，安排在旅游部门，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得挺好。

在北方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家里劳动，那个时候的收入你也知道。一天挣的工分根本寥寥无几，指望生产队的那点粮食根本不行。中午下地干活，别人都回家了，我们两个还在地里打草，尤其是我爱人。她的上进心特别好，六月天那么大的太阳，她还在割草，割完了草回来再晒干草去买，这一天累的拼死拼活。收割小麦，早晨起来，计工分，她从来不比哪一个男同志搞的少，一个月的工分下来比哪一个都多。来到四川遇到的困难更多，我来到这里以后的那段时间，她刚刚参加工作，在单位上是个新工人，就是重活脏活都要你来干，锻炼你嘛！我呢，就干点零工，拉拉板车、给人家搞包装、还当过家庭保姆，给人家看小孩儿，邻居的孩子没人管，教给你，一个月给你点钱。这二十几年，基本上都是奔奔波波的过。但是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你埋怨我，我埋怨你。

当时最叫人看不上眼的，是在北京火车站，我送她上了火车，

火车没有开之前把门关了，我爱人就在车厢的玻璃里边，火车走一步，我抱着小孩儿赶一步，里外都哭，那个场合任何人看不下去。我从北京把她送走以后，就回到天津。我大姐说：“你怎么才走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我说：“我从北京来。”她说：“有事情？”我说：“我把小娟的妈妈送走。”她问：“送到哪去了？”我说：“回四川了。”当时我姐姐一下子就坐在地上，昏过去了。她说：“你怎么把她送走了呢？”我说：“我们这里安排工作，没有能给她解决得了，虽然说是填表了，她那边一个是她爸爸没人管，只有这么一个闺女，再一个她有这个机会，让她回去算了。”我姐姐对我大不满意，我说无所谓，为人家的前途，不能把人家一辈子都耽误了。

我们这些事情，我那个孩子都知道，她那时候都已经懂事了。你想这两个场面，我从北京把她送走，第二次，我把她从我的老家送到这里来，我又走。还有第三次，我爱人带小孩回家探亲，那时候她九岁，住几天之后她们两个走，我送他们两个到县城坐汽车走，我的小孩儿就不松手的哭，这些她都能记得。小孩子的心里当时也明白，我们家一家人三口人，是不可以分割的。为什么叫我们三个人今天一场分别，明天一场分别，经常搞这种事情，她心里肯定也有一个想法。虽然她嘴上从来没有说过，但是她心里在想。别人家父母都在一起，我们家一会儿我爸爸走了，一会儿我跟我妈妈走了。

我爱人从小生人就相当苦。一岁半的时候妈妈和爸爸离婚，象个野孩子一样在街上跑，连个鞋都没穿的，连个衣服都没有。她小

的时候就这个心理，自己苦，就要想法子奋斗，她的吃饭穿衣都相当简单，舍不得穿，舍不得吃，一直到现在还是这种品格。她在单位吃苦耐劳，领导叫她搞哪样都可以。我是在她的影响下干起了小工，那时候还放不下身子，就觉得不好看，一个外地人到这里来干零工，给人家拉板车，面子上过不去，她就劝我，她说，不要不好意思，你是依靠劳动来的，

这么多年我们都是互相安慰，互相支持。我就说到现在这种情况，现在社会变了，比起人家有钱的，我们算是显得没钱的，比起没钱的来，算是好一点。现在社会这么乱，我们还是像原来那样。

这二十年来变化还是非常大，从我到奉节这个地方，现在的变化翻天覆地。我刚来这时候这个县城像一个小镇，一切都没有，自来水管儿都没有。那时候哪有什么电扇空调，冰箱洗衣机，我们现在家庭的一切都有，都买得起了。

以后我还准备继续在干下去，因为身体还可以，这几年挣点钱我可以养老，也许我还能回到老家去呢！

我本自由

武建哲：访问地点是宜昌某住所；开始录音的时间是4月1日16时；他是一名公司文员；31岁。

我能够感觉到他性格中那些极端的质素，他不停的抽烟，谈到

一些往事时面色沉郁，有些瞬间你甚至能体会他的挣扎，他的宜昌口音让人不安，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谁在墙上敲击着钉子。

他讲述的是使他苍老的童年。

我抽烟，你不会介意吧？

我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有点儿太随便。不愿意受那种纪律的约束，但是做事情还是很认真的做，上班的时候如果你让我加班，我可以不休息，我可以不计报酬，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受约束，特别愿意做一个自由人。所以政府机关也好，保险公司也好，我都没有干长久。

我这个人原来脾气很火爆的，为一点小事就可以争吵，甚至动手。现在回过头来想起这件事，真是觉得对不起别人。比如我和我爱人，男同志就应该让着女同志，何况她还是我的爱人。以前我骂，我还动手打。可是我现在对她可以说是逆来顺受。她说得对，我就听，她说得不对，我就走，我也不跟她争，也不跟她吵。

说句你不相信的话，我和父亲有十多年没有讲话了。为什么事情呢？高中毕业的时候，为了庆祝一下，我们同学约了到张家界去玩一趟，我问他要钱，他没有给我，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从那以后我见他就不讲话了。有许多朋友到现在还劝我，总是说我不对，但是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对？我就是不愿意讲话，如果你病了，我可以尽我的义务。除了我的妻子和小孩儿，我和我的许多亲人都不讲话，讲不对路我就不愿意讲。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

跟自己亲人都不讲话，我说，也不是我不孝顺，我是不愿意再发生口舌上的矛盾，我性格比较暴躁，讲起来再动手动脚总是不好，这是一种避免麻烦的方法。也可能别人认为这种方法不正确，但是我就是采取了这种方法。

我想学法律可能对我还是有不少好处，我能够看到一些原来不敢面对的缺点。以前嘴巴很倔强，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缺点。我现在为人处事非常的平常，对自己的人生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从生到死，每个人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你的空间有多大，最终你还要回到死亡上来。那么在这个中间过高的追求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在物质上，生活能够维持好也就不错，我对自己人生的看法，无论是酸甜苦辣，还是喜怒哀乐，本身都是人生存在的意义，所以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一些事情，不想自己出什么意外。

我给我的好友们说我有些心理变态，有一些病态，我控制不住自己。我一冲动起来，血一往上涌，就没有理智了，说话也没有条理了，就开始摩拳擦掌。我和家里人吵架的时候，心里也不愿意，觉得很难过。我经常跟我的爱人开玩笑：“你在家不要多发生争吵，因为我是一个精神病人。”

正常的心理状态，如果你要是对它进行压抑，它就不能平静发展，肯定会变成病态。童年时候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的就是父亲打我，他的教育方式是绝对的家长制，没有二话，他用带刺的荆条打

我的屁股，把裤子脱光了打。现在看来他确实是为我好，但手段也确实太残忍，而且有一些武断。我小时候住在那种贫民区，很多年纪相仿的孩子在一起玩儿，但是我父亲作为大学生，在当时可能有一种怀才不遇或者不甘心的想法，他不愿意我和那些孩子在一起玩儿一起混。他要我好好学习，那个时候我读小学，他逼我逼到什么程度呢？他那个时候在粮食局晚上加班，12 点钟下班回来，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检查我的作业，做错的要重做。你说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现在就像宝贝似的，那么晚了天天叫起来，不是一次两次。你可能没见过那个时候的一种量衣服的尺子，他就拿着让我做语文、算术，如果不符合要求就打脑壳。我那个时候就只知道哭，眼睛是模糊的，头是大的。作业也不会做了，想也不会想了。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压抑。

不过那个时候，我也确实是非常调皮，就是小流氓，打架是非常出名的。我跟他们在一起混，现在想那些事情对我也没有什么坏的影响，倒是丰富了我的社会阅历。也算是见过场面的。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我都见过，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我父亲在那里是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还是比较少，他就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强制的教育方式，我真是受不了。在他那种教育方式的影响下，我不爱读书。上课的时候我画画，我画的画还算可以，学校举办画展的时候选了二十幅图画，我有十二幅入选。我喜欢国画写意，我还记得我没有纸画画，把书和本子都画满了。夏天的时候我

在厕所里往身上画画，被我们的班主任抓住了，他怎么处理呢？就让我在学校的每一个教室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看，让大家看我用毛笔画的画。画的是一些什么呢？马，羊，一些动物。我家里的人觉得很丢脸。我为了这件事和我的班主任大吵一架。94年他又见到我，他后来说，他当时觉得我很聪明，说当时是为了我好。我的心里说了，你这种为我好，我实在受不了呀！我自己的兴趣你不让我发展，你总是强迫我。如果我那个时候是在初中，他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性格已经非常暴躁。我是跟老师动过手的。老师当时揪住我的耳朵，我就动了手。我觉得老师的教育方针不对，我有一个看法，是针对传统观念的，为什么晚辈一定要受到压制？我觉得应该公平一些，就像对老人，我不能因为你是年老的人而有失公正，我觉得互相都不要欺辱。

我也喜欢看书，不过我不大爱看小说，也不太看什么武侠书，我比较喜欢看新闻类的纪实类的书，象个人传记这样的书。我在正儿八经应该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读书，现在倒又想学习了。我有一个看法，是针对传统观念的，为什么晚辈一定要受到压制？我觉得应该公平一些，就像对老人，我不能因为你是年老的人而有失公正，我觉得互相都不要欺辱。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老人和晚辈之间就是有不公平存在，他总是站在有利的一边，大家都帮着他说话。

我爷爷在这个城市是非常有名的，上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他，

当时他是轮船的船长和领江，在长江航运史上是可以查到的人物。当时夔门还没有炸，三峡这一带是非常险的。宜昌这一段，如果不领江就会撞船。我听我父亲讲了关于他的事情，我非常的佩服他，他很小从秭归家乡出来到重庆去找工作，经理问他，“你会不会游泳？”他当时只有13岁，他其实不会游泳，但是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会，我马上就游给你看。”那是在嘉陵江的朝天门，他马上就要脱衣下水，那个经理没有让他下去，说“可以了，你到这里来干吧。”然后他就当了水手。他跟着船走了很多年，后来变得非常出息，成了有名的领江，又当了船长。当时他的待遇最少是一个月一千三百个大洋。我生下来不久他死了，他身上的冠心病、高血压都有，我当时两岁，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躺在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他非常的喜欢我，我父亲说他非常的溺爱我，我是在冬天出生，满月的时候，我得了气管炎，容易感冒，抵抗力不强，他就买罐头给我，或者用馒头蘸蜂蜜给我吃。我姑妈说，我两岁的时候已经会走路，我一个人走到太平间去站在我爷爷的旁边。这个我没有印象，但是他们说确实是那样。他死之前，他在病床上，我给他喂馒头，他把它吃了，到死还没有吞下去。

我姑妈非常喜欢我，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那个时候非常喜欢硬币，她经常给我拣那些硬币回来。她是建设葛洲坝的，每个星期都坐车回来带给我一块钱硬币，两分到五分的凑在一起。我七八岁已经会做饭，我还记得有次我去买菜，那是个星期六，我买了一些

肉，给我婆婆吃了一部分，给我的姑妈留了一部分，然后我自己吃的是酱油拌的小葱，我的姑妈回来看见，当时她就哭了。我当时很喜欢我姑姑，她回来后我对她说：“我给你留的有肉。”有一个冬天，我去找我的姑姑，冬天的工地非常泥泞，我一路踩着泥泞去，下着大雪。我后来找到了姑姑，那次她也哭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哭。

在当时，因为我爷爷非常有声望，周围居住的都是平民老百姓，就是我们住的是一个两层楼的洋楼。我父亲可能有一些优越感，他对我要求可能很高。他对我个人的选择，总的方向要出人头地，他真正的是望子成龙。他原来在读书的时候，每年每次必拿第一名，每一门课都是第一名，如果考第二名他会哭的，现在他的成绩单还在。他保存着古代读书人的那种习惯，你说他穷酸也好，他的书分门分类的用箱子装好，有的书几乎烂得看不成了。我有一次翻他的书，发现还有老版的康熙字典，他每年必须清理一次，他的书到现在都还在。

有一次吃饭当中当着很多客人的面，他摔桌子扔碗的教训我，为什么呢？他说我吃饭趴在桌子上吃，而且还把菜直接放到嘴巴里。按照比较传统的吃法，应该是身子不能挨着桌子，要坐的端正，把菜放到碗里然后再吃。吃菜的时候嘴巴里不能大声嚼东西，眼睛不能使劲盯着菜，这是非常严格的。我对这些非常反感，我现在吃饭还趴在桌子上，而且我吃饭比较快，总会出声，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嘛！

我和父亲的争吵是在高中毕业以后，我在学校的成绩是属于中等，他对我的要求最低是前十名。我读的倒还是重点中学，那时我拿成绩回家，他说话的声音都很大，让我听着害怕。我一直很怕他，害怕和他讲话。到了高中身体发育，心情也膨胀了，也就什么都不考虑了，我那个时候也敢反抗。不顾及其他了。他打我，我就反抗，我就把很多东西都破坏掉，我们就保持着一种相对默契或者是冷战的感觉，一直僵持着。自从那次爆发以后就不再讲话。一直到现在。近两年才开始讲不是正常交往的话，比如说，我会说：“爸爸，你的电话。”我的“爸爸”还叫的非常含糊，他也许会叫我吃饭，但是从来不喊我的名字。

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我很高兴我有一个儿子，至少是有了后代。在他出生的时候，我就在屋里拟定了教育计划，我想让他从两岁就开始学习外语，上小学到高中就由我来辅导。结果现在都没有付诸实现，他会说英语是跟着电视广告学的，不是跟着我学的。我想，我的教育方式将是非常西方化的，做朋友，不做父子。我尽量在改变过去的教育方式，我从来没有打过我的儿子，但我有时候会吼他，现在我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他，一个是我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物质条件，再一个我的吼声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他怕我，我一吼，他的身体在发抖。我觉得很愧疚，就像我恨我的父亲那样。

我的儿子非常的听话，他是一个很好的儿子。我希望他能够在

没有压抑的情况下自由的发展，健康的成长。我不一定要他出人头地，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第三章 山和峡谷

路线：

沙市——武昌——怀化——芷江——凤凰——怀化——贵阳——昆明——大理——六库——大理——丽江——攀枝花——喜德——西昌——成都

所以我们谈谈工作，像散落民间的传统技艺需要重新搜集。像阿炳，像梵高，前年我写过几句未完的歌词，大意是：在孔子之前有段很长的岁月，春天的时候采诗官的木铎在大地响起，是谁在歌唱呢？是木铎，还是关雎？倾诉养育了倾听，远方养育了同路人。

——朋友黄金刚给我的信

这时候，有乌云和白云在峡谷的上空聚拢散落，在云彩的缝隙里，透出天蓝的颜色，澄净得让我想去喝它。这样的一种景色简直像是假的，像一块画布盖在峡谷的头顶，像舞台上的景片，或者，像蔚蓝的地球笼罩在峡谷的上面。

月亮一会儿在云里，一会儿显露出来，也像是假的，纸做的，随云彩移动着，消失、出现、消失，像个诡秘的飞船。

水从西藏来，向缅甸去，那么远，滋养了峡谷里的人们。

——5月23日日记

山和峡谷是非常遥远的事物，甚至比星空还要遥远。你如果走

到他那里去，你就会马上成为他的一部分，但当你离开他，你就再也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他是一个大的背景，他在你的头顶、脚下、身旁，在你向前走的两步和向后走的三步，在你一转身时看到的一切。他藏匿了风、云彩、河流，又在适当的时候将他们展现出来。山和峡谷不像道路，他没有起点，没有终点，他是一个整体，你可以认为他是矿物，是铁，是树木庄稼，或者是岩石和泥土，但他同时也活着，能够思想，能够说话，悲伤的时候流泪，疲倦的时候宁静，愤怒的时候跳舞。

在山和峡谷之间，我能够看到凤凰城窄窄的小巷，两辆“漫游”撞在一起，谁都别想过去。小巷里走上几步就有一家蜡染店，到处都是画画的少年，上了年纪的土家族老先生老太太们坐在深宅大院的门槛上，痴痴地不知在想些什么，让你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接近他。

在山和峡谷之间，在版图边缘的怒江州，那里的山腰上有古老的基督教堂和花白头发的牧师，傈僳族妇女在河边用四声部演唱苏格兰民歌《一路平安》。正像诗人于坚说的那样，怒江是一条没有心情的大河，我看到的怒江泛着油脂的光芒，无声无息。礼拜天的上午，在半山腰的教堂，信徒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唱一首赞美诗。

在山和峡谷之间，碎石向车顶棚上撒下来，云之南的山才叫做山，雄关险隘，上下千尺，云雾升腾，那些中原腹地没有出过远门

的文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边疆的山峦。车子在盘山公路上行进，云就在车窗外被拦腰穿过，我们就在云端，在二千四百公尺以上，峡谷被云雾笼罩着，而车子向下，转过几个弯，转到几百公尺的地方，山顶又在云深不知处了。

在山和峡谷之间，在让人迷路的丽江古城，她的每一次迷失都回让你发现新奇的景致，你总是发现自己还在老路上，寻找一个地方不用凭借门牌号码，你要记住每一棵树和每一座桥的样子。纳西族老太太的和善让你感到亲切，如果你要给她拍照，她会微笑着停下来。

在山和峡谷之间，某一个早晨，雪山会不动声色的站在你面前，以往的日子她被浓云遮蔽，当云彩散开，你才会发现她离你如此之近。摩挲族的少女在阿夏客房里打跳，住在白沙乡玉湖村的少女李凤琪问我：“你想去香格里拉吗？我的家就在那里！”

在山和峡谷之间，在列车开往喜德县的途中，车厢里到处都是敲诈、欺凌、争吵、威胁、偷窃和欺骗；在凉山州的那个小县城里，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街上孤独的喝酒，招待所的服务员告诉我，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在那荒蛮山谷中停留的一夜，在静默和充满悬疑的氛围里，我突然想起了那个让我心神不宁的问题。

在山和峡谷之间，我曾不停地询问：在那个山清水秀的乡村，坐在门槛上抽着烟斗的农民李光明，他为什么忧心忡忡？在那个小桥流水的古镇，坐在椅子上打着拍子的奇人宣科，他为什么忧心忡忡

忡？在那个一尘不染的春城，坐在“一饮相思”抿着茶叶的打工妹张海英，她为什么忧心忡忡？在那个风和日丽的苍山洱海，坐在古塔前凝神远望的大学毕业生张炳立，他为什么忧心忡忡？

在这个隐藏了许多答案的年代，坐在我面前的庞大的山和峡谷，他不回答我，他为什么忧心忡忡？

我知道，在山和峡谷之间，肯定有我不能企及的地方，它们藏在山的背面，藏在水里头，藏在人间流传的故事中，飞鸟的踪迹，人们的眼神和言说之间，藏在众所周知的真相里——人们啊，你们为什么忧心忡忡？

第三章 山和峡谷

我的车站

孙 宁：访问地点是沙市客运站附近的住所；开始录音的时间是5月1日15时；她是一位个体户；21岁。

我是在沙市客运站的候车厅里和她认识的，她长的很象哪个卡通偶像剧里的小女孩，穿着短裙，背着小挎包，长发随意披散下来，明眸善睐，伶牙俐齿。

这个候车厅非常热闹，沙市是交通要塞。不时有过往的乘客在她的柜台前面看看，柜台里的货物应有尽有，电池、打火机、扑克牌、手机套子、玩具、手表、皮包---摆放的整整齐齐。

她很和善友好，没有二十岁的女孩常见的娇气，她十四岁从老

家仙桃来到荆沙，在社会上闯荡了七年，现在车站上有两个柜台都是她的。

她最大的愿望是开一家自己的化妆品店。

作为女孩子，我比较喜欢体面的，比如开个公司啦，有个漂亮的办公室啦，有个好环境的工作，车站这个环境可不太好。可是我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乘车的人少的时候，这里连同讨饭的、神经病、盲流一起不到二十个人，跟他们呆在一起一整天，我也可以看看他们怎么样生活。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其实真的比较可怜，有时又觉得有的人是有生存能力，但他不去争取。有一个女的是要饭的，下肢完全瘫痪了，她到现在为止生了五个小孩，生孩子也只是为了要饭，小孩子能引起人的同情心。她靠用一根绳子拉着的滑板行走，我有时有点零食分给他们，可我发现他们吃的比我的还要来得高档点。她有她的爱人，不过他不是在讨饭，而是收垃圾。她的小孩长大以后都送回农村去读书了，在那里上完小学，她为了讨饭这么一个简单的目标而生孩子。

在这里，我最初的生活观念开始改变。

有一个男孩，走路一瘸一拐，但他智商很正常，他经常不停更换面前的小牌，一会儿是：“得了病啊，可怜可怜我。”一会儿是：“我给人家当小工，不小心摔了下来，摔成这样子，可怜可怜我。”

不停的变换花招，讨钱的本领也挺好的。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要饭的，蛮聪明，也蛮真诚可爱的。他有时候要钱要多了，就特别乐，冲着我笑，把钱拿着抖啊抖啊的。如果讨钱没有讨到，他就愁眉苦脸的。我看很多讨饭的人，表情都很单一、麻木，但是他表情特别丰富，喜怒哀乐你都看的很清楚。他有一次给我触动很深，车站有时是不让人讨饭的，他有次在里边讨饭，因为他手脚都不大方便，被车站的保安一脚把他踢的很远，摔在地上。他自己不会爬起来，他一旦摔了跤，就没有能力再爬起来。当时他就在地上哭，那个样子给我的感觉，不管是一个正常人或残疾人，最起码的自尊心是人人都有的，所以我跑过去把他扶起来。那个保安，我平常对他印象还不错，年轻的小伙子，个子高高的，长的挺帅的，但他不尊重人。车站的小偷他们都还没有抓完，为什么还要管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又不像小偷，没有经过人家允许就拿人家钱包，没有像车匪路霸强行把人家的钱拿走，只是通过博得别人的同情心换钱。我听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在街上讨饭，不管他是真的有什么遭遇，还是什么遭遇都没有，只是为了骗钱，他向你伸手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是地道的一个乞丐，和乞丐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能够每分钟都去关怀他们，但是对于他们这种求生的方式，我们总不应该太排斥吧。

好笑的事情也有，比如说，有个盲流，他是怎么出现的呢？那真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在某一天早上，我正在开柜台拿东西出来卖，

就听到一个浑厚的男高音，在那里使劲的唱。我说，谁呀？这么早在这儿抒情。我一看，从背面看，一个光头，穿着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在那儿走，蛮神气的大摇大摆的走。对于每一个出现的乞丐或者盲流，车站警察都会把他们赶走，但如果赶的时间太长，他们都不走的话，他也就放弃了。开始他们吼他：“你走不走！”人家一吼，他就软了，“我马上就走。”他把自己的包啊，什么啊，好像拿不完似的，一会收拾这个，一会收拾那个，其实他的东西就摆在椅子上，一拿就走了嘛。他不想走，就不停在那儿唱歌。到了中午，他就看谁的饭吃完了，可以给他留一点。有一次我看见他在椅子上看报纸，我就想，他还蛮有素质的，还看报纸。我去提水的时候，发现他的报纸拿反了，他根本可能什么都没看，其实他看什么呢？他的眼睛在看那些吃饭的人，饭有没吃完？人走了没有？有没有给他剩下点什么？他看见两个人把饭盒往那一放，走了，可能饭盒里还有很多东西，他当时就特别高兴，把报纸往旁边一丢，丢的好远，赶快跑去拿饭盒。他蛮讲卫生的，一看饭盒里有好多油，又去拣报纸，刷的一撕撕成两半，把手一擦，饭盒一擦，又扔了。他一整天游游荡荡的，有一次和人吵架，可能是和保安人员，他们赶他走。他们当然不愿意走，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的，这儿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避难场所。当时保安说要打他一顿，他当时就气势汹汹的说，“我怕什么呀我，我反正不怕死，我看你怕不怕死！”他还说：“我到哪儿去找个木棍去！”他也可能是故意没找着，因为他确实没找

来，转了一圈就走了。但是他有个坏毛病，就是偷东西，我柜台上有个包不见了，没指望找回来。后来我们有个人在另一个商场，发现他和一个小姐在一起，那个小姐精神好像也不正常，经常在音像店那里看到刘德华什么的就哈哈大笑，脑子有点问题，我们那个人看他们在那里逛街，女孩就挎着我们那个小红包，问他：“哪儿来的小红包？”他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扔给我们：“拿去，拿去，什么好东西呀？！”

他比较爱抽烟，拣的烟头短，每次他都觉得不过瘾。有时他向人家要，人家不给。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现在他经常使用这个办法，不知他打哪里偷来一个茶杯，不锈钢的，看着挺体面。想要吓唬人的时候，他就不再唱歌了，因为只要一吼，人家就知道他不正常了。他就慢慢在那儿走来走去，寻找对象，有一次看到一个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用打火机点燃了，他看准了以后，过了两秒钟，向那个人走过去，很神气很大声的向那个人一指：“不许抽烟！”那个人当时一愣，看着他的表情，他一向搞的比较干净，就算衣服脏一点别人也不会怀疑，人家真以为他是管理人员呢！“不许抽烟！”他的手向垃圾箱一指，“到那边去，把它熄了。”人家非常听话，朝垃圾箱走去，把烟往里一放，就跟他的朋友们去谈话了。他一看，已经把烟放那儿了，特别高兴，马上跑过去，拿了烟以后，仔细的看了半天，看看是什么牌子啊！他特别得意，就在那儿笑，但笑的声音太大了，被那个年轻人听到了，那个人本来是背对着垃

圾筒的，一看烟在他手上，当时那个气啊，他拿着烟马上就溜了。

每当别人赶他走，他总说，“你赶我干什么？我又不做什么坏事。”听了挺有道理，但他有很多东西都是来历不明的。他有一个猪八戒的面具，往脸上一套，就开始唱歌，那个面具长了两个角，就看两个眼珠在那儿转，候车厅的人都笑起来，他就觉得特别得意。他有时也欺负人，找人家打架，可是总打不赢人家，因为保安不会帮他。

这个地方很多乞丐不停地在变，因为车站这两年效益不好，有一次我听到两个乞丐的对话，蛮好笑的。一个是中年妇女，另一个是个男的，下半身全截肢，坐在轮椅上边，就是那种木头做的板子，底下有几个轮子。她就问他，“你今天讨了多少钱哪？”那个男的说“不多，几块钱。”“我只讨到两块钱，可能一个炒米粉都不够呢。”“过两天就要转移，去别的地方，这个地方不好讨钱，人太少了，我要去河南那边。”过了两天，我就真再没看见那个乞丐了，他可能真的去了河南，他们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

其实乞丐有很多的故事，他们似乎有很多集团，我都是听人家说的。有一个小孩也是没有双腿，坐在木板上面，有一天我发现他没有木板了，在地上爬。我就问他，“你的板呢？怎么没有啦？”他说：“被别人扔到河里去啦！”因为那两天他没有讨到钱，小孩贪玩，他有时用讨的钱买了游戏机，没有交上去，所以人家就把木板给他丢了。他说：“他们觉得我坐在这个木板上还不够可怜，得让

我爬着走。”他每次买了游戏机以后，我都把用了一段时间的电池给他玩儿。

这些就是我在车站上看到的。

牢骚话

成红军：访问地点是武昌傅家坡车站附近住所；开始录音的时间是5月3日14时；他是一名乘警；40岁。

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二月份，一位演员朋友到武昌火车站送我，我们在月台上聊天，他认出了我那位朋友。

在车上他帮我补了一张卧铺票，我们在餐车聊起来，他说：“车上的人一定会以为我从你这里得到了什么好处”。

春节期间，他跟车到了西安，我们在一家快餐店聊天，他讲了许多他的故事。

这次是我重新回到武昌，下着雨，我在傅家坡汽车站打电话给他，他举着一把伞来接我。

他长的很白净，戴副眼镜，文质彬彬，不像个警察，倒像读书人。

现在这个年代很简单、很现实，有好多事情就是钱，钱到位了也许你的职位就到位了。你的入党也好、或者评级也好、包括给你的位置也好，都是这样。这是普遍现象，这就促成了人的价值倾向，能赚钱，管你是骗来的也好、哄来的也好、讹诈来的也好，反正你

能赚钱就是好。

人人都有向上的心，从善的心，但是久而久之这种心就不复存在了，几乎没有了。我以前没有到乘务队跑过车，都在所里。最后联防队撤销了，我到乘务队去跑车，去了以后，有人说“你早几年怎么不跑车，怎么现在来了？”说这话的原因，就是以前跑车钱好挣一些，乱罚款呀，逮无票旅客呀，这方面比较多一些，管的少一些。现在管得多了，不好办了。似乎去乘务队就是抓钱。

在列车上工作，让人误解的地方很多，本来你说带个人，帮个忙，上来找你买个票，收五块钱、十块钱都很平常，或者说不是熟人，你给人家解决卧铺，五十块，过年的时候还要高一点，很正常。你不收这个钱，反而不正常。这个不正常好像就是，不可能，你肯定收了！那就是毫无疑义的，不收钱的这种人根本不存在。在他们脑子里，就是这么个状况。有一次我碰到公路段的两个人，在查票时碰到的，碰到了，既然能够解决，就给他们解决了。我带他们到休息车去休息，他们本身也有免票的。但是乘警长认为我没有给他打招呼，警组的事大家一起发，他认为我独吞了。他给别人说，人家把钱给过我了。我也没有解释，这种误解在我的身上发生的太多了。自己也习惯不去解释了，误解就误解吧。因为在一起工作不是一天两天，既然自己这么做了，那就这么做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毕竟有一个过程。

也经常有不认识的人，带着孩子的，走到你跟前了，请你帮忙

解决，如果能解决，就给她办理了。在他们印象当中，就又说你收钱了，没给他们打招呼。我在跑车的过程当中还真没收过人钱，但收了一次烟。烟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女人在驻马店上了车，一直到西安，她带了两个孩子，小孩也是困不拉几的，大人也是困不拉几的，她就去找列车员给补个卧铺，列车员说没卧铺。快到漯河的时候，因为我在郑州要下车交接班，后来我就跟补票的说，“实在不行，把我的铺给她算了！”到四点多、快五点那会儿，我把我的铺给了她，补了个票，我还去当班。实际上在休息车里，到了郑州，餐车有五、六个人要起来，本身就有五、六个铺，就是说我不可能没有地方睡。当时这个女的感激的不得了，她就拿着烟从休息车一直跑到车厢里来找我。我正在车厢巡视，她非要塞给我一条烟。我说没必要，没必要，但人家给烟的时候也是实实在在的，跑了多少车厢啊！休息车是二号车厢，这个硬座是九、十号车厢，跑那么老远，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收了一条烟。

有的人是为了逃票，他有钱不愿买票，有的确实是没有钱，我碰到过几回，有老人、也有带孩子的女人。有一次，有两个学生好像是在武汉读书，到渭南下车，车还没到三门峡，他们主动来问，三门峡到渭南需要补多少钱。因为差钱，列车员非要让人家在三门峡下车。我巡视车厢的时候，看到了这件事，列车员已经把这个票开了，作为列车员，他不可能贴钱把票给你，因为车上这事碰到的太多了。两个女学生就到处借钱，跑了两个车厢也没有借到，在这

种情况下我拿了十块钱给那两个女孩，当时她们的眼泪就出来了。对她们当时来说，去渭南也不知道有多重要。她们死活不肯收钱，她们说，不收不收，哪怕不去都行，这个钱我们不能拿，就在三门峡下好了。我就给她解释，我说：“你又不是逃票，你把这个钱拿着。我比你们年龄大，出门在外，谁都有个难处，没必要为这十块钱推来推去的。”当时这个开票的列车员就说：“做好事会生上儿子的。”当时我就说：“你没看见我儿子，我儿子比我还高。”我想十块钱真的不算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话，自己有个时候打个牌呀，输个几百块、几千块，都那个了。而她们确实也有难处，把这个钱交到她们手里头，有什么不可以呢？扯了几分钟，后来我就直接把钱给列车员，把票拿过来塞给两个女孩，我说：“去去去，把自己东西看好。”后来大概快到站了吧，这两个女孩又过来了，不知道在哪里借的钱，还是在哪儿要的钱，下车的时候把钱塞到我的口袋里，说：“叔叔，谢谢，谢谢！”一个女孩就说了一句话，“现在好人不多，谢谢！”但周围的人根本就不理解，因为这些事见多了，就麻木了，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益就没有别的来往了。现在，说通俗点，就是在一起打个牌还能坐下来，真正坐下来谈谈心，说一说想法或者说些什么的，似乎说不到一起去了，能够在麻将桌子上坐下来的，关系算是好的了。现在人的关系很淡薄，说不好，社会将来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旅客有时候对你也有误解，跑车，工作压力最大的就是旅客老

丢东西，在车厢巡视，他并不理解，你给他宣传，他也不理解，“不要睡死了！不要睡觉！带着贵重物品自己要保管好！”他听了也是听了，根本就不当一回事。有时候在复杂区段你给他推醒了，他老大不高兴，影响他瞌睡了。他睡的程度几乎跟死去一样，小偷在他身上乱摸、乱抓、乱掏他都醒不了，人家掏完了、拿走了，把钱包给他塞到口袋里好好的。事情发生了，他这时候认为你这个警察没用，把小偷抓不住。可上了车你管不了这么多事，一个乘警当班，一个乘警来回转车箱，到了重点区段的时候你还要转的勤一点，特别是停车那几分钟，小偷下车也就是在那几分钟，车门一开起身就走，找都找不着。在重点区段，包括小站，我上班期间认认真真，老怕丢东西，如果丢了东西，在你这个工作范围内出了个这么个事，自己心里不是滋味。那些小偷频频得手，一上来他就有收获，给我们压力蛮大的。

我的儿子长大以后，我不愿意让他干我这一行，我说的你可能不相信，我只想让他当个工人，拿出自己劳动的一个产品出来，合格的产品，我觉得是最值得欣慰的事。干我这一行酸、甜、苦、辣太多，在学校受的教育和现实完全是两回事，几乎就沾不上边儿。

火车上什么人都有，什么都碰到过，但是自己能够以一个平常心来对待的话，有好多事可以处理的很简单，并不复杂。人相互交往多一点真诚，就没那么复杂。不是说我很正直什么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这种想法。世间上的事分该与不该，该是你的跑不了，不该

是你的你拿的再多也白费。

村干部的一笔帐

李代明：访问地点是湖南芷江木叶溪乡；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5 月 8 日 10 时；他是一位辞了职的村干部；46 岁。

这个乡村距离芷江县城有将近二十里，我坐在车上，沿途能够看到非常清澈的妩水河，有些渔船像是被那些水草托起，在河中央缓缓浮动。

车上的人们在议论附近县镇的新闻，为了支援湘黔铁路的建设，路上的民工在炸着石头。

田里是成片的水稻，山上是成片的青竹，到他的家里去，要走过一条长长的田埂，再沿石块垒砌的台阶走上去，那里有座结实的木板房，毛主席的像和港台明星招贴都在墙上。

他以前是军人，参加过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救灾，复员后当了十几年的村干部，后来辞了职。

他说话的时候语调缓慢，吐字清楚，因为当过兵的缘故，普通话说得很标准。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老百姓的生活还是苦，不平衡。少数人富了起来，真正没有什么门路的老百姓还是比较苦。还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连油盐钱都找不到，像我们这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一

点儿都没有沾着，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当然吃亏了。

国家政策从上边来看，是减轻农民负担，具体到下边来，负担却减不轻。根据国务院的收费标准，我们这些地方还是比较低的，可是原来吹牛骗人的太多了，每年收入上报，要比真实情况多好多。“人均收入一千多，”就这样的去报，就讲这个大话。老百姓没有这么多的人均收入，这个数字是虚的数字。老百姓就吃亏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今年报了人均年收入一千七到一千八，都是乡政府自己在讲话：“你这个村子条件好，能够达到一千八，那就一千八，你这个村子条件差，一千六，那就一千六。”前几年向上面上报的时候，统计数字报多了，报的人均收入多，现在摊派下来的就多。数字往下摊派。原来的数字不是正确的数字，现在的摊派可想而知。从村里，到乡里，到县里都是这个现象，为什么每个乡都是亏了几十万几百万的？就是这个原因。原来税收包干找到了这个乡，那么工业产值、农业产值、企业产值报的高，有的干部把这项数字报的高一点，就可以往上爬。这个就是达标了。这样县里也好，地区也好，省上也好就按照你报的数字给你摊牌，干部工资税收和比例分成到了乡里，一年发上三四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这就是夸大话吹牛皮的结果。从我们这个地方来讲，老百姓的年人均收入基本上能够达到七八百左右。他们现在报到一千五六、一千三四，数字无形之中长高了。一个乡一亏就是几十万，但是当头头一般都是吃得饱饱的。

村一级这些干部是最难搞的，你报多数字，老百姓没有收入，他要骂你，你不报这些数字，上边说你没有完成任务，你这个村子搞不好，他也要骂你。到了 96 年我就不搞了，我就辞职，写辞职报告，不是瞒下边就是瞒上边，这个工作可不好做。

我总觉得一个政府也好，一个党也好，如果不讲实事求是，如果不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只知道吹牛，那我是看不惯的。我们是毛泽东时代长大了的，吹牛皮的事在我实在看不惯。

有些事情我们只能随大流，反正就是尽自己力量，你上面怎么讲的我们就怎么去工作。我们这里有很多困难，也想了不少办法，但是条件有限，还是没有办法。我们希望能够少交提留，多点收入，但是我们的天时地利实在是不行。你要是盖工厂，税务工商都要找你的麻烦，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的条件，无非是加工厂。但搞个加工厂也不得了，首先要通过各种方面来批，批下来了以后这也搞你那也搞你，办好了老百姓可能会拥护，要是办不好还留下了一世的骂名。从我们来讲，什么事也不敢办。有一个算是大的厂子，亏了几百万，他们在县里边都是有名的。后来不是来参观，就是来检查工作，不久就吃光了吃垮了。我们县里经济也不怎么雄厚，基本上百分之百都亏损。钱都到哪里去了呢？一个是参观太多了，吃的太多了，贪官污吏不吃不贪，钱能到哪里去呢？上报的数字虽然有些虚数，但是也不能说就虚的那么多。

老百姓讲他们一个是吃，一个是拿，就是这样讲，这是老百姓

的话。乡政府在县城里打电话来指导工作，遥控指挥。在毛泽东时代，乡镇干部都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起码有一条，要坚守岗位。别的人我不晓得，我们以前的那个书记我知道，他拿钱到外面去吃了饭请了客，报不脱帐就到企业办来报，一报就是一万八，这样哪有不亏的？原来我们乡比较富裕，走到别处去，别人都还看得起，现在我们出去，人家就说我们是穷光蛋，

现在是越吹，你的功劳越大，评等级就评的高，起码是个一等。吹吹拍拍的话我可不喜欢讲。乡干部不是我现在才顶他们，原来他们不合理的地方我也要顶。原来还有清正廉明的领导，一届不如一届。我说现在的组织考察有问题。选乡长也不是老百姓在选，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了选乡长发了多少香烟，请这个去说情请那个去说情，结果还是选不上。有的乡长是吃得饱饱的走了。老百姓们怎么表示呢？上面不是说只要过半数就有效，干脆满票就让你当，没有一个反对，这是不是都同意他呢？很多人是不同意的。老百姓也是无所谓了，随你怎么搞。

老百姓说，只要他们不收咱们这几丘田，产量只要稳定一点，肚子饱一点，能有个安稳觉睡就行啦！他们现在就是这种态度。也没有什么比贡献、比致富了，只希望责任制的承包时间能够长一点吧。

计划生育的提留款多了一些，多年来计划生育还是走上了正轨，有的人你就给他指标，他也不愿意生二胎，养不起。因为经济

的短缺，养儿女也是个负担。

农村问题我也想过，但是就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有些东西是无法来解决的，农民的收入要这么算，他就非要那么算。怎么办呢？如果弄虚作假这种东西解决不了，老百姓就会一直遭殃。国家不是也没有收入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国家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吧！

向往文明

牛思盈：访问地点是云南昆明某茶庄；开始录音的时间是5月17日13时；她是一位导游；26岁。

看得出来，她不吐不快。

她说：“这个工作让我厌倦，最开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带团出去，是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时候我都没有出过国，第一次去。从那一次，我就感觉中国人太浮躁了，我们带的客人经常来自于各个领域，有的人从事的应该算是高尚的职业，或者是有文化的职业，但是他们仍然让我受不了。在机场，在公共场所，我宁愿装作不认识他们，就让你在那里表演好了，我可以远远地走开。这也可能是我个人的厌恶吧。

比如说，一个很大的餐厅，在我们的团队进去以前，那里可以很安静，放着很优美的音乐，很多人正在进餐，但是你感觉不到谁在大声说话，每个桌子的人都在交谈，但是每一桌的人都轻声细语。只要中国人进去，那就好了，整个餐厅就听见他们在说话，好像熟

视无睹。餐厅的服务员往往会找到我，“小姐，能不能叫你的客人声音小一点。”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有面子。如果在一个酒店里，他们住在同一楼层，总会有客人打电话到总台去投诉，说他们受不了了，因为太吵了。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

我不知道中国人出去旅游是一种什么心态，是因为有钱了，还是去外边看看这个世界。我觉得中国人出去看世界的心态都很奇怪。比如说一个政府官员出去，他来我们这里报名的时候是公费，他出去的名义是实地考察。以泰国为例，泰国的交通应该是很堵的，但是我们在泰国很少发现交通事故，我觉得出去的交通官员应该了解一下为什么人家不堵车，但是我们的官员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只知道吃喝玩乐，在这个同时还叫你开发票给他，等到回来以后他还要从发票上再赚一点钱。

我经常问他们，这次出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回答仅仅限于吃的好，玩的好，泰国很开放，黄色行业搞得比较成功。但是他们往往是以考察的名义公费出去的。

自费的可能会认为自己出来是为了享受，他就很看不起那些公费的。我会告诉他们在机场里边不能打扑克，我可以帮你找到吸烟室，到哪里去吸烟，或者不能随地扔垃圾，这些都是最简单的道理，是最起码的一种社会公德。但是在一个三四百人的侯机厅里，只要有五个中国人，他们就会成为整个侯机厅的焦点。我曾经反复提醒过他们，譬如说你的孩子出来，你应该希望孩子得到一种正面的教

育，但是在公共场所，他反而很放纵他的孩子。他认为我们出来应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在车上扔垃圾，父母也不会制止。

我最早有一个想法，就是带中国人去感受文明，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兴致。我认为我做的很多努力都是白费，曾经有一个客人说，我发现你做领队没有热情。我说我以前很有热情，但是我觉得可能中国人不配享受这种文明。

有些政府官员在出去以后连吃喝嫖赌的费用都要报销，中国云南这样的地方有多少老少边穷地区，这些贫困地方的情况，你看了都会觉得触目惊心。但这些在老少边穷地区出去的官员比昆明出去的官员还要变本加厉，他们那个地方，也许一个县一年就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有机会出去，政府的这笔钱等于白花了。

曾经有一位客人在晚上到房间里来找我，他问：“外国有没有发票？”我说：“我在国外没有见过发票。”我说，“你要发票干什么？在国内不是都开过了吗？”他说：“我们这次出来的钱是市里面出的，县里面就没有出什么钱，我想把这笔钱开点发票，到县里边去报销。”我说：“这样不大好吧，作为领队我不支持。”我不想给他这个发票。他就很不高兴的走开了。后来我知道，泰国导游好像给了他一张什么东西，因为泰国导游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但是那个东西，至少在国内我认为是不能报销的，只是有一个数字而已。泰国导游在把发票递给他时说：“大哥，出来一趟也不容易，你可以在数字前面在加个1，又没有大写，都是阿拉伯数字，在前

面加 1，就是 12000，在前面加 5，就是 52000。”泰国导游提醒他，他也一下子感觉好像大彻大悟了似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我感觉他回去肯定会加上那个 1 的。我对泰国导游说：“你不应该这样教我的客人，这是对我们的国家不负责任。”泰国导游说：“其实不用我说，他回去自己也能琢磨出来。我告诉了他，他才会感觉我對他很好。”泰国导游对中国客人太了解了。他们一些地方的人出去，一万块钱的钻戒就能买四、五个。他是国家干部，他的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那个地方的老百姓，一天三顿吃的就是土豆，土豆都不能保证一年到头全都有。我们只能说是触目惊心。

我有一个朋友带着一些做房地产的人出去，去欧洲五国，他们是公费。那是镇子里出的钱。去埃菲尔铁塔那天是公众假期，人特别多，要排队坐电梯到上头去看。于是他们问导游：“能不能插队？”导游说：“全世界的人都在排队。”其实排队是很快的，他们就说，“一个烂铁塔有什么好看的？不看了！”就这样，出了很多钱，去了法国，却没有上成埃菲尔铁塔。第二天，去卢浮宫，进去以后，自然是看蒙娜丽莎像的人最多，很多导游在用各种语言在给客人介绍这幅画，带这个团队的是一个北京来的留学生，他向他们介绍说：“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幅画，应该看看。”但他们说挤不进去：“这个烂婆娘有什么看的？”当旅游车经过茶花女的寓所，导游介绍，为了维护原状，法国政府连路都没有重修过，当年马车的痕迹都还有，他们不明白，“茶花女是不是卖花的？”

在法国，妓女是坐在车里揽客的，车上有个红色的小灯，你如果喜欢，打开车门进去坐下，谈妥以后她会把你带走，最后再把你带回原地方。我们的客人对埃菲尔铁塔，对卢浮宫都不感兴趣，对那个却非常感兴趣。平常他们都不敢讲话，连要水喝都得找导游，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他打开车门就坐进去谈价，然后就走了。第二天回来，在车上就开始交流了，导游听不懂他们的方言，看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响，于是就问他们：“你们在谈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服务的不好？”他们的领导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嘛！想当年八国联军侵略我们中国的时候，侮辱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现在我们到了法国，我们也侮辱法国妇女了，为什么不能大声的说？”我们的导游说：“人家是没有出钱，可你是出了一千美金的。”

在国外，许多旅游点的明信片柜只有用中文写着“明信片每份2元人民币”，这真是讽刺，每个人都知道要钱的，我们的客人却拿了就走，导游追上去说：“干什么？这是要给钱的。”可客人们说：“管他呢！反正他跟我说，我又听不懂。”

在我没做导游之前，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但是带了那么些团，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走到哪里都有这种感觉。不管你是公务员，还是老百姓，哪怕在中国他们很象是个人的。

我带团的时候发过一次脾气，那是在新加坡一个不错的酒店

里，早上大厅里有很好的自助早餐，在里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却只有白粥、炒饭、冰水和面包这四样东西，他们把我的客人安排在小房间里，而且他们还都没有吃饱。我就发火了，我问他们：“为什么我的客人不能在外面吃？同样住酒店，花同样的钱，为什么？”

他回答我：“小姐，不好意思，这是酒店安排的，主要怕影响到其他客人。”他表示可以加饭，但是拒绝了我让客人到外面来吃的要求。

我说：“我是领队，我的团队再也不会住这个酒店，因为这个酒店歧视我们中国人！”

有个团队的人，在泰国去色情场所参观后，他们说：“如果这是在中国的话，早就被人民群众自觉的把它砸掉了！”那么我们去文化古迹吧，我以为他们会很开心，可他们又说：“太热了，没什么好看的！”

有些人嫖娼是真舍得花钱，可是有时候为了一点钱却吵得不亦乐乎。

在飞机上，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小电视，可是他们非要戴着耳机喊：“太好看了！你快来看啊！”

在我没有出国以前，我以为我生活的很好，当我经历了这些，当我出去以后，我发现世界上还有人在那样生活，那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我们做导游的人，这种感受特别强烈，但这不是我不爱国，我只是向往文明。

漂泊

张玉馨：访问地点是昆明星文路“一饮相思”；开始录音的时间是5月19日13时30分；她是一位促销小姐；22岁。

在昆明，有许多家“一饮相思”，人们可以悠闲的在这里品茶、喝酒、聊天。

我和朋友刚刚坐下，一位长的很乖巧的促销小姐走到我们的桌旁：“先生，买一瓶蓝带啤酒吧！”她的年纪看上去很小，身上斜挂着一幅写有“蓝带啤酒”字样的绸带。

我开玩笑的说：“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访问，我一定买你的啤酒”。

她痛快的说：“好呀！”

第二天，我试着拿她留下来的手机号码呼她，她很快就回复了。

我们约在另一家“一饮相思”见面。她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到昆明来，最开始是为了和我男朋友赌气。我走的时候发誓，非要在外面混出个名堂来。

那时候我连车费都没有，来到昆明住在一个亲戚那里，那是过年的前几天，冬天。过年前那些天找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谁也不愿离开，要领了年终奖才能走。亲戚有脸色，我也不好回去再住在那里。那天我就在大街上走啊走啊，漫无边际的走，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也没有吃的。走到翠湖看见人家喂红嘴鸥，一直看到天黑。

当时我想，以前还觉得自己像一个骄傲的公主什么的。

我漫无边际的走，看人家喂红嘴鸥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家挺幸福。我这样孤苦伶仃的，一直站到天黑，没有换一个姿势。天黑了，我想最起码要找个住的地方。后来我走得很远很远，天无绝人之路，我碰到了个老乡，我就跟她说，我今年晚上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今天晚上跟她住。她有几个同学在一个宾馆打工，那个宾馆是有住宿的，我就跟着她去了。那天晚上我刚好发高烧，说实话如果不是碰见她，如果我露宿街头，我都不敢想会怎么样，那天我又吐又泻，她又拿药给我吃，又拿土办法给我治。我躺在那里，第三天的时候昆明下雪了，我那个时候没有衣服，只拿了一个包，冻得不行。后来宾馆保安看着我挺可怜的，就找了一个空房子让我在那里住。那个房子里只有一张木板，我的老乡有一床被子，一张被单，我和我的老乡就拿那个被子裹着两个人凑合着睡。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叫做饥寒交迫。我知道什么叫太冷了，什么叫做饿肚子。

然后我出来找工作，哪怕是在人家饭店里帮人家洗碗我都干。我这个人挺幸运，后来找到了一个卖健身器材的地方，刚好我是学医的，就找到了这项工作。陪我的那个老乡没有找到工作，后来她就去坐台小姐。就这样我们失去联系了。

上班了，我就在那里熬到过年放假。我没有钱，不好意思回去，出来这么多日子又捱饿，又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方，特别想家。当时我领的工资是三百块钱，后来我买了车票，决定回家，我那个时候

特别想到了亲情的那种东西。老板发了一百块钱的红包，我就想回家的时候我一定要装得挺好的，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2月15号过年，我想着2月14号是情人节，就到市场上买了九十块钱的玫瑰花，上车的时候大包小包的端着，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到了车站，怎么到顶棚上捆好的。第二天我就去卖花，那种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我是挺要面子的一个人。我们的县城，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熟人，拿着花在那里叫卖，虽然说这是凭自己的本事挣钱，但是我总是想，要是被朋友看见了怎么办。我在县城也不算是太差的人。我们那里人的意识就是人要有一个好的工作，比较体面，要是像现在这样去做小贩，就会被人看不起。但是我觉得始终要迈出第一步，硬着头皮就到大街上去卖，然后碰到我的一个朋友，当时我很不想看见她，把头扭向了另外一边，可是她却看见我了，那种感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她说：“我把你的花全部买完，你跟我玩儿啦。”我当时很难过，我就跟她说：“你们先去玩儿吧，等我把花卖完了我就会去找你。”这不过是找了一个借口，等他们走了，我又把花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最后我只剩下一把花，那天我赚了一百二十块钱，过年的时候没有必要再问家里要钱了，卖完了花，我拿着花和桶顺着公路走。以前曾经有一位朋友帮助过我，那时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我的男朋友把我的钱输光了的时候，她借给过我四百块钱，我也没有钱还给她，也不好意思见她的面，就把那束花放到她的门前。直到我上了两个月班以后，才把钱寄回还

给她。

我刚到这里来的时候，没有拿家里一分钱。我租房子住，连一套行李都没有，刚开始随便铺在地上就睡了，发工资才又买了一套行李。但至少不用再背着包满大街的走，找一个休息的地方都找不到。现在总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地方了。

最难忘的还是元宵节那天，那天我身上只有七毛钱，上一个厕所花了一毛钱，停了一辆单车花了一毛钱，这样只剩下五毛钱。当时不好意思开口问人借，元宵节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又想到了我男朋友那样对我，挺难过，同事们晚上都去打饭吃，隔两天才能发工资，他们去吃饭，我骗他们说我不想吃。我刚好花五毛钱买了一个馒头，这样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可以看到同事在那边吃饭。过年以来我第一次哭了。后来放假，我回到自己的房子哭了一个晚上。

因为我有了这么一段经历，我才感觉我更爱我的父母，我才体会到家里的那种亲情。我还曾经想我要是孤儿多好，没有人管，无拘无束。正因为我吃了这些苦，我才觉得最想报答的人就是我的父母。我爸爸和妈妈都是工人，我家有四个姊妹，你看他们要供我们吃饭读书，是不是挺不容易的。工人的工资你也知道是很低的，我妈很贤慧，对生活她好像已经都习惯了，有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吃，她自己舍不得吃。以前总觉得他们老是罗哩罗嗦，说这个说那个的，但是我现在真的能够体会到世界上亲情的伟大。以前我总觉得这些都是什么美妙的空话，现在却都是我心里真正说出来，体会

到的。

我们出外打工的目的，要么就是为自己有发展，要么就是出来挣钱。后来经历的事情也多，但总不会像以前那样眼睛哭得红红的，我也不可能是干什么大事的人，最起码生活要有一个保障吧！

蓝带公司这边招人，招促销小姐，我就过来应聘，促销小姐招的是一些高个子的漂亮的女孩子，我又不高，又不漂亮，我想我没有多大的希望，当时觉得自己干什么也不行，但没想到——昨天是我做促销小姐的第二天。

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实在是太多，肯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我现在已经交了一个月的房租，暂时这个月生活费是够用的，下个月如果真的发八百块钱给我们的话，我会租一间亮一点的房子，能够看书的房子。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黑冬冬的什么也看不到，就像难民区一样。

四川的那些民工拉家带女的能够养家糊口，难道我一个人都养活不起我自己吗？为了治疗自己睡懒觉的毛病，我每天早上自己跑步。我常常想起小时候，我们在一起嬉戏玩耍，我觉得人要是不长大多好，长大了以后烦人的事就多起来了。

“宣 6 斤”的来历

宣 科：访问地点是丽江大研镇纳西古乐会；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5 月 30 日 9 时；他是一位民族音乐家；70 岁。

丽江纳西古乐研习馆的古乐演出在一所古民居里进行，演奏者都是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楼上楼下摆满了木椅，地上铺着松针。

演出之后我找到了他，用五分钟说明了来意，他说：“你明天上午来找我”。

他的祖母是藏族贵族；母亲是中甸藏族歌手；父亲是第一个会说英语的纳西人，他在丽江是一位受到瞩目的人物，但更重要的是，在温和的不露锋芒的纳西人中间，他是一个有性格的人物。

他说：“我的时间不多，只能给你讲一件事。”

我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关进了监牢里，后来从监牢监禁人员变成了留队人员，也可以结婚了，我发现很多人结婚以后状况就能发生变化。安全部门对你的看法就有点放松了，一结婚，这个人安定了，工作也就比较轻松了。不然就得从事特别重的劳动——在深山里挖矿。这样一来，我就得想办法结婚，到了尖水，个旧附近的一个县，就找到了我的妻子。

当时我 46 岁，她只有 18 岁，这是 1975 年的事。我找到了她，我们就很美满的结合了。到了第二年，娃娃生了，生出一个男娃娃。有一个关心我的警察就来找我，他告诉我：“宣科，你要注意，最近队部正在研究你的思想动态，看你起什么名字”。

我这个娃娃一生下来，他的眼珠珠儿到处会看，刚刚出生的婴儿瞳孔是大的，没有看东西的能力，只有光的感觉。这是科学。但是他居然在到处嘟噜噜的看，而且头也随着动。那些医生就奇怪的

说，是不是真正在看呢？这是医学上的奇迹！他们就把白帽子拿下来，引导着他看，他居然就跟着白帽子转动。这至少不是神也是鬼怪这类东西！他们就吓着了，他们说：“不得了，这是个什么人？一生下来就会看东西，这是绝无仅有的”。高兴之余，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宣伟，伟大的伟。

那个警察是很有学问的，他大学毕业，他就问我：“你起的名字有了吗？我很关心你啦，你是一个人才，免得吃大亏。”我说：“好，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宣伟。”“什么伟？”他问。我说：“伟大的伟。”他说：“哎呀！”当时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那是分析批判、无限上纲最恼火的时候。“毛主席、马克思、恩格斯才是伟大的领袖，一个劳改犯的儿子，叫伟大的伟，这是不行的。太危险了，你这是自己找死！”由于我在里面是经常挨斗争，所以我想一下，这个确实不行，一个劳改犯的儿子称为伟大是不行的。

好嘛，那我就改一个，我是喜欢标新立异的，你能看得出来。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宣土”，土地的土，看看他怎么样分析。

他来了以后就问：“现在改了吗？”

我说：“改了。”

“改成什么了？”

我说：“土，土地的土。”

“你这个土太奇怪了，土可以干什么呢？”他问我。

我说：“土可以种庄稼。”

“可不可以种花和草？”

我说：“可以。”

“那么毒草也可以种了？”

当时是正在批判毒草，我就说：“毒草可不可以种，我不知道。”

“还可以干什么呢？”他问我。

人家又问了，怎么办呢？我说：“还可以被人践踏！”

那他就没有办法了，可当时他也是写大字报的人，非常会想的，
他就说：“践踏，可不可以踏出一条路？”

我说：“可以，可以。”

“资本主义的路还是社会主义的路？”

不可以，路也不行的。

“还可以埋葬，我告诉你。”

我说：“可以，土葬嘛。”

“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用土把三座大山，把蒋介石的王朝埋葬。
现在你这个劳改犯的儿子叫土，你要埋葬什么王朝？”

所以搞不成，搞不成之后，我就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个词，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杨八斤，因为他生下来时候有八斤重。对了，这就有证据了嘛！有称在那里嘛！我冲到生我小娃娃的那个医务所，就问，医生，我的那个娃娃有几公斤？没有公斤，只有半秤。那么可不可以换算成市斤？可以，一换算，6斤4两，这个名字罢了嘛！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宣6斤4两。”宣6

斤 4 两！我的妻子也年轻纯洁，我们两个就对小娃娃叫：“宣 6 斤 4 两！宣 6 斤 4 两！”喊了他好几次，他没有反应。好像他不喜欢这个名字。我的妻子说，这个名字太别嘴了，嘴里边念着不舒服，宣 6 斤 4 两，噤哩啪啦噤里啪啦的一种感觉。我说有办法，他妈的，不是有一个四舍五入法嘛，就把 4 两去了，变成“宣 6 斤。”

他又来问：“改了个什么名字吗？”

我说：“现在是叫宣 6 斤。”

他问：“宣 6 斤？”

我说：“有证据，出生证上写了半秤，而且换算为市斤了。我们这个地方有这样的规矩，一个人有几斤就给他起几斤的名字，以后有一碗粗茶淡饭吃。”

他说：“这个很好，但是土了一点嘛，你是作家，你以前都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哎呀！可惜可惜！但是算了，算了！”

可是我在名字上忘了一个名堂，使它成为了十二亿人中的绝无仅有者。什么呢？我把这个 6 字写成阿拉伯数字，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他的身份证上还是那个阿拉伯数字。你想想，十二亿人当中名字中加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有没有？不可能！这就是全国之最。“宣 6 斤”就是这样来的，从这个故事中你就可以看到一切啦！

第四章 西部

路线：

兰州——西宁——拉萨——格尔木——西宁——互助——兰

州——乌鲁木齐——石河子——独山子——奎屯——乌鲁木齐——兰州——西安

越过四道梁

越过五道梁

当道路一直在黑夜里延伸

依稀的光影在人心中浮动

当鹰鹫在天葬台上盘旋

以前的日子忘记了归程

以后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而当我们身边早已失去同伴

当我们只有你

西藏

——1994 年写的《去西藏》

兰州

这是初夏一个凉爽的下午，我的书桌上跳跃着一群快乐的光斑，一百米外的铁道线上不时有火车开过的声音，我在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我写的是我第一次来到兰州的情形：

“在火车上，一觉醒来，看到许多黄土垒砌的屏障，像古堡的断壁残垣，黄河水悄无声息地从其间流过，浑浊、纯净，颜色如同被刀削过的有质感的黄土。我的怀里也揣着一把小刀，临行前一位朋友拿特快专递寄给我的，既不能防身，也不能杀人。但这位朋友

的用意我再清楚不过，仗剑西行，到了大西北不带把刀是不成话的，所以我感谢他是知己，写信回复他：‘我俨然便是一名刀客了’！后来我在荒僻的积石山乡买了一把真正的保安腰刀，缠着七色彩帛，抹着油，削铁如泥我没有试过，但削块木头是毫不含糊的。

其实到了兰州才算是到了真正的西部。

初来乍到的那个清晨我怦然心动，孤魂野鬼的影子在河水表面起伏，古堡壁垒分明，自古至今英雄和土匪都于此间出没，箫声呜咽，西风瘦马，刀刃擦得干干净净。当然，少不了浑圆结实的美人，鬓间插朵红花，面色潮红，眼角含春，妖娆地跨在一匹烈马身上，风情万种，这是传奇中的西北，我的西北，男人和女人自然到了极致的西北-----”

西部的气质是这样的简单、粗野、磊落、叛逆，谁都知道这是传说中的西部，古典的西部。今天，即使是在兰州，这样一种英雄气和流氓气混合的气质也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虽然你还能听到一些匪气十足的语言和故事。

东方红广场，有军警站在那里，一箱箱的毒品被付之一炬，这个城市需要一个更加健康的肌体。那些让七尺高的汉子沉迷的烟尘，那些让骨骼奇清的读书人沉迷的牌局，他们早已远离骑马高歌，击节拍案的生活，在喧闹的人群中流传的不再是故事，而是传闻。

青藏

在去拉萨的班车上，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佛法研究者、军人、从玉树去大昭寺朝拜的夫妻、像女孩子般腼腆的小喇嘛、一位七十岁的藏族老太太，不埋怨，不争吵，转着手上的经轮，有人问她晕不晕车，她说：“不知道”。

四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我们走了三天。

我记得在香日德的夜，一个五岁的女孩紧紧抱着她的弟弟，用背部阻挡着风，她不时爱怜的亲吻着他。她的身后，月亮大得惊人。

西部牛仔打扮的司机小伙子给我打来青海人苦涩的茶水，喝一口就忘记了寒冷。

我要去拉萨，拉萨在什么地方呢？

丹增边洛的家就在布达拉宫的对面，他指着塔上的摇铃给我看，他用他的专业音响放他写的《永远的香巴拉》给我听。他的孩子知道客人从遥远的远方来，热情质朴，不像汉族人的孩子小心翼翼做出很有礼貌的样子。

在拉萨，我看到空心母展开布帛在天空飞翔，神像那平和与愤怒的表情都一样生动。

人们举着酥油灯，在大昭寺里，他们排成一行朝拜的仪式让我心动，但我始终在他们之外，只知他们的虔诚，不知他们虔诚的依据，我是个旁观者，是个局外人，是个不知痛痒的人。我熟知的只是那个纷乱的八角街，那些窗户上摆放着花朵的房子，那里出售的工艺品、刀具和酥油，大街上，宗教音乐中夹杂着流行歌曲的声音，

人们围拢在录像厅里观看着一部汉族人的言情片，对白已经翻译成了藏语。

对我来说，那个被人们传说已久的庄严神秘的拉萨不知身在何处，我从无数小说、散文、诗歌和游记中读到过她，我相信她的存在，我认识的一些在拉萨居住过的朋友有着金子般的心灵。但我也认识更多的人，说拉萨河的水已经涤净了他的灵魂，说他的身上有神的目的照耀，每个从拉萨回来的人都这么说，但他们依然在他们的城市里蝇营狗苟。

在布达拉宫，我并不了解那些佛的故事，我不知道那些达赖的经历，我只是隐约能够感到那些事情和久远的星空有关，和史前的时代有密切的联系。白象驮着猴子，远古的动物在神的身旁，河流发源的地方树木生长，岩石之上山脉耸动，大海流淌，万物降生----

但这也并不能让我感觉到那些夸张的描述中的香烟缭绕的神秘。

我只喜欢那个叫六世达赖的人，因为他的歌子，我才对那些窗户里散发出来的灯光充满敬意。

我见到的不是那些建筑物和兜售的真假难辨的纪念品所代表的拉萨，也不完全是一个充满诗意、神性和狂想的被渲染了的拉萨。我见到的拉萨既是那些整块砖石铺就的北京路，也是那些店铺后肮脏龌龊的普通人家出入的街区，我见到的拉萨不只是那个叫做卓玛的少女对你友好的微笑，也包括布达拉宫广场上母亲把十几岁的女

儿从歌舞厅中拉出来揪打的一幕。我去过一些穷人的房间，他们在更多的时候保持沉默，但当你像个亲人一样地坐下，他们依然会一杯一杯地盛酥油茶给你喝。

当我从拉萨回来，我知道人们要问我一些什么，也许时间太过仓促，我并不觉得我的灵魂有了什么变化。我在去那里之前是个健康结实的青年，回来之后我依然是个健康结实的青年，我只能说，那座高原上的城市，她比所有的地方距离天空更加接近，也有一些了不起的人，他们会跋涉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身躯紧贴着大地去往那里。那里一样有穷人和富人，有夜总会和歌舞厅，那里有一样的现实的快乐和痛苦，有一样的深不可测而又清晰如镜的民间。

直到我踏上了归程，在车掠过了海子提到过的暗夜中的德令哈，掠过了察尔汗和冈察，体验了中国腹地的荒凉之后，当我在青海北部的农村，感到风从麦浪尖上打着滚跑过，我才意识到拉萨已经非常遥远。

新疆

那个胖胖的哈萨克老大娘说：“那个让风一吹就跑的小伙子呢？叫他来，羊已经杀好了。”

我就是“那个让风一吹就跑的小伙子”。

这是在独库公路延伸到天山里来的一段路，几位独山子炼油厂的朋友用一只羊和伊犁特曲来招待我。虽然我不善饮酒，但那天仍

然喝了许多，他们吟唱的幽默诙谐的民歌、带着胡萝卜香味的抓饭、烤肉，讲述的哈萨克和维吾尔人互相打趣的故事，都成了最好的下酒菜。

有人对我说附近有个地方长着九棵树，那个地方就被叫做九棵树。在新疆，这样的地名随处可见，那个朋友说，这样简单、直接，这就是新疆的气质。

独库公路惊人地笔直，如果要用个比喻，只能把它比喻成道路。道路在西部的许多地方有不同的意思，有时候它像是某些外星生物留下的粗糙久远的痕迹，有时它像是不断向前沿伸的带子，很难想象青藏公路基石之下的深处有远古海洋的遗存，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的那个晚上，我才知道什么叫一骑绝尘，车辙在浓烟散尽后清晰可辨。

这样一直回到西安，当我走到了西部广阔大地的边缘，我才知道漫长是道路的另一个名字。

人民

以下的这些人都生活在西部。西部那么广大，他们那么渺小，但我仍将他们所说的话留存，作为西部的声音。

一位住在大山里的希望学校的老师，他读书看报，知道几千里外发生的事，这一种声音是热爱。

一位兰州的民间艺人，他和爱人的信物是两个缀在一起的橘

子，代表连理枝，这一种声音是血性。

一位青藏公路上的驾驶员，他讲述一次曾经让他绝望的旅程，这一种声音是仇恨。

一位拉萨夜总会里的坐台小姐，她能够认清每个贵客的面目，这一种声音是屈辱，

一位农场里的上海支边青年，她难忘过去的苦，让她更加不知所措的是现在，这一种声音是悔恨。

一位私营企业的工人，他被死亡威胁过，被歧视过，被抛弃过，被怀疑过，被践踏过，那是他的全部历史，这一种声音是苦难。

一位僧人，他片言只语当头棒喝这红尘的芸芸众生，这一种声音是自由。

这些声音不代表西部，只代表他们自身。其实你走到任何一个地域，同样能够听到这些声音。

第四章 西部

古铜色的“连理枝”

齐鸿民：访问地点是兰州刘家堡；开始录音的时间是7月1日15时30分；他是一位民间艺人；33岁。

他的家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葫芦，他和他的妻子有个称呼叫“金城葫芦王”，名片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写在一起。

他们可以在葫芦上刻人物、山水、各种景致、文字和故事。

他和我聊天的时候，他的妻子张虹依然忙着手里的活计。一张大的工作台，两个台灯，他们就面对面坐着，一人一把刀子，一人一大堆葫芦。

他们说，“葫芦王”就是这么干出来的。

咱们不要像记者采访那样，咱们扎扎实实聊天，好吧？

我和你嫂子（这时候他已经把我当成兄弟了）第一次见面，是怎么回事呢？我以前不在兰州市，我是从甘肃的靖远那个地方到兰州来的。我到她舅舅家去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她，那是很偶然的。我那时候有个毛病就是写日记，第一天见到她，你猜日记是怎么写的？和平时写得不一樣，我就写“11月25日，始见张红。”然后什么话都没有写，就这四个字，就好像预感到，以后会天天见，月月见，年年见，一直见到白头到老似的。

那是在冬天认识的她，春节之前见了一面，又分手了，回家各人干各人的事。我们两个因为住得远，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工作需要互相参谋的时候就来回跑。那个时候，她的妈妈很不愿意我们来往，我每次刚一进他们家门，她妈妈就会说：“张红，小齐住的太远，回去不方便，你让他先回家去。”我一进门就打发我。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她妈妈看不上我，虽说是美玉，但在那时候是让顽石包着呢。

那时候白天我在服务公司当车工和钳工，到了晚上在一家库房

给人家值班，一个月给我四十块钱。我就在那间房子里，自己干自己的活儿，谁知道差点儿把命搭进去。过年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商店经理的儿子成了蒙面大盗，入室抢劫来了，他把玻璃和灯都打碎，我拿着手电筒冲出去喊：“是谁？”我看见院子里有一个一米八几的大高个，我就跟他接近，搞到一块，而他就施展不开手脚了，在相持的过程中他把我的脖子勒住，就往三轮车上撞。就这样相持了十几分钟，然后我喘过气来，就喊“杀人啦！”当时没有一个人从家里出来，相持了很久以后，我无意中把他的一个手指头抓住了。我想我如果死了，连谁害得我都不会知道，我把他的手指头一抓疼，他忍不住说：“你松开！”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谁了。我当时为什么的能够那样有力气呢？我当时想到了张红，我连工作都没有，我刚刚和她见了一面，你就要我的命，我心里这么想，当时就是想到了她。。

后来我想起我见她的情景，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我也逃不出她的手掌，她也逃不出我的手掌，一个绳子两个蚂蚱，谁也不会逃出去。我当时如果在日记里不写那四个字，或者我根本就不来兰州，这不就少了一对葫芦王？

我的家乡是在靖远那个地方，靖远号称小兰州。当地文化氛围比较好，爱好艺术的人比较多，我在那里跟我的老师们学画画。来到兰州以后，作为一个待业青年，挣钱又挣不上，但是只要有什么艺术上的事情，我总会参加。有一次在一个展览会上就和她舅舅认识了，她的舅舅给我留下了一张名片，说如果有机会就到他家去做

客。我一直也没有去。有一次，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了她舅舅，就到他们家去了。在他们家，我就见到了一个姑娘，亭亭玉立的在那里篆刻章子，左手拿着一把刀子，右手拿着一块石头。在我的潜在意识里，瞧不起城里的年轻人，我认为城里的年轻人比较浮躁花哨，有功夫也是花拳绣腿，他们也许是聪明一些，受过一些教育，但是能吃苦的人非常少。可是我一见到张红，我说，这个姑娘了得呢！她拿起刀子就在那儿刻，我想这肯定是大师的高徒，这可是个先进武器，我一定要挖掘过来。然后就打起她的主意来，从心里佩服她。后来跟她一说话，她也没有城里人那种骄傲地看不起人的态度。那时候我穿着朴素，就像土豹子一样。她也没有城里人那种娇柔作态的劲儿。我想，不愧是大师家里的人。那时候我毕竟有26岁了，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就把她作为我首选目标。我在心里说，那就是我的事业，必须要搞成。

要不要让我谈一些恋爱的技巧？打个比方，我在厂里，人家都叫我齐师傅，生产上的事情我说了算。她当时也不想在家里呆着，无聊得很。为了帮助她从家里出来，能和我在一起，只要我们的工厂愿意要她，她的工资我来付。只要能把张红留在这里，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当然给她分配工作，设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这是什么意思呢？闲杂人员一律不得入内。小伙子更是一概不许进去。目的在此。我给她放了一个办公桌，三个抽屉，一个放资料，一个放工具，还有一个放什么呢，放小食品，小

姑娘不是爱吃零食吗？保证不能断顿。如果发现零食没了，那就是我失职。实打实的事情，那就是糖衣炮弹要把她腐蚀掉。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一旦发现了一个什么标准的美男子，他还没有过我这一关，我就让他走开了。我根本不可能让他进入她的眼帘。封闭式格局，完全隔离开。在她身边只有我这样一个美男子，也够残忍的吧。你把心掏给她，五脏六腑掏给她，没有说她不答应的。长得丑也好，个子小一点也好，你的感情会是无限大的。这是真心对她，她能不感动？你长跪不起，哭他三天三夜，她能不嫁给你？没有亲身经历不知道，我有一回问我的师傅，他在南京谈对象谈崩了，跑到西北来。我看他一天到晚不高兴，我就问他，听说恋爱的人不成的话就寻死觅活，真是那样吗？他说，“那当然是真的，我都差点跳了黄河。”爱一个人就是一句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那时候对她，尽我最大的才华写下的诗歌，真是一擦一擦的。我还写过一首藏头诗，叫“张红非齐不嫁”。

（张红边干活边说：那些诗起了百分之八十的作用。你别看，诗这个东西还真是厉害。）

女孩子家，你光给她买小吃小喝，这不顶用，你当然要展示你内在的东西。你和别的男人比，要金钱，你没有金钱，要地位，你没有地位，所有的身外之物你都不占，只能给她那些你内在的东西。

（张红笑了：好在我比较重才，否则就麻烦了，不起作用。）

假如我是千里马的话，她就是伯乐，我只不过是一个黄土高原

的小黄马驹。就这样她把我挑上，还是我扬蹄扬的勤奋。

我们那时候的信也比较多，我给你念一首当时写的诗：“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关上了爱的心扉，除了蒙娜丽莎和罗丹，谁也不能占据我心灵的空位，无拘无束的生活如流水，无怨无悔的《一剪梅》，最牢固的关卡就像纸灯吹，不知你怎么闯进我的心扉，爱是无语，情深似水，我是鱼儿你是水，谁又能够离开谁？”

（张红静静的听着：反正每次到他们家去，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一首诗给我看，他总说，又写了一首。对，还有那首《四路车的脚步》）

每次我早早的去接她，她坐四路车从东岗镇来，等一辆她没有下来，再等一辆还是没有下来，我就写了一首诗，叫作《四路车的脚步》。那个意思是说，当她来的时候觉得车轱辘转得慢，当她走的时候显得车轱辘转得太快，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情。有一次我两个月没有见到她，那天她打电话说，我要过来，你作好准备。我就到车站去等她。她说她两点会来，我一直等到四点多，她还没有来。我就看来的一辆辆车，从第一个人看到最后一个人，一直都没有她，一辆车一辆车的过去。四点多，有一辆车过来了，忽然她从车上下来，高兴得我简直就控制不住自己，上去就把她抱住，在车站上转了一大圈儿。当时用兰州话说这就是“脑子潮着呢！”我就在车站满车站的转，也不知道从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头，人们都在看我，以为我有神经病呢！现在如果谁转上一圈，我都会反对，当时我就会

做出这样让人反感的事情。

（张红：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并不陌生。你见过第一次见面就送女孩子回家的事吗？他和我的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像对他特别的熟悉，要不然我也不敢让他把我送回家去。）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和你嫂子结婚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千块钱，花两百块钱买一个低档沙发，房子里贴了一个大喜字，床是怎么做的呢？是我爸爸50年代学木匠的时候，用这里的劈柴做的大立柜，纯粹就是老掉牙的旧家具，安置到箱子上，就成了我们的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家里的东西都是我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都是我们挣出来的。我完了婚到姨妈家去看亲戚，看见大街上在卖桔子，我准备买些桔子给姨妈送过去，那时候看见有两个桔子在一块连着，我单独就把那个要了。我觉得那是一个枝子上结了两个果子，这不就是“连理枝”吗？拿回家我就挂在结婚照下面的墙角上，一挂就挂到了今天。那个“连理枝”都成了古董，橘子的叶子也干了，两个桔子都成了核桃的颜色，古铜色。她也很喜欢它，逢年过节打扫房间，我们谁都不去碰它。

表达感情不一定非得要金山银山。这就是我心愿，穷要穷得有滋味，富要富得健康。别人到我家里来，我就指给人家看，我说，你看，“连理枝”在那里挂着呢！

江湖

高远祥：访问地点是拉萨交通厅招待所；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8 月 8 日 17 时；他是一位驾驶员；45 岁。

到西藏之前，我就想，我应该访问一位青藏线上的司机。

这是我离开拉萨的前一天，在我居住的交通厅招待所的房间里，我正收拾着行李，他走进来了。老实说，见他的第一面我可不喜欢他，他穿着一条军绿色的裤子，大不咧咧的，眼睛直盯着你，我挺为在西藏的最后一夜有这么一个同屋而懊恼。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我。

我说：“我到这里来访问，要写一本书。”

“这里有什么好访问的！这种地方！”他似乎很生气。

停车场上陆陆续续有车开进来，招待所比往日喧闹了许多。

他靠在床上对我说：“你在访问什么呢？我一直琢磨，怎么没有人来问问我们这些跑青藏线的司机是怎么生活的！”

你猜猜我有多大的年纪？你猜的还不错，45 岁。我是个老江湖了。

年轻的时候，我在地质队干了十四年，88 年开始从成都跑拉萨，一个月跑一趟车。现在这个车是好开了，青藏线在世界上都是很难走的路，还有川藏线，在川藏线上跑车，人要是掉了下去，你就去印度洋去找吧！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找到你的尸首就说

明你能够积德行善。一个泥石流，一个塌方，一堵就堵半个月，甚至半年。

我是 96 年 8 月接手的这辆车，9 月份，开着它经过四川的一个县，在一个特别急的弯道上出事了。当时下来了一辆四川的车，我把车靠在悬崖上，然后一探头，看见对面来车了，我就停下。那个距离将将能过一辆车。过来的车车号我至今都记得清楚，他的车过来就把我的车撞了。我的车是新车，刚买一个月，那时候是借了 12 万块钱买的这辆车。我一直是吃共产党饭的，没有多少钱。按责任来说，是他的车超载拉了一只木头，而且还是下坡，车速太快。我下来一看，也没办法说，只好找交警来处理。他让我去找，我一个人拉着一车军用物资，我当然不能离开车。我说你们人多，你们去找。他们说：“你说话怎么这么牛呢？”然后就把我打了一顿。他们把我打成什么程度呢，第九、第十肋骨骨折。当时有十几个人打我。后来我就把车掉了头往县城开，离县城有十公里的地方，因为山路塌方，就把我堵在那里，他们又来了一辆小东风追我，我一看这种情况不行，把车门一锁，就走了。那时，我觉得身子后面鼓了一个包，就挡了一辆农用车，求爷爷告奶奶的跟他们说，我给你一百块钱，你把我拉到公安局去。这个农用车就掉了一个头，把我拉到了县公安局。我在公安局的院子里呆了有三个多小时，没有找到一个人。这时候我已经支持不住了，在公安局门口半卧着。我说你们有没有人能够救我，当时没有人理我。我就把一个电话号码写

一个条子上。给一位女人，我说我万一不行了，这里有电话号码。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姓严的人来，但现在我也没搞明白，他们说他是严局长，可是我看他不像是局长。他问我怎么样，我就大概把这个事情讲了，当时我已经失血过多，面色苍白，他说你能不能到现场。我就坐着他的吉普车上去了，车子很颠簸，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到了现场，他们都还在那里，可是现场已经破坏了，我又咬着牙把我的车开回县城。当时车子的一条轮胎爆了，在补轮胎的时候我就已经不行啦。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检查，拍片子的时候我基本上直不起腰来，就这样蹲着，有个人一把就把我拽起来，结果他们说片子拍得很好，什么都没有。我曾经摔断过第二条肋骨，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住了两天医院，在这两天期间我只买了一个面包，没能喝成一口水，也没有能吃上那个面包。我抽了半条香烟，但是连咳嗽都咳不出来。

他们的交通中队长来了，还来了一个派出所的人，他曾经问过我一遍，但是他后来写的那个东西跟我说得简直不是一回事，把是非整个颠倒过来了。来的刑侦队的人跟他们都是朋友，他也不管我是不是重伤，一下就把我提起来，那人姓周，我把他的名字记得很清楚。他说：“你都这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我就扎帐篷在山上等着你，我就不相信你永远不走这条路，这条路是必经之路。”当时他就要打我，被交通队的队长劝阻了。他们和医院的这些人，我一看全都认识，所以我住了两天医院以后，坚决要求出院，我不

住了，我死也不能死在这里。有一位大夫还比较客气，他说，你看你旁边床上全部都是血，前天也是一个外地的人在这里打架，什么便宜都没占着。我当时也没有钱，我是受害人，他们却还把我的车扣在县宾馆，这是公安局下的命令，没有他们的命令不能放车。我从医院出来，就住进了县宾馆，给成都打了一个电话。人家说，你没有两千块钱休想走路。我的成都朋友就带了两千块钱上来，当时我给他们钱的意思不是别的，他把我的执照什么都扣了，我给他这两千块钱纯属我的买路钱。按照我的性格，不是到了绝路，打死我都不会给的。

那些公安人员，我简直就没有办法想象他们会那么做。他们说，我如果把你扔到河里，就像扔块石头似的。这是我在人生经历中经历的最悲惨的一回，我就没想社会能变成这样。

青藏线上常跑车的也不过就是一二百名驾驶员，很多人遇到过这样的事，有人骑着马来抢车，我就让人偷过一回，军用物资丢了一万多块钱，我们只有认帐。到了若尔盖，天一黑就不敢走路了。现在身上不带几千块钱和上万块钱就出不了车，油料各方面都是比较高的。

在路上遇到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罚款，就拿青藏线来说，动不动就说你超吨位。青藏线本身就很艰苦，现在干活都和经济效益挂钩，谁不想多拉一点儿。但你把青藏线的公路翻开来看看，除了土没有石头，而且路上也没有什么大动力的车，

在这种情况下超吨位其实对公路根本不造成什么影响。你说汽车能够把你的公路压坏，那么按照规定，公路应该多厚？沥青石头应该多厚？你够不够这个标准呢？你每年投资上亿元修路的钱到哪儿去了呢？

像我这次过来，部队要的货物相当紧急，七天必须赶到。我就在格尔木耽误了一天，为什么呢？这批钢材我又不能往下倒，钢材又比较长。我等了一天，找到一个熟人，他说你超了多少，我说几百公斤，当时我拿的是部队的证明，我只好给他们买了几包烟，这就算过了。

到了一个检查站，我想这检查站怎么过呢？有人说，你到晚上走，给四百块钱就能过。到了晚上十点多我停在了那儿，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你总要往这一关闯，可是他们还是给我扣住了。我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再解释他们也不相信，把车给我扣到三点多。最后没有办法，给我这么算那么算扣我一千七百块钱，把车钥匙都拿走了，我现在把车钥匙也没有拿回来。我跟他们说，你看我这个任务确实太急，我把合同给他们看，一般合同都不给别人看的，但是根本没有人理我。在这期间我就在大马路上，天又冷，他们连推带操把我赶出来，好像我就是阶级敌人。实际上人与人是平等的，只不过干的工作不一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爷，我们是孙子。在这条路上，大家都在说开车的是贼，交警就是兵，兵抓贼是天经地义。我们又没有办法不触动你的条例，因为你的条例本身就不合

理。

我说，按照你们的规矩我把这八百块钱给你，这是双倍的，无论如何，天亮我必须走，这是军用物资，你们打死我我也必须走。我想，不行了我就硬闯，砸了玻璃走。他们看见我拿了八百块钱，也就动心了，商量了一下，把我的证明和钥匙扣了下来，就说，等一下你就跑吧，领导问下来我们就说你偷跑了。就这样我才跑出来，我一路上才挣多少钱，扣来扣去我都没有了。我家里的老婆娃娃都要吃饭，我们也是人。我母亲去世了，我还有一位老父亲。我老婆在家里，按照内退一个月给二百四十块钱，我家里还有一个高中生。一家人全凭我一个人挣钱。现在单位上我还挂了五千多块钱的帐。过去的领导贪污了几年，把我们的车卖了，贪污了，现在把钱也没有还给我们。

我跟你说的都是老实话，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我不是说在骂这个社会，这些贪官污吏什么时候能够制止？只要稍微有一点权利，他就要捞钱。那些关卡，一交钱就能走，现在这些事情你说怎么好？作为你们来说，你们是局外人，作为我们来说，有些事情能把肺气炸了。我恨不得把他的腿拿起来撕开。我本身就是一个直率的人，我的脾气有点太直了，在外面打架也打过，也把这些王八蛋打的够呛。但是从我开上了自己的车，有一次工商局的一个小子二话不说，把我的嘴打破了，我也没再说什么。开共产党的车我打完了以后就可以走，开自己的车就不成了。

我们这些人什么人都认识，国民党的将军、共产党的高干、补鞋的、耍流氓的，三教九流。由于我们就处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之中，你在外面混，地痞流氓呢惹不起，打遍四方打不过地方。我们这些人的经历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们经历的事情那么多，虽然有些事情说不出什么道理。我能记住的，都是终身难忘的事。我挨了打，打我的人的名字我都能够记得住，有朝一日我会回去报复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无缘无故的，你把我撞了，又把我打了。我当时不敢报复，如果那样就把我的朋友害死了，我是借钱买的车，我的老婆娃娃怎么办？朋友们的钱又怎么办？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你想我断了两个肋骨在那个地方跑了两遍，我喊救命的时候没有人理睬。

在我四十多岁的生命里，有二十多年我是在满世界跑，我已经把这个红尘看破了，我现在这么跑，也就是为了我的姑娘挣一点上大学费，我把我的车卖了，她还能够上大学。我死了有什么了不起？我已经活够了。我看透了，我老婆可以改嫁，我姑娘怎么办呢？毕竟我女儿的路还很长，我如果不给她准备学费，我这个做爹的也太无能了。

非常空虚

文 霞：访问地点是拉萨某娱乐城；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8 月 8 日 22 时；她是一位坐台小姐；28 岁。

她们画着很浓艳的妆，将头发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用紧身的衣服把自己的曲线突现出来，她们给自己的手指甲和脚指甲涂上油脂，戴着并不高档的饰物，穿着高底的靴子，在自己的身上撒着有浓厚味道的香水，大多数时候很倦怠地坐在椅子上，眼圈有点黑，嘴里嚼着零食。

不用我多说你也知道她们是什么人，更多的人不会去问她们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喜欢什么？知道些什么事情？并且，她们真正有什么愿望？

人们告诉我：“她们的话多半是假的！”

当然，可是你又知道多少真相呢？

她就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这是在一家热闹的夜总会的包间里，她的家乡在云南大理，她的皮肤很黑，长得不漂亮，说话的声音很尖，她怀疑自己是哪个知青遗弃在云南的，所以她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她吸毒，除了坐台以外，推销、拉广告、卖明信片、卖古董，所有赚钱的事情她都去做。她认为我很坦率，她说，我愿意讲给你听。

也许别人以为我们快乐的时候，就是那些所谓的男人给钱的时候，这个我也承认。这个很正常，在现在这个时候，他的生活水平和我的生活水平根本就不平等。

说到钱，要是让我说真话，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钱，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快乐过，这可是真话。快乐的时候是以前我唱戏的时

候，那时我在广州的一个艺术团里，每一次上台演出，我的心里感觉是最好的。面对着下面的观众，那些老年人，他们是因为爱粤剧才来的。唱完一段戏，他们一般都会叫好。

现在我每天脑袋里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感觉，就是我什么也没有，所以感到特别的空，特别的寂寞。上班的时候我们就去上班，但到了下班的时候，我就只有寂寞。有时候面对金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我男朋友离我远去的时候，我感到旁边真的没有一个朋友。我不想跟家里人说，作为一个女孩，在家里我得不到那种爱，父亲觉得我没有男孩子的那种大志向，母亲也觉得女孩子毕竟……。

现在我也不穷，我只是吸白粉，这在云南非常普遍，何况我是大理的。我这个人好动，总觉得手上没有钱就会很难受，我一次次浪费钱，往往手上有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花。有的时候听朋友说，其实人需要的就是自己内心那份特别空虚的感觉，不要太实在，不要沉浸在回忆之中。我在很小的时候有很多回忆，长大了我还是回忆。有时候我想，不要那些回忆，从零开始。

95 年的时候，我就到拉萨来了，到拉萨来之前我在家里基本上已经戒了毒，已经没有什么瘾了。为什么到拉萨呢？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在十八军呆过，对我挺好的，把我当女儿看。她告诉我说：“闺女，你到拉萨去吧，那儿买不着毒品，藏族从古到今不卖这东西。”我挺相信他的，就来了。

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个男孩子，说穿了也是在这种场合。他有老婆有孩子，可是他特别喜欢我。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热恋的那种感觉，第一次发现自己爱上别人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那个时候我偶尔犯一次毒瘾，也不是很严重，他每天陪着我，把我拉到车上大街小巷的转，让我忘记那份感觉，让我不再想那个。他每天就这样和我一起度过，时间长了，我发现我很喜欢他，后来我们两个竟然把结婚证领了。

有很多屈辱的事。一次客人给我献花，当时我跳的那个舞蹈根本就不便于拿花，我就顺手把花儿放在了舞台上。而他下面的马仔，就告诉他们大哥，那个小姐把你送上去的鲜花扔了。舞池很大，我当时正在舞台上作表演，他跑过来看着我手上没有花，直接就把酒瓶砸到舞台上。客人变脸特别的快，这一次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一个酒瓶就是一斤重，他往上扔酒瓶的时候，别的客人不知道为什么也往台上扔酒瓶，有的酒瓶砸在我身上。当我下来赔礼的时候，他买了十几瓶红酒让我喝下去，那天晚上我喝的不行了，他才跟我完事，不然的话不会让我走。那是在我最凄惨的一次，我边喝酒边流眼泪，周围的人都看着，但没有人同情我。那一次，我喝醉了，把包间里边的电视全部砸坏了，那是我最野的一次。第二天，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两个月工资六千块钱全部都给我扣掉，可这件事本来不是我的不对啊。

后来我的那个老公又有了两个老婆，两个老婆都领了结婚证，

也是靠一些办法领来的。这也是人世间的的天不公，我就到派出所去告状，结果派出所倒扣压了我八个月的身份证。后来我告到妇联，妇联出面，才把他叫到法院去。我到法院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需要什么什么证据，然后他们告诉我有了眉目，就马上打电话给我。我每去一次就象挤牙膏一样，讲上几句话，接着就把我赶出来了。而我现在这个老公就是不跟我离婚，一个女人被控制在一个男人手里，而又得不到那一份爱。我和他在这种场合认识，我也不想害他，我只要把结婚证退了就行。

我的那个所谓老公带着他的那个老婆来打过我，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祈求，在他打过我以后，我这个人整个都变了。半夜三、四点钟我打电话打到他的家里边，那时候我的嫉妒心理非常的强。

我经常跳舞，有时坐台。有的嫖客像是发了疯一样，在和我们跳舞的时候说，你跟我出去，我给你几万块钱。我觉得他们真是疯子。

我也有开心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这些女孩子嘲笑嫖客的时候，把男人们的种种丑态都嘲笑一番。在这种场合呆的时间长了，对男人我们已经没有感觉了，也分不出什么真假，有的男人珍惜你，向你表露一些心意，我们也完全没有感觉。我们是小角色，但是也有某个人把你迷上的时候，有时候你甚至不敢相信。

嫖客有各方面的人，政府官员为了保密，他也不告诉你更多，最多只告诉你他姓什么。有一天有一个大官，他给了我四千块钱，

但我觉得他们都一样。来的人也有街上卖烧饼的，他出来的时候很虚伪，说他是什么什么老板，鬼知道他白天是干什么，也许是拣破烂的，收旧瓶子的吧。但是做我们这行的人是不认人只认钱的。

男人伤害了我们，我们也有了一种报复的心理。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同学，她爱上了一个小作家，他经常发文章，也出过几本小书。他说要娶这个女孩，但是这个女孩发现他根本就没有要娶她的意思。后来这个女孩自杀了，可是没有死，最可笑的最有意思的是她身上有一支金项链，一个金戒指，一个金耳环，那些东西有那么的长，要有一定的毅力才能把它们吞下去，她竟然把项链吞了下去。我想这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结果肚子疼了两天，第三天怎么还没死？后来找医生拿了出来，她就再也不想自杀了。这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以后她就去勾引有夫之妇，她知道了别人家的电话号码，知道了别人家的地址，就去捣乱，这成了她的第二职业。

有些女孩子很有钱，她们打麻将，有的时候点一炮一千多块钱就出去了。而一千多块钱，坐台的小姐一个晚上就赚回来了。拉萨的价是坐台一百块钱。别的钱，就靠有的小姐到发廊里去做按摩，当然这种按摩还有些别的内容。但是有了钱我们也并不知道节俭，也没有什么目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拿到桌上一赌吧。

小姐们普遍有这种心理，我有了钱以后买座房子，漂漂亮亮的像别墅一样的房子，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好像也应该买辆车。她

们都没想过要嫁个好老公，因为像我们这么长时间在外面，好男孩早已经成了别人的男朋友，好男人早已经成了别人的好老公了。好的男孩也是很少，我们见的男人太多了，早已经没有感觉。有一个男孩特别喜欢我，每天晚上给我送花，每天在下面规规矩矩的喝饮料，傻呼呼地等着我，我只要一跟他说话就给我一百块钱。这有什么意思？太土了，我不愿意跟他勾搭，他太老实了，我不愿意欺骗他。在这种场合，我喜欢那种狡猾的随机应变一点的男人，不喜欢那种很憨厚的男人，这种男人，你和他打交道就像在骗他。我一点儿都不忍心。

未来？特别的渺茫。我现在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我能嫁给谁呢？我也不可能嫁个男人，像一个保姆一样替他抚养孩子，我何必要这样干呢？再说岁数也不小了。我想有一天我也许会自杀的，就是这条路。

我以前攒了很多钱，但是吃药都花光了，我要是买房子买给谁呢？我自己住，老了好可怜。捐给那些孤儿吧，我倒真是有这种想法。其实我并不是很悲观，在我脸上找不到眼泪的，没有眼泪了，不会哭了。我感觉我不是悲观，有的人很现实，走投无路了才会去自杀，我的感觉不是这样，我是觉得一时的痛苦可能会带来永远的自由。那样无牵无挂，这很自然也很正常。没有什么。人没有长生不老的秘方，你活着干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不公正的事情也太多了，派

出所扣我八个月的身份证就不公正。你开着好车闯红灯，警察不会去抓你，换一辆一般的车，警察马上去。

我们这里的小姐来自四川的比较多，四川的占 95%，最小的我见过 14 岁的，而且已经干了一年多，那证明她 12 岁就出来了，最大的我见过 40 多岁的，

社会上对我们的歧视目光，日久天长我们已经习惯，不过现在到哪里去找什么良家妇女呢？我从小就在一种歧视的目光中长大，这些东西也就没什么了。

上学的时候我的语文学的可好啦！我挺喜欢文学，也有这方面的梦想。我原来的梦想不是清华什么的，而是鲁迅文学院，如果不认识我现在这个老公的话，也许我还会去上学的，我也可能会改变这一切的。这个老公太让我失望，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出来坐台的时候，晚上回到家里，有属于自己的小窝，回去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冷冷清清，一个人没有一点意思。我不喜欢在屋子里，就算是结了婚，象金丝雀一样呆在屋里有什么意思？我还是喜欢出来玩，有时候看上了哪个男孩子，我会给他钱让他跟我走。我干过这种事。像我这种人就是扮演那种双重性格的人，有的时候在某个男人面前装的好可怜，我没有钱啊，怎么怎么样啦！而在有些男人面前，我会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见的男人多了，我就会想，哪个男人可以去宰一下，有的男人我却觉得他们挺好。真真假假有时候就分不清啦。有时候就拿酒来麻醉自己，管他什么真假。

对性行为，我已经没有感觉了。吸毒对这方面也有影响。有的时候我不想睡觉醒来的时候枕头边上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想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真是发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一个笑话，有一天晚上我喝醉了，带了一个男孩子回家去，第二天早晨我让他走，拿了一千块钱给他，男孩子价钱普遍比较高嘛。我拿钱给他，我说，我老公要回来了。结果你猜他怎么样？他反而把我抢了。脖子上的、手上的、柜子里的能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连我的外衣都拿去了，这是我最可笑的一次。遇上了贼，我又不敢去找保安。我找这些男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欲望，只是为了忘记我的老公，找一个回家的感觉。有时候找到了这种感觉，但是也不现实的。

我也可能是那种所谓的神经病，我的大脑不受限制，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时候我很后悔，但是又不愿意说出来。

跟客人在一起，我们的叫床的声音都是假的，自己做出很投入很投入的样子，其实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再告诉你一个笑话，有一个客人，那是个熟客，你猜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很喜剧的事。这位客人岁数挺大了，他也已经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准时付费，你去了以后他就给你钱，只要愿意去，别的任何条件都没有。他有好多好多的女朋友，最高的一次他喊了九个小姐出台，他给每个人付一百块钱，你要吃什么呢，你自己去点。晚上把九个小姐都带回家，不过他的床肯定是睡不下的，但是必须在房间里。他可能是太老了，我觉得他完全是变态的感觉，你脱一件衣服，他就给你一百块钱。

我没想过这个时代里还会有这么变态的人。他最多只能和一个两个小姐干，别的小姐坐在那里就好象看黄色录像一样，按照他的要求，嘴巴还在不停叫着。

作为人，我觉得我比那些官员强得多。有些尼姑来拉萨朝圣，我还给她们出钱，帮她们住宾馆，我有时候会给乞丐钱，有一次我把身上仅有的二百块钱交给了一个尼姑，请她把钱给菩萨。

从小，奶奶教我们背三从四德。后来我开始做文员，有一次，公司的老总给保险柜里放了两万块钱，把钥匙给我，让我在那里等着。我一直等老板回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天，他没有来上班，第三天他来了，他让我打开保险柜，里边是空空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下午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要去出差，顺便来问问钱的问题。他说，如果我跟他去出差，就没什么事了，让我看着办。那个时候我 17 岁，他比我大二十几岁。后来我就只好让他带我去出差，他给我买了化妆品和衣服，没有一样是值钱的，当时我想，他对我好一点也好，可是后来他厌烦我了，竟然要介绍一个男朋友给我。

后来我又遇到一个男朋友，那时候我对家庭的愿望太强烈了，也想和他同甘共苦。可是还没有到深圳，他为了两万块钱就把我给卖了，我只值两万块钱！最后我把他们的钱偷了，在广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花钱。我也不想回家，就漫无边际的在广州流浪，那个时候我想忘掉以前的一切。这样居然遇到了一个粤剧戏班的老师，她让我练习唱配角。有一次那个男孩子带了很多找到了我，我的妆

还没有卸下来，他们拿着刀追我，让我跟他走。象拍电影一样，我跑到街上，看见一辆出租车没有关门，我一下子就跳进去了，司机拉着我走了很远。……后来，那些钱全部花在了白粉上。

在我们这里，同性恋也很多，有一个女孩很早就有了性生活，另一个女孩的父亲是虐待狂，他们家睡大炕，女儿媳妇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在他们面前毫不掩饰。她们对男孩根本就没有感觉，于是就凑在一起，她们的感情很好，我有时候挺羡慕她们。

我有时也写文章，写这些事。有一个男人在这里很有名的，他出了很多书。有一天他无意中看到我写的底稿，让我做他一年的情妇，他说，可以把我写的文章拿去发表。可是后来，他又说，你这里边儿写得太黑暗了，不行。他本来就喜欢写那些吹捧文章，他把一切都写得很美，月亮下面其实很凄凉，他却写的情意绵绵，一切都是假的。

就像那些官员，他们说，“我很同情你，不要再做这一行啦！我给你批工程。”他把传呼也留给你，可在你传呼他的时候，他却说：“我在开会。”他们为什么总用开会来推辞呢？

在拉萨，你去调查一下，这些小姐，像我这样的有多少呢？我生孩子一定生个男孩，如果生了女孩，我一定要掐死她，不要让她和我一样的贱。

去西藏

李 正：访问地点是青海格尔木火车站候车室；开始录音的时间是8月11日13时；他是一位大学生、青年旅游者；21岁。

丹增边洛把我送到汽车站，然后在我的脖子上挂上一只哈达，我们拥抱着告别。

汽车站上人很多，有回乡的民工，他们的家乡竟然在河南，有一些旅行者，还有两个骑自行车来到拉萨这会儿正准备回去的青年，还有一些湖南人和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我看到他在椅子上坐着，戴着厚厚的眼镜，脚底下是他的牛仔包，手上的塑料袋里装着一些食品。我问他：“你是学生吧？”他说：“一看就知道了！”

他告诉我他从湖南来，趁着假期来西藏看看。

这一路上我们成了朋友。他为了省钱买的是一张坐票这样从拉萨坐到格尔木可真够钱。有些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聊女孩子，聊罗大佑的歌，聊在西藏的感受。车因为修理而停下来时，我们在一起听回族青年在山坡上唱着花儿，河流静静淌过，我们这样一直走到了格尔木。

我最先想到要去西藏，是在上高三的时候，那是因为看了电影《红河谷》。我觉得那里边表现的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和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圈子有很大不同，故事里的那种感情是非常真切的。我和我的朋友们也谈到过这件事，年轻人之间谈什么都可以，但是真正要做起来还是有很多困难。高三的时候当然是没时间。后来我想，

大学的时候，前两年过的艰苦一点，把钱存起来。我对自己说：“不管怎样，如果能有一千块钱，你就上路，以后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即使在路上没有钱了，那也得靠你自己想办法走回来。”

我觉得这件事对自己是个锻炼，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自己出过远门，就是去学校也是很近。而且在学校的那两年，怎么说呢？我发现在大学里边，我们真是“垮掉的一代”，特别的不思进取。可能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有这种感觉，觉得特别的空虚。有时候我们就会喊，空虚啊！无聊啊！使劲的大叫。然后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我不敢在大众面前表现自己，不管我怎么爱好一些事，心总是放不下来。就像有一次全校搞演讲会，刚进校的时候，班上觉得我普通话讲得不错，朗诵还可以，就让我去参加。然后给我两天准备。其实两天的时间准备一篇文章还是足够了，我就想了一篇短一点的文章，大概有三四百字，那是一首散文诗，我用两天时间就把它背下来了。到上台的时候，我的神经好紧张啊，结果背到一半儿的时候就把词给忘了，当时感觉脸像火烧一样，那么多双眼睛看着我。别人看到我忘词了，还给我鼓掌，他们鼓掌我也没有办法，我还想继续下去，但是越想越乱，最后只好把那篇文章的最后两句话背出来，就下台了。这是第一次，从那以后我好恨自己，好讨厌自己。后来又有一次，自己去报名。我说，这次还要去试一下，结果情况和第一次大同小异。我就搞不懂自己，为什么别人轻轻松松的能够成功的事情，我怎么做都做不成？我的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失败的

地方，比如说打牌，我们没有事情的时候坐在一起打扑克，在宿舍里打“升级”，有时候我打牌就像是不考虑，觉得自己特别笨。打扑克是打不赢，别人带我去打麻将还是不行，我在这种游戏活动上怎么就不行呢？小时候学东西挺快的，怎么越大越来越不行呢？

就这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把自己的性格压了下来，我成了一个没棱没角的人。后来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学生，自己背了把吉它踏上了西去的火车，最后走到了拉萨。和我最初的想法结合起来，我决定，我也要走。这学期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走。然后我把决定告诉了我的好朋友，他们每个人都是使劲的劝阻我，说，不要去，那里很危险，藏族人是野蛮的。我说，我不怕，我去的话，落到什么境地是什么境地。

我再也忍受不了自己的这种平庸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劝服不了我，最后只好支持我。我还是很感动的，他们帮我想办法，我们一起想，路上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这次到拉萨以后因为储蓄卡的问题，都是他们在家里帮我解决的，很快就帮我办好了。所以这次到了拉萨，还不算是靠自己完成的，还是借助了别人的力量。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够成功。但是这次到拉萨的途中，确实吃了很多苦。

在路上，首先我觉得坐车很累，第一次到成都的时候，因为没有卧铺，我就拥挤在那个过道里。你知道那里边什么人都有，四十个小时我就挤在那里边，我和他们聊天、吃东西、抽烟。那些我们平时看起来像是小流氓的人，也和我们处在一起，其实他们都挺好，

这就使我对那些人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一位大妈在一路上一直照顾我，给我东西吃，叫我不要总是睡觉，保持好的精神。这一路上，我遇到的好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还遇到了两个藏族，他们其中有一个是吸毒的。我们住在旅馆里头，他把那个纸包拿出来吸。但是他们对我也很好，他们教我在路上怎样对付不同的人，他们要我小心注意，并且他们把我带到了他们的家，给我穿藏服，把他们藏族的风俗都告诉给我。我似乎觉得我这一路上遇到的都是好人。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我遇到坏人怎么办？如果遇上有人抢劫，我该怎么办？实际上这一路上根本就没有。

在没有到拉萨之前我想过打退堂鼓，但是我一想到我以前的失败，我就忍受不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坚持下去。给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力量，一个是来自自己，还有就是来自朋友的支持，我不能让朋友们失望。再有一个就是我的家，我爸爸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他在国营企业，这两年才退下来自己干。他在国营企业还由国家养着，退下来完全是为了我们上大学，因为我们上学花费很大。我有一个妹妹也还在念高中，也要读大学了。我觉得爸爸不属于那种做生意的人，他经常在生意场上被别人骗，就算是自己的朋友都有好几次欺骗他。到了拉萨以后的第五个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同房的一个康巴老人聊了很久，很累，然后就睡着了。后来我发现我半夜是哭醒了的。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爸爸，我就决定第二天回去。

因为我这次来，没有告诉爸爸我是来拉萨。那时候我特别的想念他。本来我想第二天还要跟康巴老人去一个地方，后来我就告诉那个康巴老人，我不去了，我要回家去了。然后我就回来了。

你说，这可能还是一种软弱吧？

花儿

马明山：访问地点是青海互助县麻吉村；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8 月 13 日 17 时；她是一位土族花儿歌手；52 岁。

从互助县开出的车子把我仍在了路边，这是东和乡麻吉村的村口，路边的老乡说，要走到马明山的家，还有三四里的路程。不过他们说，马明山开了一个饭馆，很好找，就在马路边上。

马明山是远近闻名的“花儿王”，在这里，人人都知道她。

我沿着公路去找马明山，这个时候，阳光被云彩一点点遮住，但光线却没有因此而暗淡多少，空气恬静温和，麦子已经抽穗，庄稼和山峦的绿色已经搅和到了一起。

马明山说：“你来得正好，这饭馆早一步晚一步都是客人。”

唱一首花儿吗？有个人在我就不唱，不让他们听。我唱了：

尕猫娃捂着个锅盖上，

尕尾巴搭在个碗上，

胳膊的胳膊紧紧挨上，

尕嘴贴在脸上。

原来家里边有特别大的困难，有难处的时候，就唱一唱。

花儿都是情歌，歌舞团把花儿全变成洋调调喽，农村人唱的是原汁原味的，农村的花儿好。情歌这个东西，装在脑子里，随便就有了。

我十六十七岁的时候，在娘家劳动，那个时候我是个姑娘，听媳妇们唱，后来成了媳妇，我就接着唱。

难过的事情讲不得出来，花儿的词里都有：

一队白马进了灵山，
怀抱了朱砂子牡丹，
为你过了个铁门槛，
这下撒了你太可怜。”

再什么也没有了，就这么个意思。

现在好着呢，高兴有高兴的花儿，难过有难过的花儿，五十岁了，唱不了了。我们这儿的人不管大小，随便唱，喝醉了唱，河边上唱，娶媳妇，送姑娘，什么都唱。

以前，我的成分不好，生活特别困难，为了四毛钱去唱花儿，后来四毛涨成六毛，涨成一块，为了钱我去，要不然我不去。

我们尕娃不唱花儿，他能唱革命歌曲，我们姑娘的花儿唱的好。

最早唱花儿的时候，那时候挣工分，一天八分。公社里说，你唱的好，你唱去！你要唱，一天可以挣两块钱，一块给生产队，划工分八分，一块给我自家，买点盐，买点洗脸的毛巾。那时候，我

没有针，没有单子，啥也没有，住在一个山洞里。后来我得了一等奖，单子什么的就都有了。

无话可说

戚思敏：访问地点是新疆石河子某兵团；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8 月 24 日 14 时；她是一位老上海支边青年；54 岁。

从石河子到沙湾，我在车上能够看到许多地上种着蟠桃，正是蟠桃丰收的季节，庄稼地周围的白杨树林排成了一行树墙，地里有高高架起的棚子，田野中栽着许多穿着各种服饰的稻草人。

一开始，她拒绝我的访问，我想我既然走了那么远来到这里，就没有轻易地告辞离开。

她说：“告诉你这些有什么用呢？你只是写小说的。”

这里的上海籍支边青年已经回去得差不多了，她是想回去却没有回去成的。也有回到上海后又回来的，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属于那里了。

她有两个女儿在上海，一个女儿在奎屯。她早已不是那个热血沸腾支援边疆的上海女青年，她有三个女儿，还有孙子，她已经是老太了。

有些事情我们看得比较透，但是我跟你讲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你是要写一部小说吧，我说这些能够什么用处呢？

像我们这种在新疆的上海知青，现在为数已经不多了。

刚来的时候，当时的宣传把新疆说得像神话一样。我们一听到这种宣传，就满腔热情的到新疆来了。来了以后，一看现实和我们听到的完全不一样，每一个上海人都有这样上当受骗的感觉。我想，现在随便怎样说，做怎样的努力，那时候的事对我们来说，都是自找的，这些苦都是我们自找的。

我现在不想再说这些事情，人家国家也不是强迫你非来不可。如果不来，在上海有多好，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现在，像我们这种人回去，你跟家里人也没法说这里有多苦。我不愿意回首往事，酸甜苦辣太多了，这些事情都过来了，现在想起来悲观的很。你看我们到新疆来了三十多年了，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你看我家今年遇到的这种问题。我这个爱人 57 岁，因为他干工作比较认真，比较廉洁，现在这个社会，就该他倒霉。人家经理说不要他干了，一句话就让他退休了，我们到那里去告呢？这就是个民情吧？是不是？既然他能退，我也要求退，可我的单位现在又不让我退，我们两个都吊在这里。你让我退了，我就能回家，我上海还有两个女儿。两个人租一间房子住，大的那个如果结婚了，就留下小的女儿一个人住，我们都不放心。可是我们又走不脱。你说怎么办哪？但是，我们就算回去，也没有钱买房子，所以有些事情，你去跟谁说呢？不是我有什么顾虑，不跟你讲，只是讲了有什么用呢？

我们当初来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宣传的还是挺好的，动员的时

候说，新疆的车子可以随便坐。结果他们把我们送到深山老林里。我那个时候是在一营一连，离这里还有 20 公里，坐公共汽车大概要 40 分钟。六十年代的时候，当地的人对我们还算可以，随着七十年代上海慰问团来了以后，对其他省市的人好像有些触动。他们认为，你们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还慰问你们。这样在工作单位和在同事当中无形就有了一种对上海人的偏见。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去探亲了，有一次我去找我们中心的主任，他说：“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的子女都回去了，你还想要什么特殊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一颗红心来到这里，但是来了以后并不很受这里人的欢迎，反而引起了别人的嫉妒。

我们有时候说，“献了青春献子孙”。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一步路完全走错了。因为你不代表官方，我可以讲给你说，没什么意思。我现在马上就 55 岁了，原来公布的那些文件，30 年工龄 50 岁以上的可以内退，可是他们不让。你去跟他讲理？那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在国家也是提倡企业的法人说了话算数，我们上告无门，我去告谁呢？

像我丈夫还差三岁就满 60 岁，现在让他退休，什么意思？不就是因为他的廉洁？他当的是会计……我不想给任何人说这个话。有些同志问我，怎么他现在就退休了？我只能说是年龄到了，你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别人，那一定会得罪领导。你说，作为平民老百姓，又能到什么地方去说呢？我们经常说，现在这个社会，你没有钱，

没有权，什么也干不成。

我这个人可能思想也不太好，我也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员。我们最近来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都非常奇怪，“你怎么不是党员？”我也没有吭气。也可能是我守旧一点吧！不喜欢冲锋陷阵。

当初我来的时候，我母亲还在，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现在母亲也没有啦，哥哥姐姐们都成家了，你到那里去问人家要房子呢？现在两个娃娃叫我们回去，我们回去了哪有钱买房子？我们很关心这些事情，一看电视播有关的新闻就赶快看。今年开春的时候说商品房积压太多，因此要销假处理，可上海的房价始终不跌下来。我们就在盼望着那一天，但怎么也盼望不上。我爱人说，写封信去问一问，可是我问谁去呢？

我们再艰苦，要比在连队的上海知青好多了，他们一直就在那些地方。刚才带你来的那个人说上海知青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其实也有文化水平比较低的，那个时候不管你是小学的、初中的，只要你想来新疆，一下子就把你赶到这里来了。当时知识青年支边没有讲文化程度。

我开始也是在连队干，干了九年，种了九年的土地。文化大革命以前不是社教吗？社教的时候，我父亲有些说不清的历史。他在40多岁的时候才生下了我，对我父亲的事情我可以说不是很了解，家里边也没有给我说过。社教的时候让我说我父亲的事情，我说不

出来，所以就一直就属于黑不溜秋的那种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按成份好坏分班，我就在黑五类的班里当班长。那就带着他们只有死干苦干，每次的工都要比民兵班的高。他们给我贴大字报，说我能说会道，长得又可以，连长指导员喜欢我，给我的工分高。我说，我不当这个班长行不行。就跟他们吵了一晚上，说什么我也不干了。其实我们确实是拼了老命干出来的，那个时候我的组织能力、鼓动能力很强。我说，咱们的心往一处想，因为咱们都是黑不溜秋的人嘛！咱们齐心协力地把它干好。那个时候搬包谷，把手一挤，从毛细血管里的都可以往外出血，就那样我们都不请假。人家红五类的就我们没有我们这样吃苦。现在想起来，当时吃那样的苦干什么？现在我要回上海，我比我姐姐和嫂子看上去都要老得多了，那不就是当初干的？她们都 60 多岁的人，可我比她们看着老。说实话，我们拾棉花都可以拾到八九十公斤。我背都背不动，摔了一跤，把这个胸椎摔成了骨折，我还有残废证呢。

和人家经历了许多坎坷的人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是对我自己来说，我们这个家庭确实有很多的苦。我们校长说我把红尘看的太破了，可能我自己也确实落后，我看到的社会阴暗面好像总比光明面要多一点。

我总是这么想，我们这些人能够从上海来到新疆，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能够在这个地方艰苦奋斗二三十年，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从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来，刚开始来的时候把

小麦当成韭菜，真的不认识，因为没有见过嘛，我们说这里怎么种那么多韭菜，人家都笑话我们。我们还把甜菜当成菠菜。新疆把洋葱叫皮芽子，人家外面说皮芽子两毛钱一斤，让我们听成了皮鞋两毛钱一双，我们高兴的全部跑出去买皮鞋，结果一看是洋葱。后来我们发展成播种出来收获，天上的星星还没有下去我们就出来上班，天上的星星都挂在空中了我们才下班。那时候我们刚来，人家叫咋干咱们就怎么干，要是换到现在，肯定都回去啦！

那时候，家里不想让我来，没有办法，你要是报了名藏到那里也不行。我们家里人把我藏到了别的县城去，他们还是把我找了回来。当时我才 17 岁。他们给我的姐姐哥哥家里都有压力，说你妹妹如果不回来，你们就不要上班。来新疆的时候，人家帮我搬行李，说你的行李怎么那么重？是不是拿了一个手风琴？其实我带的都是高中的书，家里的意思，就是让我到这边来了以后再继续复习，看能不能再考上大学。一来就是社教和文化大革命，根本就再没有高考。78 年才恢复高考，我们这个学校 75 年毕业了一批高中生，他们在 78 年高考的时候把我带来的书都借光了。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呆了这么多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非常的艰苦，但是也有毛泽东的思想在那里支撑着我，那是一个精神支柱。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思想。你看我们两个的结合，也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他是个贫下中农，像我们这样黑不溜秋的也想尽量找一个靠山，尽管人家说从人的样子上好像不是很般配，但是毕竟人家是贫

下中农，就那样成了一个家。大部分上海人成家以后就后悔了，我首先就是这样。成家以后有很多琐碎的事情不习惯。你看我们上海的家有厕所，有水龙头，做饭有煤气，到了这里来连炉子都不会生。炉子不着，我去吹炉子，眉毛头发烧掉了好几次，烧掉了还会长出来，我也就不管他。那时候就会感到日子过的非常困难，不像现在大米又多，面条也可以买也可以换，那时候什么也没有，靠我自己做面条，我们一家吃这么长的面条。我们年纪越大越后悔，尤其是到了晚年，更没有办法好好的过。随着年龄老了，就会得病，这个地方不管你的，你回家以后给你六十块钱的医疗费，你说现在六十块钱能干什么？像我这样的情况还好，我有一个大姑娘在奎屯，有时候还能伺候伺候我。还有些上海人在这里没有子女，两口子如果有一个有病，或者两个都有了病该怎么办呢？只有靠朋友，不过朋友毕竟是短暂的。越到老，问题越多，一天到晚的问题，你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医疗改革不就是让你自己掏钱吗？

我们今年冬天回去过一次，他们就叫我们不要在这里干了，回去吧。我们想，得为了买房子再艰苦奋斗三年，谁知道一回来人家又不让他干了。那个时候我气愤得不行，就想去告状，让他们来落实问题。男同志毕竟心胸要开阔一点，他就讲，算了吧，咱们又没有钱，告状也告不赢，现在请律师也得花钱，到最后弄的最好的结局是两败俱伤。人可能早晚会有一些报应，就让他们先为所欲为吧！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互相安慰，互相勉励，有钱也过，没钱也

过。

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些事情不是一个单位的事，全国都普遍存在。一夜不能扭转乾坤。说说也没有什么意思。像我们这种年龄只有自找乐趣，不要去自找烦恼。为的是多活几年吧。

天性自在

宝 珠：访问地点是西安皇城酒家的咖啡厅；开始录音的时间是9月3日16时30分；他是一位寺院住持；42岁。

我的朋友，诗人杜爱民和我谈起宝珠师傅。

他说：他的斋饭往往是玉米下的面条，用馒头擦得干干净净，再把馒头吃了，不留任何痕迹。

他说：反叛者的性格，怀疑的态度，在他身上都有，他是不拘泥，是大自在。

他说：遇上宝珠师傅会有好运气的。

他说：我第一次去他的居所，在苍苍茫茫的群山之中，在我眼前有一种东西，那是没有边际的。宝珠的居所叫做大茅棚。

宝珠师傅说：“我们不是墨守陈规的僧！”

甜瓜的美德，在于甜瓜的心是苦的。

要把人间当成一个大寺院，天涯共此寺。

天性自在，不以为然。

没有半径的圆，小到不可见，大到无穷处。

万家灯火，人间冷暖，吃饱穿暖，睡着松管。

谈话即拉家常，从不看相。

大海都知道这样，当人们不可及时，她会化为云雨。

身躯的要求，无所谓善恶，千面刀自身无所谓善恶，善恶在使用者。

无理数在一定界限之内，它便合理，除不尽便有误差。

一个人讲的太细微，便失真。

你所看到的对方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的行为作为举手投足，便是我的经典。

超出这个桌面之外，我不搁茶杯。

一个西瓜不切，你知他是哪一牙？

本来没有墙，何必找个缺口去安门？

人晚上睡着，他就不知道自己是人，是动物？是畜类？这个时候没有分别，那是他本原的东西。在繁华世界看到的带不到蒙昧之间。

我们人类定方位为东南西北，若我们在子夜时分，因地球自身运转而头朝下方，东即是西，南即是北。

假若说是一杯水，我们在区间内看着水是平的，假若是太平洋的水，因为地球是球型，有吸引力向心力离心力支撑，在大区间中水便不是平的，人们往往把区间的事带往广大处。

人不落框架就不是囚犯。

淡水没有国界，各种男女，动物植物都食用他，人卑人能都能使用，他是个共性，而且又不张扬，又被人所不讨厌，又那么平淡，谁又离不开他，喝着相同的淡水，存在在彼此之间，流着相同的血液。

人生春夏秋冬，因为人的爱好，因为动植物的需求不同，穿的服饰薄厚不同，起到一个从饱和到平淡的作用。

如果我面向东方，无尽的东方是我的未来，无尽的西方是我的过去，如果我一百八十度转弯，东方完全变成我的过去，西方又转换成我的未来。

能说服一个人说服一个人，不能说服一个人只能随缘随分。

只有经过才有权利诉说。

因为距离的关系，世界观便有很大误差。不可把自己的视觉错误贻误后人。

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怨：昼夜阴阳；严寒酷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活在有滋有味和不以为然之间。

跪在苦难面前

赵建民：访问地点是西安市文联传达室；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9 月 4 日 10 时；他是一位私营企业的工人；50 岁。

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

他没有过什么奢求。

他的嘴唇有很清晰的轮廓，目光黯然而亲切，说话的声音透着温和。

他是个普通人。

但是他能够记住，并且能够讲述那么多的苦难。

他的故事让我想起了那句话：“我不是对着你下跪，我是跪在人类的苦难前面！”

在农村当知青的那些苦就不说了，我讲讲回城以后办户口的那些难事吧！

回城以后，两个星期过去了，户口报不上，咋办呀？老人说：“报不上也没关系，爸已经托人给你在陕北买了土豆。”没粮嘛，没有户口你就没有固定的供应粮，那个时候是供应制，居民是二十七斤半，按户口本发粮本，才能买粮，没有户口就没有粮吃。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正是吃粮的时候，老父亲也头疼、操心，就通过别人在陕北给我买洋芋。我呢，趁着这个时间，派出所也跑，区下放办也跑，市下放办也跑，比在农村做的难还大。当时我的户口是在莲湖区，区知青办下放安置办公室有个军代表，我把门给他敲开了，我问：“我的问题咋办呢？”他啪的把我的材料扔出去了，“你这个出省了！”我就跟他辩论：“谁谁从北京跑到内蒙古，谁谁从上海到黑龙江，算不算出省？中间隔了好几个省。毛主席他老人家下指示，并没说上山下乡还分这个省那个省，下乡的时候你们没说出

省，回城了你们说出省。你有没有父亲？你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叫权？那就是权，你再说他也不认。最后没办法我把被褥搬到他的办公室门口。后来就有人给我出主意，越级上告。当时西安市的革委会主任是当时二十一军军长的老部下，是个师政委。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城市都是军管，革委会主任、军代表都是军人。孙常青当时坐的车是伏尔加，那是最高档的。我哪里能见到他？进都进不去，我就守株待兔，下着大雪，天天守在门口。结果引起哨兵怀疑了，你这个年轻人成天在这儿转啥呢？我就跟哨兵唠嗑，拉关系，把我的身世，上山下乡的事跟他们说。说得多了他们也就睁个眼、闭个眼。时间长了，他们就跟我说：“首长的车，我给你说是什颜色的，灰色的伏尔加，车号前头是几几几，记住！可别说我说的，我同情你。”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一说这个我记住了，有一天，大院里面开出了一辆伏尔加，看样子象！我就三步并做二步，扑上去了。开车的猛一刹闸，下来两个兵，“找死呀！”这个时候我就头顶着状纸，“冤枉、冤枉！”首长摆摆手，秘书就拿过去看了，看了以后，批了几个字：“请下放办酌情解决！”我千恩万谢，拿着这个到市上办去了。但还是不认。“要区下放办给我们写个证明，介绍信，我们见了底下的批示意见，这才给你盖章，准予你重新入户。因为政策，我们不能直接办理。”说的也有三分道理。但区上也不认，“为啥？既然你到市上闹去了，我这儿就不管了。”这怎么办，后来就想呀想呀，那时候人不像现在人那么话道，

老认为毛主席的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办实事的，为什么该办的你给我不办？钻牛角钻到这种程度。有人家的社会油子，混得多，有经验，什么要二十响，要手榴弹的，什么叫二十响，二十响就是烟，二十根这就是二十响，手榴弹就是酒。当时有一句时髦的口语，所谓“研究研究”，就是烟酒烟酒。你给烟给酒，就给你研究研究，你不给烟不给酒，我就不给你研究。七十年代初，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这个话就流行着的。那个时候的行贿也少，一条烟、一瓶酒、二斤点心就打发了，现在不行，胃口大了。

当时我也没钱，穷学生哪来的钱？在院子里面跟邻居借点钱，还要给老父亲看病。后来狠心买了一条大前门，还算不上高档烟，又买了两瓶西凤酒。不敢公开到人家办公室，“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你少来这一套，你拉拢干部下水！”他会给你扣帽子。但我不知道这个军代表家在哪里住？这咋办？采取个笨办法。下班他骑车子，我在后面跑，跟踪他。一直跑到二府街多少号，他在不在那个地方住，我还吃不准。第二天早上又过去，他从门楼里出来了，这才证实军代表就在这个院里住。他前脚出门，我硬着头皮就进去了，进门就喊：“杨代表，杨代表！”上房出来了一个中年妇女，我说：“我找杨军代表。”“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找他有点事。”“你到他办公室去，他去革委会了。”我说：“阿姨能不能让我进去，我给你说两句话。”“有事你到他那儿去！”我说“阿姨，求求你了！我这儿有天大的困难，求求你让我进去，我只给你

说两句话。”女人家心比较软：“好好好，你进来吧！我还忙，你说完赶快走。”只要进门就好办了，脸一抹也不要了，扑通又跪下了，跪到哪儿就哭，她慌了手脚了：“起来起来，咋回事吗？有话好好说。”然后，我就一把鼻涕一把泪从头说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她被打动了：“看来你这个经历特别坎坷曲折，我很同情你，但是这个事情人家老杨说了算，我也做不了主，回来我给你说说，看看行不行？”我就阿姨长阿姨短的就把这烟、酒、糕点搁到这儿了，她说：“我们不能收你的礼！”我忙说：“阿姨，这算不上拉拢腐蚀，这是晚辈对长辈的一点心意，事情办不成，我也不会再来找你，你放心！”临走时她又说：“你这样，我回来跟老杨说说，三天以后你到那儿再看看去！”我说行。到第三天头上，我就到了军代表办公室，一看办公室有人，他看了看我没言语，我看了看他也没言语，我就退出来了。等一会儿那两个人走了，他说：“你进来。”进门就数落我，“你年龄不大，心眼不少啊，你还会这一套，你走后门走到我家去了，你怎么知道我家在那个地方？”我说：“这是逼的，没办法，你在前面骑车子，我在后面一路小跑跟着。”“你还跟踪？”调侃完了以后，他说：“以后不要这样子，该给你办了就办了，你送东西，不该给你办的还是不给你办。证明带来了没有？”然后把抽屉开开，拿个大红印章往证明上一盖，签了字：“同意重新入户，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

拿着证明，到市下放办去办，人家还是不认。你不知道为了户

口，办的有多难？他们说：“你先放在这儿，现在这个问题牵扯面太广。”刚好当年有个知青叫个李庆林，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几个字：“暂寄上二百元钱暂补无米之炊，此类事甚多，当以统筹解决。”对方就抓住毛主席这个话，“此类事甚多，统筹解决，我们不能给你一个人办，先放到这儿，统一办理。”我一想这统一办理就麻烦了，一年两年，什么时候统一？我的父亲奄奄一息，马上就没命了，我连吃粮的钱都没有。

最后我把证明拿回来，想来想去，决定找我的恩师。现在回过头来想，人多行善多积德，还是有好处的。我的恩师没退休以前在省委宣传部，当年因为手里面有几本《燕山夜话》之类的书，也成了牛鬼蛇神。他被打的牙都掉了，我想着老师总是自己的老师，不能这样粗暴对待，就和红卫兵辩论了几句。结果呢，人家说我立场不鉴定，保皇派，拿着皮带也把我抡了一顿，关到牛棚陪老师。因为我是贫下中农出身，最后放出来了。看着老师太可怜，隔三差五的给老师一盒烟，拿上几个糖豆、瓜子呀，拿上一把茶叶呀，接济他。人在难处的时候，一丁点儿的恩惠、温暖都会特别的感人，他都记在心里。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找他去了。老师说：“我和我哥关系不好，但是为了你这个事，我去求我哥。”他哥当时是红庙坡革委会主任，和下放办主任是莫逆之交，拜把子兄弟。下着大雪，老师去找他哥，他哥不愿意，他兄弟俩就吵开了。我一看没辙了，故伎重演，给他哥扑通跪到那儿磕头，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他

哥一看磕头了，没办法，拉着我：“起来起来，我去给你试一试！”

“我们三个人当时就骑着车子，到了市下放办办公室，进门的时候他说：“你什么东西都别拿，把你的证明手续给我，如果办成了我出来给你，你也别谢我，条件就是这个事情捂在盖子里面，任何人不要知道，我平生就管你这一件违背政策的事，我给你走后门了。其他人再问，你的户口怎么报的？你自己随便说，别咬我，办不成，你也别骂我。”他进去以后，我这心里边就忐忑不安，默念祈祷，哎呀！老天保佑！千万千万要成功！求你了观音菩萨！求你了玉皇大帝！毛主席你老人家发发慈悲吧！

他哥一会儿就出来了，老远就说：“办成了，办成了！”我三步并做两步，抓住他的手：“谢谢你，谢谢你！”恨不得又想给人家下跪，那时真是千恩万谢。我又对老师说：“老师，以后我再谢你，我现在得赶快到派出所去！”这市上也批了，区上也批了，拿着手续，到了当地的派出所，人家一看，说：“放到这儿！”我心里咯噔一声，怎么回事？“一个星期以后再来，我们内部还要研究研究。”我这回就明白了，内部研究研究是啥意思了。出来以后，我口袋还有点钱，买了一条烟，那时候才三毛钱一包，在当时来说算是高档烟了，买了两瓶酒，买了一大包葵花籽、糖，然后用那个兜一兜，进去就找管户籍的干警：“我给你说个话。”“啥话吗？在这儿说。”我拍拍包，他就明白了，进去把门一关，跟做贼一样看看，“有啥事？快说。”“这是一点心意！”我把抽屉拉开，烟往这儿一放，酒

往里面一塞，他半推半就的，“三天以后你来。”就改了口气了。三天后去了，他问“户口本带来没？”这时候我心里面一块石头落地了。把户口本拿出来，章子往上一盖，圆章子，方章子，“准予重新入户。”报上户口，回去就让老父亲看，人也是乐极生悲，当天晚上老人就不在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晚上八点左右，爷俩还在说心里话呢，老人说：“你户口报上了，你工作问题咋办呀？现在人家统一安排，你这是自己回来的，不行，我跟我单位领导说一说，我退休你接我的班算了。”老爷子说他想洗脚，我给老爷子把脚一洗，他说：“头有点晕，让我躺会儿。”就躺到床上了，躺在床上我看他不动了，打呼噜，光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我一想，麻烦了！叫声爸、爸，他翻翻眼看看我，不吭气。我就骑个车子飞速赶到他们工厂，厂值班领导派了吉普车带了两个大夫到家里来。那个大夫水平很差，来了以后拿听诊器一听，眼皮一翻，把血压一量，说：“不要动，这叫血管痉挛，不敢动，一动血管就要破裂。”实际上当时往医院里去，说不定还死不了，顶多就是瘫痪。这一下就耽搁了，过了两个小时，我看我父亲动了两下，不对劲！我以为他要解手，把床拉开一看，尿了一床。我说：“刘大夫，你看我爸尿了。”他的脸刷一下变了，把眼皮一翻一看，一号脉，马上就问，你们院里面有没有床板？谁家有三轮车？那个时候三轮车奇缺，架子车多，我到隔壁借了一个架子车，两个人把床板抬下来，拉到人民医院。那个时候的大夫不像现在的大夫。现在大夫也可恶，可恶到什么地

方不说你也知道，有钱了他把你当爷敬，什么条件都给你优先，没钱了，正输着的氧气都给你拔了，拿钱来！过去那时候，医生可恶到什么地方，那就是你有钱有势的人来了，有身份的人来了，首长来了，兢兢业业，老百姓来了以后大大咧咧，挂号去！我说：“你先救人，号我去挂！”“不挂号这儿不给看病！”然后敲玻璃窗户，敲了半天，那里面打着牌呢！还说：“等着！我穿衣服。”三耽误两耽误二十分钟过去了，号挂完了，找到值班大夫过来一看，赶快人工抢救，那时候就是人工呼吸、按摩，手按着、锤着，然后嘴对嘴，折腾了一整，最后摇摇头。老人不到半个时候就去世了。第二天厂革委会主任和劳资科的干部来了，提了条件，“你父亲是劳模，不管是大劳模、小劳模，还是个共产党员，要是火葬，咱把你安排到你父亲的生产厂接他的班，要是土葬，那就是二百多块钱丧葬费一算，啥都不管了。”我和我母亲一商量，顾活人不顾死人吧，听从组织安排，那个工作还要，然后就签了个字，把老爷子火化了。

安排到他那个单位，搞什么呢？拉土方、烧茶炉、拉煤渣，干了一年多，又分配到车间，锻工我干过、车工、刨工、钳工、磨床、镗床干遍了。一块来的好几个人都转正了，就是给我不转正，咱傻乎乎地在那儿干。

烧茶炉的时候，负责人找我谈话，说：“这里有个老头姓高，是个历史反革命，你要和他划清界限，现在把你和他分到一块，你的任务就是监督他，他有什么反常的举动，要随时向组织报告。”

我特别反感，你们既然要我和他划清界限，就不要把和我历史反革命分到一起，我成了什么？我才从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来，又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当时就提出不同的意见，人家说：“就这个活，你干不干？”没办法，只好干。

尽管我口口声声高伯伯的叫他，人家不答理我。有时候我帮他主动推煤渣，他把锹一夺，瞪我一眼。有一天，突然老头没来，我一听老头有病了，通过其他人口中问到家属院，就去拜访老头。那个房子这么大一点，破木板房，又潮又暗又黑。一进去，听见耗子吱吱的咬，墙角的蜘蛛网挂着，老头活像个要饭的乞丐。一床烂褥子，烂被子，旁边搁了半截烂碗，苍蝇在上面飞着，他躺在床上啊啊的哼。我过去一摸，他的头滚烫。我说：“高伯伯，你吃饭了没有？”他摇摇头，我说：“给你买点吃的吧！”又摇摇头，后来我跑到一家馄饨馆，二两粮票一毛八买了一碗鸡丝馄饨，小笼包，给老头端了去。喂老头，老头不吃，说什么也不吃。老头就这个倔脾气。我一看床底下放了一大堆脏衣服，就把那些衣服和脸盆端走了。他家门口有一个居民用的水管子，我就蹲到那儿给他洗衣服，洗的干干净净的，那个水都成了混泥汤。洗了一个多小时，洗完了，给它晾到院子里面。拐回去一看，馄饨也没了，包子也没了。走的时候我拉着他的手：“高伯伯，你的衣服我给你洗完了，在院子里面搭着呢，下午我过来给你收衣服。”老头拉拉我的手，眼泪哗的下来了，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两天以后，老头上班了，比我去的还早，

我去的时候，我的火已经生着了。每天我的任务是去先生火，今天他给我生着了，把茶叶也给我泡好了，放在那儿，脸色也有点缓和了，但还是不说话。过了两天，我又给他买了旱烟叶子，送到家里面。第二天，我看见老头把那个烟叶提来了，我心里面一咯登，我说这个老家伙不领情，他来了看着我，笑笑也没有言语，然后他把那烟叶搓搓，用烟袋锅装上，递给我，让我抽上两口。我没抽过旱烟，一吸马上流开眼泪了，老头哈哈笑了。

终于有一天，一年以后了，老头突然穿了一身新衣衫，他说：“小伙子，能不能陪我坐一坐？”我说：“可以。”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他也不说到什么地方，就捡了一个小酒馆坐下。过去那个酒和现在不一样，你看看电视上那瓷瓶，就这么高，中间细薄，上面是个喇叭口，那一个酒凳就是二两半酒。给你两个小酒盅，一碟花生米、一碟豆腐干，就这么简单，五毛钱，便宜。老头吃着，给我说着，“你光知道人们说我是历史犯，我有天大的冤枉。”说着他就哭开了，他是山东人，旧社会闯关东，到东北遇见了胡子，在那干啥？给人做饭。后来他跑了，搞了个拨浪鼓挑子，走村串巷的买个针针脑脑。结果有一天遇到土匪劫路，老头是山东人，多少会点功夫，土匪劫他，真枪假枪不知道，过后把人打倒了，再一看人没气儿了。结果文化大革命不知道谁咬他，说老头打死的人是八路军的人，是地下交通员。那人跟他有仇，整他的黑材料，老头不承认，死都不承认。最后他们把老头打断了一条腿，交原单位劳动改

造。

他说：“我要走了，感觉你这个小伙子确实不错，我活了这么大一把年龄，没有人对我这么好，我很想念你，走了以后也没有啥纪念品给你，我坐了个小板凳留给你。你烧火的时候，坐着就能想起来我这个孤老头。吃完喝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别一块走！”

第五章 北方往事

路线：

北京——南岔——大庆——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铁岭——沈阳——北京——银川——包头——呼和浩特——东胜——达拉特旗——府谷——保德——河曲——太原——郑州——安阳——北京

破碎的湖泊

半枚月亮

并排套在你的食指

依然是无法言喻的忧伤

依然是用心

也不能够触摸到的方向

北方呀 北方

——杜爱民《祝福北方》

在北方，长满了红松和樟子松的没有边际的林区，有一个不起

眼的小站，故事开始的时候，火车还跑得很慢，这里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

一位姓程的猎人和他的媳妇，那时他们还都年轻，猎人的身子骨非常结实，是个厚道人。他媳妇也是个好心肠，手脚勤快，能过苦日子。他们生了九个孩子，个个都不是不成样的。

得着空闲的时候，猎人总要扛着上好了火药的枪，到山上去寻找熊和孢子的足迹。他分得清黑熊和马砣子有什么不一样，野猪和鹿在什么时候下崽儿，他也知道，一下雪，山上什么地方最危险-----在那些个饿死人的年代，他没有让任何一个孩子饿过肚子。

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今天，这里的冬天远没有那时寒冷，一棵棵树木像一个个衰老的老人那样倒下来，成群的野兽已不知去向。老猎人和他的老伴儿还住在他们木篱笆围起来的小屋里，孩子们早已个个长大成人，连孙子都快娶媳妇儿了。

老猎人仍旧清楚地记得那些往事的细节，在我坐在他面前听他娓娓道来的那个下午，我感觉像是在阅读一部非凡的历史。那历史中的追逐、窥视、搏斗、危机、闪转腾挪-----一点一点展现在眼前。

钟声敲响，山风落下。

北方就是发生过故事的地方，在大雪掩盖了踪迹的林间，在草原的帐篷里，在某一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小镇，你随时都可以发现遥远的年代留存的痕迹。

在银川，七十八岁高龄的老军人韩春安记得去给自己的部队送情报的夜晚，他发现那个村落早已被敌人占领-----

呼和浩特，六十岁的作家何乃强记得在一个小县城里嫁给当地人的知青，她央求他：“你帮我说说话-----”

哈尔滨，三十岁的动物保护者赵会宇记得少年时代的一个瞬间：“那时侯我们的教室里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好看极了。”

郑州，二十多岁的商人陈海涛记得自己贩卖假烟的最后一幕：“那一次，我没命地跑---”

九月末的大庆，工厂区路边的树叶已经泛出纯正的金黄色，让我想起电影中遥远的俄罗斯。这座城市的剧作家杨利民说，这是一个达斡尔人、蒙古人和苦役流亡犯居住的地域，最早有个蒙古名字，意思是月亮升起的地方。

当月亮升起，人们点燃篝火的那一夜，人们驻扎下来的那一夜，发生过什么样的往事呢？

北方，当我接近他时，也接近了他那些雪地里的结实的木屋，他的暖和的炉火，他的粗糙的爱喝酒的男人，能向你抖落一大堆关于寒冷的故事。北方，当我接近他时，我想起了我的好友，诗人杜爱民的诗句：

北方呀 北方

无际的北方

我从小梦想

就是在梦中祝福你

走近你的各民族兄弟

互致安康

我被一种莫可名状的力量牵引着，沿着走西口的人们跋涉过的老路，沿着垦荒的行旅们漂泊过的老路，沿着枕着月亮做梦的人们踩出脚印的老路，捕捉着一点点来自久远的过去的讯息。在我追寻往事的旅途中，我知道北方是我唯一的出路。

第五章 北方往事

山风落下

程树林：访问地点是黑龙江伊春南岔林区；开始录音的时间是9月25日13时；他是一位老工人、老猎户；76岁。

在去南岔的火车上，我对面的住在带岭的女孩对我说，伊春恐怕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城市，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都要坐火车去，

在火车上看窗外的林区，层林尽染，红花开遍，到处都有带着烟囱的木板房和篱笆，火车经过一个个不知名的小站。

我和程大爷聊了一个下午，我听到的是一篇非凡的故事，如果要把它全部写下来，一本书都写不完。青年时代被胡子（土匪）绑架的经历可以写上一段；在日本人手下当博役（杂务）和日本人干仗（打架）的历史可以写上一段；他和妻子在光复时期的结识也可

以写上一段，那时候，老伴儿还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家，在逃难的途中迫于无奈嫁给了程树林。老太太说，这件事孩子们都不知道，然后他们生下了九个孩子，个个都不是不成样的。在困难时期，程树林没有让孩子们饿着，那年冬天，他上山打围，打了十三只熊瞎子。

九月末的南岔已经有了些凉意，墙上的挂钟在滴滴答答的响，老人讲到他背着新买的猎枪上了山冈，我感到山风袭来，悄悄落到头顶。

我就说说打黑瞎子的事，那危险事可多了。

那时候有一个地质队，他们在找什么矿，经常在石砬子底下的空当过去。他们问我：“你打不打黑瞎子？”我说：“打。”他们说：“我们老看见一只黑瞎子在那边。”拿着我三姐夫的枪，他买了一个单筒子，那个枪有劲，比双筒子准，一般一百五十米之内的东西跑不了。我是背着那只枪去的，那枪筒子长，再加上一个把子就这么老长。我冬天穿了一只小棉袄，鼓鼓囊囊的，把枪就大背着，单背着它不得劲儿。爬山的时候有树好挡，这样大背着你就挡了，它也掉不下来。那一阵子，黑瞎子我也打过很多次了。这一次就大意了。我到了他们告诉我的地方，枪还是大背着。那个地方往上是个大石头砬子，往下挺陡，是在半山腰上，就是那么个地形。我往那疙瘩一瞅，我说，这地方没有黑瞎子啊？黑瞎子在冬眠的时候，总要扒树叶子，扒土，扒一个包，石板上还铺上一些草。我说，这个

地方能住黑瞎子吗？我正叨咕着，枪我也没有摘，趴在石板上往洞里看。这么一看，一哈腰，跟着听见“哼”的一声，哎呀！我说，真有！忙得就站起来往后退一步，就往下摘枪。人一着急，枪摘不下来了。它的脑袋已经从洞门里出来了。我一看，不好！我离它也就是一步远，只是因为洞口小，它往外蹿不好蹿。我那个时候也灵巧，两手一按，一用劲，就蹦到石砬板顶上了，那也就是能站一个人的地方。我又摘枪，这工夫它已经从洞里边儿出来了。我摘枪又没摘下来，它两个爪子把石砬板子一打，就想往上蹿，脑瓜子已经快杵到我的身上。我就紧靠着后面的墙，也就离他一米多。你说马虎到啥程度了？那个枪得掰起来才能打，我这么一拽，这不就顺着枪把子顶上它脑袋了，那个时候也说不出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用大拇手指头把枪机子往这边一拱，枪机子就校起来，再把大拇指头伸到扳机里，枪准子就薅到它脑袋上了，也就是一尺远吧！那还能打不准？我一抠扳机，当的一声，它一缩脖子掉下去了。那回弄得挺危险，山上地质队这伙人，黑瞎子一出来他们就喊。您喊不喊，黑瞎子它不怕。他们就说：“怎么这么危险呢？你怎么能这么干？”我净是啥呢？（我干什么呢？）当时遇着事儿吧，我不害怕，始终都不害怕。啥时候害怕呢？把它打死了，我想，这是怎么弄得，这么危险的？

从那以后接受教训了，他们也问，你打围儿怎么这么大意呢？怎么这么干？我说，我就这么干。还撑着说呢！完了事后他妈的是

挺害怕。

还有一回打黑瞎子动枪把子了，枪不响，那更危险，比这回还危险。我们那个三小子没事也常背枪去，有时候也打个狍子、野猪。正赶上那个秋天，老迟在山岗上下了套子，一下子套住个黑瞎子。我们三小子跟他俩人去溜套去，一看套住个黑瞎子，三小子那天还没拿枪，空手去的。溜套子的时候老迟带了个小斧子，小斧子磨得挺快，他要用斧子去砍，我们三小子不让他砍，说：“你别去，它没老实，楞扑棱，一下子把你按倒了，那怎么整？”就没让他去。那黑瞎子就在那里扑棱扑棱，扑棱了不大一会儿，把套挣折了，跑了。他就埋怨我们这个老三：“我要砍，你就不让我砍。”我去了他也跟我说：“白白地把黑瞎子跑了。”我说：“你要愿意砍，那好办，等我那天上山走的时候，你跟我去。”

赶一入秋，下雪了，那天下的挺大的雪。我说：“你不是要砍黑瞎子吗？我领你去，咱们上山走吧！”那回去，我们二小子和我，还有他，三个人。二小子也拿了一支枪，那时候的枪都换了，我换了一个32号的，原来那个枪筒子粗，费药，打起来没劲，32号是老式的连珠枪改造的。我的几个小子都好上山。我跟老迟说：“我给你找黑瞎子，指定能给你找着。”到了山上，有不大一会儿，雪已经下的溜膝盖了。我看见半山腰上有一块这么宽能过去人的地界，能过去人的地方有可能冒出来黑瞎子。我就进去了，搁那往里头走，走得还挺得劲儿，一拐弯，角上的石砬子有一条缝，我走到

那个地方往下一瞧，有一尺多高，这么大的窟窿。那些石头不知道是让黑瞎子啃了，还是让它给掰下去了。黑瞎子这个东西身子软，骨头像脆骨似的，只要有个缝，就算是扁的，它硬挤也能挤过去，只要脑袋过去，它身子也就能跟着过去。我一看那么大的地方，觉着它身子指定能进去。我说，这里备不住有，趴着窟窿往里一瞅，嗨！真有一个！黑瞎子两个爪子搭着正往外瞅呢！我想照脑袋上给它一枪，临了想起来，老迟不是要砍吗？我就退回去了，没打。我到了岗上就喊他们，二小子就过来了，他离得近，我说：“快去喊迟大爷，他不是要砍黑瞎子吗？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砍，就像猪圈在猪圈里一样，它也出不来，就那么一个窟窿。”把它迟大爷招呼来了，我说：“你来砍吧！看样子不超过三百多斤。”我对我们二小子说：“你到石砬子旁边找一棵桦树，上到桦树的顶上去，正对着那个洞口。不行的话就补一枪。”这个时候老迟是什么思想呢？他信不着我，寻思我糊弄他。一看我的脚印儿都紧挨着窟窿口了，那里能有黑瞎子吗？要是有黑瞎子那不早就蹿出来了？他不信，就往前走，拿着小斧子，还觉着胆儿挺大的，刚走到还有能一米远到黑瞎子的洞那儿，黑瞎子听见又有人走过来了。刚才光听见有人在外面吵吵，半拉儿它也不吱声。老迟刚走到那个角上，里边“轰”的一声，黑瞎子叫唤的就像儿马提架的那个动静，吓的他就回来了。我说：“你这个胆儿也太小了，你不是要砍吗？这在圈里圈着呢，你都不砍，你把斧子给我，我给你砍砍看看，我不使枪，你看看能

不能砍。”他不干。我将了他一军，我说：“你是不是害怕了？”他说：“我不害怕，我要砍。”我说：“你要砍就上去砍，要不这么着，来个更有把握的，关门打狗，你找个这么粗的木头桩子给那儿一叉，它出不来，它伸脑袋你砍脑袋，它伸爪子你砍爪子，这多有把握。”我一瞅旁边，有一颗死的松树倒在那里，我说：“你把它砍下来，拿根往那一叉。”他“哐哐”的砍了一个梢儿，不粗一点儿。我说：“你是闹着玩儿呢，那挡个屁，我看你怎么整？”实际上我站在哪儿呢，就是黑瞎子走的那个道儿，离老迟也就是两米多远。石砬子山有三四丈高，把谁掉底下也拽死了。这块儿有山上长的那种达子香，那是一种药材，春天才开花，我这只脚踩在黑瞎子过的道上，那只脚踩在石砬子根上，我把他让过去，站在这一块儿等他，他要出事儿我就直接能上去。他把那个树根扔到那儿，黑瞎子就搁里头站起来，往这边儿走。我说：“你赶快用棍子把它捅倒了，你不捅倒，它一会儿出来枪都不好打。”他又砍了一个长棍子，拿着一捅，结果把它扔的松树头也捅倒了。黑瞎子就搁里头出来了。它脑袋出来的时候，我给石砬子挡着，看不见啊，它往外拱，搁里头蹬巴半天才出来。我说：“这你要砍他妈的多少下子也把它砍死了。”他不敢去，我见黑瞎子的脖子都露出来了，照着它的脑袋吧嗒就是一下子，枪没响。那枪来回背着，不知道谁把撞针给我调了，打不响。我忙把栓子拽出来对上去，又来了一枪，又没响。我二小子看见我打枪了，我告诉过他，我不打枪你别打。他没打过黑瞎子，打黑瞎

子有一定的地方，你打在别的地方白费。二小子他们经常把枪背出去，回来不炕，子弹不炕反潮，他就打了一枪，子弹刺溜一下子没响，刺溜到黑瞎子底下了，那连个皮儿都打不进去啊！这黑瞎子就上来了，我说：“老迟，你倒是砍呐！”他也不砍，我这个枪怎么打也不响，现换子弹，不赶趟了，黑瞎子往上扑腾。他拿个小斧子不砍，他拨楞，我说：“你能拨楞死了？它不是蚂蚁啊？你赶快把斧子给我，我的枪不好使，打不响。”叫斧子他还不给我，我一看他退过我了，不赶趟了，黑瞎子上来了，我把他让过去，那只脚往上迈了一步，这只脚还没离开达子香那儿，就那么个空地。我怕把枪对差劲儿，忙把枪机锁上，不锁就怕走火把人打了。我迈了一步，枪把子一倒，照准它的鼻梁喀哧就是一嘴。这一枪托打在鼻子上，它扑腾就站住了，就不往上上了。这时候，要是二小子有经验，你那枪刺溜完了以后，你赶快换子弹，再给它一枪啊！他也吓的噎到那儿，愣住了，也不换子弹，看我在那儿拿枪把子对，他从树上下来也要去对。那不是蚂蚁，一下子就能对死？我对了一下不成，怎么办？我晃它，我的脚又回原窝，把脚倒了一下子，我只要一闪身它指定往下扑，如果给它搁到石砬子底下去，那不就安全了吗？我就往那边一探身，那只脚往那一蹬，它忽地一下就过来了，它一扑没抓着我，我就又回到原位了。给它整到二丈多高的石砬子底下去了。这下我就有时间了，忙掏出探子把子弹捅出来，我枪没打响的时候，抓了好几回抓不出子弹来，现在忙把它捅出来又对上子弹。

黑瞎子掉下去以后，又拱起来，就往下跑，我顺着枪比划准，这下枪响了，它跑出去足有一百五十米左右，子弹搁它后屁股下边一点儿打进去，在它肚子里的蹿一趟顶到前边去了。那枪有劲，削个跟头，它又爬起来晃晃荡荡的走了，黑瞎子那玩意儿皮实，你打不到它的肺子，打不到它的心脏，他不死。我们搁那儿下去到底下，老迟说什么：“咱们往下跟一跟吧！”我说：“你可上一边呆着去吧！拉倒吧！今天整的够可以了，不打啦！回去！”

后来去找那个黑瞎子没找着，找着了一个比那个还大的，能有四百多斤。那个黑瞎子什么时间才找着？过了年以后，我的外甥放假了来，我们才发现了它，在那个山坡上它搁那儿搂了一些树叶子，在窝里爬着，最后血出干了，死了。临死的时候它是从窝里出来，仰八磕骨碌到下边来死的。我外甥跟我上山走到那边遇上了，他说，那边是个猪还是个黑瞎子？一瞅，是个黑瞎子，死的，再一瞅就是他！

除了老虎，我其他的東西都打过。开始也打过鹿，后来不让打我就不打了，凡是禁猎的东西我都不打。狩猎也就是个爱好，出去打猎一个是锻炼身体，节假日没地方去了也就算是娱乐，有点兴趣。实际上在生活上，打猎确实也对我家帮助很大，我这么一帮孩子，加上我父母，人口最多的时候有十二口人，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那时候工资还低，你想，我上班的那时候也就是挣个四五十块钱，养活这么大一帮人。六几年的时候，正是和苏联绝交的时候，国家

为了还债，咱们的猪肉都给出口。在供应上来说，一家一个月也就是半斤肉，打猎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一个是打着黑瞎子，肉咱们自己就吃了，黑瞎子胆值钱，咱不卖私人，直接卖给国家，这样的话咱又犯不错误。那时候黑瞎子胆也贱，四十块钱一两，私人要买，那都上百。大的黑瞎子，一般的胆大部分都能定两（算成一两）。后来他们动员来买黑瞎子掌，才给你六毛钱一斤，我说谁愿意吃谁自己打去呗！山上有的是。黑瞎子肉也就是脂肪大一点，很好吃，但那么好吃，我们家那口子她一口不动，黑瞎子掌炖出来她一口不吃，这帮孩子都吃，那玩意养分大啊。

在那之前，我打黑瞎子一个冬天打了十三个是最多的，那是六一年困难时期的事。大家都困难，打回来了以后同事们都吃，骨肉最香，改善改善生活呗。要说困难，我这一帮孩子还真没什么困难，不够吃怎么办？油炸，过一点面子咱们再炸着吃。油最多的时候，黑瞎子油和野猪油成缸装，亲戚朋友谁要是拿了就拿去整点。

那些年究竟我打了多少个黑瞎子，多少个野猪，那也没数了。

（最后是程大爷老伴儿的话）

那几年呀，他打回来这玩意我都犯愁，我得扒啊。

人家找对象都愿意找我们程家的人，人家说，因为程家有肉吃。我们都分给大家吃，不就是多出点力吗？

关于钱

郝建国：访问地点是大庆某发廊；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9 月 27 日 19 时；他自称是一位“社会人”；42 岁。

吃罢晚饭，他们说耍唠嗑，“咱们边按摩边唠嗑吧！”

我把录音机打开，发廊的小姐问这是干什么？他们说：“他是写小说的！”他们和这些小姐很熟悉，一个长的憨憨的女孩说：“我不爱看小说，我爱看童话。安徒生的童话，特别美！”郝建国的朋友王继平说：“你那个离现实太远了。那不是‘春天的故事’吗？”

王继平有时会拿起录音机听一下回放，他笑：“怎么跟说评书一样！”

郝建国说：“你就写我的真名，我不反党不反人民，你就用我的真名字。”

我要说句话，你说反党，我不反党，你说反人民，我不反人民，可贪赃枉法的人，大多都是共产党员，还都是科级、处级、局级干部以上的。老百姓肯定不能折进去，为什么？像我吧，我签字儿也不好使，我说话也不好使，我更接触不到国家的钱、东西和物，我犯不了法。我要想犯法，只能去偷，咱们知道是犯法，就不能去做了。所以有些有钱有势的人，今天有同志给你买点吃的，明天给你买套西装，这个那个，一点一点就觉得不够了。我坐公家的车多没意思，自己有车不更好吗？分的这房子七十多平方米的多没意思，自己买套房子一百七十平米多漂亮。可是钱呢？你挣的那点工资远

远不可能抵御那些想法。你的欲望太高了，钱从哪来？那就想办法。出去抢？不许。别人送行吗？

送的钱，十年二十年也够用，越来口子越大了，整套房子里也能拿到。我要送你一套房子，我不可能没有想法。送给你东西，就要用你的权利达到某种目的。前一段时间，湛江走私不就是吗？海关关长和公安局扎到一块儿了，中央台都曝了光，官官相护，为了啥？还不是为了钱吗？

悟出点儿道理来没有？好事能轮得到咱们？轮不到。

我们的好年头都给耽误了，还能干啥？只能对你们这些写小说的人侃侃大山了。说心里话，我对社会上的事情比他们看的还要透，别看他们有位置，他们只要在他的位置上就犯糊涂。兴许我到那个位置上，可能早就没有我的今天了，对，我可能更狠。要是我当大庆市市长，就像前市长那样，也能毙三个来回了。我能活到今天，因为我没权没势，签字不好使。我说，我签字少付二十块钱到你这儿来按摩，你一定不搭理我，这件事你都不干，还说别的事情？没机会，犯法都没机会。

警察也好，官员也好，都讲究打擦边球，似犯非犯的时候，这个事情是最好做的。挣了钱，也是花的最得劲儿的，像我这种角色，犯罪的事情我都轮不上，吃喝，拿公款去玩儿没我的事儿。

你寻思寻思，你不是写小说吗？你琢磨琢磨，现在大案要案经济案件一发现，个个都是高级领导干部，平民百姓就没有。所以老

百姓想法就多啦，单位起哄的也多啦，工作不好好干的也多啦，下岗的想法就更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你们吃老本能吃到死，我们呢？

现在，咱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你懂法也好，不懂法也好，觉得没有道理的事情，你不去做就好办。钱来路不明的，咱们不去花，饭来路不明的，咱们不去吃，这是最粗浅的道理。这个东西不该我去拿，我去看，我去碰，我去得，不付出劳动辛苦，不该得到的钱怎么去花，我不舒服。

共产党的政策是相当不错，每届人代会、党代会制定的政策都相当不错，一到底下就歪了。

我们这个地方不行，下岗了你干什么去？比方说这个地方有二十九万人，下个三分之一，也得九万到十万，一下子干什么去？都去搞按摩，谁去按呐？都去卖茶水，谁去喝呢？都去卖服装，谁去穿？他跟开放的城市不一样，沿海城市卖杯茶水都挣钱，天安门广场矿泉水瓶子放点水就是两块五毛钱。

这个城市要是不赚钱，这城市就完蛋了。我还是说这个话，我既不反党也不反人民，中国要想赶上世界水平，得五十年以后，两代人都没了。

现在大家都处在挺难的阶段，我不知道你走了这么久，能感觉到什么？像我儿子这样，上完初中就不愿意读了。你说他们是中国未来，他们不但不是中国的未来，他们还是中国未来的包袱。死

整不死，活活不起。

谁说喜欢看童话来着？离现实太遥远啦！

获得幸福

龙 飞：访问地点是长春某茶社；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10 月 2 日 17 时 30 分；他是一位电脑商；35 岁。

我能够从他的普通话中听出他的西北口音，那种坦率和漫不经心的语调和语式我是再熟悉不过了。我相信西北的岁月使他受益非浅，冒险和执着保证了他的爱情。

这样的事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在匆匆一面之后对那个女孩说：“我要到你那儿去吃早饭！”这样的事情同样也很少有人做到：在吃过那顿温馨的早饭后，他把那个做早饭的人惦记了四年。

他做到了，于是获得幸福。

没有配合的相遇是逊色的，没有波折的成功自然也缺乏意趣。如果他们不是在同一个车站下车；如果象他猜测的那样，她留下的是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号码；如果没有那天早上透过车窗的阳光，恰巧就洒落在她的身上；如果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们没有坚持——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爱情故事。

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浪漫的地方。那是 92 年的事情，应该是 3 月 9 号，头一天是三八节，礼拜一。这可是纪念日！我们每年的 3 月 9 号都当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来过。当然，结婚纪念日也要过，我记这个日子比结婚日记的要准确。3 月 9 号，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生日的那种感觉。我结婚是到了 95 年。这件事中间不是有很多波折吗？一共经历了 4 年的时间。

我觉得不管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他都需要一些朋友。我接触的女孩不多，有些同性朋友会给你一些关怀，可这种关怀跟从异性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那次到长春来是跑市场，第二天我就要回北京，要去买张机票。那时候吃完了中午饭，也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出来了。那天刮得风很大，我住在南湖的 20 栋，后来才知道她住在南湖的 27 栋，实际上就隔了三四栋楼房。

我坐的是那种联运的班车，平常那里有小巴，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小巴了。我在那里等车，我习惯坐小巴的，那种车比较快。因为没有小巴，而且风比较大，我就上了通道车。我是从后面上的车，车头冲着北方，尾冲着南方，后面有一个大玻璃，阳光从那儿照射进来。那种车的座位很少，他们把座位都扒了，为了拉人拉的多。车上，很多人都站在那里。这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女孩儿，其实她是先上的车。因为阳光从南边照射进来，有了一种反光的效果，我在恍惚中看了她一眼，她穿着红颜色的礼服，短短的头发，感觉

有点像农村孩子的那种头发。我当时觉得她非常朴实，长得比较白净，五官也比较端正，不一定很好看，但是端正。我开始没什么感觉，逆光的时候你看不清楚人脸，但是轮廓能看得清楚。那个时候你又不能拉着人家看。上车以后我扫了一眼就往前走，坐在售票员的前面。我就问售票员：“我要去买飞机票，怎么走？”售票员说：“你要到南关去买票，在文化活动中心站下车。”

男人看漂亮女人是一种习惯，她站在那里，像我这样的在外面很长时间的单身汉，自然要多看她两眼。但我还是看不清楚。实际上我当时怎么想呢？因为我总来东北，也想在这里找一个比较好的女朋友，或者可以互相认识聊聊天。我不希望找的女朋友太社会化，希望她更单纯一些，生意场上有交往的女孩儿也挺多，但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刺激。我觉得这个女孩儿挺好，虽然看不清楚，但是感觉很好。当时我心情很慌乱，因为没有干过这种事，和不认识的女孩儿搭腔说两句话，这事儿我没干过。

位置，我从中门下车和从后门下车距离是一样远。我就想，我从后门下车，我会跟她说一句话：“小姐，我在这里下车，您能不能跟我下车？我跟你讲几句话。”这个方案马上就否定了。后来我又想，这个女孩如果在那一站下车，我就跟她说话。可能就是天意，下车的时候，我往后走，她站在我前面。这个时候我仍然看不清楚她，她是一个背影，我又不能凑过去看。我扫她一眼，她穿了一身红呢子半大衣，穿了一条黑裤子，一双旅游鞋，她的头发没有烫过

染过，还有些白头发。车在走的时候我总是回头看，还是看不清楚。但是我当时已经在想，怎么能够认识她？我还怕人家以为我是流氓。后来她说她也有所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心灵感应，她说她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下车会和我说话！”我当时的心很慌，我是在中门和后门中间。

我们下了车，我就想，说什么呢？干脆我问路吧！我问她去哪儿买机票，她跟售票员说的方式一样。我们下车以后就很自然地往南走，买机票的地方离车站可能有五十米，过了路口就是。我接着就问她是做什么事情的，她说她在上学，我说我以为你工作了呢，她说我没有上班儿，我在上学。我就问她上什么学呢，她说上自学考试。这样很简单的几句话就到了马路边上。过了马路以后，我问她是不是应该这么走，她说对，往东走就到了。这不是就要分手了吗，我就一定要跟她说几句话。我说：“小姐您贵姓，叫什么名字？”她好像说：“没有必要告诉你。”我说：“我也觉得没什么必要，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认识，你不要把我想的太好，也不要把我想得太坏，我不是一个坏人，我没有恶意，只不过想和你认识认识，聊聊天，我是到长春出差来的。没有别的意思。也许您晚上能出来坐坐。”她说：“我晚上没有时间。”当时她急着上课，要赶时间。我说：“我真的是想跟您认识认识，或者你可以有一个电话或者别的方式，让我可以和你联系上。”她犹豫了半天，有几秒钟吧，她说：“我把电话给你。”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电话肯定是假的。但我还是写在手上。

后来就分手了，我就去买了票。买票的路上我想，这个女孩儿真是好，不是那种很浮躁的女孩，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电话是假的。晚上回到家里我还在想，这个电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个时候还没想到后边的这些事情。第二天早上起来，家里人都走了，我起床决定打电话试一试，就打电话，有人接了。我说：“我是昨天向你问路的那个人。”她说：“我能听得出来。”我说：“你干什么呢？”她说：“我在家里呐，上午没有课。”我说：“我还没有吃饭呢，你吃饭了吗？”她说她吃过饭了，我也确实是没有吃饭。我说：“你们家住在 27 栋吗？”她说是的，然后告诉我是哪一个单元第几层楼。我当时开玩笑，我说：“要不然，也没有人管我，我到你们家吃早饭去？”我说了以后，还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一，我当时觉得这电话是假的，一般留电话都是为了摆脱纠缠，再一个，人家不可能让你进她家的门。后来我想，她肯定也挺后怕，但是她再也没有说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了，他们家有炒的酸菜粉，她好像还煎了一个鸡蛋，再吃点儿馒头，喝点儿稀粥，吃得挺香甜。这顿饭吃得真是舒服。吃完了饭，我们就接着聊，一直聊天聊到中午，这时候相互之间就都了解了。当然，很多事情我会说得好听一点。中午，在他们家又吃了一顿饭，把剩菜剩饭热热吃了，中午我送她去上课，我说：“下了课我来接你。”她说：“行！”下了课，我带她去了一家咖啡厅，我把我们家从我爷爷辈儿到现在的情况都跟她讲了，我也说了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以前干过一些

什么，当然我尽量汇报更显得自己有事业心，更辉煌的一些事情。

后来就是写信，鱼雁往来，电话打的也比较多。最早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想法，不管是非分的也好，正常的也好，就是这个想法。再后来，我觉得她非常单纯，我觉得，这个女孩儿，我在生活中不能这样简单地对待她，这种人是要做妻子的，是应该和你一起共同生活的。我觉得她可以和我共同走过以后的路。她和你吃饭的时候，不会去点很多的菜，她也不希望你多花钱，花钱花多了她觉得心疼。我们的关系没有确定的时候，我给她买东西，我送她三枪内衣和牛仔裤，她都不要，一年之后她才接受我的礼物，那是一条左丹奴的牛仔裤和皮带。一般的女孩子可能不会是这样，你愿意买就买吧。

时间接触长了，这种感觉可能就越来越好了。两个人比较了解了以后，我曾经问过她，你也就敢这么大胆子？那是相当冒险的，每一步都非常冒险。我那天穿的是一双旅游鞋，一条秋裤，一身皮夹克，还戴着一副墨镜，不像好人，而且因为风大，我的头上还打了摩斯，肯定是一个坏人。她后来可能是开玩笑，她说：“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摘那个墨镜，早知道你眼睛这么小，我就不会找你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心灵感应的东西，就是一见钟情。我在下车的时候她也在想：“这个人肯定会和我说话，说什么，不知道。”我后来想，我那天在车站下了车，她如果再接着往前走，也就没有这个故事。

我们正式确定恋爱关系是在 93 年。后来我们公司出了一些事，我不想因为我给她很大的压力，就想让她离开我，把这件事情当作一次美好回忆。她跟我说：“你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在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我后来觉得那种安慰来得特别的扎实。在她过生日的时候，我给她买了一只很大的玩具老鼠，现在已经很破烂了，我说扔了吧，她说不扔。

他们家是在公检法工作的，很容易想象我这个人是一个骗子，开始当然不同意。你想，女儿那么单纯，遇上了这样一个男人，从那么远来做生意，这个人肯定有心计。

在南湖边儿上，我们两个人表示了决心，准备打持久战。又好了一年，他二舅的出现是一个转机，他的二舅给他父亲作了二十多天的工作，终于同意见面了。见了面，当天晚上我准备出去住，他的爸爸却同意我在他家住下来，这就等于接纳了。我就经常帮着做饭打下手，说好话。几天以后，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爸爸说：“他们两人经历了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在家里边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可我们说了这么多，他们还是在一起了，难能可贵。这真是不可思议，就是天意。也别租房子了，省钱为主，就先住在家里边吧！”

战争的回忆

韩春安：访问地点是银川老年公寓；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10 月 16 日 14 时；他是一位“老八路”；78 岁。

我原本是在访问另外一位老人，我和那位老人在那里聊天的时候，他在两米开外的床上沉沉睡去。他们告诉我，他是一位老红军，是余秋里的警卫员。

第二天，他纠正说，他不是老红军，他只是一名老八路，他也不是余秋里的警卫员。

他个子很高，很瘦，精神很好，在他坐在我的对面用浓重的河南话讲述历史时，我能够看见他的喉咙，他的牙齿掉光了。

这天是老人节，和历史对话的日子，而那些历史，在他说来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

他们昨天跟我讲，说人家明天还要来，跟你聊聊。我想，我能聊些什东西呢？是聊我参加的一些战斗？那些事儿，有些就是到死都不会忘。

我当过八路军，人家称呼我是红军，我不是红军。当时吕正操正编制一个队伍，延安来电，毛泽东让他把这个队伍给编制了，具体任务派谁去了呢？余秋里。这以下我个人的故事就开始了。

有人说我是 359 旅的，不是的，我是 358 旅的。我是 120 师的人，120 师的政治委员是关向应，那时候余秋里是一个团政委，他

带着一个团去编制吕正操的队伍。我不是红军，但我是一个真八路。什么叫八路呢？那是依照西安事变的标准，国民党的编制。为什么南泥湾赫赫有名，总是提到 359 旅和 358 旅的？你不要觉得我说话拐弯，我只有通过这个拐弯才能说明我的来源，才能归根到底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说话的水平就是这么高。我刚才说了，总提这两个部队。难道别的部队就不行吗？这两个旅是毛泽东带的一、二方面军的人，这是共产党的种子。我站队站对了，一下子就站到 358 旅了。

我是 1939 年在河北参加的部队，在 358 旅的四团。那个时候中国抗日大发动，口号多了，我自己记不清楚了，反正我就参了军。

我当兵了以后都干些什么呢？说到这儿，要说的可就太多了。新兵连挑出了九个小孩儿，是从目测来看比较精干一点的，这是为了参谋长到新兵连找通信员。有我一个，这九个人编制了一个班，到第四天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遭遇战，把七个没有了，还剩下两个，我就成了老战士。为什么呢？当兵打仗，这个班里没有人了，再补上七个，我可不就成了老战士了嘛。那个时候不一样，过一个晚上就马上不一样，伤亡太多了。在打日本的时候我还不出名，我出名的时候是打石友三的时候出的名，他是蒋介石的部队。

我在的四团是个主力部队，有一仗我们打着打着打不赢了，上级确定，这个仗不打了，很快转移，少受损失。我是个新兵，什么都不知道，说老兵我只是几天的老兵。处在这个情况下，团长就叫

通讯员捎一封信去给我们的一营，这个一营是个战斗独立营，他单独活动，离团司令部远一点。这封信的地址不是那么准确，只知道在那个方向，不是东边就是北边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有没有我们的部队？也不敢肯定。在东边还是北边？也不敢肯定。只是让班长带领一个通讯员，把信很快地交给一营，告诉他们紧急撤退，突出敌人的包围圈。这封信上面还包括了路线问题，是一封很重要很重要的信件，要是落到敌人手里，那这个营都完蛋了。你这一个团都没有人家的力量大。

上级有上级的事情，现在来说我，就从那一天，我就比较的出了一点名。这个名气是怎么出来的呢？有一个山西的老兵，本来是个班长，上级说，某某班长，你带一个新战士，赶快去。人家交代任务不一定对我交代，我只是听见了一点，任务是班长的，带上新战士只是怕出意外。他这就把我带去送这封信，这个班长心里有数，上面给他交代的时候他清楚，不是东边就是北边。这一个村庄里面有没有敌人？可没有给他交待清楚。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他娘的必，我是个新兵，我管这个？我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才不管你那个呢！

那是晚上的事情，要在月亮地里边撤退。到了地方，班长说：“韩春安！”我说：“有！”他说：“前边的村庄里是我们的一营。”他不敢跟我说实话，他不是说了实话，我就动摇了吗？要是敌人呢？我就不敢去了。他给我只交待了一半儿，他说：“你去找我们

一营的营长，把这个信亲自交给营长，你听清楚了没有？”我说，你不是叫我交给一营的营长吗？我那个时候也很精干的，这一点事情我要不弄清楚，我还能跟日本人摔跤？还能拿着大刀去劈日本鬼子？我心里话说，这个任务不重，这有什么不得了的？我说：“我听清楚了，要把信亲自交给他们的营长，连长我都不给他。”他一看，我接他的话音还挺干脆，按着他的意图来，可是他怎么想的，我可就不知道了。他说：“送了信，开不开收条你都赶回来，到这里来找我。”我们呆着的地方是一个小庙，土地庙前面还有两棵树，他说：“你看，这不是庙嘛？你记着这里。”这个地方离村庄有多远？也就是一二千米，能够看见战壕和工事。我就去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到了那个地方，也该我有运气吧。看见了战壕我就问：“这是我们一营吗？”战壕里边的人说：“我们是一营。”我说：“营长在哪儿呢？”他们说：“在这儿，不远，你过来吧，我们拉你。”就在这个时间上，他那个机关枪的射手说悄悄话呢，他说：“不要打！”敌人说敌人的话，他当然不会对我说，那个说话的家伙一定是个头脑，他们说：“要捉活的！”这话进到了我的耳朵里。我也不笨，你这样慢慢地说，只要让我收到音，我就知道你是谁。你是一营也好，八营也好，你不是我们的东西嘛！这个时候我假装没有听着，他说：“你一蹦，我一拉，你就上来了。”我说：“我找个窄一点的地方。”他相信了，我马上就跑了。我想，班长怎么什么都没说呢？我往下一跑他开枪了，子弹连皮子都没沾上，对我这个新兵来讲，那可都

是稀罕事。也不知道那个危险不危险，光知道完成任务。回到土地庙我就大声喊：“班长！班长！”他娘的必，我喊了十声八声，也找不到班长。我小的时候也有一点儿胆量，我就大声喊：“班长！班长！”还是不见通气，我一想，他妈的，我来的时候是从哪个方向来着，这要是没有班长我该怎么办呢？那我就按照我来的方向回去。这个时候脑子就比较紧张了，我们没完成任务，回去还要对我开检查会，叫我检查错误，连一个收条儿都没有，我跟人家说什么呢？这真是一件丢人的事。我就满头大汗的跑步，那是冷天，还出了那么多的汗水。

回去的时候，团长、参谋长，还有支队长在那个地方着急得不得了，正在想，信要是落到敌人手里，怎么办？如果一营被敌人歼灭，当官的是要掉脑袋的，跟我姓韩的可没有关系。这个信上的路线写得很清楚，要是让敌人知道了该怎么办呢？司令部的人都在等这封信。我回来就去找通讯排长，他们喊了起来：“小韩回来啦！”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司令部，他们问我：“你们班长呢？”我说：“我找不到他。”他们说：“先不说那个，那个纸条呢？”我说：“在这里呢！”把信给首长一交，首长放心了。这封信如果落不到敌人的手里，我们那一个营也不是豆腐渣，情况不好，他也会撤退。后来追查班长的问题，班长不班长的都扯淡了，谁完成了这个任务？是我完成的任务。上级说，这一关总算过来了，如果不是我立了大功，他的包袱才掉不下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也高兴

了，他开始耍我，他们说：“叫刚才那个小鬼来！”这个支队的参谋一了解，说这个班长回来了要处罚他，应该你做的事你不做，要一名新战士去做，这个新战士是做好了，要是做坏了，这个责任由什么人来负呢？然后就开始表扬我，这个首长把我拧一下，那个首长把我踢一脚，司令部的政治干事、参谋、团长、政委都把我给记住了，把我的长相、姓什么、叫什么都给记住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我的人多了，从那以后也就抓住我不放了。他们说，有必要的时候，这个新战士有培养前途，班长还是能当的。这是我走了运，有没有功在你出力不出力，那个点子凑巧了，你不出力也不行！上级就这样把我给看上了，行军的时候骑着马走到我跟前，一定要打我俩鞭子不可，无是生非过过瘾呗！一个领导是这样看的，别的领导也会这样看。司令部的人都把我这个小鬼看到眼里。

就这样边行军边作战，回来就打日本，边打日本，边和我谈话，谈什么呢？他们要求我去当警卫员，因为老的警卫员要被提拔当干部，就把我做一个对象在考虑。他们说，让你当警卫员好不好？团参谋长跟我谈话，实际上是他想要我，可不知道他要得上要不上，那个时候萝卜快了不洗泥，我这小鬼要是有了名，就不知道香到什么程度。我说不行，我敢说话，他说：“为什么不行呢？”我说：“我家卖豆腐，我爹给人家当长工，我也是给人家当长工。”他说：“当长工就当长工吧，还有什么？”我说：“我不会盒子炮，我不会骑马。我还不认字，那可不行。”可是到了第二天下午，他还是

跟你谈，这个不跟你谈那个跟你谈。给谁当警卫员？没有名没有姓，光叫你当警卫员。我当通信员背的是马枪，他说：“给你一个盒子炮！”我说：“我不当警卫员，就是不会打盒子炮。”他说：“慢慢学嘛！”但他们说来说去，反正不成功。可越不成功他越抓你，因为你是长工嘛！这一摸底子，你是贫下中农，“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个首要问题。”给敌人扛长工的都是我们共产党的亲人，是接班人，这样又对我是一个好的印象。不会使盒子炮这是真的，不认字也不是假的，我家卖豆腐那更不是假的，这个小鬼对组织说话干脆，不拐弯，成分也好，身体也好，战斗表现也好，各方面他妈的都符合他们的口味。等我同意了，参谋长却要不上，团长把我要了，后来是政委要了，这个政委是余秋里的红人。

后来我们又去了晋西北，晋西北有个宁化。有一天晚上我们对敌人跟踪包围，跑了一百多公里，疲劳得不得了。敌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的团包围了，要吃掉我们这个团。我们的司令部是在最后面的一个小山上，后面只有两个大官和我们几个警卫员，可不知道敌人来了十四个人。他们先观察了没有战斗部队，这可是我们的心脏，团长和政委正在这里商量事情。日本人就抓住这个机会上来，他们一露头叫一个通讯员给发现了，可是他不会打枪，日本人也发现了他，就把手榴弹往山头上一扔，这个时候团长知道了，他喊：“警卫员跟我来！”这又是一个走运的机会，我的80发子弹打的剩了20发，哪里有个准，瞎球打！那个警卫员当场中弹打死，我受

了重伤，抬回去了。团长政委都没受伤，是谁立下的功劳呢？两个警卫员，那么一个警卫员已经不在，功劳就归倒我一个人身上。这时候我日他奶奶又是一个幸运的机会来到了。上级总结战斗经验的时候，鬼子为什么会发现我们？那是汉奸捣鬼。后面为什么又要遭敌人的袭击呢？这是你团长政委无能。为什么团长政委没有当俘虏呢？通讯员又不会打枪，那是因为警卫员。

后来据说是培养我做关向应的警卫员的，如果努力学到文化，跟个中央首长没问题，可是 1942 年关向应就死了，他如果不死，我前几年受的这些困难要好得多。后来余秋里说：“你看，你把机会错过了，还是在团里干吧！”

再后来转业了，我的材料曾经被烧掉，余秋里证明：“见了韩春安这一封信，”他用红蓝铅笔写的：“他的情况确实。地方应该照顾。”

我现在还经常总结，我就是有点运气，那个时候首长真是把人看错了！

不要忘记

何乃强：访问地点是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路；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10 月 19 日 19 时 30 分；他是一位编辑；58 岁。

“不要忘了这些人！”他说。

他说的那些人是指流落在各处的知识青年，他去过他们的家，

和他们谈过话。他讲的是别人的故事，但都是他亲眼所见。

他把这些人的故事记在心里，并且告诉别人：“不要忘了这些人！”

有一些知识青年在北京和很多地方开了饭店，叫知青饭店、北大荒饭店什么的，都是把他们那一段当作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我也看过很多文章，许多知青现在也成了全国著名作家、作协副主席什么的，也拿那些事写了小说了。但是我觉得，现在人们忘记了还有一些知青成了普通农民，他们没有当工人，也没有当干部，而且这里头最主要的是女性。我了解的就有两个人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不应该忘掉他们。

有一位是在 1965 年第一批从北京插队的知青，到了内蒙古的临河。那时的知青有高中毕业生，有初中毕业生，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耕那些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成为楷模的人物。65 年的时候，我来到内蒙，第一次去看汇演，正好赶上晚会有他们演出的节目，充满了朝气，表现了他们当新一代农民的决心。作为我来说，对这件事很感兴趣，我就到他们农村访问去了，了解了解，准备积累一些素材，写一些东西。在他们知青点住了一晚上，他们集体跟我谈了谈，都是北京的，其中一个因为文化程度最高，也谈的最多，她叫李桂芳，这个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她讲她的插队经历，他们晚上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白天集体出工劳动，来内蒙

的时候，县城里夹道欢迎。他们从北京带来了松树苗子，充满了革命朝气。当时，我接触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是真诚的，所以我也很感动。这样，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记着他们的事。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也去了建设兵团，在兵团呆了一年半，然后又去了五七干校。内蒙五七干校所在的地方正好在 65 年我去访问知识青年点二、三里以外的地方。有一天休息、歇工的时候，我就徒步到了那个村里，我想再看看。我记住那个女学生叫李桂芳，一打听，真有这么个人。当时人家就告诉我她在几队几队，领了我到她家里去。我见了她，这个人完全变了，就是农村妇女了，脸上也有了皱纹，炕上、地上起码有四个孩子了。我问她还认得我不认得，她说不认得，我就说起 65 年的事，她说：“这件事情我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不见了。”实际上也就是六、七年的事情。后来，我问她怎么样，她说，家里头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走投无路了，父母也挨斗，姐弟都四分五散，北京也回不去了。我在这儿插队落户了，我总得要生活嘛！因此她就准备找一个对象，先找到一个富农子弟，对她很好，生活也很关心，经济上每次回北京，他都给路费，有病有什么人家都关心，不管有感情没感情吧，反正跟他就接触了。她想，她今后的生活总得有一个依靠，有个靠山。这个时候公社找她谈话说：“那个人是富农子弟，你谈恋爱结婚跟他不行，你要找贫下中农子弟。我们本来要让你来当代课教员，到村里教小学，你要跟他结婚了，就等于说是富农子弟的家属了，就不能用你了，你要

权衡这个利弊。”她说：“我也考虑了，但我主要考虑要生活，因为当时这个情况，阶级路线嘛！”

后来她结了婚，成了一个农村妇女，接着生儿育女。我去的时候，她说：“你看我们家就这样子！”她那个土炕上没有炕席，黄泥磨的光溜溜的，晚上一铺就睡觉，就这么个样子。当时我就说：“你和他之间感情怎么样？”她说：“谈不上什么感情，他认识几个字，我是高中毕业，你说从文化层次这个方面来说，能怎么样呢？但是我要生活呀！”跟我谈话的过程中，那几个孩子大大小小的挨着，我也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她骂完这个骂那个的。孩子们浑身上下不穿衣服，光着屁股满院跑，她还在院里喂着猪喂着鸡，就是一个典型的村妇。我拿出日记本，对过去他们小组成员的名字，基本上都没了，有几个女孩子名字我记得比较清楚，当时她们比较活泼，说话也多，后来有一个精神分裂，嫁给矿工了，嫁到那儿就不知道了。

她男人回来了，她男人是赶大车的。进了家以后，一看我在家里坐着，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她说：“人家文化厅的领导看我来了。”这个男的成惶成恐，蹲在门口不动。这个女的对他说：“愣着干甚！还不切瓜去！”赶紧切了瓜给我吃，过了一会儿，我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就走了。又过了些日子，有人说：“旁边村子有个妇女来找你了，新华公社的，我告诉她你不在，人家也不等了，问她有什么事，她说让你到公社给她说说情，让她能够当个教员。”当时，我是五七干校待分配的干部，我自己的前途还说不定的，我还怎么能

够帮助她呢？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我相信落实政策以后，北京知识青年返城回北京，她也不可能回去。四个孩子怎么办？她不能把孩子都扔了，她毕竟是母亲，命运决定她以后就在那儿了。也许能够落实政策，充其量当个教员，拿着代课教员微薄的工资，也不见比农民生活好。这就是一辈子。知识青年有的回到城里头，继续学有所成，成了企业家、成了什么人物，哪怕当个普通售货员呢，她这一辈子当农民了。这就是个悲剧。她和她丈夫之间无所谓感情，但是为了生活，命运把她决定到这儿，我想，类似这样命运的恐怕不止她一个人，可谁还记得这些人呢？我说，不能忘记这些人！我不知道对她们的命运该怎么评价，她没有成为侯隽，也没有成为邢燕子，没有黄宗英写《小鸭扛大旗》那样的报告文学树立她，现在已经被我们的时代遗忘了。也许现在农村实行承包以后，她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但我估计她不会有什么改变，四个子女将来都要结婚，每个人都是很大的负担，要娶媳妇或者要出嫁。我给人们讲到过一个情景，每年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就看有人赶着小毛驴车从村里去临河火车站，回家过年，男的都穿着皮袄，那是当地农民，抱着孩子的女的，都是外地知识青年。

还有一个是乌拉特前旗的知青，“伤痕文学”那阵儿，我们到乌拉特前旗去，那是个产鱼的地方。我们在渔场招待所里办了一个巴盟地区的剧本创作学习班，在那儿生活条件比较好，天天能吃鱼，大家每天谈自己的剧本构思，讨论。这招待所里头，我们能看见有一

个女的，大概三十多岁吧，每天在房檐底下晒太阳。巴盟当地的人跟她聊天，知道她是个北京知识青年，父亲是大学教授，究竟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我们也没详细问。有一天我就跟她聊天，她说她是北京哪个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到了内蒙插队落户。她的经历跟我说的第一个女孩子差不多，家里头父母被斗，兄弟姐妹四分五散，有家难归，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也是有一个人对她很好，她生了病，人家给她烧水送吃的，她要回北京看一看，探亲路费人家给拿，在这种情况下，她唯一的依靠就是和这个男的结婚了，成立了一个家庭。这个男的基本上是文盲，但是对她很好，就结了婚。不久以后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有政策，可以招工，她就被抽调上来到了农场，成为农村的农业工人了。她当时在农村学过赤脚医生，就到这卫生院里当护士，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但是不久这个渔场领导自己的亲戚来了，就把她这个指标占了。她又成为普通工人。乌梁素海出产芦苇，他们的副业就是生产苇席，她每天就是领多少苇子，打多少苇子，编多少席子，然后就拿这个挣工分，拿工资。

我跟她聊，她也会一些英文，跟她谈莎士比亚，谈这些作家、作品，她都明白，也都看过，都懂。我问她：“你跟你的丈夫结合，有感情没有？你爱他吗？”她说：“怎么会有感情呢？这完全是感激。生活要有依靠，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在农村里头，我得有一个男人，一个靠山。你看我的文化，他的文化，我们中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但是生活嘛！就在一块了，我们有了孩子，这孩子是我唯

一的乐趣，我要在她身上寄托我的理想，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念书，接受最高层次的教育，能够摆脱我的命运。我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也就这样了。回北京有政策，可是我结婚了，怎么办？我周围有很多人都离了，跟农村决裂了，孩子也不要了。我回了一次北京，看到这些同学有的进了工厂当工人，有的当了售货员。但是我回到北京去，北京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所以我不愿意像他们那些人一样。另外，一个人总是要有良心的，我不能把我的孩子放在这儿，我肯定要带走，可我离婚的话，他怎么办？如果再倒退几年，他可以再结婚，现在他已经过三十了，就一个老母亲，就他这么一个劳动力，能挣够娶媳妇的钱吗？我一走，就等于毁了他们母子俩个，我做不到这一步。我宁可在这个地方维持这个死亡的婚姻，也得维持下去。你说感情，感情谈不上，举个例子来说，给孩子订了一本《小朋友》杂志，让她读书识字，小孩嘛，在城里来说这个是最微薄的、最起码的，但是为了这事，我跟他吵了一架，他说，订这干甚，花钱。可是你说，我给他讲什么道理？从这一点小事上，对孩子教育、培养子女这方面，就没有任何说的，我不想跟他吵架，没有什么互相沟通的。”

后来，这男的来了，把孩子也带来了，赶一辆毛驴车。他们往车上铺着羊皮褥子。她男人在前头赶着，她坐在车后头，孩子跟着靠着。已经到晚上，他们越走越远，我一直看着他们，太阳慢慢消失。

我们在开联欢会吃饭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公社书记提出来，不能让她当个代课教员什么的，或者到卫生院也行。他说，这当然可以。酒席之间说的话，谁知道算数不算数？我只希望她别在编席子了，发挥她的文化水平，教教孩子，对她对孩子都有利吧！这件事情在创作学习班里头引起很大的轰动，大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是中国女性是最伟大的，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这是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一个典范，太感人了。还有一种观点说这就是中国对女性的一种扼杀，是最不幸、最大的悲剧，谁造成的悲剧？怎么会造成悲剧？她本来高中毕业可以上大学，可以出国留学，可以当研究生，她的父亲就是教授，她可以受更好的教育，她可以找一个也受过这种教育的人，成立更好的家庭，结果命运的波涛把她扔进这个角落里来，这还不是悲剧吗？但是也有人说，那么天生就该农民永远找那没有文化的，跟他一个层次的人，结合家庭，然后再繁殖她们的后代？永远的落后愚昧？城里的人就永远不应该到农民中来吗？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走这条道路是悲剧吗？她不会用的她的知识来改造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今天我也很难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价值趋向，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但是他是个客观存在，所以在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时候，谈知识青年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题目：不要忘记这些人。只有这些人才能构成比较完整的知识青年的这段历史。当然，还要包括一些什么呢？各种各样原因

的死亡的、被埋葬的知识青年，譬如说像救火，草原着火、兵团着火，草原上扑灭火灾应该有一定的方法，按着风向能够避免伤亡，但那些知识青年满腔热血，刀山火海都要抢，死了大概几百人，集体埋葬了。也有成功的例子，现在在农村搞养殖，他也不回城里头去了。讲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论断。

我也没有机会再去看她们了，她们已经留在农村里头，在农村跟农民结合，农村的面貌改变不改变，她们丝毫作用都没有起到，她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1966 年她们 18 岁，高中毕业，现在三十四年过去了，该当奶奶了，还能干什么呢？

如烟往事

陈海涛：访问地点是郑州某商务楼；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10 月 24 日 14 时；他是一位私营企业老板；26 岁。

他非常爽快的说：“我愿意谈，但请到我的办公室来！”他的办公室在一座现代化的写字楼上。

这个人的经历可以说得上是一部微观的当代经济变迁史，他最开始倒卖假烟；在大学时代开了一家洗衣店；之后他做过期货；开过公司；现在他经营一种时髦的会员卡。

他的生活是和投机倒把、小本经营、泡沫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商业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网络时代来临时他仍只有二十来岁。

在他漂亮的办公室，我看他最喜欢讲的还是那段烟贩子的生涯。

最开始的时候，我去找一个老板，那个老板有四、五十岁，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那个店里连瓜子都没有真的，这不是开玩笑，泡泡糖都不是真的。我跟他熟了之后，就是去他那儿买东西，他都不让我买，“隔壁买去！”他说。因为他那里面没真货，那老头挺逗的。从那时候开始，知道他这块儿要烟，他说，你拿过来，这个我给你包销了。

第一笔买卖并没有成功，烟质量太差，按照现在的假烟水平，那时候真是比不了。我就开始了解新的市场，通过我一个同学哥哥给介绍，有一个地方全部是假烟。到那个地方我是真的开了眼界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到晚上七点半的时候，整车整车的往外拉。那烟往全国各地散呢，放烟的位置基本上全都在夹层里面。一个村的老头、老太太就在车站那块儿，等着拉客户，我是让一个年轻的女的给拉走的。在那儿的第一站就是考察他们的香烟，装着自己也懂一点，我事先也经历过，又不是第一次。然后开始品烟，品烟时就说这个烟丝不好，实际上心里一点都没谱，一点都不懂，就跟他胡掰吧。他就领我参观他们的作坊，现在我还记忆犹新，那真是特别严谨，国家工厂都比不上。打个比方来讲，他家是生产红塔山的，现在如果有活儿的话，我们都去你家干，我们家有一批活，人家要彩蝶，那么你们家都过来，来给我做，大家都不闲。他们在地下挖

了一个大洞，放的烟机，那时候农村不是经常停电吗，烟机就开不动了怎么办呢？直接把自行车后胎一扒，往树上一绑，然后一个人骑着带动机器，把烟切开。最后一道工序是什么？就是配料，小碎壶底下有好像咱们水烟的那种东西，一吹就喷出那种烟蒙蒙的东西，给香烟一点一点涂香味。

从那里，我拿了第一箱烟。挺顺利，那时候国家抓的还不紧，回来之后我直接给老板。当场结算，特顺利的赚了第一笔钱，好像是四百一十八块吧。那时候，利润比较大，市场这块还不像现在这样饱和，还有开发的潜力。

第一笔买卖之后，我藏了个心眼。藏了个什么心眼？我留了三、四条烟，专门买了一个牛仔小背包，背到街上去推销，到各个烟摊去推。我的范围就是西郊，我们家住西郊，没有越过这火车站。有一次去火车站推销，当时也笨，那里有很多的便衣警察，一下就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就告诉我，这烟我们得没收，我那时候就想到贿赂贿赂他，也不知道咋说的，反正给他留了一条烟，就跑了。当时心里挺扑腾的。毕竟是第一次让人给逮住了，从那之后火车站这个界限再也不敢逾越了，那个地方被我认为禁地，我不会再去。

我在整个西郊那些大街小巷里流动，有了另一个客户，他和我的年纪大小差不多。我说：“我推销烟”，他问：“真烟还是假烟？”，我一看他年纪小，就告诉他：“真烟，你看看吧！”“那也行，如果是真的你便宜点儿，先给我留一条看看吧！”我就卖了一条，那是

我的第二个客户。推销下来一圈之后，没什么起色，唯一的是多点经验。郑州的街上许多那种卖反包装烟的，特别是那种地下道里摊上的，实际上全都是假烟。当时我就想，不如雇点农民工，我就算了一笔帐，一个卖多少、两个卖多少，算下来收入非常非常可观。我得去试试，当时就又到火车站地下道，自己写了个牌，自己摆摊自己试，卖了一盒，第二盒就碰上公安局了。完了事儿后才知道，他们全是熟人，像我不行的。他们要把这个烟没收了，给我带到那个警亭，询问了一会儿。他们问：“你现在干啥呢？”我说：“上学呢。”“上学还干这一行！”然后大道理给我讲了一通，对我来讲，赶紧让我走这是最关键的，我就给他讲这好话、讲那好话，没收也行，反正没几条烟，你就没收吧，当时我想只要人脱身就行，也害怕家里人知道。

这种尝试等于说又失败了，设想破灭了，就开始找老关系，由他把烟往外分散。这里头有很多不起眼的小故事，我就讲一个令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故事。有两个老夫妻，四十多岁，是河南开封一片的，给一个老板打工，他们给我说：“小伙子，你的烟给我们老两口怎么样，你不要再给老板，他得了这个烟他也卖，我们这个钱放自己兜里，就不给老板卖了。”后来，他们又给我诉了一番苦，然后说：“你能不能先给我们赊一箱烟？让我卖完之后，再给你钱。”我说：“那没问题。”当时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心里话，他们把我感动了，我就给他丢了一箱烟，我去收帐的时候，发现他老两口跑

了，怎么跑的？他们老板的值钱东西全部被席卷一空，还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我大概可以复述一下，特别有意思，而且有很多的错字，信里把他们老板这个人的作风和不道德整个罗列一遍，然后说，我们家在哪儿住，我们的身份证你也有，老板不是压着他的身份证吗，你可以到我们家，你到我们家，我们把你的腿给打瘸了。那次以后，我的感觉就是人轻信不得。

那段时间挺挣钱的，在我们家，唯一知道我做这个烟的生意的是我妈，我妈对我特别袒护。因为她一直有病，对很多东西分不太清楚，怎么说呢，你可以想象一个母亲为儿子做的一切，在她身上都能得到。她知道我这些事情之后，帮我隐瞒着。当时我上高一了，一个同学去我们家，他抽开我的抽屉，吓了一跳，那里面十块十块的钱那么厚一打。他说：“你怎么这么多的钱？”他是第二个知道我做假烟的人，对我有一种羡慕，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九三年中国质量万里行，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抓的特别紧。有一次我去进烟的时候，感觉罗集、康城、顺店周围全是武警官兵，整个把那块儿包围起来了。因为我小，没人查我，我去了做烟的那家，他就说：“你现在来，不是找事的吗？现在咱们省里对这块儿特别重视，好像中央点名了，力度挺大的。”他就告诉我：“这次你空手回去吧，最好一条烟也别带。”当时我的确一条没带，出来之后，吓我一跳，两个吉普就把我夹中间了。因为我背个包，走近了以后可能他发现我那个包特别空，特别瘪，就没下车，直接又把车

撤回去了。当时我说句心里话就是感觉不好，觉得这个生意基本上已经到头了。那个时候我还在离我家的不远的地方专门租了一间房子，囤着货，那时候生意已经比较大了，一进就是进十几箱、二十来箱的。

一看势头不对，从此没再搞过。从那时候开始，烟就比较紧张了，跟我要烟的特别特别多，不论价格，只要拿过来就行。彩蝶成本是七毛三，在市场上是两块多，我给他们是一块多。最挣钱的是红塔山，红塔山好像是八、九块吧，因为假烟没有什么好和坏之分，成本是一样的，我进的是九毛，一卖是四块，利润非常大。

冒风险，我经历比较深刻的一次，就是那次。因为风声稍微松了一点，也是赶个大冬天，下着雪，我那次买了特别大的桔子篓，还专门买了一筐子桔子，下面是烟。他们把我负责运到城外，他们不可能把我送到郑州啊，就给我放到余县往郑州去的路上。当时已经很晚了，根本再没有往郑州去的客车，正好旁边有个拉酒瓶的车，我就跟他们商量：“你看，能不能帮我把这个货捎到郑州呢？”那人挺好，同意了，但是四个人坐了一个司机楼，不可能再容下第五个人。我就呆在上面，整整扛了两个多小时，真是冻坏了。那种感觉真是一辈子不想再有，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爬在玻璃瓶子上面，天上下着雪和雨，而且那风刮的，一点遮挡都没有。

到了郑州，车就多了，那时候还不兴面的，租了几辆三轮车，把货拉到我囤烟的地方。我把盒子整体都拆了，一条一条摆在那儿，

象擦砖一样，中间留个空，晾一下，害怕它潮了，潮了烟会发霉的。我刚晾到那儿，整个屋里全是香烟的那一霎那，房东咚咚咚敲门了，他说：“下面来了一群大盖帽！”哎呀！当时把我吓坏了，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跑！那是个二楼，我就“啪”把灯拉灭了，房东“啪”又给拉着了，我说：“你拉灯干嘛？我得赶紧跳楼跑。”他说：“你千万别，千万别，他们还不知道是来干啥的，千万别跑！”那次是幸亏真的没有跑，你知道他们来干嘛的吗？抓杀人犯的，如果我跑的话，我估计那目标就是我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还在那里，有一大群人，看看满屋的烟，没有引起他们一点的感觉，他们就只问我在哪儿见没见一个人，给我叙述了一下，我说没有见，这就过去了。当时如果我要是跳楼跑的话，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对不对？从那之后我感觉这个活不能再干了。那次我一出去，他们不是还有一堆人嘛，问我是哪儿的，我说家是哪儿的。他们说：“你蹲那儿！”就搜我的身，看看你有没有藏什么凶器之类的东西，他倒是没有往钱上注意，当时他们没有搜到这一块儿，搜到这一块儿我也肯定说不清，那么小的年龄拿这么多钱，干嘛呢？他肯定得问。

小时候我打架可厉害了，几乎是每天都打，因为那时候也不甘受别人欺负，有时候我俩姐帮着我打。但是无论是学习还是玩的方面，我都没落给任何一个人。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最爱讲的事，小时候打那弹蛋，我最多带五个玻璃球，每次回来都是半兜，真的没输过。记得我们家搬家的时候，把弹蛋往外扔，足足有大半盆，我姐配了

好多好多副跳棋。因为家里的原因，早早去赚钱，你知道那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母亲基本上一直卧床，本身家庭条件都不好，再有个病人，欠了一屁股债，家里的环境可想而知了。我母亲是个哑巴，得了病之后她就不会说话了，那时候到同学他们家去听人家一叫爸妈，父母一答应，或者是给孩子讲这个那个的时候，感觉自己特失落。有时候我喝多了，就想，自己这一辈子过的！

第六章 在城市之间穿行

路线：

北京——南京——上海——海盐——海宁——杭州——厦门——南昌——合肥——蚌埠——济南——青岛——北京——秦皇岛——天津——北京

站在桥中央流水冲击桥墩发出轰鸣声，整座大桥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摇动。汽车经过时，桥给人一种将要倒塌的感觉。这不是在梦里，也不是在文字和别人的转述里，桥的存在，在这座城市中比记忆还要久远。有一段时间，我时常去那座桥上，不是为了看它，而是想重温在它上面飘飘欲飞的感觉。我获取了一种飞翔的姿态，像鸟类那样自由而又顽强。

我清楚我孤身一人来到这地方是为了什么，我开始为自己的一切负担，孤绝的在物质条件严重匮乏的精神存在里流浪。

——杜爱民《在城市之间穿行》

在城市之间穿行，这是我最后的旅程。

南京、上海、杭州、厦门、南昌、合肥、青岛、天津、北京-----

当我从一个城市离开，坐着火车或者长途汽车，抵达一个新的城市时，当我穿过那座城市的某一个路口，看到每隔五十秒就变换一次的红绿灯，当我穿过那些寂寞的假景点和浮躁的街区，看到阅报栏上张贴的小道消息，或者当我穿过起重机挥舞手臂的工地，穿过狭窄的胡同和弄堂，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所有的城市都惊人地相似。那些街道的名字，那些硕大的广告牌和醒目的标语，从一幢幢玻璃房子中泄露出来的钢琴曲，在大街小巷中赶路的人们脸上的表情，还有他们在闲暇时议论的关于这城市的一切。

这使我的脑子经常产生出一种迷幻的感觉，让我不知身在何处。皮包、汽车、墨镜、报纸、香烟-----在这城市的每一个空间里漂浮，我不需要在这城市的车牌上和地图中寻找标志，这都是徒劳之举，我在此处时就已经在彼处。

在我们内心深处，城市是希望，是文明、富足的依托，是高大的建筑物、连锁店和银行，是需要挣的钱和需要买的房子，是优越感和身份，是安身立命之所。

每一个城市都能够散发出驱之不去的气息，它在自己的周边弥漫开来，向着更远更广阔处漂浮，它能够迅速膨胀，然后化云为雨，让城市的种子在任一处偏僻的所在生根发芽，商业化速度迫不及待，此起彼伏。那些市镇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租赁 VCD 的小屋，挂着美人头向你抛媚眼的发廊，随时都在让利酬宾的商场，各种福利

彩票，各种娱乐新闻，各种新兴运动，各种健身器材，各种各样的壮阳药和减肥药，电线杆上贴满了治疗性病的招贴和租赁房屋的传呼号码；泰坦尼克的旋律在集市的喧嚣中不只疲倦地飘扬，好像它永远都不会沉没。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大得没边没沿的都市和每一个小得五脏俱全的麻雀城市，流着相同的血液，出自同一个母体。

在城市之间穿行，这是我最后的旅程。

我在这些城市中寻找着可以坦诚相待的人，他们虽不像草原上的人们，当你乘坐的汽车在他们身边经过时向你挥手致意，但他们却也并不讳莫如深，他们是这水泥丛林中的活体，他们能够说话，有自己的方言和口音，有自己的性格和癖好，他们能够得出结论，能够解释原因，能够表达自己的认可和愤怒。

在北京路的出租车上，一位司机对我说：“下岗的人千家万户，宣传上说要自强自立，交钱上培训班学裁剪，大家都去学裁剪吗？街上不许摆摊，做生意没有背景，怎么自强自立？”

在中关村的出租车上，另一位司机师傅说：“你要去什么广场？我就不明白了，现在怎么盖个楼就叫广场。广场是宽敞的地方，那鸽子窝一样的地方也能叫广场？”

每一条街都有人在说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

在城市之间穿行，我见到的城市是一些老人。

上海的老人刘达临在人们的误解和知音难觅的寂寞中孤独工作，只为了证明一个朴素的真理：性，是自然和健康的，它与生俱来，不可抗拒。

杭州八十七岁的老人林玉娥在旧社会里给资本家当过保姆，又在新社会里拣过几十年的破烂。她说，资本家是好人，关心照顾我的居委会也是好人。

厦门九十六岁的老太太吕艾治永远记得五十年前，厦门解放的那一昼一夜，当她醒来，她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回到家乡金门去。

海宁一百岁的老人章克标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五个字：“尽在不言中”。

老人们隐居在这城市之中，他们是城市的见证和历史。

在城市之间穿行，我见到的城市是一些青年。

杭州的美国青年乔纳森，他对我说，不要分你们和我们，这是两个危险的词。他讲述的是一段在中国的感人的经历，那故事里没有你们和我们。

南昌的中国青年胡伟，他对我说，我想拿一架照相机，到各个地方去，把那些即将毁灭的文化遗迹留存下来，他讲述的是他在不被人认同的思想中孤独的自己。

北京的青年于彤，他什么都不做，他读书，他自己养活自己，他不担心不惧怕，他讲述的是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还有那初为人父的吕松松，他和妻子都很年轻，他们讲述的是一个家庭的诞生，一个孩子的诞生。在他们的孩子快要一周岁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希望他有一个自由的健康的未来。”

青年人在城市里成长，他们是城市的背叛和继承。

在城市之间穿行，我喜欢这些城市，但我讨厌这里的矫揉造作和死气沉沉。正如我喜欢那些乡村，但我讨厌那里的水灾和旱灾，迟钝和贫穷。

我认识的城市就是那里的人民，那些在公共汽车上互相警惕的乘客，那些在公共汽车上互相让座的乘客，那些在公共汽车上为一次拥挤便破口大骂的乘客。我认识的城市就是在公共汽车上挤来挤去的人民。

我认识的城市就是那个站在人行横道线上举起黄旗阻挡着汽车，让自己放学的同伴安然通过的少年；我认识的城市是那些提着篮子，在菜市场和小贩们讨价还价的母亲；我认识的城市就是那些坐在酒店咖啡厅的沙发上，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姿态的新贵；我认识的城市是那些老鼠一样躲避市容检查在街头摆摊的人-----

一个人就能够代表整个城市，官员、下岗工人、艺术家、为富不仁者、小偷、流浪者、警察、婴儿-----他们都居住在这里。

当我在城市之间穿行时我便认识了他们。

第六章 在城市之间穿行

我要一双白球鞋

李小萌：访问地点是上海波特曼酒店酒吧；开始录音的时间是11月10日18时；她是一位外企公司的高级职员；30岁。

我想找一位上海的没落贵族，他们问我，见见新兴的贵族你愿不愿意？

她和我约好在北京路上的波特曼酒店见面，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流浪者，在这样的场合，和那些衣着光鲜的人相比，我很容易被辨认出来。

前一天晚上，她和那个名噪一时的吴士宏一同被上海的某家电视台请去，做了一期商界成功人士专访的节目。我见到她时她正准备换个工作，在这之前她是一家名牌外企的高级职员。年薪很高。

她谈话的态度非常平和，她说，最开始想到要赚钱，是因为一双白球鞋。

我不知道你对心理学有没有研究，其实一个人小时候的经历，决定她长大以后很多做事的方法。我在心理上并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可能就是小时候的经历所决定的，我虽然很好强，但在性格上也有很脆弱的地方。挣钱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方式，能够让我的母亲感到骄傲，感到开心。我的家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家庭，我不知道我父亲是谁？我没见过他，我也不想去找他，我觉得没有

养我的父亲不是我真正的父亲。如果再见到我的父亲，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处理那种感情，那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母亲家出身不好，在文革的时候，外公、外婆希望我的母亲能够跳出这样一个家庭，所以就嫁给了我的父亲。但是他们的感情生活一直不是很理想，因为这里面没有爱存在，最后我母亲就跟我父亲离婚了，然后嫁给了我弟弟的父亲，他们应该属于有感情的婚姻，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去世很早。对我母亲来说，生活的压力是很大的，她曾经想到过自杀，那时候没有人跟她说话，人家都看不起她。她是个很坚强的女性，而且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女性，母亲一直到现在还跟我常说一句话：“在哪里摔下去，就从哪里爬起来。”

改嫁那种生活总是很微妙的，母亲从此以后就变了，她很关心别人的意见，别人的说法，所以动不动就说别人会怎么说，别人会怎么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恨别人怎么说，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这是一种很强烈的逆反心理，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使得我变得很独立、很好强，敢做敢为。我读书的时候一直都不是很用功，不属于那种很顶尖的学生。交朋友的方面也有一个问题，我自己发现，我很少交朋友，总觉得他们很虚荣，不值得交往，她们很在乎成绩，你成绩好就和你交往，或者就以这个为衡量的标准，把人分成了好几个类别。我很讨厌把人分成所谓的类别，我外婆是一个很博爱的人，有一点就可以证明她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性，在她去世的时候，有五百多人参加她的追悼会。她一直对人很宽容，我

小时候一直跟我外婆长大，外婆告诉我：“你永远不要看不起谁，今天他可能是这样的，三十年以后说不准的，人世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你再好，也可能过了三十年会很糟糕。”我从我们家的身世上面也感受到这点，以前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候，但后来就一下子没落了。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有很多的波折，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些波折可能又形成更大的一个循环。所以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其实很平等，没有什么贵贱之分，没有理由去看不起比你穷的一个人。我曾经很穷，我小时候很羡慕别人家的小孩，这种环境给我身上带来很大的优点，就是很平等地看待别人。

童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最让我难忘，那是我最大的转变。那次老师让我们穿白跑鞋，但是我的鞋子是有一些条纹的，我就跟我妈妈说：“这个怎么能穿得出去？别人都是穿白的，我一定要一双白跑鞋。”妈妈跟我说：“不行！”我就哭了，我说：“你为什么让我这么没有面子？其它同学都有。”母亲说：“我去跟你们老师谈，你可以不穿白跑鞋，他会同意的。”我就跟我母亲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没有想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活得很痛苦，我都不想活着。”我母亲就哭了，那是我伤我母亲最深的一次，我也哭了，从此以后我几乎从来不伸手问我妈妈要钱。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点点零花钱就开始积攒，我们那时候并不常见有打工的，我就已经开始打工。我很难伸手向家里要钱，即使跟朋友去借钱，都不会向家里拿。金钱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

更多的是一种痛苦，并不是一种幸福的东西，一定要有它，没有它不行，但我有时候又讨厌它。后来跟妈妈说我有钱了，妈妈总觉得我花钱如流水，她说：“你总像跟钱有仇一样。”我没有把钱看的很重，我觉得钱今天可能有，明天也可能就没有了，可能也是有一点自信，相信自己能挣钱。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想法，我将来能挣钱，我一直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想法，莫名其妙的一种想法，会有钱的，一定会有钱的。

我父亲给我们花钱是记账的，我很难过，我很讨厌别人记下来我的花销。我一直是个很敏感的人，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好像我欠着什么。我一直在自己的脑海里说，你在花别人的钱，你又在花他们的钱，别人又记着你的钱！那都会追加到妈妈身上。我心理始终有一种感觉，我有一天能让妈妈抬起头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恢复她那种自信、她那种骄傲，她原先有过的那种独立。

我小时候是一个很紧张很胆怯的人，在湖南的时候，他们想让我在班级里唱歌、跳舞、读书，我都不能做这些事，我一点都做不到，上不了台面。我的的确确有那种重压，见到人多我就心里发慌。读书的时候，其实我都背得出那个课文了，但我一站起来读就读不出来，好像从来没有读过这个课文一样。我外公是个知识分子，他能写诗，很厉害，很有文化素养。我在家里一个人总是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读呀读呀，有一天晚上，我外公就进来了，我没有看到他进来，他说：“哎呀！你读的特别好，为什么在课堂上就不能读呢？”

明天你一定要在课堂上完成这件事情，否则的话你就别回家，你就没得饭吃。”小孩子很容易饿的，第二天就一直想“没饭吃、没饭吃，”后来就读出来了，其实人就是怕那么一关，过了这一关，人就行了。

那时候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人的各方面就开始转变了，特别在挫折当中，就变得越来越强，因为你碰到挫折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来帮你。

我小时候一直想为我妈妈活着，当我给我妈妈买完房子的时候，我一下子很失落，很空，我一下子没有理想了，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因为我的理想寄托在我母亲身上，以前在为她奋斗、奋斗、奋斗，一直让她很光荣、让她很为我骄傲，当她真正的达到那个层次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感觉了。

我有一段受益很深的感情，我的朋友是美国人，我们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认为对方就是要找的那个人，一下子就好像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我们把一种很强烈的感情给予对方，同时对对方的期待值就越来越高，就是因为这种期望值那么高，往往就忽略掉了很多的不合适，或者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为什么会谈到文化背景的差异呢？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个很大的观念上是不一样的，但经过了那样一段感情之后，我不得不赞成他们的观念是对的。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所接受的教育和我所经历的事情，使我一直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一种责任，甚至痛苦的东西更容易接受，因为痛苦本

身就是一种实际的东西，摸得着的东西。然而，他是为了快乐而活着，我没有，我当然也希望快乐，但我并不理解快乐是什么？

看法

陈 节：访问地点是杭州某茶馆；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11 月 12 日 20 时；他是一位古董商；38 岁。

我和一位朋友刚刚在茶馆里坐下，他走过来。这家茶馆开张不久，他是茶馆的股东之一。我们赞扬他的茶馆布置的很有特色，尤其是那张红木卧榻和硕大的鸟笼。

他像新派京味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出口成章，话语中处处露着机锋。

寸头，留着小胡子，穿着一身中式衣衫，他说：“这里有很好的茶！”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都非常功利。他们的评判标准不是纯艺术的标准，也不是纯精神上的标准。我觉得在精神上我们比不过前人，我们在这个物质非常丰富的年代里，在精神上反而比不过前人。我们公司里挂着一张画，它是根据一张晚清意大利摄影家对一组中国人照的相画的，当时的文字介绍说，他们是一个反清团体，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从这张照片上，能看出来什么呢？能看出来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能够看出来他们是给刀就能杀人，给

笔就能写文章。可是我们现在呢，基本上这两手都不成。给你刀，你不能杀人，我们所说的能杀人是有信仰，为一件事情去豁出命来，就像早期的共产党人，还有早期的国民党人。推翻清朝不惜流亡。像谭嗣同就说变法是要流血的，以前的变法没有流过血，那么从我开始！那是有精神的。能组织军队，像孙中山，能招募勇士，然后能写文章，能写出“三民主义”。我们什么都不成，这就是精神境界的不同。古时候，“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很多人的精神状态。土匪是这样的精神状态，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精神状态。所谓大义凛然，我们现在一听说要枪毙，先是一裤子的屎和尿，就瘫下去了。过去那境界就是老子不怕，砍头不就是碗大的疤，那不是豪言壮语，那是一种精神看法：“我对人生的看法是我还能再来，我今天输给你不要紧，咱们回头见！”我们现在的精神境界是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看待死亡？

所有的人 30 岁就开始为晚年着想，我老了怎么办？我要买保险。我生病怎么办？很简单，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些问题只能寄托于社会的发展，老了由社会来养，由国家来养，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无法面对的时候，死亡也是一种面对。病了怎么办？治不了死呗！那还能怎么办？如果这个病只有二百万块钱才能治，那么我们只有选择死亡。我们没有钱，很多人二十万块钱能救活自己，他也只能选择死亡。我面对过因为八万块钱选择死亡的人。有一次吃饭，几个大款在一起，一个人说：“幸亏没有给你弟弟介绍那个女孩儿，

那个女孩现在得了脑瘤，要做伽玛刀，八万块手术费，父母两个人挣几百块钱的退休金，男朋友撕心裂肺想去借钱，借不到。”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那种家庭，工人家庭，子女很多，他们到哪里去找八万块钱？就算是借了，怎么还？而且，最后也没有人会借给你，别人都知道你没有归还能力。人们都是对等交往的，他们所能够见到的都是低层次的家庭，像我，问别人借几万块钱是一句话的事情，但是如果员工问我们几万块钱，我们也没有，这涉及到层次，涉及到信任，涉及到归还能力。你不信你跟李嘉诚借钱试试看，李嘉诚钱有的是，每一分钟的利息都够我们花一辈子，他的和黄上千亿港币资产，但是他不会借给你。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孩儿只能等死。大家就说，咱们就赌一把，她还年轻漂亮，八万块钱出了，这女孩如果伽玛刀照射好了，卖身给你，陪你两年，不过分的，你可以看一看，花钱买一个看法：“我给你把病治好了，你怎么报答我？”买出一个故事。但是所有的人都只在那里嘻嘻哈哈。其实当时每个人凑一万五千块钱，不会给任何人造成负担，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我也承认，有人即便提出这件事，也不会付诸实施，大家会说你有毛病，认识不认识你就拿一万五千块钱给他？这就是人对生命的看法。

现在人的境界远不如过去，没有主张，也没有主义。共产党人当年是什么样的？辛亥革命时期人又是什么样的？秋瑾作为一个女人那是能舞剑，能写文章的。

这社会世俗到了极点，我们买东西是没有标准的。您首先应该知道劳动的价值，创意的价值，这个东西应该是多少钱？我知道是奔驰车要二百万，奔驰车贵，但是我不能说奔驰车不值。我不能说，他妈的这个国产车卖五万，你那个奔驰车却要两百万，你有没有搞错？大家都四个轮子。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可以说他贵，但是你不能说他不值。买古董的人经常就会说：“瞎说吧，一块石头卖得这么贵？”他根本无视古董上面传达的人文信息，这块石头不是从地上拣的，地上捡来的还有值钱的呢，原始的钻石也是有价钱的，黄金是天然矿物，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取，不需要人工冶炼，它也是有价值的。现在的状态，就是受过教育的人也不讲理。

中国人现在最糟糕的，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下一代。那么你自己就不打算生存了吗？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起码的一点，就是每一个生命都应该精彩，就是自己活得好。怎么能说我做牛做马就行了，我可以给人当奴隶，只要我儿子怎么怎么样。前天我看一张晚报，上边有一个消息：母亲和父亲为了女儿拉大提琴辞职，从黄石到武汉去。那不是人生，那种境界极其低下！你可以做一个社会跟踪，他的女儿出不了名，不要看她得了什么英国皇家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历史证明，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奖，均不出身于职业教育，美院没有培养出划时代的巨匠，文学系也没有培养出划时代的文人。你问问毕加索，问问凡高，问问达芬奇，你甚至问问爱因斯坦，问问丘吉尔，问问毛泽东出身何许？他们受的是什

么教育？鲁迅是学医的，他的成绩一塌糊涂，全是他藤野老师红笔乱批，我们读过书的，知道红笔批的是什么意思，一篇文章全是红笔改，那是什么？但是，他是文豪。我们建国 50 年了，我们现在的巨匠齐白石、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那都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吗？没有一个。我们没有培养出艺术家，没有培养出文人，北大清华仍然是一百年前的北大清华。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伟大的科学家吗？我们不好意思。任何学府没有产生伟大的科学家。我们翻翻那些伟大的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教育出来的。我们再把鲁迅和前辈们和孔子和孟子比和朱熹比，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怎么啦？我们的物质文明越来越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享受越来越登峰造极腾云驾雾，但是我们的画家呢？我们的文学家呢？

这个时代他妈的坏了，自己含辛茹苦，然后说：“我女儿考上英国的学校！”那又有什么呢？考上了英国的学校就证明有成就？那么你自己的成就是什么呢？成就是对人类的贡献！要么是思想贡献，要么是物质贡献，比如说我是水稻之父，我的发明使水稻产量提高了；或者我发明维生素，发明了青霉素，人类因此而获救；或者我认识到了一个思想，我向所有的人阐释了一种思想，使别人搞明白了一个问题。那是贡献。英国女王接见了，就叫贡献？女儿拉琴拉得再好，英国女王都服气，那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问题。全家人从三十几岁到五十几岁就弄这么个女儿，而且我敢说这个女儿并

不谢恩。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过什么样的人？我们有没有音乐家是这么出身的？聂耳和冼星海是这样出身的？那些少年科技大学少年班的人都在那儿呢？有成为思想家的吗？有成为科学家的么？我一再跟我老婆讲，如果我们的孩子读书负担确实太重，她上了初中就不读了。作为父亲，如果我是优秀的，那么我言传身教。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上一代人并不传承给我们什么，他们在思想上给我们什么了？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我的女儿一定要从我身上得到得到一些东西，我每回买回东西，我女儿都会说：“这是宝物！”我女儿一直以父亲为骄傲。她知道我买回去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这是有传承的。

个人的选择，没有什么好提倡的，也没有什么好贬低的。如果愿意就可以，但这个愿意，必须是不反社会不反人类。中国人的境界之虚弱，我们公司的小姐跟一个外国人卖古董的时候就说，这个东西保持价值，它将来可能会更贵的。外国人当时就表示，这不是我所需要的，我喜欢它才来买它。我去给那些小姐说，你这就好像是跟李嘉诚说，这一块钱等过两天就成了十块。李嘉诚要不要你这十块钱？盖茨一觉醒来帐上就多了几个亿，你对他说，我有一个办法让你赚钱？这对他来说不重要。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产生影响。资本家是通过钱和通过花钱来改变社会的，让这个社会按照他的意愿去发展。

我们对艺术的看法一塌糊涂，我们这个社会并不包容前卫艺术、先锋艺术，不包容艺术家的个性。艺术家是思想的天马行空者，是可以任意驰骋的。社会越发达越富有，为什么不能对这些人宽容一些呢？何苦呢？艺术家能造反吗？历史告诉我们，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你害怕什么？一个强大的政权，一个完善健康的社会机制，怕什么呢？我们委屈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别人强大，而是因为我们懦弱。我们有时候会害怕一个孩子，因为他的父亲是厂长，而我恰好在这个工厂工作。我们有时候会怕一个什么人，他可能是市长的公子或司令员的儿子，但是我们能打过他，我们的体格比他健壮，而且我们人多，但是我们还是怕他。这是因为我们屈服。

我对所有的人说，我的古董非常的贵，因为我优秀，所有优秀的东西都不能便宜。在古代，艺术家都有赞助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反而没有了。我们认为经纪人无耻，从别人的所得里边剥下一层。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画廊，印象深刻，它上面写着：某某画廊，祖孙三代不遗余力照顾艺术家。下面是人名，有谁呢？上到毕加索，下到赵无极，历历在目，他支付他们旅游的费用，写生的费用，在他们没有成名的时候给他们帮助或者关怀。那是能够感动人的。是的，他最后从这些画家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画家可是一张画也卖不掉的。凡高不就是这样吗？他的画现在值多少钱？能买就是欣赏。艺术家的观点也非常的糟糕，他们以他们的画被什么博物馆收藏，以多少钱收藏而津津乐道。那么你的思

想境界到了什么地方去呢？中国文人的传统思想，那种傲慢，那种自视清高，那种似乎近乎扭曲的自尊都到哪里去了呢？我并不是说那些东西好，我们的中国文人的漠视金钱、穷酸自负全部都扔了，我们又捡起了什么呢？我们不穿中山服，又不穿西服，那么我们只好光着。

我们现在说某某某的画好，为什么？因为它卖了几百万，好坏的标准是金钱。不对，金钱只是判断好坏标准的一个媒介。我们大多数时候能够通过金钱看到他的艺术价值，但不是在有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去看待凡高？他所有的邻居把他送进了疯人院。齐白石这个跨世纪的人物是一个木匠。

我觉得他们是如此的不包容，如果什么问题我不懂，我会尽量少发言，我会问清楚，而不是随便的评判。我们现在不得不为我们当年的豪言壮语脸红，超英赶美，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机械化在什么地方？我们去看看农民是怎样弯腰插田的，再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手工收割的。有许多问题我们不能不问。

社会应该允许有各种思潮，你说你有一个上帝，我说我有五个上帝，那有什么关系呢？不行，你非得让我投降，欧洲人早年也是这样子，美国人不就是因为被迫害者的流亡而搞了个美国吗？

你们再接着聊天吧，我去招呼客人了。

“我们”和“你们”

骆笑生：访问地点是杭州古荡镇一家饭馆；开始录音的时间是11月13日12时；他是一位软件开发商，美国人；33岁；骆笑生是他的中国名字。

如果你经常到“天上人间”酒吧去，一定能够碰到他在那里唱歌，他在那里要唱到很晚。

他的名字叫做乔纳森，他是美国人，虔诚的基督徒，经常去当牧师，同时，他又是当地外国工商会的主席。

乔纳森在中国已经呆了五年多，他的中文名字很好听，中文也说的很好，在中国的五年里他去过很多地方，包括他母亲的出生地。要知道，他的外公在二十年代就来过中国。

他是一个认真的人。

我在中国游历，去过南京、上海、西安、厦门、昆明、广州、北京，还有敦煌、吐鲁番，瑞丽，当然黄山这种有名的地方也去过。瑞丽和青海格尔木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好。坐汽车从敦煌到格尔木，我没有看到过那么漂亮的地方，那里的天非常的蓝。我们从瑞丽回到昆明的时候，我们是搭的----（他不知道顺风车怎么说，朋友给他解释，就是像风一样。）顺风车，我们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这种方法很好，但是如果是一个人去搭顺风车就会有点危险。（朋友说，作为外国人遇到的危险会比我们中国人少一点。）也不一定，

黄头发可能就会是目标，（朋友向他说，如果是一名外国人遇到了事情，中国的警察是一定会过来的，但中国人就不一定了。）这个我是了解的，但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我的生命的成本和你的生命的成本是一样的。

我在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印象，如果说有一点，武汉！但也不是说我在武汉的经历都是这样。还有沙市！三年以前的春节我在那里，春节的时候出去旅游是很麻烦的，我到沙市的时候，发现和我约会的人已经回家了，他不在那里等我，他没有告诉我，也没有什么人来接我。我去看我妈妈出生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帮我找到那个地方。我没有朋友，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和他们联系，我的中国话马马虎虎，现在也还是马马虎虎。我要到长途汽车站去，准备坐汽车回武汉，然后再回杭州。我找了一辆三轮车，我问他：“到长途汽车站要多少钱？”他说：“一块钱。”怎么会这么便宜呢？我反复说：“一块钱是吧？一块钱是么？”他说：“对的，一块钱。”好的，我上车。到了长途汽车站，我把一块钱给他。他就用很奇怪的一张脸看着我，他说：“不是一块。”他拿了一张十块钱给我看，并且说：“一块钱。”我说：“我已经在中国住了两年，我知道哪个是一块钱，哪个是十块钱。”他说：“不，你没有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一块就是十块。我们说一毛就是一块。”那个时候我一点儿都不相信他。我想他是在骗我。我就把这一块钱扔在他的身上，进去了。我说：“我们说好的是一块。”我看他怎么说，他应当知道我

是一个外国人，我不会知道当地的习惯，我一定不要给他十块钱，他为什么要骗我呢？但是我回到武汉的时候，在飞机场等飞机，我跟几个人谈话，我说：“有一个人在沙市说，一块就是十块钱。”别人说：“是这样的，这是本地的习惯。”我突然想，我不应该那么生气，也许他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了，我那么快的做出一个决定，不好。

外国人在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人说外国人也许并不能了解中国，他可能在中国生活十年二十年，也还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个我同意。但是还有一点我要说，中国人也不太能够了解外国人的想法，外国人怎样。我经常跟出租司机这样说，可能我的看法不是很正确，这只是一个外国人的看法，对中国我有很多事情还不懂，真的不懂，可能永远不懂。

最近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来中国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找新的故事，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故事，你自己在写它，我们都是作家。你要选择你是在写什么样的书，但是一个好的书，好的故事里边有很多的小故事，每个故事和这个大的故事有关系。我来中国就是来找我的故事。来中国已经五年了，我来的时候，在杭州的外国人还不多，那个时候在报纸上有关于我的文章，电视上也给我做了一个二十分钟的节目，在美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在那里，我只是个老百姓。但是一个月以前，我在中国遇到了我所碰到的最奇怪的情况，我星期天上午到教堂去，一个朋友告诉我：“在广场

有一个艺术博览会，我看到了一幅油画，画上边有一个人在弹吉他，和你非常相像。真的很像你。”我在心里说，不可能，一定不可能，那不可能是我，但是我要去看一下。后来我去了博览会，看到了一幅长两米的油画，中间就有我在弹吉他。背景是很朦胧的，只有我在中间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半小时都站在哪里，笑死了，因为太好笑了。很多人都来看我，他们说：“就是你呀！”我说：“我想可能是吧！”我在那里笑，有一个门卫走过来，他问我：“你身体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那么长时间在笑，他以为我也许是生了病。我说：“没有事儿，你看看那幅画就知道了。”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对别人有什么影响，有一个人，我曾教过他英语，她说：“我们上课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我还记得。在我的生活里，每天都还在想这句话。”那天我一点儿都记不起来我说过的那句话，什么时候说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没有这个印象。但是我们每天做事情，对别人是有影响的，你对我有影响，我对你也有影响。我在看这幅油画的时候就在想，这个人为什么选择了我？我的吉他弹得马马虎虎，但是他花了不少时间画这幅油画。很多人会说你这么好看，或者你是怎么怎么伟大，但是这些话跟我不太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才有一种感动，他为什么要抓住这个瞬间来画？就像那个学生一样，我说了一句话，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被接受？因为我没有准备，我没有想到我说的事情那么重要。其实我们要注意我们对别人的影响，这

个不是说我们天天都要很紧张。你只是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一定对别人有影响。所以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很重要。如果我有不太好的习惯，或者我是坏人，我对别人的影响一定是不好的。那么我就伤害了他们的灵魂。我自己做不了好的人，但是我也许能够帮助别的人。

我在中国，每天都遇到一个挑战，你要看你的想法在什么地方是对的，在什么地方是错的，你一定会发现在你的心里还有什么错误，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坏的地方？比如说，我在美国住在北方，在南方，他们还是要管你的皮肤颜色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在北方不是这样，我们都这么好，我才不要管你的皮肤是怎样的，我才不管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们都很骄傲。但是如果你没有碰到一个严重的情况，如果你没有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就不能知道你真正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到中国以后，我发现在我心里有这种东西，我看一个人，我不认识他，我看见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已经决定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发现不是只有我这么想，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这种东西。到今天，我碰到了很多很好的人，可是他们在心里都还是有这种东西，但是这不是说我们都是坏人，这是说我们都有这个问题，都要注意。我放假游历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我就会想，这个人一定会骗我，他是中国人，我是外国人，所以一定会骗我，这是一种不好的想法。我要说，不，这个人是一个人，他可能有孩子，他可能有妻子，她可能有丈夫，他是和我一样的。有

的人会骗我，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骗我。在每一个地方，在中国、美国、欧洲、非洲，都有诚实的人，也都有会骗我的人。

我以前说的沙市的那个故事，第一天有个人要欺骗我。第二天在武汉的时候，我上了一辆出租车，春节时出租车比较少。上去以后，司机告诉我：“到那边要 50 块钱。”我说：“50 块钱，就几公里，不是 50 块钱。”他说：“那你去找一辆新的出租车吧！”我就下去了，我很生气，我不要他骗我，我上了另外一辆出租车，我想，每一个出租车司机大概都是这样吧，特别是在武汉。在头脑里，我知道这个决定是不对的，但是我的心里还有这个感觉。上了这辆出租车以后，我跟司机说了几句话，我说：“我只要回杭州，我要回家，我很累很累。”在心里我已经想，他已经准备开始骗我了，还要拿我的钱。他说：“这样，我帮你去问几个地方。”我们就跑了几个卖票的地方，大概都没有车票。我告诉他我是一个老师，我的钱不多，我的钱可能只够坐汽车或者火车回去，飞机也可能够了，但是回到杭州的时候我可能也就只剩下一百块钱了。最后，火车没有，船也没有，我们只能到飞机场去，我们先到一个地方买了一张飞机票，这个人帮我买的票。他说：“你等在这里，因为你买一定比较贵。”他进去以后，我真的害怕给他这笔钱，但是我在他的车子里，所以相信了他。买了票，我们就到飞机场去。大概在路上跑了三个小时，跑了好几个地方，计程表上都有一百多块钱了，那是很贵的。但是我下车的时候，他说：“我不愿意收你的钱，我一点儿都不愿

意收你的钱，我知道你没有钱，你在路上过的肯定是很苦的，（这时候骆笑生沉默了，眼泪流了下来）我那时候发现我太容易决定，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沉默了很久）看到这种情况，我很容易说我自己是一个坏人，但是我发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人类的问题。我没有碰到没有这种感觉的人。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我们都是这个样子。

我看中国人经常有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外国人。有两句话我不太喜欢，一个是外国人说中国人怎样，一个是中国人说外国人怎样，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怎么样，美国人说，我们美国人怎么样。我觉得在世界上最危险的两个词，就是“我们”和“你们”，我们要分开，我们要给每个人画上这条线，我们是对的，你们是不对的，这两个词非常非常危险，会让我们最终不了解别人。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你们、他们，重要的是他，是这个人怎么样。我们是人类，我到中国来，了解你非常容易，但是在心里真正了解却比较困难。我并不能责怪美国南方的人，我也不能责怪南非洲的白种人，你做的事情不对，我不是恨你，我是恨你做的事情，很难分开一个人和他的行为。但不要用“我们”和“你们”来决定这个人好不好，或者他这个人的成本怎么样，价值怎么样。每个人的生命成本都是一样的！

共产主义接班人

何佳汝：访问地点是厦门何厝村何厝小学；开始录音的时间是11月17日9时30分；她是一位辅导员；55岁。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牢记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这首歌她从十几岁唱到五十来岁，每一次唱起来都很动情，因为这是她的歌，这首歌简直就是她的历史和生命。

四十年前她和她的十几个伙伴被称作“英雄小八路”，那首后来成为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歌子就取材于他们的故事。在金门炮战的前夕，他们没有和老百姓们一起撤退，偷偷的留了下来，在前沿阵地硝烟弥漫的那些日子，给他们留下了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

后来，何佳汝为此还去了一次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她最大的志愿是当一名民兵，可是他们让她做了小学辅导员，她的任务就是给小学生讲当年的经历，她说：“现在的学生已经不听那些故事了！”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十三、四岁。从七月份部队进入阵地，整个前沿就笼罩着打仗的气氛，老百姓分期分批的都撤退了。有天晚上10点多，我们在学校接到紧急通知，说是晚上全部都得移走，只留下一百多个民兵，而且还要是贫下中农。那个时候乱哄哄的，大家都在拿衣服和行李。我们就躲在老师的办公桌下面，或者跑到树上，老师和家长都找不到我们。家长向老师要人，老师说：“你们

赶快先回去，我们保证把学生交回给你。”结果卡车一走，我们就赶快跑到阵地上去找解放军叔叔。

我们备战了一个多月，对前线已经非常熟悉了。解放军叔叔说：“你们都应该移到后方去，你们留下来造成了负担，仗打起来可不是好玩的。”我们说：“我们要跟你们在一起，我们不怕。”最后解放军还是让我们留了下来。

防空洞就是把一个窟窿用门板盖起来，我们就呆在那里，防空洞里的条件非常艰苦，同学们没有叫苦的。我们留下来就是要干活儿的，我们去扛炮弹。那时候不能点灯，阵地上坑洼不平，我们三四个人抬着一个炮弹。解放军和民兵不让我们扛，因为炮弹很重，要一百多斤。我们说：“我们留下来就是要干事情，不干事情我们就不留下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很不适应，眼睛都熬红了，半个多月以后就适应了。当时的炮战打了四个多月，前两个月是天天打，到后来就单打双不打。因为他们被打得很惨，他们没有粮食吃不行，总理说要发扬人道主义，不能让老百姓饿死，要让他们生产，就变成了单打双不打。这样一直到 1978 年，到《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就没有再打。

我们留下来十几个人，没有牺牲的。我们起初害怕，后来就不害怕了。我们也有差一点就死了的，有一枚炮弹打到了防空洞里，可是没有爆炸。如果要爆炸的话，我们就全部完蛋了。当时的战斗非常紧张，我们的一所学校，一天就被炸了一百多枚炸弹。

后来叫我去开会，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辈都接见了我们。我们去北京坐的是军用专机，那是 1964 年。听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能够睡着觉，都穿了最好的衣服，当时也没有什么化妆，就是梳头。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人民大会堂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就不停，很多人的眼泪掉下来。毛主席来了，要和我们代表照相，那天中央的领导都来了。

有一个人到我们这边来采访，我们就把我们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听了以后很感动，这是 58 年 10 月的事。他是一位作曲家，他边和我们走边问我们为什么要留下来，我们就向他汇报了。他说：“等一下我给你们听歌。”我们当时说：“那么厉害，这样就能写出歌？”很快他们两个就哼起来，然后他们唱给我们听，还说以后写好了寄来给我们，1978 年就通过这首歌为少先队队歌。

后来叫我去搞社教，社会主义教育嘛！我不想去，我说我喜欢民兵工作，但那个书记说：“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积极组织入党，他说：“应该服从分配，要去！”只好打起背包就去了，要不然不行嘛。去的时候生活是很艰苦的，贫下中农更比我们苦得多，我们吃不好睡不好，整天要开座谈会，了解干部的情况。那个时候的斗争是很尖锐的，晚上我们出去访贫问苦，那个地方还有好多土匪，我们晚上蹿来蹿去，民兵连长就批评：“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晚上这样走呢？”我说：“不要紧。”他说：“怎么能够不要紧呢？”以前我们是跟敌人炮对着炮枪对着枪干，现在我们要和

暗藏的敌人斗争。以后晚上就不敢让我一个人独自出去了。搞社教我是不喜欢去的，因为服从组织需要我才去。

后来他们又叫我到学校来工作，我也不喜欢来，我说我一向就喜欢民兵工作。他们说：“拿工资是最高级的人了，你还不要？”我说：“我这种人不是当教师的，我宁愿晚上去站岗。”我是孩子的时候就在站岗，他们叫我到团省委去当干部，我说：“不要，不要，我喜欢民兵工作。”领导就笑了，他说：“一辈子要当民兵，你不要嫁出去了？”我说：“我要嫁出去，也嫁到我们何厝。”我那个时候管理学校还兼民兵，站岗一直站到78年，生活很充实。我是晚婚，我当时只想干事情，不想那么早结婚。

当时，别人说我们是英雄小八路，送给我们锦旗，还让我们去做报告。上了讲台，我说：“讲什么呢？”老师说：“就讲你们怎么做。”我就讲了几句话，后来老师就说：“这样讲不行嘛，这样讲叫什么报告呢？”他教我们这么讲：“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样就留了下来？要把过程讲出来，怎样扛炮弹？怎么困难？”一个一个的给我们启发，一个一个地向我们提问，我们这样才会讲出来，要不然我们不会讲的。我们去做报告的时候都是穿得破破烂烂，家长看到都哭了，说这些孩子太可怜，那时候的生产非常艰苦，但是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非常好，大家都很团结。

现在年轻人听我们这些故事，听一次就可以了，多了他们就不愿意听了。我们要讲的时候，他们要是不注意听，我们就生气，我

们说：“如果你们在那个年代，你们不一定会留下来，留下来也不一定会坚持到底。”

一个人，你不能一下把他捧得很高，后来又一下把他摔得很低。58 年的时候我们是鲜花铺路，走到哪里都非常非常的受人爱戴。到了文革，我们也从来没有搞过武斗，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们一直站岗，可是后来有好几个民兵站到了我家大门口。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难受，我哭了，我说，我们每天都站在大海边防止小股敌人上岸，可是我们现在却被人家站岗。我们没有做对党不起的事情，我们的“英雄小八路”是用生命换来的，不是说谁送给我的。

（她哭了）你们每天站在我们家门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安分守己的劳动，我的家庭是贫下中农，我三代祖宗历史都是清白的，我是堂堂正正的民兵连长。就因为跟他们不同派，因为我们没有介入，就这样对待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伙伴，他是受了冤枉的富农子弟，他不是真的富农，却被斗得很惨，从 68 年到劳改农场劳动一直到 71 年才停止。我们是从来不搞坏事情的，为什么要折磨我们这些人？

运动结束以后，有些人来向我们解释，不是我们要来站你的岗，是别人要我们来，我们怎么敢不来呢？

这些年我还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学校里到现在，听说展览馆还要叫我去当管理。现在的孩子都不爱听我们过去的故事，我说这些孩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已经不懂得什么叫大炮了，我们很

心酸。他们不懂得那些革命先烈是怎么流血牺牲，我讲的时候，他们还笑，我问他们：“红领巾为什么会红？红旗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才换来了今天，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可他们说那是布料，你说气人不气人？

（这时候，坐在一旁听着的何星赞插话，他也是当年的“英雄小八路”之一）

我有个看法，为什么说现在的人会这样？和基层的干部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平平常常的，现在都讲皮包胀起来的人，这些人讲话是管用的，我们讲话不管用。我向好多媒介提过意见，是不是在全国要来一个叫做什么教育的，我不懂得题词，不懂得讲，你口袋里的钱花在哪里，要怎么去花，现在年轻人都不懂得，所以他感到花钱很自然。我们也就没有力量影响他们。像你这样的人，我们跟你讲老话，你能听得进去，其实能够听得进这句话的很少的。

（何佳汝接着说）

现在的人对以前的艰苦生活忘得一干二净，一有钱就忘记了过去。列宁讲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你现在的幸福生活是谁给你的？他们总说我们跟毛泽东思想跟得非常紧，我们的孩子跟别人讲：“我们家有两个雷锋。我爸爸和我妈妈。”

忘记过去的都是那些当官的人，我们那时候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都忘记了。我们要举办小八路的活动，他们能跑掉的都跑掉，如果要开一个什么企业家的会，他们却要争着去。

我们从来没有向大队要过一分钱，我们从来没有给大队增加过什么负担，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唱起少先队队歌，我们都很激动，它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年代，一些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好像还在昨天发生的一样，很清晰的印在我的脑子里。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回忆，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何星赞最后说）

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工作，都是在给别人打工，我们没有伸过手。可你看看他们，如果再不进行传统教育，就完蛋了。

孤独的旅游

胡 伟：访问地点是南昌凯盟酒吧；开始录音的时间是 11 月 18 日 15 时 30 分；他是一位推销员；29 岁。

在我抵达南昌几个小时之后，省经济电台的《青春快车》为我做了一期节目，介绍我和我的这本书。据说这个节目和她的主持人在这座城市的年轻人中很受欢迎，听众很多，主持人希望我和这里的听众多一些交流。

第一个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是一个小伙子，听他的声音和我差不多年纪。他说他是在路上边听 WALKMAN，边打手机和我们通话。他和我谈到了盖洛普调查和文化遗产诸如此类的问题。谈到我的旅行访问，他说：“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做这样的事。”

节目结束后，这个小伙子又将电话打了进来，我意识到他是想

和我谈谈。于是我们约好了在附近的一个酒吧见面，他同时说，他是一个另类青年。

这家酒吧的外墙被装饰成一堵破砖墙，有一辆车曾破墙而过，房间里的墙上挂满了二战时期的作战地图等图片。

我见到了他。后来我明白他说的另类是什么意思。不是身上挂满了叮当做响的金属片或者像刀枪剑戟的发型，所谓“另类”，他指得是他的观念和经历。

生活中只有像你这样的人，和我才有天涯若比邻的感觉，我实在是太孤独了。

我还是会执着的对未来追求一些什么东西，现在我每天下午都会想好，明天该做什么事情。如果说每天上班八点钟起床，我就会认认真真的把闹钟上好，可是，昨天三点钟看流星雨我没有看到。

今年五月份到南京，我去了地质博物馆，去看了李四光工作过的老房子。当时看到一个家长带着一个小孩儿，来看那些科普知识和恐龙化石。他就像是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穿得非常普通，你去问他很多问题，他会很认真地回答你。我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只有一对父子，就再也没有别人，一排排的化石，没有人参观，我感到非常的悲哀。我有了一种失落感，你说，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很相像，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总说要加强思想工作，中国的人的思想就更加的没有个性了。

我很喜欢北京这座城市，在那座城市里你可以给骑着车和黑人赛跑，可以钻进小胡同里被戴着袖章的老太太大吼一声。在北京，很多地方我都去过，但是每一个城市我都会留一点悬念，我刻意的不去，我想，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以后故地重游。

十几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出去过一次。那个时候我站在两节车厢中间，又困又饿，有个列车员大姐就带我到她家去睡觉吃饭，我都住得不好意思了。我这次去南京还特意找过他，但是已经找不到她了。在南京，我从长江大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回忆十几年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在这些岁月里我又知道了一些什么。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对比，我个人在这个时间也经常做一些怀旧的东西，这次到南京我去了他们的山西路和湖南路，那里还有一些三十年代的洋房，独门独户，是一些权贵住的地方。我在南京的音乐台，一个下午一个人站在那里，看见那么多鸽子，听着德彪西的曲子和流行歌曲。坐在那里慢慢的听，你会觉得很温暖。你看见白发的夫妻结伴在一起，能感觉到那种人间的温情。如果你读过一些历史书，你就会知道那些建筑的设计者都是一些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南京的三十年代，我觉得那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

在聚会的时候我常常听朋友们说话，“不多不少的钱，不大不小的官，成家立业三十而立”这些东西。我在想，在这个世界上我能拥有什么呢？我在南京买了一些自己觉得很好的东西，像日本

时期发行的那种明信片，那里有一些人文的东西，我觉得很好。比如说我收集了很多门票，我会把它当作遗产来保存，留给后人。我一直在想，这个地球上死掉的人比活着的人要多。这种文明的东西怎么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我觉得需要传承，有时候我会想到家族，一代一代会影响一代一代的，看你在什么环境中长大。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你已经长大到能决定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就不会变了。就像我很高兴认识像你这样的朋友，有一些这样的生动的人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有精神寄托，我就能抵抗一些周围的东西。也可能在過去的环境中我失去的东西很多，时间对我们来说越来越宝贵了，那么一定要学会放弃，放弃也许是转变的一种过程，比如说去西藏，去买一架尼康照相机，可能这些我都会放弃。我也想学会成家，去找一个喜欢的女孩子，过一种平淡的生活。我会觉得过得很好。我就怕跟周围有一些隔膜，也许只是因为我不愿意跟别人说话。

这种孤独的感觉，我经常想起来，有一句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想去和古人对话，但是他们不在我的身边，想和身边的人说说话，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一开口说出来，别人就会说：“你想那么多干什么？”也可能会认为你有毛病。有时候我会想，身边的人，来来往往到处奔波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世界真的是熙熙攘攘，我们这一代人都在这个转型期当中，可能我们会成为牺牲品，但也许有很多东西会树立起来，我们是为未来铺平了道路。

那天，我自己做一个生存体验，我用创可贴贴著眼睛，试着用一只眼睛去烧菜、看书、看电视，我什么都尝试了一下。最后我打开它，我突然觉得挺好。就像我吃一顿饭一样，我会感谢生活，觉得每一天都是很美好的。有多大的逆境，我也会觉得我们生活着是很美好的。今年，我每天都在把我干了些什么事情简短的记录下来，到有些地方去我会拼命的写东西，比如说敦煌和草原。写好了，也许我就会一直放在那里，我想总有一天我打开来看，我绝对不会舍得把它丢掉。

我经常问这些问题，生存和死亡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对我有一种启示。我可能害怕过死亡，可能经历过一些有惊无险的东西，就觉得生命非常重要。有一次我在壶口瀑布，岸上的泥沙是一些很浮动的土，我当时穿着双拖鞋，有句话叫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知道河对面就是陕西。我用一个二十块钱的相机把自己的脚拍了下来，把我的脚印拍了下来，那是一种很自由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拖鞋一滑失去重心，我差点掉进壶口瀑布里。

我到一個地方很喜欢看当地的报纸，我关心当地有没有什么演唱会，有没有什么热闹，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我如果住在旅馆里边，会向他们讨一些旧报纸，晚上拿回来看。我在苏州就看到了一个关于文史馆的消息，那个文史馆的桌子上摊开来一幅明朝的地图，能够辨认出苏州的一些地区。我在那里看资料，我喜欢一些人文的东西，关于苏州这个地方和苏州这些人，最后我要求复印这些

资料。一位老先生说：“你是搞什么工作的，怎么会这么认真？复印很贵的，你要报销吗？”我说：“我不要报销，你要是能少就少算一点儿。”他说：“你这么大的声问我复印，少是不好少了，我是馆长，如果你以后要什么资料的话，就打电话过来，我一定免费复印寄给你。”我觉得他真的很真诚，他给我留了地址和电话。我们可以认识这样的人，后来我也留了一张名片给他。我觉得这就是上代人对文化的一种关爱。他这样就给了我一种动力，我觉得我应当尽可能地去做一些事情。

（他随意的说着，这时候我们看到，窗外有个民工用脚蹬着地面，让架子车在马路上掠过。）

我接触的许多客户就是这样拖板车的，但是现在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温州有些五年前拖板车的人，今天他们可能有一百万的资产。可在南昌这样的内陆城市，和温州比起来，我就发现他没有朝气。我有时候从那边坐火车回来，到这里是清晨。那边的这个时候，大街上一派熙熙攘攘，这边却只有上学的学生。虽然到了夜晚好像灯火辉煌，灯红酒绿的，但是我觉得这分明是一些假象的东西，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如果要是像西方那样，在大街上，看见陌生人向他微笑，说声你好，……也许我应该放弃一些东西，随遇而安，忍受生活。我以前非常欣赏一句话，“心动不如行动。”美术和音乐使我找到了很多乐趣，使我发现了生活美好的一面。我真希望街上走的所有的人都能去看看画展，听

听音乐，也许这些事情在欧洲是可能会发生的。我有时候想人生应该更加丰富一些，比如说去吃一顿西餐，在音乐厅的门口等等退票。

我爱过一些女孩子，现在没有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站在她的旁边。我可能最大的寄托是我未来的爱人，是不是会有一个女孩子爱我，会和我风雨同舟，白头到老。我觉得我必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才能够做得到这些。

今天我受到你的影响很大，否则我不会有勇气和这里的老板谈话，比如说我身边走过去一个女孩子，我就不会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一个北京来的朋友的访问？也许匆匆走过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他可能会有一大片的天空中展示给你，但是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有一次，从杭州去苏州，我特意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是坐船。轮船公司门口有旅行社，那里有推荐景点的图片。我就拿了一些进了侯船室，这时我看见一个女孩子，侯船室人不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长得很漂亮。我感觉这个女孩子真得很好，我想，如果她跟我一起坐船到苏州，在路上我也会有一个旅伴。但是我就不晓得如何去跟她讲话，后来我想拿我的东西放在她旁边，让她帮我看一下，我去打传呼给我的同学。但是我走近她的时候，却放在旁边一对情侣的身旁，请他们帮我看。我出去打电话回来以后，看见她还是一个人，我看离开船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不可能再有什么更多的人了，当时真的有某种心动的感觉。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过去认识她。

正好我手上有一份宣传介绍，我想用一种平常心给她看一下也好，首先我给旁边的一对情侣看了看，然后把宣传资料给她看，我说：“这是运河之旅的介绍，如果有必要你可以留一份。”她问我：“你也是一个人吗，你是哪里来的？”我说我从南昌来，去苏州，她说她去无锡，我们开始谈话的感觉很好。她说她一个人出来的心情是很不错的，她可以回去以后更好的工作。我也没有问她是干什么的，她问我：“你会去无锡吗？”这时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就想放弃了。最后她去了无锡，我去了苏州，我留了她的手机号码，到了苏州我一下船就打电话，我说：“我准备到无锡去，你在哪里？”她说她已经在灵山大佛了，晚上就要回上海，我说：“我现在就马上赶到无锡。”她说，她可能没有时间了，后来我想，就算了吧！

我曾经把游船上的一盏灯拿下来，我想，如果去了无锡，就把灯送给她。那天船上只有三个人，我的感觉非常复杂，我想起我在内蒙古坐在汽车上的时候，非常颠簸，我想起在张家口，我曾经骑辆自行车在山路上摊开双手，那时我觉得很愉快。我想也许会把自己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我并不想去评判什么，有些事情只想让别人去看，去感受，生活中有这些东西，可以让我活的很生动。

我得生存

高景新：访问地点是天津辽北路；开始录音的时间是12月10日16时；他是一位下岗工人，现在靠蹬三轮谋生；40岁。

从他祖辈那代起，他们家已在这条街上住了七十多年，每个人都认识他。76 年地震的时候，他帮助许多人家盖过房子，现在他有一辆木板车，有时候他用它来给一些老人拉煤气罐。

这辆板车用场很大，他们全家都指着它吃饭，自从下岗以后，他就骑着木板车给人家送货，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块钱。

这两天他在巷口开了一个卖日常用品的杂货铺，因为他没有执照，他也不知道能开到哪一天。

“别人吃剩下的饭我都会吃”，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老婆孩子，我就不一定活下去了。”

我父母的家住在这儿至少已经六十年了。高中毕业以后我就顶替接了我父亲的班，我也在厂子里也呆了十八年，现在我在家里呆着有三年了。

在家里呆了三年，是谁非让我回来的呢？是厂子让我回来的，他们说：“你回家吧！”回来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回来不少人。厂子里头没有活，不是我不干活儿，不是说我不乐意上班。我说：“我回家算什么呢？”他说：“你是下岗了。”每月给你一百多块钱，一百多块钱是给了，给了多长时间呢？给了一年半。以后就不给了。我就去找厂长，我说：“厂长，我没有生活来源。”他说：“生活这方面没有了，现在。”我说：“为嘛没有了？电台报纸不是说下岗职工都有生活费吗？”厂长就把条文给我拿出来，他说：“你看看，条文上有。上面还印有江泽民他们签的字。有这个文，但是钱从哪

里出呢？也不能从我们口袋里出啊？”

我在家里这两年期间，最多可以每月拿到六百多块钱。给人家送货，六百多块钱我维持了一个家庭。我家里的已经在家呆了五年，她也是下岗。我们还要给单位交养老保险。我爱人在区粮店卖粮食，现在这个粮店已经关了，他们不给我爱人生活来源，我爱人还要往外掏。当我没有工资以后，我家里的也没有工资了，她卖了一个工龄，给了五千多块钱。她上班二十多年，比我早，这样就完了，你回家吧！养老保险你自己上，每个月街道给你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费。给你两年，过了两年就不给了。现在我还不如他，我现在一分钱没有。

我现在为嘛蹬三轮送货呢？因为我有一个小孩儿，为了下一代我要生存。我孩子今年 15 了，上初三，学习还比较刻苦，非常的老实。为了他，我要赚钱。你看见刚才咱们走过的那个小亭子吗，我才弄了一个多月，逼得我实在没招了。我现在每个月蹬三轮也就拿到四百多块钱，加上我爱人一百多。孩子上学要钱，上学的费用比较大，我生活也要用钱，一个礼拜要去三天伺候母亲，伺候老的这是应该的，拿我来说，我长多高这钱就得排多高，老人活到 80 多岁，我能不能活到 80 多岁我都不敢想，我敢说我活不到那个岁数。

我每天吃饭都要考虑考虑，有时候别人剩的饭给我，我也可以吃，别人剩的盒饭我拿回家来吃，省钱吧。我思想上想得比较多的

是，我的生存不可能这样下去，咱们没本事，没有地方挣钱，活着有什么劲呢？还不如死了。人活着没有骨气的话，那不是白活吗？你说想法挣钱，咱们挣钱又不能挣那些黑钱，骗人，咱不能干那事，不明不白的钱咱们不能挣。还是因为改革开放好吧，我比较满意的还是我还能活动，还能挣点钱，能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就比较满足了。你说要去挣大钱，我想我的脑子可能比较落后，我不是说一分钱都借不来。但是，这投资能回来吗？

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主要都是在给人家打工，有在饭馆里刷碗的，烙饼的，做个小吃的，卖个油条豆浆的，一个月三百多块钱，干些零杂。现在卖东西也不大好卖，他们管理的太严格。我在马路边上卖点桔子卖点苹果，警察来了以后给你把东西放到车上以后扬长而去，你做点小生意，他全给你拿走了，你还能问他要吗？你就是去要，他开的罚款单比这些东西的价格都多。他还要那些干什么呢？他就不要了。

太艰难了，我跟我那口子说，也就是因为由你们娘儿俩，如果没有你们娘儿俩，我回到家乡一呆就完了。实在不行，生活再维持不了，孩子就不要上学了。要不咱就，我就想了一个招，咱们一块死。我想这一步，就说明我太无能了。她说，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靠着这力量来支撑，很多人经常劝我，年轻轻的，怎么会想到那些事情呢？

我现在刚刚有了这个小铺，办了一个公用电话，又上点烟酒什

么的，我已经满足了。我现在就想让孩子上学，能达到他的目的，像我们这样四十多岁的人再上学也是不可能的，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前几年的时候在翻盖厂房时，我从三楼掉下来把腰摔坏了，到医院一看，医生说你这个毛病，时间长了会瘫痪。我现在蹬三轮，我也不怕他瘫了，你说我不出去能行吗？不过，真要是有一天，我是一点辙都没有了。

有一次碰见大夫，他说：“你这样还蹬三轮车哪？”看病也不给报销，即便是有病，我也不舍得拿积累下来的钱去买药。我躺一躺起来，也不说，有病只好扛着。我说我们下岗了没有生活费，我在北京的亲戚听了都不信。

我在巷子口开的这个小亭子，邻居们都说，人家要是来管理怎么办呢？我说，他来了，我可以跟他讲讲理，他们说：“你讲什么理？”我说：“单位不给我钱，你们要是不相信，你们可以跟我到单位去看，我说话你们肯定不相信，我带你们去。打出租车的费用我都包了。单位要是给我一分钱，我全都给你们。单位要说，姓高的，你没有生活费，那你们就得让我干。照我起不了，我拿什么起执照？我现在上的货还都是找人借钱上的。亭子带上货加起来就两千多块钱。都是朋友支持我。我得生存。”

我想，现在像我这种条件的也不止我一家，如果没有下一代，我自己早就想辙了，我想得这个辙你们都不知道，我说心里话，活

得太累了！还要交什么辅导费，我借钱也得供他上学！他如果能上大学，我可以把房子卖了。他有他的前途，那是他的一辈子。如果他真是块材料，就不能可惜了。

我有时候就想问问，是不是以后有钱人家的孩子能上学，没钱人家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

谁不想吃的好一点？有钱的话还可以到外边去洗个澡，我跟家里边儿说，咱们的生活，挣多少是多少，吃便宜的菜，吃点菜叶子也行，我们没本事没能耐，可是我们有志气。谁都想吃好喝好想享乐。有钱咱不会花吗？五块钱洗个澡，我干嘛不去？娱乐娱乐、看看戏、跳个舞？我有钱我干嘛不那样？问题是咱们的生活来源就到了这个份上，咱们就得省吃俭用。把钱省下来供孩子上学，也就这一个目的。

也有幸运的事儿，那次我蹬着三轮，刹不了闸了，闸坏了，从坡上下来，一下子撞到一辆夏利出租车上，司机们都下来了，大家嚷嚷着叫我赔。车主看看车，看看我，问我：“你不是某某街上的谁谁谁吗？”我说：“我是。”因为在我们那一块儿，谁家老人拉个煤气罐什么的，我都能去帮忙，好多人都知道。

他说：“你撞的这个，要赔的话得赔不少钱呢，可我不让你赔，我认识你，你是个好人。”

我就是个闲人

于 彤：访问地点是北京鼓楼根大石碑；开始录音的时间是12月19日14时30分；他是一位“闲人”；32岁。

“你是画画的吗？”“我不画画”。

“那你是写小说的？”“我不写小说”。

“那你搞乐队？”“我不搞乐队”。

“那你是干什么的？”“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是个闲人”。

“太好了”。

——一个女孩和他的对话

我们在他的家里随意聊天，他在房子中间用布搞了一个帐篷一样的东西，他有很多书，他喜欢看书。

朋友们叫他“老屁”。

我吧，现在整个就是个闲人。特好玩儿在哪儿呢？我闲着和别人闲不一样。有些闲人总在干事，画个画，搞个乐队什么的，我属于那种纯粹的闲着，什么我都不干。我也可以听，我也可以看，我也可以有意见，我也想干，但是也许是性格有些软弱，干脆我就什么都不干。后来我发现我自己是在做一名观察者，我就怀疑这样倒挺好。

有一次特别好玩儿，我们在一起吃饭。有一个女孩儿和我第一次见面，一大桌子人，她就坐在我对面，她问我：“你是画画的吗？”我说：“不是。”她看我的样子有点儿奇怪，我一直留着长头发，留

了好多年，而且成天骑着摩托车，挺脏的。她问我：“那你是写小说的吗？”我说：“我不写小说。”又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是演员？”我说：“我不演戏。”她就不停的在这些职业中间问，最后问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就跟她说：“我跟你讲，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成天闲着。”然后她忽然特别高兴，她说：“太好了！太好了！现在还有你这样的人在。”我忽然发现闲人成了一种名分。现在我周围的朋友一听说我干了什么事，就说：“你怎么干这事？你就该闲到底！”我跟好多人说，我是在消费，我是在消费闲时，他们是消费钱，他们挣到了钱，然后再去消费，他们可以拿钱去买闲时，可以休息一天去哪儿玩，实际上我消费的价值和他们是一样的。

其实我做生意特别特别早，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我小时候就开始集邮，我就开始倒邮票。然后就开始倒卖衣服，不好好上学，一直都特别想赚钱。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反抗学校的教育制度，我每天把书包往学校一放，然后就跑了，到西城图书馆看书去。我就喜欢乱看书。估摸着学校放学了，我再回家，学习成绩很差。后来我就和朋友想了一个招，要先发财，然后再去上学。

我小时候那会儿，那绝对就是文化沙漠，什么都没有。我老爹不在北京，也是因为文革的什么事情，我老爹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看书的人，他有一些特别好的习惯，坚持记日记，一回到北京就去逛书店，他喜欢书的那一股子劲特别感染我，他回北京的时候我就天天和他在一起，他去逛书店，给他自己买书，也给我买书。

有一件事情需要感激，就是我遇见的人都特别好，许多人都对我都很有帮助。我们院是一个大杂院，我们院楼上有一朱妈妈家，她的四个女儿都是大学生，她们家里有很多小说。我们院还有一位沈奶奶，这沈奶奶太神了。沈奶奶是解放前的一个大户人家，他父亲可能是中国第一代的铁路工程师，家里边儿特别有钱，还有十几个兄弟姐妹。有很多都出了国，在国外，她从小受到的都是西方的教育，在教会学校上的学。她的丈夫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抓起来，在监狱里死了。她每天就在家闲着，她和街道上的老太太全都不一样，那老太太一出来，就绝对起范儿，真的。她夏天穿着自己做的旗袍式的衣服，冬天就是翻毛的大氅。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她特别喜欢我，我小时候长得不这样，我长的特胖，特别好玩儿。她经常给我讲故事，现在长大了我想，实际上她就是想找个聊天的对象。我只要一下幼儿园，就直接跑到她们家里，她坐在沙发上，我坐在小板凳上，我们院子的小孩儿都去，但我和她关系最好。她开始先点上烟斗，她有自己一套程序，然后她就开始讲给我们听，讲什么呢？讲成本的小说。不是讲闲篇儿，不讲贾雨村言的故事，她讲《悲惨世界》什么的，她是在凭着记忆讲话，《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福尔摩斯》，这些书都是我长大以后，才想起来，“这个沈奶奶给我讲过，是这个故事。”

她讲故事是这么讲，你来往这个地方一坐，她把烟点上，先聊上几句别的话，然后我们就说：“沈奶奶，你快讲吧！”她就问我们：

“昨天讲到什么地方？”她开始讲：“这人进来了，这些人看见屋里还有一个人，那人叫什么呢？”她就开始在屋里找，她看半天，看见了一个花瓶，她说：“这人就叫花瓶吧！”然后她就开始讲“花瓶”怎么了，这故事就一直这么讲下去，比如说“独臂人”，这就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名字，剩下的那些名字全都是“小花盆”这样的名字，有时候她自己还编一个名字，“小雪”什么的，就这样，她给你讲了成本故事。长大以后我一看小说，才知道那个人是谁，另外一个人是谁，就全都能对上号了。

她也让我给她找书，她说：“你爸爸不是有很多书吗？”我小时候对书还不是特别清楚，除了小人书。她让我给她拿书，我就给她拿颜色我特别喜欢的书。我记得有一本还是《共产党宣言》，是老版的书，一个兰框中间有一个红五星，繁体的大红字。我觉得那个肯定非常好看。我小时候看我爸看书，他一边看书一边喝糖水，我觉得特别的好。我就拿着大书和厚书，在里边找字。看完了第一本小说，我和沈奶奶就交流的多了，我也开始能买书了，和我爸一起我也可以开始选择书了。那时借的书都没头没尾，许多书都翻着角。我们院子还有一个人也挺神的，那人是老兵团的，病退了，属于那种闲散人员。我们院子的人很破落，他们都是属于那种过去的小商人小文人的。我不是到他们那儿就是到沈奶奶那里玩儿。那时候我什么都喜欢，没有什么书，我就特别喜欢到人家借书，然后拿给沈奶奶看，我就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

我上了中学以后，我们能够交流的东西就更多了，我们变成什么了呢？就变成了她开始说她的私事了，她已经不是光给我讲故事，她开始给我讲她大家族之间的恩怨。我听着，也开始发表我的看法，那个时候我十几岁，当时不觉得，现在觉得她说的那些事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就像启蒙似的。她那个时候也有六七十岁了，我们聊的那些事情都是她一辈子的经验过程，好多具体的我都记不起来了。我记得有一次谈话，她说什么叫做好朋友：“就是每天两个人在一起下棋，然后可能也聊天，但是两人又不过事儿，没有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什么的，两个人就是下下棋，每天见见面，什么时候有一天你没来，我就觉得这一天好像有什么事情没有过去似的，等到过两天看见你，就特高兴。”我觉得她说的这种朋友关系是双方没有负担的、纯粹的朋友关系，她跟我讲这些类似的东西讲的特别多。她说到感情。“有一个人就属于能够摇摇头就走的人，这位男主人公走到一个地方，遇到一个十几年没见的情人，这情人跟他处的关系特别好，但是这个女的知道这个男的还要走，她特别了解这个男的，这个男的又走了，这个女的就和他难舍难分，可是两个人一见面，特别高兴。但是知道他走也是必然的，这个男人到了下一站可能又有一个老情人，这个人也知道他在别的地方也有情人，但是没关系，他们两个人就是好。”她觉得这种状态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但是那时候我才只有 17 岁，我还不怎么懂。

她也讲一些家里特别琐碎的事情，我就陪她聊天，沈奶奶还是

基督徒，但是她也给我讲武侠故事，受她的影响，直到现在还觉得还珠楼主是最好的武侠小说作家。那个老太太绝对是一大神人，她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晚上不睡觉，一下就到三、四点钟，就是看书，到了下午，两点多钟起来吃她的午餐，她的午餐和别人的也不一样，她用的锅和别人的不一样，她用的是南方人用的那种小锅，她熬棒子面粥，再来点儿苹果，这就是她的午餐。我们两个还老打架，因为那个老太太脾气特别怪异，我们大家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儿，可能就是因为一句什么话，我们俩就谁也不理谁，一直不说话，过一段日子，两个人就又说话了。

她为什么喜欢我？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院儿的水管子那块儿我觉得很滑，我总是把水管子旁边地上的冰除下去，这样她就能走着特别方便，所以她特别喜欢我。我总帮她干一些事情，她特别好玩儿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她会说英文，她说：“我以后管你叫 NAUGHTY BOY（淘气孩子），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别管。等你长大了学了英文，我一直叫了你十几年的 NAUGHTY BOY，你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她成天没事儿就特别的悠闲，生活虽然苦，但一看是破落，不是那种穷困。她常常一个人在家玩骨牌，她教我玩儿，我也没有玩会。她的那种状态我特别喜欢，我那时候在家里偷支烟出来，她要抽烟的时候，我说：“沈奶奶，你抽我的。”她就说：“好。”然后坐得特别端正，她说：“你得给我点上烟。”我就给她点着，她说：“这是我一次抽你给我点的烟。”这句话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在这里一下子长大成人了，被她承认了。

我和沈奶奶那时候聊的东西和生活格格不入，没有什么关系。我回到家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和胡同里的小痞子小流氓什么的在一起，我那个时候生活就是这样，这一块儿那一块儿的。我心里还是最喜欢和沈奶奶在一起。再长大一些，新华书店开始卖再版书，有许多文学名著，书店一卖书就排大队，书店门口就跟市场似的，一说要买《约翰克里斯多夫》，有的人一买就买三套。我还能看见他们换书，就特别的兴奋。后来我们院又回来了几个兵团的人，我永远好像是和我比较大的人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又在聊书，又在聊兵团的生活，我就又比较感兴趣，这样，看书的习惯就一直延续下来。

有许多事情我觉得经历最重要，我觉得这跟看电影一样，很多经验不是你亲历的话，成为不了你的经验，我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如果你没有经历就很难变成你的经验。我还特别喜欢生活里出现什么岔子，我觉得特别好玩儿。

从两个到三个

吕松松、张涵：访问地点是北京永乐小区他们的家；开始录音的时间是12月26日10时；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一个新生儿的父亲和母亲；父亲26岁，母亲28岁。

他们是我最后要找的人，1990年12月26日，我的整个访问

即将结束，这时我见到了他们和他们马上就要一周岁的孩子。

一次意外使他们有了这个孩子，他们为这个孩子结了婚，但这并不是个很无奈的故事。

我喜欢他们和他们的这个孩子，我看到了一种事物或者一个人，不，两个人的成长。

在近一年前，我就要开始旅行的时候，我当然不认识他们，这个孩子也还没有降生，可这会儿，在我和他的父母要进行一次与他有亲密关系的谈话时，他坐在手推车里，要下楼去呼吸新鲜空气了。

他们的孩子起名叫林放，放虎归山，自由的意思。

要说到他，我们得先从他的父亲母亲说起。

吕松松：我觉得这一切，就在于我选择了一种不太负责任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表面上看，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的确很自由。这不象在一个单位，你不仅要在专业上作贡献，你还要在道德上注意自己，你是不是迟到、早退？是不是交女朋友？和这些事情没有关系了，我的状态就比较自在。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是他让我们认识了，而且不是故意的，是一次偶然。那个晚上，我那个朋友和她在一起，说是去看另外一个人开的商店。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她。

前一段我的一个朋友说，对我们的事，他一直不明白，特别惊

讶，一直没有好意思问。这次终于问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把这件事说具体，就必须从头交代。因为在我们认识之前，我有一个女朋友。但是那时候已经有点儿不太稳定。张涵呢，也有一个男朋友，但是这个关系也有些……但她的事情我就有点不好说了。然后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认识了，认识以后谁也没理谁。当时我们打小面的回家的时候，我和她坐在出租车里。我听说她是弹钢琴的，我就问：“你觉得谁的音乐最好？”其实这个问题特幼稚，如果有人要问我：“你是画画的，你觉得谁的画最好？”我就会笑，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特别业余的人才问的。当时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没话找话，在那之后有半年我们没有联系过。最早的联系是她来找我，她说她想在广州办一个音乐会，然后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主要是她想让我帮她设计一个节目单之类的东西，最后这个音乐会也没有开成，但是因为这件事请，我们就往更深的深渊走去。是不是？张涵，我说的都属实吧！如果不属实，你就跳出来。我比较喜欢轻音乐，到最后我也没能明白，我到底是喜欢轻音乐？还是喜欢演奏音乐的人。

我们的相识并不是特别的浪漫，那个时候我有一辆摩托车，像警察开的那种带跨斗的。她第一次请我吃饭，谈那个节目单的事，那时候我们都比较认真，没有那个意思，而且在那之后也没有那个意思。我就开摩托车送她回家，本来我也没想送她回家，我觉得你打辆车回家不就完了吗。但是她特别想坐摩托车，我们就开着那辆

摩托车在三环路上兜风。她们家应该从蓟门桥那儿拐过去了，我们却一直开到三元桥那边又开回来，她特别高兴，觉得特别刺激，就像坐了免费过山车似的，还没完没了了。我当时就觉得她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因为特别自觉的坐我这辆摩托车的女性不是特别多，她们觉得太快了，或者说“怎么那么脏”什么的。

她和我的很多想法都不太一样，并不能说是因为志同道合什么的才走到一起，我们的一些想法和做的事情都有些矛盾的地方。内心的冲突都挺多的，并不能够完全把握住自己的生活。但是也有希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共同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都做得很出色，都控制得很好，而且经常是我们没有控制好，经常是事与愿违。但是我想，生命这样子才是挺有意思的，要不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做得出来的都是你希望的，都是你设想的，那就没劲了。在我们接触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未来会怎么样，可能甚至都没有想到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因为那个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都还早呢！不会想到有一个那样的生活，在一年以后就等着我们。如果当时有所谓的显灵呢，在梦中有个声音说：“吕松松，给你展示一幅图画吧！”或者放了一段录像片，说，“这是你一年之后的生活。”那我打起行李就跑了。（笑）

张：他经常跟我说，如果在吃饭的那天有人跟我说，这就是你老婆，你要去见的就是未来那个要娶的人，他说，我当时就不去了。

吕：我当时觉得就是这样的，但是她来了，也挺好。我们在一

起的时候主要是听音乐会什么的。我们开始聊音乐，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原来我听音乐就是喜欢听，我也不太懂，上大学的时候听摇滚乐、爵士乐，快毕业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古典音乐，觉得挺好的。我觉得音乐这件事对我和她的影响都比较大。如果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个占很大的比重。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中没有一个宗教信仰，我们也没有宗教，我本身也不想有一个形式化的宗教信仰。这些东西和我个人的生活不太相称，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空前绝后的，前面没有继承什么，到后面怎么发展也不知道，你知道这是什么教育，这种教育带给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以前可能在也是这种制度的国家中出现这样的情况，他给你的那种东西、那种理想什么的看上去很不错，但是又很空洞，如果你想接受这种东西，你的心总是很空虚，你的心不是有一个很充足的立足点。音乐这种东西，在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不能把它说成是信仰吧，但是可以起到一些信仰的作用，有这样的一些成分，它比较抽象，而且这种信仰从来不是说教，这种形式是一种很严谨并不容易很快理解的东西，但是你在理解的时候，它比其它形式都要直接，到达你的内心。

她是学音乐的，她和我的这种不是搞音乐的人对音乐看法不一样，跟不是画画的人去看画一样，我带她去看画展，她特别高兴。“这个画真好看，那个画红红绿绿的。”我们就会说：“这个没劲，那个是学谁的，这幅画形式一点儿也不均衡，很做作。”我在听音

乐会的时候，我会说：“这个人弹得很不错，又快又凶狠。真过瘾！”她就会说：“这全是错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也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好的音乐艺术，你是无法回避的。说他好，是因为他特别纯粹，特别干净利落。比如像巴赫的一些钢琴作品，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和弦乐三重奏，好的让你觉得必须相信他。因为他有这种魅力。我和她认识，这也是一种机会，我本来也很喜欢的一个东西，从听听而已到入迷，我打心底里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在这一点上有一种喜悦和新奇。

（孩子要出门了，张涵要让小保姆带着他到楼下去晒晒太阳吹吹风，这时候我问他们，从恋爱到结婚有一年的时间吗？）

这个故事不对你讲清楚，就不太负责任。

我们是先怀的孩子再结的婚，差不多有了孩子几个月以后才结的婚，实际上，我们是为了小孩儿才结的婚。

张：我们俩开会开了很长时间，把家里边闹翻了，我们家里，她们家里，我们家里听说好好的一个女儿在外面突然……我打电话回家，说我怀孕了，我有孩子了，家里的人还没见过他，

吕：其实她的心理比我有意思，因为她这个人比较神经质，我觉得我还比较正常，可以说吧，当面说总比背后说好吧！

张：他比我小，小两岁。

吕：我开始也想不明白，我怎么比她小。后来我想其实这也没什么。

张：开始，就是在三环路上兜风的时候，特别舒服。

吕：她的事……（问张）我能说吧？毕业以后，她去广州了，在广州乐团。她去广州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是听她说的。今年夏天我们一起去了趟广州，她把在乐团的辞职手续都办完了。她毕业后本来有机会留在北京，但她这个人神经质嘛，这个挺有意思的，我毕业的时候我至少起码知道我去什么地方，可她从来没有去过广州，在广州也没有任何关系。毕业后就非要到广州去工作，他父母家在成都，她从小在杭州长大，然后，她工作了四年就觉得没劲，就要回北京，就又回来了。我觉得这样一个人，怎么回事？摸不透。就因为这种好奇心，就要摸摸透。

张：结果一摸就透。

吕：再说说有小孩儿的事，她有一次问我：“要是有了小孩儿怎么办？”我当时也比较幼稚，而且，一件事是你设想的和摆在你面前是两回事，我设想要是小孩儿那就要。过两天她就说：“是真的有了。”我说：“啊？这还了得！”我就想，我的家庭比较繁杂，我奶奶我外公了都健在，这一家人也都对我挺关心的，我还有很多舅舅姑姑什么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对我都很好。我如果突然告诉他们：“我要有孩子了，我要结婚了。”这个太突然了，我想，我怎么跟家里人说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可能把这个问题想的也太过分了，我害怕因为我的什么东西伤害他们。我觉得有时候也不得不这么想，做一些事情都想想家里人。

其实后来证明这些想法也确实太多余。我们俩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天天开会，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孩子，一块儿讨论。我倾向于可以先要这个孩子，但是不结婚，我认为如果因为这个孩子结婚的话，对我们的好处都不太大。而且我们本来也没有谈到要结婚的事。因为有这么个制度，因为要遵从这个制度，不得不这样做，我就特别恨这种感觉。要是由着我的性子，我才不呢。后来我发现人的伸缩度也很大。——这个事情，我第一个跟我妈妈说了。

张：他跟他妈妈说了以后，他妈妈哭了，我记得他多次给我描述这件事，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做了一件事。”他妈妈刚看了一个戒毒展，给他吓坏了，以为他犯罪了，然后他就说：“我女朋友怀孕了。”他妈妈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还有我这个女朋友。

吕：那个时候……（问张）你不介意的，反正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以前的女朋友谈到要结婚的事，我们家的人对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挺接受的。这个事对我妈来说挺突然，我妈这个人挺善良，事情出来她首先想的不是她自己，她觉得她怎么样都可以，她只是觉得除了她以外的家庭成员能不能接受。后来我妈妈把这个事情跟我父亲说起，那已经是很晚的事，她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张：我怀孕几个月以后，夏天的时候，他过生日，8月13号，我去他们家里，要跟他们家里人见一面。他特别紧张，还去晚了，我去剪了一个头发，把头发剪得特别短，他爸爸觉得就是一个女朋友，也没觉得怎么着。他妈妈对我挺好的，让我吃水果。我觉得他

妈妈的每句话都是挺有意思的，“这是猕猴桃，特别有营养！”我特别不好意思，临走的时候，他妈还给我们拿了一大堆核桃，还有红枣。

吕：我爸问我妈：“是什么东西？”我妈说：“你别管！”我爸是一个特简单的人，他也不管。当他知道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那赶快结婚吧！还犹豫什么。他还挺高兴。

张：现在最喜欢这个孩子的是他爸。他特别喜欢来看小孩儿。

吕：我和我爸不是从小在一块，不是很熟悉，也不是经常交流，他特别厉害，我小时候很怕他。这件事情一出现，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说：“要当爸爸了！？”

张：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从天而降的，真的就是这样，我根本不能相信我怀孕了，太意外了，我到现在也不能回忆起来是在什么时候。我那时候脑子特别乱，刚离开我的男朋友，我以前也有男朋友，也是跟他差不多一样的情况，我们家里边也已经接受了，快结婚了。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和原来的男朋友已经住在一块，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家，我跟原来的男朋友好了有很多年，但是我经常到广州跑来跑去的，也不是经常在一起。怀孕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一起住，我就觉得不对，那个女孩儿说，去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怎么办呢？我一下就蒙了，我跟他说，我们暂时不要确定恋爱关系，因为我刚刚离开以前的生活，还没有稳定下来。我说，我想一个人多呆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怀孕，对我来说也是特别大的打击。当然第一个

念头就是不要了，有了孩子只有两个选择，要，还是不要。我当时作了很多的打算，我就想，怎么办呢，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这对于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严峻的事情了，对于他来说肯定更厉害。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很冲动，天天开着摩托从这儿跑到亚运村去，那么远的路他都天天飞奔了去。我觉得这种状况不是很正常，所以我想，不告诉他，自己回家去，假如要孩子也是我自己要。

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就先给我表姐打了一个电话，她给我说的话对我影响挺大。她说，“有孩子干嘛不要？孩子完全是你的。”我说起他那种状态，她说：“你不要去想他，他不一定会为你负责，有了一个孩子以后，你就会觉得有很多幸福，不管这个男人负不负责，你不要管他。”她问我是不是想要孩子，我想这一生总是想要一个孩子的，她说：“那你就不要管别的事。跟结婚没有关系。”她跟我具体的分析了帐单什么的，要一个孩子要怎么样，需要有怎样的准备，一直鼓励我。然后说：“你妈那儿我去说。”然后她就跟我们家里人说了，我妈第二天就要飞来，拼命阻止才没有来。我爸气坏了，他问我：“你想想有没有出息，一个男人比你小，你想想将来会怎样？现在科学那么发达，有试管婴儿，你想要孩子还不简单嘛？”他当然是为我负责，认为我的婚姻是最主要的，“马上结婚！”但是我们当时是坚决不结婚。我跟我爸爸谈过，我不愿意在这种状态下结婚，我觉得这对我自己不负责任。我说，不结婚，但

是要孩子，他说，有三条路，第三条是你绝对不能走的，第一个是最好的，你赶快回家来，我们家好好照顾你，做人流什么的，我妈妈都作好准备了，哥哥请假也请好了；第二条就是马上结婚；第三条就是你们说的这种方法，是绝对不允许走的，就把我痛骂一顿，我跟我爸争论了也没什么用，我们是九月底才结的婚。

吕：9月28号。

张：那段时期特别痛苦，现在我觉得挺好的，也没有什么了。我以前经常跟朋友说，我觉得生孩子就是对这个社会不负责任，人口已经那么多了，小小的这个地球，你没有为她做什么贡献，你还要给她增加负担。这当然是开玩笑。让我的话，我觉得最好是领养一个孩子，这也是为社会减轻负担。干嘛非得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呢？我觉得挺矛盾的，我也说不出来。

（一位在旁边听着的朋友忍不住问：“你妈妈为什么哭呢？”）

吕：我觉得有时候女人哭并不是说明她伤心，它是对外界突然刺激的事物的反应，有时候这种反应是带有自我保护似的。就像壁虎尾巴一样。

张：（笑）你说你妈妈哭像壁虎尾巴，吕松松，你要当心，他是会写出来的。

吕：我不给我妈看就是了。不是说她特别难过，就是这件事情太突然了。而且她可能没有做好在五十多岁就要做奶奶的心理准备。其实我的奶奶在五十多岁就做了奶奶了。

张：计划生育多重要，完全多了一代人。

吕：我觉得挺庆幸的，那时候我奶奶已经癌症晚期，她自己都不知道，能在她有生之年看到我有了孩子，她肯定挺高兴。而且就在我知道有孩子这件事的前一个月，有一次家里人在吃饭，我的姑姑说：“什么时候松松要有了孩子，就四世同堂了。”然后我说：“谁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要不要孩子还都是一回事呢！”我奶奶听到这话，她会很伤心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在那之后很快，我知道我要有个小孩了。后来我们一直在商量这件事，一直在矛盾之中。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也是挺突然的。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张：有了孩子就等于判无期徒刑了。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切合实际，我现在回忆起来，怀孕的时候，感受和身体都发生了变化，就想把孩子生下来，头三个月不要孩子还有可能，三个月以后就挺困难的了，在这三个月之间我就逼着他。因为他总在摇晃。

吕：其实我当时非常矛盾，在我得知她怀孕之前，我一直在画画，那个状态还挺好的，元旦的时候我们还对新年寄予期望，我们听说 98 年是国际美术年，大家还很高兴，我们还要干什么的。得知她怀孕以后，我就没再画画。并不是说我们天天争论，我们也到医院里去做检查，一直在犹豫。因为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状态，两个人既要为这件事做共同的打算，又要各自做自己的打算，这个心照不宣的很厉害，斗争的很激烈，就像搞政治一样。

虽然也有感情，是一对情侣，但还有一个“我该怎么办”的问题，互相都给自己留后路，然后还要谈条件，就跟谈判一样。现在我知道某些谈判为什么谈那么多年，都是要争夺更大的利益，但是我们还不完全是这么冷冰冰的。

张：还不愿意损害浪漫的幻想。

吕：在这时候也要替对方考虑，因为不仅是有感情，而且感情很深的。就想怎么办？

但是这个东西又非常现实，一决定之后就不仅仅是感情的付出了，这是一个生活的彻底变化。这个变化你都无法预计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还是冲着要保住这个小孩儿。所以我们去医院做检查。我们还到灵山去骑了一次马，张涵非要骑马，后来我特生气，我说，你不要骑马。这些被我的一个朋友看到眼里，去年他从别人那儿得知这消息后，他说：“我在六月份骑马的时候就知道了。”以后就是她和她家里的争执，我和家里没有什么争执，我的母亲找我小姨谈过，她们从大人的角度去看，觉得要这个孩子过于仓促。她就和家里打电话谈这件事，家里的意思是要不你就赶快结婚，要不你就不要这孩子，绝对不能要了孩子不结婚。当时我们有一些逆反心态，为什么有了孩子就必须结婚？后来发现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户口，要不然他就是一个黑人了，他们说这样做完全对孩子不负责任。我们就想，也确实有些问题，既然想要他，就得让他和别的孩子是完全平等的，因为你可以不在乎这种社会制

度，但是他毕竟要在这种制度中生存。后来的转机就在于，我们想来想去，除了这种逆反心理以外，没有更多的理由、更强烈的要求我们不结婚而生孩子，我们的感情也不错，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虽然有很多未知数。有时候人就是这样，我得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也许还能得到更好的，所以我们就想，那就先这样。我们并不是很快作了决定，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还需要去开很多证明，她的单位要开介绍信，她的单位在广州，我的也要开介绍信，还要去做婚检什么的。那一个时期醒来的时候就觉得还有这么一件事，要有孩子了，怎么办哪？

张：我刚开始跟他讲的时候，他以为是我在开玩笑，他说：“不会是真的吧？”我是想要他一个真心地答案，要他一个确切的选择。我就说：“你要是有了选择，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哪怕是我一个人带孩子也好。我没有告诉他我自己怎么想，我只想知道一个他的想法，即使在这之前我已经想过，我一定要个孩子。但是我又在想，假如他不要，我就知道这个人我是不能靠了，我想家里也不能靠，我可以到外地去，我表姐说，你要生孩子可以到我这里来生。我还想过我的工作，或者回到广州去，或者去别的地方，反正躲起来。也许我就想不要这个孩子了。所以我一定要一个他的回答，我就知道怎么办。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我觉得他很冲动，他特别高兴：“要啊！干嘛不要？”但冷静下来以后，他又说：“算了吧！”他这一说算了，我脑子就马上紧张起来了。反正总是一天变好几遍。

我都害怕死了，我想只有三个月的考虑，过了三个月就没有选择了。他那时候非常关心我，但有时候又说：“算了吧。”他说：“我们两个如果不要孩子，该多么幸福啊。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我会对你特别好。”好像该说的话都说了。我们就一直翻来覆去的折腾了两三个月，我当时也很动荡不安，还搬了一次家，我觉得我不能和他再住在一起，必须有一个冷静的时候。他醒来以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我，我们俩必需要在这种矛盾中才能够安心，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当时有一个女朋友和我住在一起，她也在帮我绞尽脑汁地想。

吕：当时不仅要面对她，还要面对她的那个女朋友，她也经常要跟我谈一下，其实那个人很好。她说话的语气都是站在我的立场，但是我听来听去好像都是她在为张涵做外交官。

张英：我说了一个方式，我说，我们将结婚只是一个手续，这个证书只是给孩子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一种实际上的制度上的婚姻。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当时我们也许还没有达到能够结婚的程度。当时我就这么说，其实我也不想嫁给你，这不是很可怕的是事情，现在的女孩儿都觉得要找一个可靠的丈夫，我从小都喜欢比我大很多的男孩子，他们可靠一些。我用这样的方式和他谈，我说，既然我们已经是这样，没有办法了，只是把那个证书拿回家吧。

吕：我有一个朋友从美国来，住在我这里。他本来特别想

让我陪他去四川青海一带玩

儿，当时这种情况，我根本就不可能跟他出去玩儿。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他刚一来就听说了。他比我小，我跟他说，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麻烦，说完了，他特别正经的说：“是这个样子。”他想了半天：“在我们美国，你完全可以不对这个事情负责，你可以跑了嘛。”后来他特别想见见张涵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吃了一次饭。后来他对我说：“这个人还不错。”不知不觉我们就把这三个月过来了，不得不这样，这样做选择就轻松很多了，没有机会再让你反悔，面对的就是做这件事，那就把这件事做了。到了夏天我们还到海边去玩儿了一场。回来以后，她拿到了她的介绍信，我也拿到了我的介绍信，就开始准备结婚了。

我们到 301 医院去做身体检查，这个也很有意思。医生说：“都怀孕了这么长时间了，赶快结婚！”当时我们觉得真挺好玩儿，因为这些制度从来没有接触过。最后，9 月 28 号早上起来，我们就说：“走，结婚去吧！”我觉得我到那个时候还挺自然，她可能有点不自在，挺矛盾的，有点难受，哭哭啼啼的。走之前在家里眼圈儿还红了一次。我觉得可能出嫁前都会有这么一出。我们出门可能也晚了一点，10 点半才从家里出来，就开着我的摩托车到羊坊店去结婚，那里正在修路，尘土飞扬的。我们赶快停了车，就去民政科里边，一进了大门，我闻见了一股饭的味道，我说，坏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到了。一些人正在那里分盒饭，他们说，下午再来吧！

张：婚没结成，我还挺高兴的，像还有缓和的机会。

吕：我们当时就去了一个凉快的地方，去了麦当劳，看报纸，也没有说什么话。那个

时候也挺有意思的，两个人都沉默，也许是心照不宣吧，谁都不理谁。一点儿都没有甜蜜蜜的感觉，看看时间，觉得下午该上班了，就说，走吧。我们的车在梅地亚宾馆门口还停了一会儿，她还哭了一场，吵了一架，人们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她面对的是一件能够改变生活的重大的事情。可是，那个过程特别简单，就是盖一个章子，就把我们盖到一起了。

张：有趣的是办手续的人，乐呵呵地。

吕：她那时候有点担心，婚检上写着是有孕，而且她肚子都有点起来了，因为在我们

的制度里，你是不可以先怀孕的，你想怀孕，必须要经过好多检查，然后单位再发给你一个准生证，生育指标，一年几个指标，如果人家把几个指标领了，你还不能生了，你就得等明年了。

张：我们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痛苦。一般人觉得结婚是很高兴，快乐的，充满喜庆

的事，我们却是经历了家里面的反对，自己的斗争。我们才真正认识半年多，就嫁给他了。就这么着急和他结婚了，心里边就像窝着一些什么。还没有生出一个孩子，你就要为他结婚了，心里边总会有点不高兴。我觉得哭完了就行了。从家里临走前他特别高兴，

一个劲儿催我，说：“快点，快点，晚啦晚啦！”我那个时候也不太方便，那时候也肯定有点软弱，而且闷了一中午，好像故意跟他找了一个茬，我说：“停车，在这里吵一架！”其实就是通过一个方式发泄一下，然后就高兴了。没进去之前还拍了两场照片，那是一个工地，没有人给我们拍照，我们就互相给对方拍了一张照片。我们办手续的时候，还有一对夫妻在开离婚证，我们还问了一句：“都在这里啊？”人家说：“都在这里。”那人说有些人离婚特高兴，来这里还说说笑笑的。我还说，原来都在一个地方。这时候还来了一位老先生，讯问老年人结婚的情况，特别不好意思。

张：我也想过很多，有时候想想宇宙生命什么的，就觉得自己很渺小。也没什么。我

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是向最好的方向发展。

吕：家里边也没怎么样，我妈妈买一个蛋糕，奶奶送给她一个戒指。

张：那个时候北京的污染非常大，我最害怕的是，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生下孩子不

健康，这是所有可能会怀孕的人都担心的事。而且我当时的条件并不好，一直那么累，看书上写到，因为空气污染导致的畸形儿很多，吓得不得了，我们还买了空气净化器。那个时候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怎样让孩子健康，我们看书，书上说怎么样就会对孩子产生不好，我们就吓得不得了，就采取措施，既然已经结婚了，和他们

家的接触也多起来，她妈妈还经常带我买东西。还开始了音乐胎教。

吕：一开始是每个月都要到医院去查一次，到了最后两个月，每两周去一次，到了后

一个月，每周都要体检。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工作，这一点比较好。有时候就开始在猜，到底是男是女？这我也不是特别在乎，也可能儿子更好玩儿一点，张涵希望是一个女儿。到了1月24日，她妈妈从成都来了，夜里头来的，早上5点多钟我去车站接她，到家里的时候张英在睡觉，我就觉得有了一种家庭的气氛，原来我们两个人没有太强的家庭气氛，她妈妈一来，就觉得特温暖。他妈妈来了以后两天，孩子就生了。1月28号我们去医院检查，反应已经比较强烈了，医生说，住院吧！因为医院里吃的特别差，我们就到一个馆子里要了很多菜，当时张涵已经特别能吃，因为她当时在吃两个人的东西。

在医院走廊里，我发现都是和我一样摇摇晃晃的人，大家的状态都很相同，而且都在互相交换经验。大家都在说，有的人在这里待产一个礼拜了还没有生，有的一来就生产了。后来医生就把我们轰下来。我回到家。她妈妈跟我说：“你早点睡，没准儿晚上医生就会叫你。”我还说：“不会那么快生吧！”我觉得不太可能，后来到夜里电话就响了，我就跑去接电话，那边是一个比较粗鲁的女中音：“你是张涵的家属吗？快来医院，生了！”我当时也还清醒，但是觉得太突然，不知道什么“生了”，我问：“什么生了？”她说：

“孩子生了，三点半生的。”当时的表就指着三点半，一生她就给你打电话。她妈妈也醒来了，我说：“孩子生了，是个男孩。”我也没拿什么东西，就下楼去热车，然后就上路了。在路上开得很快，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种情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原来也有类似的期望和情绪，考大学领取通知书的时候，但那个和这个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是不一样的。

到了医院，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还锁着大门，我从门上翻了进去，根本不像一个父亲的行为。病房里有六个床位，张涵的病床上睡着一位老太太，是旁边产妇的陪床。我就去找值班护士，也没见着人，我就在空荡荡的楼里跑来跑去，就听见我的皮鞋在走廊里踢里匡啷的响。在病房我只看到了她穿的衣服，我想，她可能还没有出产房，就又去了产房。有两个疲惫不堪的男人正在那里坐着，睡的已经很熟了。产房有两道弹簧门，在夜里的走廊里，门吱扭扭的响，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过道，推开弹簧门，我看见一辆手推车，车上都是一些被子，白颜色的，我正要往里走，突然看见被子中间露着张涵的脑袋，我说：“咳，她在这儿呢！”我看见她特别安静，她醒着，脸色很白，没有什么血色的样子，但是很美，在她旁边的位置上有一个小脑袋，象一块小肉馅。我想，这就是我儿子？当时就是觉得特别美，那个美不是美丽的美，就是感觉到特别的幸福。

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后面的弹簧门开了，进来了一位护士，让我把车推到病房去，我就把她们推到了病房。

我记得早上看见小孩儿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睁开了一只眼睛，挺吓人。我就有了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人家说小孩儿在出生的时候是没有视力，他看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看了你一眼，你就觉得他正在看你，而且是有穿透力的眼神。

张：他生下来就看着我，我当时已经麻木，他眼睛转两下看着我，我觉得挺吓人的。

我想，突然的，就多了一个人了。

1999 年的最后几天，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我呆在我在亚运村租住的小屋里，开始了我的整理工作，顺便等待那个“新千年”的来临。

在这个寒风料峭的北京，我没有再打算去访问谁，自从认识那个健康的林放和他的父母之后，我觉得可以为这个长达一年的旅行访问划一个句号了。最后的这个故事是充满希望的明朗的故事。下一个千年到来的时候，林放将迎来他的周岁生日，他的父母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比起他的父母，他应该有一个更自由、更富足和更幸福的生活，就像比起我们的父辈，我们所享有的生活一样。

我愿意这么想，等到他长大一点，他应当能呼吸到更加清新的空气，他能够在一片干净湿润的绿地上奔跑，他的想象力能够得到鼓励，他所有合理的愿望都可以实现。我愿意想，作为一个

孩子，他完全可以大方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说他对天空的看法，对恐龙这种史前动物的解释，对颜色的态度，对雨的感受，哪怕是一个多么幼稚的结论，那也是他自己的，不是谁强加给他的，或者是谁暗示给他的，而且比起大人们那些复杂的说法，他也许会有一个更正确的结论。在受到爱护和尊重的同时，在他摔了跤自己能够爬起，犯了错误自己能够纠正的同时，他能学会爱别人，尊重别人，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平等、诚实、责任心便开始生根。

我愿意这么想，等到他成为一个少年，一个青年，他会充满朝气，充满自信，他会有一个结实健壮的身体，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他应当能够在假期去远的地方旅行，去访问山川河流，了解道路的走向，他能够凭借星斗辨认方向，他对自然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他很少生病，一旦受了伤，他也知道如何治疗自己的伤痛；他能够了解庄稼生长的过程，能够叫出那些农作物和树木的名字；在他的作文中，他不用去写那些空泛的假话，他之所以热爱学习，那是因为他对要学习的事物充满了兴趣，那是一些可以触摸的活的事物，他们甚至会为课本中的故事流泪；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当那些空泛的数目字在脑袋里活过来，他们又会欣喜万分；他们会指着地理书中的某一幅照片说，这是多么美丽的地方，总有一天我要到那里去；他们也会看着历史书中的某一段描述默默地想，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总有一天我要像他那样；

他可以把物理、化学知识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也可以用英语对某一位迎面而来的外国朋友说：“我喜欢你的国家，当然，我的国家也一样了不起。”我多么愿意这么想，他之所以勤奋而快乐地学习，只是，仅仅是为了把他自己变成一个优秀的普通人。

我愿意这么想，等到他真正地长大成人，他能够学会恋爱，学会失恋，学会找到真爱，他将在每一次恋爱中得到成长。他和他的情人可以自由而认真地选择生活，选择爱的方式，选择分离或者结合的方式，他们能够体会彼此的感受，学习保护对方的知识，他们能够把热情传送到对方心里，他们的生命互相关联，但他们彼此并不从属。他们的爱情能够创造出一个广阔天地，他们因此而不会轻易厌倦，而当他们真的厌倦，他们当然会鼓励对方和自己寻找更好的生活。同样，他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在不危害他人的前提下，他可以自由地发展他自己。如果他能够在在一事物中得到快乐，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他就创造出了最重要的东西：他自己！这样，他就不会在乎因为从事某一种工作而自感优越，也不会因为从事另一种工作而自觉丢人。这样，他就能够从容自由地处理自己的白天和黑夜，灵魂和身体，他只是他自己，不是任何一个别人。

我愿意这么想，等他也成长为父亲，他会成为自己孩子的榜样，孩子为他的父亲骄傲，并不是因为他多么伟大或者多么威武，而是因为他多么自由，多么快乐，多么丰富。他会教会孩子怀念

那些已经绝种的动物族群，告诉他如何查阅字典和地图；他会带孩子去看每一场激动人心的球赛，教他在胜利时欢呼自己喜欢的球员的名字；他会教给他有关性的知识，告诉他生命的由来，给他讲爸爸和妈妈恋爱的故事，同时他会教给他有关烹调、园艺和旅行的知识，并且让他试着——尝试。就这样，父亲引领着孩子，母亲陪伴着孩子，他会学会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如何尊重别人的权利。

我坚定地愿意这么想，等他有一天衰老，他也会衰老的，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背着行囊去访问他的时候，在回忆中，他也许会流泪，为那些让他特别珍惜的美好的事。

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他会记得有一本书里提到过他的名字，但他绝不会记得这书里写了些什么，这本书里记叙的先辈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他必将忘记。诗人布罗茨基说：“自由，就是忘记暴君的名字！”忘记过去并不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意味着彻底的解放，忘记过去意味着不再有过去。

这是那个我们能够信任的未来吗？报纸上到处都登载着迎接新千年的消息，商场里清点着即将削价酬宾的货物，电视台赶排着大呼小叫的喜庆节目，世界各国都像打了鸡血似的瞪着眼睛数数：“十、九、八、七-----”

我想起一位诗人在五十年前写下的诗句：“时间开始了-----”

结束

我开始收拾行李，那个大旅行包上积满了灰尘，录音机仍然能够运转，一部分照片还没有来得及冲洗，所有的东西全瘫在那里，像是我明天又将踏上旅程似的。

我不禁有点惶惑，我摊开地图，看到那些做了标记的地名、铁路和公路，还有那么一大片的地方仍是空白，我不需要再走了吗？不需要再去访问更多的陌生人吗？这个国家还有多少需要去记录的故事呢？

面前是摊了一桌子的资料、笔记、照片，我将他们一一翻阅，许多自己亲历的事件，有趣的细节，在字里行间，在底片上留存下来的人们的笑容中间，清晰地突现出来。然而我经常 would 问自己，你真的到过那里吗？那天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时间？你遇到了什么人？这些记忆甚至会模糊起来，然而只要闭上眼睛，不知是哪一個由头，那个地方的气息就会扑面而来，那个时间就会像新年钟声敲响一样确切。

这是我所经历的一年。在我的四万六千公里的行程中，我无数次感觉到它的漫长。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质疑，我是在怎样的仓促之中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而我所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我所经历的一年，在我离开一位朋友或者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的间歇，我也无数次感觉到它的短暂。有许多理由可以让我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有更多的理由让我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

将这道路重走一遍！

我记住了那些地名、人名，以及他们故事中提及的地名、人名，我开始理解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的故事。我知道我触摸到的只是他们记忆的躯体和皮毛，但那些毛发分明在簌簌发抖，那些皮肤下分明流淌着血液，我能感觉到他们呼吸的温度和颤动的节奏，我懂得那是些真实的生命。

打开录音机，我开始倾听那些收集来的故事。当磁带转动，他们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的脑子里马上浮现出他们说话的表情，他们的姿势，他们的笑容和他们悲伤的泪水。他们在大海边，在林间，在茶馆，在自己的家里给我讲述那些久远的或是刚刚发生的故事，他们讲述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热爱、担忧、愤怒，还有仇恨。

这工作让我精疲力竭。那些声音，那些声音所代表的深沉的力量让我不可抵挡。在他们的倾诉之中，我知道我面对的是多么重大的主题。

百姓语录

在《百姓语录》这一部分，我尽可能留下了更多的声音。由于

篇幅、录音质量、风格的选择和其它各种因素的限制，我不可能将这一部分的言说内容完全展示在本纪实报告的主体部分《倾诉与倾听》之中。

我之所以将这些谈话整理并记录下来，是因为我觉得，这些看上去散乱的经历、观念、感受，与那些完整的叙述同样重要，在这本书中不可缺失。

1月5日10时；广州天河东路的立交桥下，访问街头贩卖假证件者胡先生（40岁）我的第一例访问

我的家乡在湘黔边界的农村，在我们那里，很多乡镇当官的都在贪污，把提留款和罚款都塞进自己的腰包里。为了上学的孩子，我看到有人在广州赚了钱回去，就来到这里做起了这个担惊受怕的生意，一天只吃一顿饭，要过年了，没有钱买车票回家去。

又不能去偷去抢，那样会伤天害理。富人有钱养小姐，穷人吃不上饭，这个地方完蛋了！

1月6日14时；广州沙河顶一间租来的民房里；访问“地下摇滚歌手”敖博（27岁）

他说：“在南昌有些朋友，他们的口头语是：‘黑呀！好黑！’”

这是他写的一首歌：

黑呀/真黑呀/要多黑/有多黑/黑呀/太黑了/简直又黑又亮/比黑社会还黑/比光明还亮/这样的黑又亮/让人无法想象/这样的黑又亮/让人心都凉了/你的时间不长了/我听见每个人都这样讲/黑又亮

1月7日16时30分；深圳某贸易大楼，访问期货经纪人罗海宾（29岁）

我看到大街上有钱人吃饭花那么多钱，再看那些小孩子在砖厂里搬砖头，农村有些孩子八九岁就在家里干活做饭，我们单位有个领导的小孩，每天小车接送，为了写一篇有关钓鱼的作文，父母陪他去银湖钓鱼，一篇作文花了两百块钱。

20时；某公司员工宿舍；访问湖南新邵打工仔李海洋（19岁）

我以前在深圳服役，在我们农村，当兵是一条出路，当然，保卫祖国这个口号比较响亮，但个人的前途考虑也是很现实的。我们是农村的，父母一定要我出人头地，脱离那种环境，从小我在他们的这种灌输下长大，出来感受外面的世界以后，就怕带着一种挫败感回到家。我有一个理想，骑着自行车从深圳到北京去，一旦有可能我就做这件事。当然现在我最大的愿望，还是在深圳安一个家。

访问广东揭阳打工妹蔡小华（20岁）

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深圳是个大染缸，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是，人的思想都腐朽了。我这个年龄不该看到的听到的也都看到了听到了。我没有考大学，这就是一个社会大学，我比起以前有了转变，因为我看到了黑暗的一面，比如公款挥霍、滥用职权。社会在前进，不能把西方的糟粕、堕落的思想都吸收进来。在深圳这个地方，我不相信任何人，我只相信我自己。

访问长春大屯打工仔韩智（21岁）

人活着肯定能做一些什么，我经常尝试，我到底能做一些什么？我肯定要先挑一些喜欢的事情，等到没有钱了，就得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唯一的目的是锻炼，我最大的愿望是办一所慈善学校。我认为你可以过几年再写一本书，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1月8日20时30分；深圳莲花福利小区；访问职业打假者、消协工作人员杨剑昌（40余岁）；因为害怕不明身份的人侵扰，他对我反复询问。侵扰他家人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多起。

他们打电话恐吓过我，说几千万买我的人头。我的小孩在屋里写作业，他们拿着刀走进来，连六七岁的小孩都不放过，我冲出去说，你要砍就砍我。我的心情很痛苦，他们要把我往死里整，我背着沉重的包袱。有两年，我没有生活费，没有工作。

为什么腐败不能制止下去，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贪，小贪变大贪，大贪变腐败。这个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得不到打击，犯罪得不到惩治，就是社会的悲哀。

1月9日15时；深圳龙岗周立太律师租住的民居；访问暂住在这里的打工仔付建林；（17岁）他在前不久因工致残，失去了一只手。此时周律师正在帮他打官司。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跟家里人说这件事，我断了这只手，还没有跟父母说，骗他们，我不忍心，打电话时，我的心里是闭着眼睛

的。他们知道了以后能否接受这个现实，这是个大问题。

本来在这边的梦想，不说大事业，至少立足吧！可这个梦想也破灭了，现在只有踏踏实实的，比起在学校里的梦想，真是天地之别了。

1 月 12 日 13 时 30 分；蛇口港；访问摆书法摊的老人鹿中行（78 岁）。

你要说真实的话，人们不会跟你说真话，十年以后可能有人说真话，现在说真话的，十分之一都不会有，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关心有什么用处呢？老百姓关心老百姓没有用，他无钱、无权、没有背景、地位、靠山，没有力量，仅仅是人血液中的一个红血球，他没有抗御的能力，无论天灾人祸，自己都不能抗拒。老百姓仅仅是老百姓，我很少用人民这个词，人民这个概念变形了，不是我们几十年前说的人民了，现在的人民只包括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把他们叫做人民，我们只能说我们是老百姓，我们还不够资格做人家的人民。

1 月 14 日 20 时；三亚某医院；访问医生王正立。（43 岁）

治病的事情本来比较简单，加上市场的因素就使它变的复杂了，常见的一个腰疼，开个几块钱的药多数解决问题，再换一个人，真的上百上千的药给人家用。比如他为什么要给你开 CT？在有些医院，开一个 CT 能得 30 块钱，开十个就能得 300 块钱，相当于工

资的三分之一。

另外一个感受最深的就是见死不救，由于经济的原因，无论是110送来的还是家属送来的，院长和医务科会说，要抢救，但是不能输血，不能用贵重东西。可比如车祸的失血性休克，就是没有血造成的，不输血就等于把人搞死。我记得某医院有一次，采石场几个工友送来一个工人，他们都很穷，送来就走了。医院不知道他是谁，他的老板是谁。这个人就躺在急救室，出气的时候血就往外冒，但他的生命力很强，摆了两三天才把他摆死。真得没有办法。医院要救他可能要花几千上万，这就是一条人命。

22 时 30 分；三亚某住宅楼；访问酒店高级管理人员陈遥（33 岁）

我在歌舞厅做过经理，在歌舞厅里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灵魂，白天他们道貌岸然，到了晚上就原形毕露。最丑恶的不是那些小姐，而是那些嫖娼的人，但这些人往往是一些国家干部，所以我常常感到没有希望，怎么这么腐败啊！

1 月 16 日 16 时；屯昌某农场；访问老农垦工人杜子权（66 岁），他在这个偏僻的农场已经呆了 50 年。

现在也没有放电影的了，出去一趟十八公里，七块钱，领导坐小车转来转去，我们不敢出去，出去没有饭吃。当官的来这里，第一年大展宏图，干的第二年开始有私图了，第三年拍拍屁股走了。我们呢？原来这里都是荒滩，我们挑着行李进来的，一点一点铺路

盖房进来的，我们是服从党的分配来这儿的，是不会讲价钱的。

1月19日8时30分；北海夜巴黎夜总会；访问服务员甘国霞（21岁）。

我妈叫我回去，我说算了，打工打到二十四岁，回去再找个婆家。说是这么说，心里边还是不服的，找了婆家还不是要受委屈，不如学点东西。现在我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又没有一亩田一分地，现在我在学做衣服，反正衣服年年都要穿的。自己闷的时候，找张废纸，乱写乱画，夜班十个小时，时间就是这样打发的。我喜欢看杂志，看别人的故事比我还悲惨，有什么不开心，想想这些，我还是很幸福的。

11时；北海太和酒店大堂；访问房地产商言行一（40余岁）。

我现在很热爱共产党。现在允许别人讲话了。

我记得小时候我跟妈妈去看病，看到人家桌上有一个台风扇，我就觉得那个太奢侈不过了，太豪华了。现在少则彩电冰箱，多则汽车、豪华公寓，这就是进步了，我觉得，我们的领导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

我为什么赞成现在的政府和领导呢？我看到思想解放一次快过一次，我觉得整个中国有希望。

1月20日10时；广西民族学院；访问毛难族教授覃永绵（60岁）。

我们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受的灾难，那也是无法估计的，我父

亲因为一些小事情，在县里被打的脑子里边都看见了，他还是顽强的活了下来。我们没有怨言，也没有鸣冤，这是整个历史的悲剧，不是我们一家的事。

我们民族最喜欢的是松树，我们向松树学习，在石头缝里也能长出来。

13 时；访问农村大学生莫凌华（20 岁）

我学习法律，坦率的说，有点封建意识在里边，我们家乡，宗族之间有点歧视。我们家人口少，又没有钱，没有权，大家族总会欺负你。

要么我要找钱，要么我要找权。我的目的不是从政以后惩罚他们，没有这个必要，我只要证明，你们不要小看人，不是哪个人生出来就是这么窝囊的。

1 月 21 日 14 时；南宁广西电影制片厂；访问电影导演徐顺达（62 岁）。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去十三陵劳动，劳动的时候发包子，发馒头，每人两个牛肉包子，因为馒头不够吃。后来“反右”，有人就批判我：“徐顺达资产阶级思想非常强烈，大家都只吃两个牛肉包子，他一抓就是四个。”我有一个同学吴志宏就站出来，他那个时候才十六岁，他说：“不对，当时我在他旁边，我看见他只拿了两个牛肉包子。”

这个时候，我接受批判，下去改造，都不太了解情况了，后来

我才知道，他为我吃了一辈子苦。当时组织好多人帮助他，他们说：“徐顺达这个人非常反动，你干嘛替他说话？下一次声明你说错了。”又一次批判会，他又站起来，他说：“我上次说的话没有错，我拒绝收回，完了。”他说完就坐下了，当时帮助他的人白费劲了，痛哭一场。

我不知道，他被勒令退学以后，政治审查，不让他读书，想去找工作，不让他工作，后来拉了好几年的板车为生。

我几十年总想找个什么东西弥补，但我始终也不如意，我是一点忙也帮不上，结果他得了机会，反而来找我合作，这样，我和他的命运就搅到一块了。过去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仇恨，战胜仇恨的只有爱。

1月23日14时；广州枫木廊酒吧；访问报纸记者张晓舟（29岁）。

九十年代的一切，不是说斗争少了，而是说冲突的东西越来越多，社会和个人都在抹杀这些冲突，大家都在竭力使自己不彻底，竭力使自己妥协，好从这个时代和他人分得一杯羹，这是一个共存共荣的时代，说的难听是都捞一把，说的好听是和平共处，不战而胜，落实到个人，就是一个个人主义非常盛行的时代。

一位法国朋友说，中国人是最“崩”的，“崩”就是喊打喊杀，别人打了你，你“哇”一下叫起来，而不是忍着，这就是“崩”。“崩”就是不掩饰自己有多傻，自己有多穷，不是闪烁其辞。

我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自己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才是解放，才是自由。

爱、批判、智慧，这根本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和自由一样的，天赋的，我们要谈论人，我们讨厌一切知识分子的谈话方式，当对他人怀有使命感成了特权，如果你爱别人还要有优越感，那就不是爱！

1 月 25 日 9 时；长沙湖南电视台附近；访问老右派、电视工作者张炳新（69 岁）。他一再说：我说的对你可能没什么用处。

我们在农村劳动的时候，吃也吃的不好，还有压抑，是怎么活下来的？人得有个希望！

一边劳动着，一边精神上会餐，想什么？我没有错！怎样才能证明我们没有错？就在想这个事情，想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没有错，正是因为这个希望，才能够活下来。

一直活到现在，愿望就是改正，你给我改正，说明你是改正自己的缺点，并不是我要感谢你。责任我们要弄清楚，当初是你错了，你改正了你的错误，我好过了一点。我们当时是小青年，现在五六十、七八十，也没什么用了，这一代人没有了。

现在支持我的是什么呢？我要看看有没有人能把历史上的很多东西摆平。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澄清，就不能造成一个说真话的环境。

11 时；长沙街边某大排挡；访问餐馆老板赵玉莲，下岗女工

赵新燕（30 余岁）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社会上那么乱，就是因为闲人多嘛。想做都没得做，有时你想凭着自己的双手，挣点小钱来花，这里管，那里管，我跟你说根本没法做下去。我曾经摆过烟摊儿，他们说你今天不能摆，明天不能摆，那我挣什么？

我妈厂里没工资，我大姐下岗没工资，哥哥因为车祸没工资，二姐两口子带个小孩，厂子里效益那么差，这个日子怎么过？

有时候我想把日子说的好一点，我也碰到过好的。但光说好的不说差的，上边永远不知道。我虽然觉得渺茫，但还是想说。十七八岁的小孩，如果环境好一点，肯定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可是，他们有的甚至十四岁就出来打工了，为什么？读书读不起，混饭吃吧。

20 时；长沙湖南省湘剧团；访问湘剧演员王永光（54 岁）。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为什么是个乐观主义者呢？是因为我从小受正统教育，是毛主席的阳光党的雨露哺育我成长的？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关系。我也有坎坎坷坷，我出身不好，是狗崽子，那个时候的种族歧视比非洲换要厉害的多。

我的经历也有大半辈子了，我相信会有能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我很乐观。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负重承载能力太差了，无论是在体力上、精神上、还是生活上，不及日本人

也不及美国人，克林顿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他的民众照样能客观的对待这么一个总统，我们呢，情绪化的东西太多，可能一下子就起哄了，悲观了。

3月1日10时；陕西宝鸡某纺织厂；访问保全工薛宝成（39岁）

因为买房子，现在我还欠了5500块钱，今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欠人家的钱还了，就没负担了。我不能给儿子一点儿钱都不留，他现在学习还可以，假如他能考上高中，怎么办呢？现在手上一点儿钱都没有。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问心无愧，但是这个社会太不平等。

但是，我还是感觉和自己过去比，确实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如果退回十年以前，让我掏三万块钱买房子，我想都不敢想，我就是这样鼓励自己，我这个人比较乐观，在家里还比较幽默，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常对自己说，明天太阳升起来会比今天更好的。

3月5日16时30分；陕西勉县某教师住宅楼；访问中学教师韩文中（63岁）

我妻子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他的大哥为了谋生摔死了，她的母亲因为受到批斗而自杀，她又不习惯农村生活和受到歧视，患了精神分裂。我的大儿子也是精神病。我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吧！

我曾经苦到什么程度呢？我要教学，我要照顾老伴的病，我要煮饭、要洗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早上起来，要给三个孩子准

备吃的，又要忙着去上课，三节课后又回来煮饭，洗完碗又要上街买菜，买完菜接着上课，下完课又要煮饭。因为老伴干不了家务，孩子要吃饭，我没有办法，当时好苦恼。我想怎么也得撑下去，我的寄托就是孩子长大，我的担子就能减轻了。

我锻炼身体，我从来不绝望，那些历史上的反右等等都是社会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家里的困难，病人的折磨，我只能解释这是一种命。我能维持就维持，不能把他推向社会上去。三十年都过去了，我何必整天忧心忡忡，剩不下多少年了，我想心情乐观一点。把事情往好的方向办，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3月11日14时30分，四川成都某住所；访问金钱板艺人邹忠新（75岁）

这些年我们民间艺人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价值，越活越快乐，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的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幸福，这是共产党给我们的幸福。要是解放前，绳子、杠子、草帘子就把你打发了。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幸福快乐。我不求富贵功名，艺术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忘本。

3月12日10时；成都省文联住所；访问老报人车幅（85岁）

我向你郑重介绍两本书，你找来看看，一本是韦君宜的《思痛录》，一本是李锐的《直言》，这两本书说真话。

我是过来人，我看了几代，生下来是洪宪，然后国民党，然后内战，然后共产党来了。我们是搞笔杆的，只有踏踏实实的工作。

国家不能这样，犯了法你们不惩罚，好比一个人得了癌症，癌都扩散了你才找医生啊？

3月13日13时30分，成都东方人住院部；访问男科医生贺医生（55岁）

有些事情给我印象很深，明明是性心理障碍，性变态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作为流氓来处理。一个同学因此被发配到很边远的地方。

一个老师劝我：“一个女娃娃，搞什么男科吗？”我开玩笑说：“那么多妇科医生，可都是男的。”

这个事业不仅仅是在拯救人的身体，而且也拯救人的灵魂。

有的病例非常震撼人心，有对夫妻结婚以后性生活一直不能成功，最后我知道，这个女孩认为性是丑恶的。女性不能谈享乐，她们以没有性为荣，认为自己很正经。父母对她影响很大，母亲离婚后告诉她，这世界上没有几个男的是好的。这种教育比比皆是。爷爷奶奶蒙住小孙女的眼睛，说亲热的男女都是坏人，小孙女就说：“我长大了不结婚的！”

3月18日14时；成都某茶楼；访问记者谭小月（27岁）

我的生活如果能够像艺术一样，我就这样生活，我宁愿不产生任何东西，我觉得这就很好。你能够给别人带来一种诗意的东西也挺好的。

我觉得我的心在远处，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反正生活对于我来说就像游戏一样，我的躯壳在这里，心不知道在哪里？

我对物质也没有要求，我只是要一种爱，要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我也不知道不一样在哪儿，但那是属于两个人心灵上的生活。

我一直想走，我也不知道我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负责任的爱一个人。我不要我跟你好了，你必须是你的，我必须是你的。我觉得生活在我手里，但是我很迷茫，生活像水一样在我手上流走，我不知道把握。

女人有很多东西都是空的，只有身体是最实在的，最美的身体特别多变，她可以像鲜花、像流水、像火焰，也可以像其它的东西，在不同的时候，她是不一样的。我喜欢这样，你完全可以生活在你的世界里，也可以走来走去，也可以飞，想呆在哪个地方就呆在哪个地方。

3月20日11时；重庆“棒棒军”总部；访问“棒棒”刘海啸（36岁）

我们遭受的屈辱就像老舍笔下的样子，挑菜、送水、干脏活、红白喜事、抬死人到太平间，都去干，重庆的地理环境就造就了这样一个群体。小学生背书包，做值日，他也叫你去干，或者让我们充当家长，什么事都干。这个城市最累最脏的没得人干的活就是这个群体来干，城里人是不干的。

社会的不平本身就存在，我只希望他能进步，能多点包容，可

城里人思想素质也就那样，你能怎么样？我对于别人的人格能有尊重，我想，有了钱不要自傲。没有钱也不要自卑。因为我们是一直从长久的不平等的过程中走过来的。

20 时；重庆大渡口某茶楼；访问残疾人傅永励（40 岁）

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八级焊工，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你这辈子，我给你下个断语，你今后的工作就是擦皮鞋，在个人问题上，你就打光棍。”这句话对我很有刺激。

后来有一次看电视，无意看见女排比赛，在马上要输的情况下能打回来，我难道就不可以？

21 时；重庆某住所；访问个体户王艳容（31 岁）

我不悲观，我的病情我了解，最多再活二十年，我不想再上班，我想活在我喜欢的事情中，一心一意做我喜欢做的事。我要利用时间好好挣点钱，买房子，让我的儿子居有定所。

人有时生病了才能有些抉择。我得了病，反而不怕什么了。

3 月 25 日 13 时；开县街头；访问某镇长路永端（化名）

企业产值的虚报浮夸，远远超过 1958 年的浮夸风。我们每年有 40% 比上年增长的产值，可是看一下我们的利润和税收，就一目了然，大白于天下。十七个亿的工业企业产值，而税收是多少呢？农业工业加起来才收一点五个亿，这就说明我们的产值是虚的，重复统计，五个轮子一起转。这个地方统计成国有企业，那个地方统

计成乡镇企业，那个地方又统计成工业，这个是不是实事求是？领导们真不懂吗？真不知道么？我不以为然。我认为他们是知道的。也许有个别领导想实事求是，但是看看大的形式，他可能“未敢翻身已碰头”了。你看看多少亏损企业？多少分流职工、下岗职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都说，行贿受贿都是罪，吃了喝了不是罪。吃了喝了，无影无形，招待费是正常交往。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吃法？我跟你讲一个打油诗，我在路上碰见一个农民，意外地讲出这么一套话：“中央在造福，省里把政策出，地区瞎佩服，县一级坐五分六，乡镇在喝酒吃肉，村干部就象夜壶，老党员在哭，新党员中了毒，老太婆在烧香拜佛，年轻人跑了江湖。”

16 时；开县政府招待所；访问税务干部赵渝（化名，40 岁）

我对人的看法，从这一个字来研究，“人”这个字为什么一撇比一捺要多？从制造这个字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平等。按照西方的说法，人人生来平等，事实上人生来不平等，地域、家庭都是因素，一个人如果是出生在达官贵人的家庭，肯定比一般老百姓起点要高，人是太复杂又太不平等的群体，我建议你去发掘一下人民是怎样不平等的。

为什么现在的人对社会治安，对腐败，对物价，对经济发展感兴趣。他们愿意生活在一个比较安静、平稳、安全生活环境里，生活在一种物价不是很高，不需要太多心力交瘁就能够养活自己的社

会环境之中。

我经常感到痛苦和无奈，我们交上了税款，交纳给国库，国库返还给政府，由政府支配。我们通过千辛万苦挣来的税款，政府却没有把他们当作税款，他们也许用于吃喝、用于玩乐，有些可能用于他们本人的消费，买高档小车，建楼堂馆所，甚至是个人的开支。我们也无法对这些进行监督。

3月30日14时；湖北宜昌某住所；访问影楼化妆师徐敏（31岁）

我在读那些描写激情的书籍时，我想，为什么我不能那样活？

有的人在我那里拍照，我真的想为他们祝福，但到了感情返归于平淡的时候，要用婚姻的形式延续下去的时候，我看到的就不那么美好了，似乎结婚都是不必要的。

有的新娘说：“你给我打扮的真漂亮，要是我下次来结婚的时候，你能把我打扮的比现在还漂亮就好了。”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

她说：“是啊！这个事情没办法说的，我和我丈夫感情不好，就得离婚，离了婚就得再结婚不是？”

我当年以为两个人的爱情非得用婚姻定个位，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再看这个问题，两个人怎么相爱，不一定非要有婚姻形式。但没有婚姻，做我们这行的就没有饭吃了。

3月31日15时30分；宜昌三峡坝区宿舍；访问工程人员杜

翔（23 岁）

我和女朋友分手，不是因为感情问题，她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我这样的工作不能适应她，挺遗憾的。如果我们能在一块儿，多半已经结婚了。

我记得 94 年的冬天，我们在一起的情节，那时候的欣喜若狂，现在取而代之的似乎是一种味觉，夏天的冰激凌的感觉，当时在河边，我亲了她的额头，她脸上凉凉的，象冰欺凌。现在事情过去四五年了，这种感觉还是记忆犹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吧！

5 月 2 日 20 时；荆洲某住所；访问无业人员王一胡（28 岁）

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吸了这么多年的毒，亲戚朋友看到我这个样子，象瘟神一样的躲着。你知道，人一旦吸了毒，就与世隔绝了。

5 月 13 日 13 时；贵州贵阳花溪某餐馆；访问风水先生马玉其（40 岁）

文化大革命时，我是贵阳“全球赤化战斗团”的团长，我们到北京串联，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我非常激动，我甚至流了眼泪。在我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时候，我有一个很老实很忠厚的同学，说要去那个搭起来的厕所解个小手。他去了以后，毛主席的车就到了，我在第一排，我看到毛主席的大手在挥舞，车开的很快，不象后来电影播的那么缓慢。等我那个同学出来，我们告诉他主席的车已经开走了，我们还看到主席挥手，这个同学一下子就昏过去了。他日夜都盼着这一天。我们就把他送到负责接待串联学生的医院，他已

经不行了，经专家鉴定，心肌梗死。

5月14日13时；贵阳某住所；访问银行职员蓝海心（23岁）

我们的同学总在说：“外面社会很复杂啦，希望你到社会上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战胜它！”

很多人都在不断提醒我，你今年多少岁了，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了。我就很讨厌这种东西。我希望忘掉我多少岁。

我的理想是做个自由人，但我不当流浪者，我不要受经济和其他的困扰。搞了这么长时间的美术，我对颜色都麻木了，我只喜欢白色，它真的很纯洁、舒服，就像要化掉一样，就像我喜欢的王菲的歌，像水一样干净的东西。

也许以后会喜欢更多的颜色，

我也常听到一些不平等的事，我和朋友会在电话里狂骂那些人，我们会很不耻地说：“真是太罪恶了！”

14时30分；贵阳某住所；访问退休政工干部尚涛（59岁）

现在人们的牢骚比较多，主要是针对腐败。过去我还有个错误看法，腐败现象宣传的太多，在老百姓中间有负面作用。现在我看，搞来搞去都是当官的贪污，哪儿有老百姓贪污的？你也没办法贪污，你没那个地位，你怎么个贪污法呢？过去生活困难，干部为什么受到拥戴？他所做的一切全是为贫苦老百姓的。现在私人资本家发了，老百姓无所谓，想得通，人家有本事挣的。但很多政府官员、企业干部，他工资也不高啊？为什么他什么都有呢？住房特殊、坐

车特殊、孩子的工作也特殊。他这个钱是从哪儿来得呢？

等到什么时候才来查这些事？现在也宣传报收入，但都是走形式，起不到实质作用。从大政策讲，是好的，一到执行，只是走过场。也做了，文件也有了，好听的写下来，实际上怎样？就像你刚才用照相机拍的那个烟囱里的灰，他们什么时候重视过？这灰对老百姓是犯罪啊！

5月15日11时；贵阳某宿舍；访问记者、“社会调查工作者”李筑（28岁）

我们以往学习的历史都是些和我们的生活不相干的历史，我们学习的是人民的历史吗？不是！梁启超说了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已，这些东西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研究这些历史只对帝王将相会有好处，对野心家有好处，和人民生活有什么关系？这对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发达的国家，把一个社区变成一个文明社区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

中国农民辛苦一年却往往挣不了几个钱，这种状况的存在是现实。平等从何而来？人民当家做主从何而来？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这种角色使我更加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用自己方式坚定的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

5月20日19时；云南昆明董家湾某茶馆；访问白领职员陈淼（27岁）

做生意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大家都把最好的东西摆出来给你

看，其实到底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做完业务之后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对很多事情我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我觉得自己可以像这样说，实际上我知道并不是这样的。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不相信人，大部分时间里怀疑别人，开始觉得人和人之间是很冷酷的，没有谁真正关心别人。

我爸爸是一个很健康的爸爸，他总让我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看事情，我妈妈很心疼女儿，她总说，没人关心你，爱你，她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很伤感。

5月26日

13时；大理古城三塔寺；访问刚分配到这里的大学毕业生张宾力（22岁）

人活着是为什么？我在这个问题上思考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他一定会有很多后悔的地方。怎样评价他自己的人生，我问了很多，什么样的答案都有。这个问题就象是一棵树一样，生根发芽，千丝万缕，已经讲不清楚了。在大学里想了几年，这个问题真是让人比较苦恼，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答案。

人很可能就是因为一种很小的愿望活下来的。

5月30日16时；丽江行政公署办公室；访问外事干部和为剑（33岁），他当时正在翻译小说《消失的地平线》

这个小说已经过去六十六年了，现实意义仍然很大，南斯拉夫

人不就天天处在恐惧当中，处在失去生命的边缘，他们需要香格里拉，但他们没有能力，他们可能连梦都不会有，也许会做个梦，但第二天就会被炸死，倒在血泊之中。香格里拉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他是一个意境，但他好像又是真实的，好像就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身边，我们看到山谷、小桥、流水、人家，就会联想到香格里拉。

6月29日13时；甘肃榆中上庄马莲滩希望小学；访问教师杨财高（33岁）

我爱看书，一般感兴趣的书，从家里到学校的那段路就能看完，他们开玩笑说，小心绊倒了，我说那我可绊不倒。

7月2日14时30分；兰州某酒吧，访问某公司经理卫英（28岁）

我一直以为，我特别向往美满的家庭，我并不把事业看的很重。我害怕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又得见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太累了。

我现在只是四处漂泊，家，我不愿意回，他们想让我找一个合适的，但我就是找不到。我最害怕参加别人的婚礼，那时候最能感觉到孤独。

8月12日14时；青海西宁北关某住所；访问残疾人、无业者张道力（41岁）

88年我因公造成下肢瘫痪，后来公司倒闭了，就给两百块钱的劳保，再没有任何待遇。我一个工伤，毁了三代人，老母亲八十岁，

我要是好着还能挣点钱照料一下老母亲，现在我不但照顾不了她，还要她反过来照顾我。我这一代完了，下一代上学上不起，现在这个社会，工作怎么找？十六七岁就推向社会，没有任何文凭，做生意又没有本钱，哪有立足之地？这不是把下一代也害下了吗？我的妻子从二十几陪我陪了这么十年，你要是能好，她还有个盼头，可你没有任何转变，她陪着你有个啥前途呢？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走后门，请客送礼，办一点事情，问居委会要点补助之类的都要给基层的人说好话，救济金他们还要扣掉一部分。这是啥道理呢？你要去问，办事处的人就说：“你不要再找了，这点给你就够意思了！”因公致残，把一生都毁掉了，这样的代价还换不来个人的一点生活费吗？你说我对这个社会还能没有一点看法。

我的思想是不太先进，这就是我的思想，单位倒闭了还有上级吧！还有政府和民政局吧！你们是不闻不问，每年到了春节，给你拿来一袋面粉，就等于给你慰问了，这一袋面粉够我们吃上一年吗？

8月24日18时；新疆石河子某住所；访问园艺师吴骏权（46岁）

我原来在学校里挺活泼的，爱说爱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们就有意识的少说话，那一阵子把人逼的太难受了，现在也不大会说话了。

9月5日14时；陕西西安某住所；访问航空爱好者张自力（51岁）；他曾制造飞机并试航成功。

下乡以后，人心惶惶，我们都很彷徨。我的前途到底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这么想。我们总想，我们掌握了那么多的知识，知道了居里夫人、爱迪生、牛顿，课本上原来都有他们画像的，那时候都想着将来要当这一类人物，结果现在一天到晚背着背篓，在山里边，像个野人一样的生活，肯定不满足。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我们也讨论过，为什么农民能呆一辈子，我们就不能呆一辈子？我说，确实不能呆一辈子，我们知道外面有一个很精彩的世界。

现在开放以后，农民知道的东西多了，很多人都出来了，他们都去接触现代的文明，然后再去改造他的家乡，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道路。

9月27日15时；黑龙江大庆交通局招待所；访问机关干部于合龙（40岁）

现在说社会腐败，咱们不是调子低，就像我父亲说话了，党是个好党，党是没有什么说的，关键是在于这些人。现在就包括一个小小的口头官，普通的办事员都是这样。你不给我利益，我得不到实惠，我就不给你办事情。这样的例子特别的多，不是说我不复杂，我一样，大家都一样，社会就这么个风气。就像刚才的电话，他们的房子要扒，要我给他疏通一下，就不扒了，这是谁给的权利？

9月28日10时；大庆某采油厂；访问机关干部李宗（54岁）

年轻人也好，年老人也好，对党组织的大门要求进步的人少了。为什么六七十年代大家积极强烈要求加入党组织，那时候的人都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不图名不图利。那时候共产党员冲上去，毫不犹豫，现在你说党员冲上去，可能就差点劲了。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人们都奔着钱去了，咱们 60 年大会战的时候，零下四十多度，大家照样干，那是党组织的力量，人们都有一种信仰。

现在才把雷锋搬出来，是不是晚了？

9 月 30 日 9 时；哈尔滨东北虎林园；访问野生动物保护者赵会宇（37 岁）

这一代人正赶上什么？文化上思想上的大起大落。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一片红。可是这一代人的思想是有史以来最混乱的一代人，被强制灌输了一种思想，又在混乱中失去了所有的思想，形成了一种非常古怪的思想。就像穿着羊毛衫打领带还要放在外边，一方面这个手拿着大饼子嚼着咸菜说，好吃，多少年没吃过了，把这个放下以后，客户来了，马上去西餐店，要上咖啡，嚼半生不熟的牛排，这些事情都是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出现的。

10 月 2 日 10 时 30 分；吉林长春某茶社；访问离休干部王忠欣（60 岁）

机关里的干部内耗非常严重，97 年我因为一件事得罪了某些领导，回家的路上被歹徒打昏，住了四个月的医院，住院期间，不

断有人来打听病情，出院以后，又接到恐吓电话，这些事情，不能不和单位中的人事纠纷联系起来，但是，我当时就想，人际关系真能恶劣到这个程度吗？

20 时；长春某住所；访问某销售公司职员关永明（33 岁）

在这里，你真有能力就可以做到最顶点，你没有能力，只有社会背景，对不起。正好跟传统的工作体制相反。而在以前的单位，我不能说好与不好，但我确实是很难发挥能力，很难被人认可。

我觉得可以给下一代留下一份没有遗憾的东西，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不要跟他讲：“妈妈就指你了。”我会告诉他：“妈妈替你创造了这笔财富，给你搭了一个台阶，你可以在我这个台阶上，再往上走。”

10 月 4 日 14 时；辽宁铁岭某饭店；开始录音的时间是；访问官员赵丙文（53 岁）

中国有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仔细看看，有的地方黑社会代替了党的领导，你走遍全国你还知道吗？有的县有的乡，黑社会一句话，党都不好使啊！

不管咋说，我是为官者，我非常赞成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我想给他加一条：讲良心。我们现在的干部真的到了该讲良心的时候了，包括我在内。这个车都三十多万，专车专辆！不是经济不景气！这种高消费不得了啊！

都讲刺激国家有效益的消费，可你看看，这种会议、旅游、出

国消费，一个县级干部的消费能养活二十几口子人。应该有人下来调查调查，这个县有多少人吃不上饭？有多少容转军人？有多少人家没房子？你再调查一下县里边，人大主任、县长、县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武装部长这套干部，搁下贪污腐化都不算，他的用车、招待、有线电话、无线电话，拿过来一平衡，你看看是个什么数字？

10月4日0时；铁岭文联宿舍；访问基层作家赵明舒（35岁）

小时候隐隐约约的有一种作家梦，我那时候看我老父亲给我母亲的那些日记和古体诗词，太打动我了。我也想像父亲那样用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当我怀念母亲的时候，就在诗歌里写妈妈两个字，就愿意写这两字，觉着写在纸上跟亲妈妈说话一样。

10月20日10时；内蒙古呼和浩特某住所；访问编辑余风（74岁）

那时候的夺权，其实就是你占领了办公室，把那个章拿上，你就掌权。你掌权了就可以执政，你想专政谁就专政谁。等这一派失败以后，另一派又上来了，你在那一派执政的时候被送进了有关部门，但是这一派上了台，你也放不出来了。进好进，一句话，“我抓了个现行反革命，”就进去了，出的时候，却没有人负责了。

怎么说是冤假错案呢？有的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稀里糊涂被关了十五年。

10月22日10时；河曲县文化局；访问民歌手贾德义（50岁）这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说到河曲民歌，他担心以后没有人再唱了。

以下是他创作整理的一段河曲民歌：

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水，河曲人唱山曲古来就会。

山曲好比葫芦里的油，生在咱肚里出在咱口。

山曲本是顺口流，多会儿想唱多会儿有。

山曲本是出口才，看见甚也能唱出来。

三十六眼窗花鲜又香，唱曲都是打比方。

妹妹唱曲儿哥哥听，十句有九句唱爱情。

10月24日10时；河南郑州某茶社；访问戏曲演员李汉成（41岁）

我父亲是在县城教书的，58年他被打成右派。他年轻时爱写文章，有一篇在河南的大报上发表的文章，提到现在农村人不得势，城市的厕所都比农民的房子强，老百姓的娃娃上不起学。这样就被打成右派。

他一直性格孤僻倔强，总是低着头走路，他自己上山弄木头，给我们兄弟三人在乡下一人盖了一间房子，我们都在城里也没有去住。后来他突然生病，脑溢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10月25日14时30分；安阳北关区某住所；访问退休干部李云林（65岁）

从我家里来看，文化程度，我父母一个字都不认识，我认识几个中国字，孩子在加拿大，认识几个外国字；生活条件，我父母一辈子没出过河南省，在农村过的很辛苦，我起码在中国跑了跑，孩

子跑的更远，跑到了国外，他们的消费水平就比我们高多了。我们一家三代，一代比一代强。

11 月 7 日 12 时 30 分；江苏南京华电新村住所；访问老军人高仕禄（72 岁）

我们的这个部队在进攻南京时，由于投诚的国民党军舰的帮助，比较早的上了岸。二十三号占领南京，我们负责清理路障，但我们比负责包围总统府的二营早到达总统府，那时候总统府只剩下一座空城了。所以我就成了第一个打进总统府的人。

一路打进来时，没有抵抗，当时还想会有一场恶战，说不定就死在这儿了，没想到蒋介石的人跑的跑逃的逃，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根本不抵抗了。

开始我们的口号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后来就变成了：“打到奉化去，活捉蒋介石！”“打到上海去，活捉蒋介石！”到最后就是“打到台湾去，活捉蒋介石”了。

15 时；南京某住所；访问画家、唐伯虎后人唐立心（52 岁）

我主要的经历是在民间，唐伯虎只活了五十四岁，但那些画家中他名气最大，他的画人民性最强。

我父亲一直对我讲，如果你有志气，就像唐伯虎那样画，只要人民喜欢你，美术家协会不喜欢你不要紧，人民承认你，你的画就有生命。

11 月 11 日 10 时；上海淮海路先施大厦性博物馆；访问性学专家刘达临（67 岁）

我告诉他们这都是很珍贵的文物，千万不要销毁，应该交给有关博物馆。他们很为难，说博物馆不敢要，上级命令销毁，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拿出两千块钱，请了两个专业摄影师把这些东西拍了下来。现在这些东西都销毁了，我手中的这些照片就成了绝唱。这么好的东西没有保存下来，国外对中国的性文物非常重视，我们自己却在毁，可惜啊！

11 月 11 日 19 时；浙江海盐秦山核电站家属区；访问工人一家李冰和父子（老父亲 60 岁，两个儿子都是 30 多岁）

（父亲）

那个时候，我们非常艰苦，到了沙漠里，恰好碰上自然灾害，没吃的，就吃一种叫骆驼草籽的东西，可以充饥，但吃了以后拉不出屎，那真是可怜。尽管生活困难，但士气还挺高，有些人慰问我们的时候说：“祖国不会忘记你们的！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到如今，也全忘了。

（一个儿子）

我们厂这工作是说走就走，我记忆里我们都换了近二十个地方了吧。你别看我们家所有的家具都挺结实，其实只要几十分钟，我们哥几个就可以把它们拆开，摞在一起，随车运走。你屁股底下坐的这把椅子少说也有二十年了。

（另一个儿子）

我妻子她们那有个老师傅，因为生活特节省得了个外号“王保长”，就是电视剧《王保长》里头那个特抠门的男主角。这个王师傅家在农村，他一个月挣 1000 元工资，他只用一百块，八十块用来买饭菜票，二十做零用，其余统统寄回家，每月如此。我们在广东搞大亚湾核电站时，广东夏天能晒死人，王师傅想买一顶草帽，当时厂子旁边卖的是两块三一顶，他听人说王浦那边是两块钱一顶，他就步行走了近两个小时的路去王浦买，因为那样就能省三毛钱，结果到了那边一看，要两块五呢，人家又告诉他听说南澳卖两块，他又走了三个多小时去了南澳，结果还是两块五，他只好又走了近五个小时回来，这好不容易获得的休息日就这样过了。他就是这样省钱，结果他在农村的老婆还是跟人跑了。

11 月 12 日 22 时；浙江杭州某酒吧；访问公关人员、布隆迪人卡纳（32 岁）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太可惜了，他没有想法。他只想到要去美国，喜欢自己做个老外，他从动作上，语言上模仿老外，没有他自己了。

11 月 13 日 0 时；杭州某酒吧；访问酒吧老板严成（36 岁）

我这个口头禅“气死我了！”是怎么来得呢？气死我了，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漂亮的女同事，但我还没来得及说，气死我了，就让头儿给抢走了，我就自言自语，“气死我了，气死我

了。”头儿就问我：“有什么不满意吗？”气死我了，我又没法明说，只好说这是我的口头禅，既然是口头禅，气死我了，就不能今天说，明天不说，就这么说上了。气死我了，真成了我的口头禅。

做酒吧以后，到我这里来玩的人，一听见我说“气死我了”就笑的人或以为我生气的人，肯定是生客。最有趣的是在一个在杭州做生意的韩国人，气死我了，他不懂汉语，但他把我这句话学会了，就在办公室里把“气死我了”当感叹语来说，搞的手下人都很紧张。气死我了。

11 月 14 日 10 时；杭州西湖湖畔；访问自由职业者陶萍（27 岁）

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学到了一点，“人可以有不同的活法”。人不必按照从小就被灌输的被压抑的模式生活，人可以好好学习，长大努力工作，结婚生子，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以前经常疑惑自己的选择，我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不现实的，现在我觉得我追求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是正确的，欧洲有些艺术家一天就啃一块干面包，喝几十杯咖啡，他也不觉得不好。

11 月 13 日 18 时，海宁桃源里住所；访问百岁老人章克标（100 岁）由于每天大量的记者来访，他已不胜其烦。他只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

尽在不言中。

11 月 16 日 15 时；福建厦门福利院；访问老人吕艾治（96 岁）这位老太太在 50 年前的一个下午，带着一些小食品从家乡金门取道厦门准备去香港，在旅馆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厦门解放。她就再也没有回到金门，后来人们用船把她带到海上，她能够看到自己家的房檐。

20 时；厦门古楼对高山住所；访问台湾雕塑家侯金水（52 岁）

在台湾，我因为雕塑“颤抖的泥土”而成名，但我好像还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我不能因为收藏家的需要完成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同时我把雕塑当成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当我经济发生了困难，我才发现自己为创造什么而犹豫太久，浪费的时间太久，等到三餐都没有的时候，我才又拿起泥土，做出了我在大陆的第一件作品。

11 月 18 日 11 时 30 分；江西南昌某花园；访问电台主持人许玉娟（26 岁）

我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我们并不像老一代人说的多么幸运，多么幸福，多么好。幸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它与物质没有太大的联系，并不是和钱的多少成正比的。现在给我的感觉，是物质方面越来越好，内心的苍白却越来越多。我的感觉是一种动荡不安，父母那一代人有个工作，就有归属感。刘欢有首歌叫《从头再来》，是唱给下岗工人的，我却感觉是唱给我们的。一生恐怕都在从头再来。

11 月 19 日 21 时；安徽合肥芜湖路住所；访问孩子的母亲边缘（30 岁）

结婚六年，我一直不想生孩子，总觉得怀了孕挺难看的，没想到后来怀上了，也就不觉得了。摸摸肚子，感觉蛮幸福的。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先看他的四肢，手指、脚趾，我总觉得你生下他，最起码是个健康的孩子，漂亮聪明都在其次。

从此，人变得有耐心了，有责任感了。我记得那句话：“我给孩子生命，孩子给我生活！”

很多家庭给孩子买保险都买到了六十岁，我不想这样做，我只给他买到二十五岁，念完大学，长大成人，以后就靠他自己奋斗了。

11 月 22 日 19 时；山东济南无影山新村住所；访问工厂干部金朝晖（53 岁）

人还是应该朝好日子去努力，但现在看来，要应付社会，光靠努力奋斗是不行的。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挫折、困难是太多太多，如果能拿你们开放的思想，再吸收我们的经验教训，应该能做的很好。善良、责任感这些东西当然是基本的，但不必像我们这一代过的太苦。

11 月 23 日 14 时；青岛八大观某机关；访问政治教师、民主人士刘仕正（52 岁）

政治课几乎没有办法教下去，当着纯洁的孩子，我糊弄人家，做不到的事。

学校就不是一块净土，八门专业课都不及格的学生照常分到最好的地方去，学生们说，有关系才行，你学了也没用！他们在现实中接触的非常真实，他们知道：“大意思办大事，小意思办小事，不意思不办事。”你到海关去打听一下，那里有没有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下岗职工有没有正局级以上的？有，这边领个下岗证，拿一百八十元，那边兼职，每月上千。乡镇的老百姓形容干部：“左手抱着鸡，右手牵着羊，村村都有丈母娘，天天做新郎。”坏到什么程度？大家说，过去一个村就一个保长，现在一大群，我们养不起。我去一个比较发达的县看到，一个乡里，书记、村长、妇女主任年薪一万二，不管你老百姓收入多少，你必须保障这些东西。老百姓还说，有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惠，紧密联系上级，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有一个干部在三讲会上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时候被检察院带走了，他怎么不讲自己贪污腐败呢？

我还听说有人讲，贪官污吏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荒唐到什么程度？资本集中、行业垄断，我都没得说，问题是财富不是通过这种手段的集中，而是利用权钱交易进行的集中，这不是资本积累。

你说，政治课怎么教呢？

12月10日8时45分；河北秦皇岛邮政宾馆；访问银行职员罗宏（28岁）

我有时候太空虚，空虚也是看书看出来的。

我看过一本传记，说台湾的运动员纪政曾在化妆台上贴了这么

一首诗：“又是新的一天，上苍赐给我新的一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可以小心珍重，也可以浪掷虚度。我选择成功不要失败，我选择收获不要损失，我选择善良不要邪恶，因为我要永远记住，我为此付出的是我生命中的一天。”这就让你珍惜每一天，让你一分钟也不闲着。

我只求三件事：平安、健康、发财，我不希望老了以后满脸沧桑，人只活在现在。

12月22日

11时30分；海运仓住所；访问乐评人金兆均（42岁）

我从小就写日记，大学毕业以后，就成了没有谱的记忆。后来觉得挺遗憾的，因为忙起来了，好多事都没记下。其实，最早记日记，更多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比较压抑。

后来，一闲下来翻翻，有一次突然感觉到，以前的东西好像历历在心，后来过的却好像越来越快了。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上边写一个人老听说，人生如梦，他不明白，于是去问智者，智者说，人生非梦，你处在某地，一屋、一室、一桌、一几，梦中或像飞禽上天，或像鱼儿入水，等你醒来，飞鸟游鱼都不在了，你还在。另一位智者说，人生是梦，你能说出一天之前你在做什么，你能说出三年五年之前你在做什么吗？你活这一生，不过是几十年，你自己都不能清楚是怎么过来的。

你忙忙碌碌，为名，为利，为理想。最后，你经历过的已经从

这生命中消失了。人一辈子活的不过就是不多的几个瞬间而已，只有那些瞬间对你有意义，那是真正在你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东西。

地图、远方、同路人——一代后记

我是在 1970 年出生的，等到我稍通世事，那个给我的长辈们留下刻骨铭心感受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对于在那之前的许多次社会动荡，我更是一无所知。即使是被许多人称之为“浩劫”的文革，也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不好的印象。虽然我随着下放的父母在农村颠簸流离，但摘棉花、挖荠菜、和农村孩子嬉戏，这些有趣的细节占据了我所有的记忆。

我这样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饥荒、瘟疫、战乱、经济危机、居无定所的漂泊、种族仇杀、政治压迫，都没有。所有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全是从书籍、电影电视和老一辈的传说中得来的，有时候我惊诧于我和那些灾难距离是如此之近，但我似乎和它连个照面都没打过。我当然有些别的记忆，在我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小胡同里，每天都发生着一些大大小小的人生悲喜剧，待业青年、平反、严打、走后门，我对这些词汇渐渐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然而一个少年对社会的认识永远是单纯的，即使我也曾目睹过当时盛行的枪林弹雨的街头斗殴，在我的眼里也更像是电影和游戏，刀子砍在别人身上，于我没有切肤之痛。

曾经有一度我迷恋上了地图，当我发现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在地

图上只是一个很小的点，如果看得不够专注，你甚至会忽略它。这时候我惊诧于它的大，迷惑于它的不可知，相对于我经常出没的街区，我觉得这城市的边缘就已经非常遥远，不要再说地图上那些同样用小圆点标志的陌生的地名，然而我就是对这些陌生的地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能从地图上班驳的色彩隐约感觉到地域的不同。至少我觉得哪一座城市更接近于海洋，哪一座城市处于沙漠之中，我开始学习辨析河流与山脉的走向，浅绿色让我感受到清新，深褐色让我感受到重，所有的地方都是远方。喜悦和神秘感能够让我在地图前呆上一个下午，我用手在不同的道路上留下指痕，我的旅行从地图开始，到地图结束。

后来，当我在游历的途中抵达某个城市时，偶尔会想起，它的面貌与我童年的想象截然不同，我想象的依据只是那些地图上的单纯的颜色，我忽略了街道、建筑物和人。那些地图上对一个地方的夸张的文字描述曾使我激动不已，它带来的后果是使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的“地图理想主义”被击得粉碎。——所有的地名代表着的，仍然是远方。97 年夏季的一天，我站在甘肃临夏的路口，不知道是应当前往出产锋利的腰刀的积石山，还是去长满了青稞的甘南，我的地图藏在旅行包里，我知道我的道路是一种没有找到目的地的迷途。

被一种对远方的幻想耽搁了很长时间，在那些日子里我反复设计出走的日期和路径，然后一遍遍的改变行程，朋友们见到我的第

一句话往往是：“你怎么还在这里？”这使得我的旅行有了一种落荒而逃的感觉。在那段日子我经常阅读旅行者的传记，安徒生的一句“旅行就是生活”让我彻夜不眠，朋友史航在送给我彼得詹金斯所著的《走遍美国》时，在扉页上写到“除了流浪，你没有别的道路”，这种包容着真情实感和夸大其辞的鼓励的句子象兴奋剂一样让我热血沸腾，我一度以为自己是要上刑场而不是去远方。

最让人心神不宁的感觉在这时候出现了，在车厢里我会经常注视窗外黄昏的景色，我看到铁路边上的民居，看到远处城市和村庄里的房子，在漫长的旅途中，那些房子窗户里散发出来的光芒温暖亲切，但是在一闪而过的某一盏灯的下面，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或她，叫什么名字？他有多大的年纪？长的什么模样？他在等什么？有什么样的秘密？在多少年前的某一个和今天同样的黄昏，他曾遇见什么事？遇见什么人？——所有这些问题都接踵而至，我的奇思异想一旦出现，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与地图曾带给我的那种震荡又一次不期而遇，我生活在自身之中，我的世界是一座孤城，而在它之外，每一个人都是远方，当我出门在外，远方是我的必经之处。

97 年在西北的游历给了我许多知识，那是地图册上没有注解的内容。对我来说，一张新的地图展开了，人名代替了地名，事件代替了景点介绍，温度和湿度是凭借皮肤就能感觉到的，不是地图上干巴巴的数据。

我开始在小旅馆里和东奔西走见过世面的推销员聊天，听深夜住店的长途司机们讲述他们一天的见闻，有的人快乐；有的人愤怒；有的人沉默，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在一辆汽车上，我曾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坐在那里，泪流满面，她的神色哀婉动人，表露出极度的绝望，那种表情让我心生畏惧，我不知道她经受的是一种怎样的伤痛！？在某个小县城的汽车站，长途班车在傍晚七点十五分准时出发时，我透过车窗看到一家老小四口人在汽车后面声嘶力竭的呼喊，他们的手仿佛要拽住汽车的轮子，他们跌跌撞撞、神情凄怆，行李散落在地上，他们是要回家去？还是为了什么远走他乡？后来，我在大西北的一个小山沟的学校里呆了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除了和非常亲近的朋友为数不多的通信，我几乎与世隔绝。有一次我面对着空旷的操场，远处是屏障似的大山。我能听见一个女人喊叫自己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那时候，我觉得远方象一种没有形状的物质一下子撞进了我的身体。

我和一些人认识以后说声“再见”就各奔东西了，更多的人，我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他便与他擦肩而过，我们不会成为兄弟，不会成为朋友，不会成为恋人，空气在我们之间漂浮，远方在我们彼此之间存在。

我曾在高原的夜晚抬头看过天上的星群，那些星星象礼花绽放，象针芒一样散落下来，刺入深厚大地的胸膛，这样的星空在我以往的生活里非常罕见，她意味着我所未能知晓的一切，在我接近

她之前，她是我的远方所在。

地图是一种暗示吗？他呈现了一切，同时隐藏了一切。我知道，那些符号和标识是一些需要破译的密码，通过他我可以走上某条道路，通向某个远方，通往某个星空下的夜晚。最终，在某个县城路口的黄昏，我明白我必将选择一个方向，但无论选择了什么，我都知道，星星在前边等我！

我在旅途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走了这么远的路，得出什么结论了吗？”我说，我不知道，如果有了结论，我会把它写进书里。在这次旅行结束之后，仍然有朋友问我：“有结论了吗？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仍然说，我不知道，结论？

大家都想快一点知道结论，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件事情的结论对于我们是重要的，知道了结论，心里会塌实很多。因为他不仅牵扯过去，也关系到我们的未来。于是我也会经常问问自己，我可以有个结论吗？这是个我没有能力回答的问题，毕竟，这次短暂的旅行访问不足以使我对这个时代下个简单的论断，它的大，大到不可逾越，他的复杂，复杂到不可知。有些问题清楚的人人都能明白，有些问题则有着极其含混和深不可测的背景。如果按照我乐观主义的本性，我当然觉得会有希望，但当我看得仔细，我也知道不能等闲视之。

我的行文中多是抒情的成分，少有思辩的内容，我相信那些被描述的细节代表了某种直觉；同时，我也深知自己不能承载思辩带

来的重负，我既不是社会学家、政治家、或者经济学家，也不是考据家、心理学家、或者技术主义者；我既不能进行准确的分析又不能进行细致的考证，我的调查，如果姑且说得上是调查，在那些材料中也不能提纯什么数据，我的材料仅仅是一些零七八碎的观点和故事。

我是一个旅行者、观察者、目击者，我是一个访问者、记录者，我的任务是看，是倾听，是访问，是记录下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一切。我能向人们展示我记录下来的这一切，我提出问题，我得到或者得不到回答，但我自己不会做出结论。

如果让我形容某件事物、某种景象，让我使用某个词汇：富人和穷人、阶级与阶层、好和坏、希望与绝望，我知道它们像远方一样飘忽不定，我不能确切地把握。

相对于一个庞大的背景，我所能做到的是关注某个人的命运，我想做的也正是这个。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部断代史，我要撰写的是这些普通人的传记。在对他们生命材料的考据、梳理、记录之中，一点点辨析这个时代的本来面目。每个人都是一个活化石，你不用到实验室去揣摩他的由来，也不必用显微镜观察他的肌理，他是一个存在，他活生生地展现一切，问题得以彰显，他是答案、依据和证明。

我相信这样一句话：“对一个人的不公，便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我同时相信：“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必要前提！”

我是在旅行访问中，在耳闻目睹中，在和人们的交谈中，在倾诉与倾听当中-----得出了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对我来说犹为重要的是我个人的成长。这是一种特别的学习和历练，像看图识字一样，在旅途中我以一种新的方式阅读了我的祖国和人民。

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怀疑一些事情，开始相信一些事情。

时代是个巨大的地图，是一个在我们身前身后随时出没的野兽身上的斑纹，我在它的身上走过，我身陷其中又置身事外，我知道它行踪不定，无法捉摸。一个活的地图实在是最可怕的事物，它可以扭曲，让你误读原本最明确的标识，它可以伸缩，将你置于两难的境地。

然而，人们仍然象钉子一样牢牢的站在他之上，象久远的地名一样结实。人们没有驯服这闪转腾挪的野兽，但他同样也没能驯服人们。

童年时代，我对地图的好奇出于对那些象图画一样的颜色的热爱，那些陌生的地名代表的所在也同样吸引了我。我相信远方是必定存在的，它必定在比我所居住的城市郊外更远的地方。

在旅途中，有人告诉我哪里是他们所跋涉过的道路，有人为我指引了往前方去的路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图，不管它是拼凑起来的碎纸片，还是压在箱底的被人遗忘的羊皮，有的人把它藏在心底，有的人把它刻在身上，他们的传说中保存着通往远方的密码，实际上，那些传说本身也是人人皆知的秘密。他们在倾诉时已经泄

露了天机，我在倾听时也获得了训示。

有一位朋友在歌里唱到：倾诉养育了倾听，远方养育了同路人。

2000 年 3 月 31 日于北京小关

谢辞

新年的时候，我给那些找得到地址的朋友寄去了一张贺卡，上面附了一首小诗：

你可记得有个年轻的旅人

马背上驮了幅七彩的地图

在他停下时你请他喝酒

在他离开时你为他指路

我说：“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祝你幸福快乐！”

这是我真诚的感谢和祝福。

我想我微小如尘，只是选择了一种自己热爱的方式来体验生命，却得到了那么多朋友的关怀和帮助，在我脆弱和疲倦的时候，是他们的支持给了我莫大的力量，我知道自己的幸运，所有人和我一起在路上，他们都是我的同志。

我无以回报，只能把这部凝结了很多朋友心血的作品作为礼物。

我要感谢关雎先生和郭昕女士，作为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纵容我去寻找自己的人生，并且不间断的给予我爱和鼓励。我在童年

时代受到他们特别的教育，他们向我讲述的往事及其背后隐藏的真相，使我对人们的遭遇有了更多真切的同情。他们身上单纯的理想主义气质深刻的感染了我，同时他们对事物的宽容态度也使我学会了对他人的尊重。我不是一个忠实的儿子，在很长时间里我出门在外，远离他们，我只能希望所做的一切能让他们感到骄傲，虽然这依然不能弥补我的过失。

我要感谢冯俐（皮皮），在我仍有些犹疑的开始，她肯定了这次旅行的可能性和意义，并且在我以后的旅程中，热忱的给我无数次帮助；

我要感谢李永辉，他帮助我做了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有些事情非常繁琐，他却乐此不疲。在这一方面需要感谢的还有金哥，他在技术上的支持使我得以完成书稿的整理。

深切的感谢我的挚友雷霆，自从我萌生这个念头开始，她长达数年的督促和鼓励使我不敢轻言放弃，不敢懈怠和退缩。感谢一直帮助我的沈雪，她的支援保证了我有一个较为顺利的旅程。同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的同学李樯、佟鸿力、顾言给我的支持从不间断。

感谢薛芳芳，她的资助不仅使我感到友情的温暖，同时让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感谢这些朋友和师长：沈林、金兆均、杜爱民、龚朝晖、赵一工、张晓舟、史晨风、蔡尚君、穆涛、句洋、孟岩、杨利民、徐讯、

史航。他们自始至终关注我的工作，他们或者给我许多中肯的建议，或者以各种方式给我提供帮助，这些建议和帮助使我受益非浅。

感谢老朋友和新朋友：冀英、王欢、周南、文玫、李蓉、韩一丽、张晓军、李梦、曾雪涛、史海、陶萍、石莉、路红利、金丽、丹增边洛、刘志群、李筑。在那些城市，他们放下了手中的事情，陪我跑来跑去，不知疲倦。

感谢这些长者和姐妹兄弟：广州的孙志勇先生、屯昌的陈志川先生；南宁的严小丁先生一家；长沙的吴敏、陈琼夫妇；勉县的张宝舟先生和马贵珠女士；成都的赵素春女士一家；黄金刚、张翠华夫妇；重庆的刘得志、周赤夫妇；开县的李涛先生；芷江的邓光伦先生一家；昆明的张晓菲女士；兰州的田企川先生一家；邓伯言先生一家；我的好友田蹊；乌鲁木齐的熊庆芬女士一家；呼和浩特的何乃强先生一家；安阳的李作述先生、马玉芬女士一家；南岔的程树林先生一家；长春的史今先生一家；海盐的厉福增先生一家；蚌埠的张建平先生；青岛的张坤权女士；雷受 MIN（曰加文）先生和黄晓明女士。他们热情的款待让我像是回到了家。

我永远记得齐齐哈尔那个寒冷夜晚的十二点钟，张达先生从几十里外赶来接我的情景；我记得南昌火车站的那个清晨，胡伟先生赶来和我握手告别；我记得在大庆，刚刚认识了几个钟头的袁凯先生，坚持为我买火车票；我记得南京的陆拂明先生，作为一位前辈，他给我这年轻人最热情的帮助；我记得秦皇岛的姒同先生，我怀疑

他已经不大记得我的名字，对他的帮助我铭记在心；我记得榆中上庄马莲滩的老师们，他们亲切如故；我记得青藏公路上司机李志杰的悉心照顾。感谢他们！

特别感谢我亲爱的朋友小妖，她的出现使我如获至宝，在繁杂的时而让人激动时而让人厌倦的工作中，凭借我们的共同努力完成此书。

我要感谢那些给我指路的不知名的人们，那些向我报以微笑的陌生的人们；感谢那些和我交谈的人们，感谢他们的故事，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感谢人们复杂和丰富的生活，他们为生命和尊严付出的努力，感谢他们的爱和斗争；我要感谢那些先贤，感谢欧文斯通、安徒生、聂鲁达、惠特曼、斯特兹特克尔、彼得詹金斯文字中传递给我的力量，感谢那些冥冥之中的提示。

最后，我当然要感谢这个时代，他使得人们不必有过多的担惊受怕，能够有机会从容的表达自己。

感谢以下诸位：

杜明宏女士 沈婷昭女士 沈天舒女士 邓 芝女士 李玫
忆女士 郭 晶女士

杨 宇女士 郑 菡女士 游琳姝女士 秦丽婷女士 王
晶女士 王 媛女士

屈晓苏女士 谢 峰女士 徐 敏女士 陈素萍女士 李
红女士 孙 蓉女士

刘新天女士 沈 嵘女士 董天乐女士 李凤琪女士 陈小燕女士 张品红女士

黄静巍女士 黄 虹女士 程 琳女士 姚 艺女士 武雪梅女士 马 青女士

厉建新女士 邵亚青女士 杨晟娟女士 王 泉女士 杨宏毅女士 王 林女士

李国光先生 张 慧先生 王 卫先生 赵 勇先生 张勇先生 和 谷先生

杨培书先生 黄一鸣先生 哈 博先生 赵文忻先生 游少华先生 王 戎先生

董瑞生先生 张玉升先生 陶 银先生 渭 水先生 李涛先生 朱文杰先生

刘 建先生 钟 渝先生 饶昌俊先生 文 峰先生 宋颖先生 游付强先生

和为剑先生 吴克珉先生 嘎 玛先生 张 忠先生 周仲君先生 王中俊先生

顿松林先生 何天泉先生 陈 东先生 高 峻先生 马鲁川先生 韩万德先生

谭生健先生 张 鹏先生 龚若飞先生 韩其军先生 张世安先生 杨耀健先生

刘明孝先生 杨尧唐先生 刑纪文先生 陈立军先生 马群

三先生 韩 伟先生

任振虎先生 任 重先生 冯国强先生 李喜龙先生 律玉
发先生 王继风先生

孙立群先生 党兴昶先生 纪 元先生 李养胜先生 邵立
峰先生 唐立心先生

宁 耘先生 陆 亮先生 沈 雷先生 俞步涛先生 熊
磊先生 孙大庆先生

黄蔚蔚先生 杨 迈先生 尤传楷先生 金朝晖先生 安立
阳先生 林 青先生

林伟民先生 牛龙菲先生 翁古五合先生

几点说明

我不认为这些言说者的声音代表了所有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沧海一粟”，他们的话和他们的情绪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但我认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话和情绪都需要得到尊重，甚至内容都不是绝对的重要，重要的是争得每一个人大声说话的权利。

我不认为他们所说的一切都绝对的真实，因为某个人受到某种刺激给他留下的强烈印象和某个人的倾诉欲，他也许会夸张一些东西，或者因为某个人对我的不信任和其他的顾虑，他会隐瞒一些东西。我会怀疑和正视这些可能被夸张或隐瞒的东西，但我不会因为只强调了这些细节而忽略那些更大的真实，当我走进他们的家里，

看到他们的神情，我知道我必不能了解的非常透彻，但我仍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判断相信那些真实。而且，我完全理解某些人在倾诉中夸张和隐瞒的动机，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在经受世上最大的苦难，这种并不客观的宣泄之所以出现，在于那些苦难带给他们个体的具体的感受，强烈到了他们无法从容的表述最真实的东西。有些事情，“对于国家，那是一段历史，对于个人，那是他们的一辈子。”另外，有些人的夸张是为了在讲述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对这种努力我同样尊重，这种天真的确认反映他的愿望，尽管可能事实并不存在，但愿望非常真实。我不能够在许多谎言仍然能够被容忍的时代里，要求这些普通人倾诉所有的真实，夸张和隐瞒同样是他们的权利。

我不认为他们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他们的任何一句话，都能够表明他们对事物的态度。如果你能够仔细阅读，即便是片言只语，也会显现出某些深刻的真理。

我不认为他们在倾诉中表现出的悲观和乐观都是可以被忽略的情绪，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漠视自己的感受，我们无法嘲笑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伤痛而怜惜自己，我们也不必嘲笑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喜悦而张扬自己。

我不认为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和情绪，实际上，有时候我会为遇到一位同道者而感到欣喜万分，甚至忘掉了旅途中的孤独和疲惫，有时候，我会因为某些谈话而感到非常压抑，我也曾因为不能理解而感到忧虑。更多的时候，我会在那些纵然是我非常认同的见

解中找到歧义，也会在那些我曾经认为不可理喻的见解中找到道理。倾听真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每个人都是一本书，你可以在阅读中认知别人，辨析自己。我从来没有打断过任何人的话，我和我的录音机一样忠实，我会鼓励每个人把话说完，我对每个人表示感谢，因为他信任了我，并不大委屈的展示了自己。我喜欢那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不认为我没有一个鲜明的态度，我选择了一个最广阔的民间，我有很主观的感受，我有资格像我所遇到的每个人那样倾诉。但我认识到，我不可以随便肯定或否定某个事物，在我对他不够了解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去看看。

最后，我当然不认为我听到看到了一切，我甚至不能够把我听到看到的一切完全展示在这本书里。我不认为它能够说明什么大的问题，它只说明这些人所叙述的事情和我短暂的经历。

为了给自己的旅行找一个可以比较容易被认可的和体面的理由，面对人们好奇的提问，我常用“体验生活”这个作家术语来解释，这让我感到可耻，生活是无法体验的。我为曾经这样回答而表示道歉，虽然那样更显得我更像个作家，我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回答，“我在写一本书”，或者，干脆，“这是我的一段生活。”

在这本书里，无论是哪个部分，我必将有所遗漏。我不能把每个人的倾诉都收录其中，我进行了选择，有些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选择。这也是我的遗憾，因为我非常珍视这些倾诉，那里有很震撼人

心的故事，很精彩的段落。

我在访问中好几次遇到这样问题，他们问我：“你把这些写到书里，对我有什么帮助呢？”我只能回答：“很遗憾，可能什么都帮不了你！”

还有几件事不得不说：按照我们习惯的做法，要为这本书找一个主题，我在旅行之中和整理此书时都未能找到让我感到缺了它就不名正言顺的那个主题，但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如果我说，它就是“人们自由的表述，”有一些朋友一定对这个总结不满意，所幸的是没有主题并不绝对妨碍我们阅读。另外，既然书的内容经过了筛选，为了阅读方便，也进行了逻辑上的整理，但我仅仅调整了那些重复和离题太远的内容，以致于某些篇章读起来仍不算流畅，为了不使它接近倾诉的原生状态受到质疑，我坚持不做更大的改动。